

第九章 希望得到权力的诸神

布尔什维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对比——斯大林十分关注托洛茨基在国外的活动——托洛茨基在俄国国内产生的影响——两代布尔什维克反对派——斯大林于镇压和自由姿态之间左右摇摆（1934年）——1934年12月基洛夫被暗杀和半自由时期的终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重新承认错误——斯大林派日丹诺夫执行“清洗”列宁格勒——1936年“斯大林宪法”的主要作者是布哈林和拉狄克——关于斯大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法庭庭长的评述——政治局的观点——斯大林的文学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他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友谊——1936年到1938年的“清洗”审讯——被告和指控所列的罪行——为什么被告们都“供认罪行”？——选择审讯的时机——图哈切夫斯基密谋——1936年11月斯大林公布新宪法——1939年初审讯结束，审讯的后果——托洛茨基被暗杀

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的事业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他开展了一系列的清洗审讯运动，几乎消灭了全部的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人们经常把这段黑暗的时期与法国雅各宾派执政的后期进行比较。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有相同点，以致使得这一戏剧的一些主要演员和观众经常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区别。罗伯斯比

斯大林政治传记

尔和斯大林的“恐怖统治”都具有可怕的性质，同样无理性的残酷，同样恐怖的表现，使得人们永远难忘革命中残酷性的情景。甚至恐怖事件发生的先后性都是相同的。罗伯斯比尔在获得了由丹东领导的雅各宾右派的支持后打败了艾伯特和克鲁兹所领导的雅各宾左派。然后他就把丹东和他的伙伴击败，在一个短时期内确立了他的雅各宾中派的绝对统治。我们知道，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中派的领袖，他起初得到布尔什维克右派的支持，击败了左派，然后转过来又去反对右派，最后他成为获得胜利的那一派的领袖，独占了政权。

但是二者具有显著的区别。雅各宾领袖们之间在革命的早期阶段发生相互屠杀。革命各个阶段之间存在着非常短的间歇；而且所有阶段中似乎都被同样盲目而新鲜的热情所笼罩。1793年初，表面来看山狱派和吉伦特派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君主。在10月31日，十个月以后，吉伦特派的领袖们就被送上了断头台。后来雅各宾主义达到了高潮，即迎来了所谓的理性的节日。不过五个月之后，在1794年3月，雅各宾左派的领袖就上了断头台。两个星期之后，丹东的尸首被刽子手展示给围观的巴黎人。罗伯斯比尔的个人独裁统治不到四月，在7月27日就被推翻了。一连串事件以疯狂的形态毫无节制地发展开，毫无节制的人类理性、自我保存和自我约束的本性好像都失去了作用。表面看来领袖和追随者，派别和个人，都在发挥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但没有完成推翻封建统治使命的法国，却在这种狂热中自我毁灭了。

俄国革命的一系列事件与法国革命的情况相比是有区别的。早期20年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还没有雅各宾派那么狂热。在1918到1921年的内战期间曾发生过恐怖的事件。但那种恐

斯大林政治传记

怖还只是针对做好武装并具有挑衅性的反革命的一种军事策略。那场战争所具有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方法和目标。与雅各宾派相比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对布尔什维克采取处死的方法。一些最著名的孟什维克的发言人如马尔托夫、阿布拉莫维奇、唐恩，在布尔什维克查封了他们的党之后，或者被允许离国，或者自己流亡国外。留下来的极少的一部分人则被监禁起来，但大多数孟什维克承认了自己的失败，都忠实地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后来，有的孟什维克者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员。

俄国的山狱派既然能够赦免孟什维克者，因此就能够做到不处死他们的领袖。三十年代早期，在布尔什维克中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在斗争开始时，它的领袖们曾秘密而庄严地发过誓言，在反对敌手时坚决不使用处决这一手段。暂且不评论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可以肯定斯大林是的确考虑过法国的恐怖先例的；而且在几年里这种考虑使他没有采取最激烈的镇压手段。他曾这样说过多次。例如，他曾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要报复托洛茨基的做法，说：“我们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建议，是因为我们知道，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流血的做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险的，并且会产生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处死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就会无人存在了？”他似乎是说，二十世纪的革命可以摒弃自己的子女，但不能把他们置于死地。1929年，他下决心逐放了托洛茨基。但仍不会采取措施把托洛茨基监禁起来，更不会处死他。一直到了几年以后，当革命似乎完全冷却下来时，才发生了新的恐怖行为。斯大林的敌手们都承认了错误并进行了检讨，而大多数雅各宾

斯大林政治传记

领袖在审讯中表现出了傲慢和轻视的姿态，二者成为鲜明的对比。基于这种原因，使得斯大林的清洗审讯比罗伯斯比尔的更易迷人。

法国大革命是自发爆发的，在大变动的过程中它的各种党派产生，这些党派没有提出自己稳定的纲领和清晰的指导思想。它们是革命大潮流的一部分，随着运动的发展，它们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和口号。雅各宾主义的力量在于它要彻底摧毁法国的封建统治，它的弱点则在于它不能提出一种新的有效的社会组织。罗伯斯比尔提出在法国建立一种乌托邦社会组织，而这种乌托邦以小私有制上的社会平等为基础，而法国更适合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他努力想使整个法国转变为下层中产阶级的社会，因而他割除了他的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敌手们。法国挣脱了罗伯斯比尔想迫使它躺下去的普罗克拉斯提斯床，抛弃了那位曾经使它废除了封建主义的乌托邦独裁者——这样法国就可以取得和恢复资产阶级性质的进步。雅各宾主义拥有很微弱的支持力量，因为它的各派对社会的需要和国家的前景没有任何现实的和积极的观点。

布尔什维主义的支持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本身不是革命潮流的产物，在革命爆发前，列宁的党就是一个坚决不允许自发运动的紧密组织的团体。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时就已确定了纲领中的主要路线。即使在革命处在低潮时，这个党虽然内部意见不一，仍然向国家提供了一个对社会发展有建设性意义的纲领。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中，它的理性观点维护着它，反对由革命产生的专制主义所具有的非理性的做法。在大约二十年中，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向祈求获得权力的势力屈服。但是当它们向它们屈服后，它那种卑贱的行为甚至比雅各宾主义更为丑

斯大林政治传记

恶。

虽然更为丑恶，但并没有取得完美的结果。斯大林本人不像罗伯斯比尔那样，并没有被送上他自己设置的断头台。

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斯大林一定轻松了许多。托洛茨基即使在西伯利亚的流放中仍然保持着和那些不屈不挠的追随者的联系；离开俄国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不令人满意，致使气氛紧张，为此他还必须进行有力的反对。斯大林同凯末尔帕夏政府达成了协议，将托洛茨基放逐到了土耳其。他希望托洛茨基到了那儿之后将失去与外界的联系，从而就无所作为。但是托洛茨基在流亡中仍用他留下的惟一武器——笔继续进行战斗。在居住的太子岛上他出版了一份名叫《反对派公报》的小型期刊。他亲自在刊物上连续撰写对苏联和共产党政策的评论。这个不显眼的刊物最初却对旅行国外的苏联官员影响颇大，他们读它，还常常带回国去，让朋友们看。每一期刊物斯大林自己也仔细地阅读了。这刊物对俄国国内发生的事反应极为迅速；而托洛茨基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评论家。斯大林的一些行动，首先是在《反对派公报》中有所体现出来的。而且，《公报》对于反对派的情绪和希望比斯大林的政治警察的更有启发性。

斯大林没有低估托洛茨基在国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不能忘记列宁的《火星报》是一份同托洛茨基的《公报》一样不引人注意的报纸，却一度“点燃了革命的火焰”。诚然，托洛茨基现在是宣扬改革而不是革命。他的《公报》不像布尔什维克以前的报纸那样隐蔽，而使得俄国工人几乎很难读到。它在高级官员和有影响的党员中自由广泛的流传，他们中很多人都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在托洛茨基手下工作过，而且对托洛茨基仍有遵从之情。在托洛茨基被放逐到太子岛后不久，政治警察的一个头子布鲁姆金在国外旅行时拜访了他。斯大林决心坚决避免这类接触。为了警告众人布鲁姆金被枪毙了，一个反对派的同情者遭到这种极刑这似乎还是第一次。过了一些时候，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及其家属的国籍废除了。从此以后，任何同托洛茨基有任何接触的人，都将被视为同“外国阴谋者”交往。

但是，托洛茨基继续在国外施加某些影响，特别是在1932年到1933年的危机时期。当危机发展到高潮，大约就是斯大林的妻子自杀时，《公报》发表了一篇较为详细的评论经济形势的文章，包含有统计资料，而这些资料除了苏联政府的成员其他人是很难看到的。这篇没有署名的评价总结道：“因为我们的领导没有办法摆脱经济和政治的僵局，关于改变党的领导的要求正在增强。”这篇评述的作者是打败高尔察克的I. N. 斯密尔洛夫，他追随托洛茨基，“投降”之后被任命了职务。托洛茨基对取消他的国籍一事表示抗议，也再次提醒他过去的同志，要他们记住列宁曾立下的关于“撤换斯大林”的遗嘱。

俄国的反对派显露出一些反对倾向，但并没有采取行动。从西伯利亚回来并归顺了斯大林的领袖们虽然对斯大林政策的深有不满意，但却不能对这些政策表现出公然的反对。托洛茨基虽然一直致力于批评斯大林，但他却没有坚定的实际结论。在1932年秋天他写道：“当前，斯大林的统治均势的垮台，对反革命力量肯定是有利的。”这也就是劝告反对派，可以做的事情只有进行宣传。不过，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又宣称：“过段时间我们将看到，左翼和右翼反对派既没有被击溃，也没有被消

斯大林政治传记

除，恰恰相反，在政治上它们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1932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许多人又被开除党籍，并流放到西伯利亚。这时季诺维也夫说道：“1927年抛弃了托洛茨基，这是我今生所犯的最大的政治错误。”托洛茨基《公报》上那篇述评的作者斯密尔洛夫被逮捕了，还有宣传负责人柳亭和莫斯科党委书记乌格拉洛夫都被捕了。季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离开了他们的那些想同左翼反对派妥协的同志们，并反省了自己的观点。然而，几个月之后，在1933年5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再次承认错误之后，同意不再流放而回到国内。托洛茨基评论这些新的“投降”说：“就像果戈里笔下的人物，斯大林由于没有活的，就去收集死的魂灵。”多次的放逐和承认错误是为斯大林的目的服务的：放逐使反对派感到害怕，而承认错误又对他们进行诱使和欺骗。不过，托洛茨基的嘲笑是有一定的道理。不满情绪在党内普遍存在。1933年到1935年间，有几百万人遭到开除；被开除出共青团的则更多。值得注意的是，不满情绪开始表现为一种新的形式。反对派中的两代人之间产生了分歧，这就是父与子的分裂，但这与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中的那种分裂是不同的。

此时，反对派中的老人不仅早就遭到了挫败，而且精神上已经支撑不下去了。甚至前乌克兰总理、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拉柯夫斯基曾经表现得很顽强，但最终也投降了，并在1934年回到了莫斯科。他像所有悔过者一样，也签署了一项声明，在此声明中对斯大林的吹捧和对自我的谴责随处可见。所有的这些声明主要是讲，斯大林执行的政策是惟一正确的，反对派所鼓吹的任何路线都会带来不幸。不过，这些“投降者”并未承认他们是在致力于恢复资本主义。也没有人要求他们对此承

斯大林政治传记

认。他们自我谴责是在表明，如果采纳了他们的政策，就会与他们的初衷产生对抗，使国家遭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他们同意进行这种“自我批评”的原因，并不只是由于他们遭到了斯大林的严重打击。事实上，他们之所以屈服，就足以表明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力量了，或者就是在消极地进行反对。仅他们的年纪就证明了他们已经疲倦了。“投降者”中的大部分都已进行了三十或四十年的斗争，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进行秘密的地下斗争。他们三心二意地进行反对，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不管他们对他的方法如何考虑，斯大林完成转变是肯定的，否则就会对革命产生损害。尽管他们对斯大林的方法充满了惧怕，但他们已意识到，他们包括斯大林分子和反斯大林分子，所有的人都是在同一条船上的。自我贬低就是他们付给这位船长的赎金。因此，他们承认错误的态度既不是完全诚恳的，但也并不是完全不诚恳的。他们从流放地回国后，都尽早的同政治上的老朋友和老关系进行来往，但反对斯大林的任何政治行动他们对此十分小心。大约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他们中几乎全体的人都同斯大林的新政治局成员有着联系。像布哈林、李可夫、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人，这些悔过者或者是斯大林的个人顾问，或者就是政府成员。他们是有许多时机可以暗害斯大林或他的亲密同伙。

托洛茨基在俄国的一个记者描述了这些悔过者在 1933 年的情绪说：“他们所有的人都在对斯大林的孤立和对他的普遍仇恨进行着谈论……但是他们往往又说：‘如果不是亏了那个……现在一切都已经摧毁了。正是他使这一切得到了维持。……’”在反对派的队伍中，上一辈的反对派抱怨、叹息，希望排解闷气。他们继续把斯大林称为政治局中的亚细亚人、成

斯大林政治传记

吉思汗、新的伊凡雷帝。斯大林马上就得到报告，即关于这些抱怨和称号，因为他的耳目遍布各地。他明白蒙受耻辱的反对者的真实感情和他们公开颂扬的价值。但是他也相信，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缺乏力量，所以他们至多是使用比较激进的词句。

毫无疑问，反对派中的老战士们把模糊的希望寄托于将来。因此他们认为，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经济上的繁荣和政治上的满足就会实现，然后斯大林严厉的统治就将成为不必要或能够忍受。这时他们只好等待合适的机会，并对他们之中的青年人和更无耐心的追随者进行约束。在 1933 年 3 月，甚至连痛批“胆小的投降者”的托洛茨基也写道：“在党内外，‘打倒斯大林’的喊声日益强烈。理由……在这儿是不用解释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问题在于他的集团而不在于斯大林本人……大家都知道，群众被迫崇拜的由一个领袖掌握的波拿巴政权，是应该和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是对革命政党思想的最无耻的歪曲。但是我们对排除个别人并不觉得重要，我们所看重的是制度的改变。”当这个政权面临自由化的严重危机时，托洛茨基甚至提出与斯大林进行合作的建议，以共同抵抗反革命的危险。

这些老战士的坐观态度不能不引起得不到满足的青年人中的不满。这些“儿辈”的反对派使用比“父辈”更大的热情，试图去反对让人忍受不了的独裁统治，这件事本来无可避免。新一代的行动策略绝对是不同于老一代的——更不用说承认错误和自我羞辱这种令人作呕的做法。他们对于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伟大的领袖们还是有些尊敬的，希望他们的名誉能够得到恢复和使他们能够再次得到政权。这些“儿辈”不仅感到“父辈”在教育 and 政治经验上比他们高，而且“父辈”的主要想法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他们也表示认同：“回到完全纯正的列宁主义去”，不管这意味着什么。在选择的方法上，他们是不同的。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对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暗杀沙皇仆从的行为表示反对；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依靠群众运动力量的壮大来反对沙皇制度。他们对那种政治传统还是忠顺的，希望通过改变工人阶级的态度，而不是依靠背着人民的个人密谋活动对这个政权进行改革。“儿辈们”对这些约束则置之不理。他们看到，现在的产业工人阶级绝大部分是刚刚从农村招来的不成熟的农民，他们的政治觉悟是极其低的，他们几乎不具有任何行动的能力。如果要通过那个工人阶级来实现改革，那么国家就得忍受斯大林的专制统治许多年。这些最热情的青年反对派是绝对不甘心看到这种前景的。在学校和共青团的小组中，他们听到了那些俄国革命家孤力无援的故事。那些人在十九世纪时，几乎没有得到俄国任何社会阶级的支持，就用武力去进攻专制制度。列宁的哥哥不就是参加了对沙皇亚历山大第三进行暗杀的密谋吗？教科书中对那些烈士和英雄进行了大肆的宣扬；而过去的这些神圣的亡灵现在好像把暴力又带给了这些不耐烦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共青团员。

在反对派分裂的同时，政治局中也出现了新的意见分歧。它的成员虽然都是由斯大林本人任命的，并誓死保卫现在的制度，但在手段和方法上他们却有分歧。有些人敦促斯大林把更多的自由主义政策加进他的专制主义，而另一些人则主张实行高压政策。基洛夫、伏罗希洛夫、鲁祖塔克和加里宁好像是属于“自由派”的。伏罗希洛夫不得不认真对待集体化对军队士气所造成的影响。远东地区军区司令员勃柳赫尔将军表示，如

斯大林政治传记

果在边疆区强行集体化，他就无法负担捍卫远东疆界的责任。伏罗希洛夫在政治局对勃柳赫尔的观点表示支持，因而免除了远东的农民集体化。基洛夫被派到列宁格勒对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进行镇压，但不管是否情愿，他却不得不为列宁格勒的不安情绪进行辩护。他恳求斯大林对反对派采取宽松的态度；而且在他权力范围内，尽力约束政治警察。副总理和工会领导鲁祖塔克也在这个方面运用自己的权力施加影响。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则极力鼓吹高压手段。

不容置疑，他们中所有的人都是忠于斯大林的。他们是斯大林的禁卫军领袖。公众看到他们同斯大林步履一致，因而对这种权力的暗中争斗是毫不知晓的。斯大林本人冷静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对它毫无畏惧。对手们依靠他的明智，期盼着他的裁定。他一段时间支持这一派，过一段时间又支持另一派。他在1934年一年中都动摇于加强镇压和实行自由之间。1934年春天，他命令对反叛的富农采取有限度的赦免政策。但是到了6月他又发布命令，对谋反的家庭实施连坐法。人们对谋反的亲属如果不向当局进行揭发，就要遭到严厉的惩罚。他在一个月以后取消了格柏乌，接管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当局又规定限制政治警察的权力，总检察长被赋予对政治警察的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力；如果它的活动违法，能够对此进行否决。反对派的领袖们在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是得到允许的，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也是得到批准的，但批评现存政权除外，进一步采取自由化措施的要求很强烈。政治局也有要改革宪法的要求；反对派的几个主要领袖被邀请来共同起草制订新宪法。

1934年12月1日，一个叫尼古拉耶夫的年轻共产党员在列宁格勒暗杀了谢尔盖·基洛夫，于是这种半自由的时期就突

斯大林政治传记

然终结了。斯大林火速来到列宁格勒，亲自对恐怖主义者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审问。这次暗杀是一个小团体的青年共产党人干的，他们被国内的镇压政策所激怒，并受革命恐怖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这种情绪在青年人中普遍存在。尼古拉耶夫和他的朋友们认为自己是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但他们同他并没有任何联系。基洛夫对政治警察对他加以严密警卫深表反对，也许正是因为基洛夫的这种自由主义，使得恐怖分子才能够有机会接近他在斯莫尔尼学院的办公室。无论如何，列宁格勒的格柏乌对暗杀预谋是知道的，但没有采取行动来对此进行制止。对斯大林是否也知道这个预谋并对此默认了这一事还不能肯定？不过他利用基洛夫之死对他的结论给予了证明，半自由的让步时期已经结束。他打击反对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他只是把反抗分子赶到地下。现在他要进行更严厉的打击。

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俄国专制制度的历史上是非常常见的。在沙皇统治下的每一代人中，同反对派中温和的“父辈”和激烈的“儿辈”之间的决裂相对应，在宪兵当局和沙皇扈从的半开明派之间也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暗中争斗。甚至在专制制度比较温和的时期，它也没有达到可以使反对派得到满足的开明程度，而只达到革命者可以对之进行打击的温和程度。温和的“父辈”徒劳地劝说激烈的青年对沙皇作出进一步的让步要有耐心等待。想对专制制度进行的每一种变革都得到一样的结果。在统治集团中，半开明派被打败了，重新掌权的是宪兵当局。宪兵当局并不满足于镇压革命者，他们还提出温和的反对派应对激烈青年的行为负责的要求。开明派就对此表示反对，并指控专制制度不允许存在公开而合法的反对派，因而要对青年的过激做法负道义上的责任。因此，在亚历山大第一统治下

斯大林政治传记

存在着半开明的改革。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是宪兵沙皇、铁沙皇尼古拉第一统治开始的前奏。半开明的亚历山大第二被密谋的革命者暗杀以后，他的继位者亚历山大第三就采取了暴力镇压的措施。最后一个沙皇的政策则在两条路线之间摇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由于一个没有得到巩固的、革命后的社会独有的紧张局势，俄国政治斗争的这些传统特点就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尼古拉耶夫和他的同伙受到了判决。他们是根据一项关于恐怖分子没有辩护和上诉权利的特别法令被秘密审讯的。斯大林不允许尼古拉耶夫一伙人把审讯席作为陈述自己观点和控诉统治者的地方。他还不满足这些。他像过去的宪兵当局一样也为激烈的“儿辈”的行为而对开明的“父辈”进行谴责，指控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要对基洛夫遭到暗杀负责。对他们进行的也是秘密的审讯。两人都不承认同这次暗杀有关。在谴责时，他们一致认为，这些青年恐怖分子可能从过去他们对斯大林的批评中受到某种影响；但是他们宣称，由于斯大林压制公开的批评，迫使这些共青团员进行这些毫无希望的暗杀行动。季诺维也夫被判十年、加米涅夫被判五年监禁苦役。但是，斯大林这时对把这两个老布尔什维克关在监狱里的做法并不感兴趣，因为这会使他们成为殉道者，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还会达到重新树立他们作为合法要求政权者的形象。斯大林主要的目的在于诱使他们承认有罪的口供；根据口供，他们就会自己摧毁自己。

接下来的就是一个关于承认错误方式的稀奇古怪的商讨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所在的卢布扬卡监狱之间展开的。斯大林同意公开宣

斯大林政治传记

布这两个囚犯同暗杀者毫无关系；但他要求他们承认自己希望达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但遭到了两名囚犯的拒绝。于是斯大林就利用了他们已经承认的，即恐怖分子曾从反对派往日对他的批评中得到了鼓舞。不管是用恐吓还是用辩论的方法，斯大林终于使季诺维也夫公开承认了那一点。季诺维也夫说：“由于客观环境的影响力，以前的反对派曾做过的活动，必将促使那些犯罪者堕落。”也就是导致基洛夫遭暗杀。这句话既是诚恳的，又是一种敷衍。谴责恐怖行为是诚恳的；斯大林是能够从季诺维也夫那儿得到这种认可的，因为季诺维也夫也希望反对恐怖主义。但是季诺维也夫特别谨慎地强调，他只能承担间接的道义责任——他的意思，就是唯有“反对派过去的活动”可能鼓舞了恐怖主义的倾向。这种说法还隐含着对斯大林的谴责，因为他的话是说，恐怖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客观环境”，即由于全国的镇压气氛造成的。此时，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不准备进行更多地自我谴责；而斯大林也只好如此。季诺维也夫设辞略施技巧，对他的“承认”作了两面的解释，这对公众毫无意义；承认本身就是说明问题。反对派的领袖们下滑得太远，最终带来了大清洗审讯。

基洛夫遭到暗杀使斯大林警觉起来。密谋者会不会已渗入他的办公室里呢？在1935年春季，大约有四十个他的私人警卫被秘密审讯，两个人遭到处决，其余的被不同期限的判以劳役。报纸上没有对这次审讯做任何评论。接着，就在党和共青团的一切部门中对恐怖分子进行疯狂的搜查。这时斯大林的行动原则是，仅仅打击他的真正敌手已经不够了，他要彻底清除产生他们的环境。他把全部的愤怒都发在列宁格勒上，因为它的守护神在最近十年来似乎一直在以蔑视的态度对待他。他把

斯大林政治传记

安德烈·日丹诺夫派往到列宁格勒去接替基洛夫的职务。日丹诺夫是一个年轻、能干而冷酷无情的人，他曾经担任清洗共青团中异端分子的任务，并在同工会的斗争过程中，以对托姆斯基进行毫无顾虑的攻击而知名。斯大林可以依靠他去捣毁列宁格勒的反动窝点。在 1935 年春季，许许多多被怀疑的布尔什维克、共青团员和他们的家属遭到流放，从列宁格勒流放到西伯利亚北部。从其他城市也有很多“暗杀基洛夫的人”被流放，监狱和集中营都被他们塞满了。

对政治犯的待遇也发生剧变。过去，他们的待遇同沙皇时代还没有任何不同。政治犯可以享受某些权利，享有从事自我教育的权利，甚至被允许进行政治宣传。反对派的备忘录、小册子和期刊在监狱中被半公开地传递着，偶尔还被夹带到国外去。斯大林自己就作过囚犯，亲身体会到监狱和流放地是革命者的“大学”。最近的事件也向他证明不要冒这个险。此后，在监狱和流放地的一切政治讨论和活动都遭到严厉的镇压；反对派衣食匮乏，劳动艰苦，过着牛马般的生活，最后导致了不能正常地思考和形成自己的观点。

当斯大林已经抛弃了自由改革的希望时，他仍假装愿意满足这种改革的希望。他给人民提供的是一种恐怖和幻想的混合物。他行动狡猾，因为他带给人民恐怖，就很易于促使他们采取绝望的暴动，最有力的政治警察也会变得无能为力。但是如果不同时期用恐怖手段来掩护它的话，仅带给人民幻想也不足以保护斯大林的政权。在 1935 年 2 月 6 日基洛夫被暗杀后两周，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认为当前需要一部新的宪法，并选举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这个委员会由斯大林领导，包括像布哈林、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一类的人，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还有他们未来的起诉人维辛斯基。这个委员会在后来的一年半里经常在斯大林的主持下开会。布哈林和拉狄克作为新宪法的主要作者，他们频繁地在《消息报》和《真理报》的专栏中对此进行讨论。这部宪法于1936年11月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这时正赶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处决后几个月。这部宪法被称为“斯大林宪法”，“世界上民主性最高的宪法”。

在对基洛夫被暗杀前后的形势作描述时，我们说到了沙皇专制制度下传统的政治模式。这种类比看起来可能是生硬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和沙皇俄国之间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不过，正是列宁第一次隐晦地提起了这种类比。在最后几次报告中的一次中，他要求追随者注意，当征服者的文化比被征服者的要低一些时，历史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被征服的民族会强迫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列宁说，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中也有这类的事情发生。布尔什维克已经把地主、沙皇官僚制度和资本家打败了。但是，列宁说：“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但与我们的文化相比还是要高一些。尽管他们的文化水平特别低，可是比我们作负责工作的党员的水平要高一些。”

布尔什维主义为被击败的沙皇俄国强加了他们的标准和方法，列宁看到的只是开头的一部分。对于作出英勇努力，希望摧毁过去的一代人来说，过去对他们的报复也是残酷的；而恰恰在第二次革命的过程中这种报复达到高潮。在斯大林身上就体现了俄国历史的这种怪事。任何人都比不上他能代表那些“做负责工作的党员”，他的“文化”与俄国的老统治者相比要低得多，因此他最重要的爱好就是对老统治者的习俗、习惯和

斯大林政治传记

做法经常不自觉地去模仿。这个历史上必然发生的过程，在斯大林政治外貌的变化上表现为：不是一个而是几个沙皇的特征的总和，似乎在目前掌握政权统治着克里姆林宫的那个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身上再次出现了。有一段时期，他表现得有点像被称为铁沙皇的尼古拉第一。另一些时候，他又表现得更像彼得大帝的直系子孙：彼得大帝把他的圣彼得堡建设在沼泽和建筑者的白骨上，斯大林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建设工业化的俄国，然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假装和模仿地极像亚历山大第一。现在，在大清洗的期间，由于他对自己的反对者采取镇压的政策，他就越来越像激烈反对特权贵族的伊凡雷帝了。由他任命组建的政治警察既看管工业企业也看管监狱，这也极其类似于使伊凡雷帝获得支配地位的禁卫军。在他同托洛茨基的争论中，人们还可以回想到伊凡同特权贵族的反叛领袖基亲王库尔布斯激烈论争的模糊情景。莫斯科的人们现在就像在十六世纪一样，也是“在恐怖中祷告，但愿这一天没有人被处死”。在这种历史的报复中，似乎时间久远的过去比时间短近的对向前运动着的民族的赶超力量更大。能得到世人承认的，只是那些早期具有勇猛精神的开疆拓土的沙皇，而不是更亲近、更温和、更“开明”的，但却处在沙皇制度衰落过程的沙皇。过去对现在压迫的残酷性，是同革命开始抛弃过去的决心成比例的。

但是，斯大林身上所具有的，那种革命的因素，特别是从列宁继承下来的那些特点，同传统的因素奇异地发生了结合；而这种结合使他成为不能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和捉摸不透的人。过去并没有使革命消失，而只是在新社会中留下了自己的烙印。斯大林现在就像克伦威尔作为护国公和拿破仑作为皇帝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一样，也仍然是革命的保护人和托管人。他使民族的利益得到了巩固，并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利益。他领导“建设了社会主义”；甚至他的反对者，在批评他的专制时，也承认他的经济改革的大部分对于社会主义的确是重要的。因此，过去的报复对他的社会纲领没有产生影响而只影响了他的统治手法。主要就是在这一点上，“低得可怜”的沙皇制度传统才起了支配作用。

我们知道，他搞权术活动，说明他对社会持不信任态度，对处理社会问题持悲观态度。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是靠压制而不是靠说服。甚至当他企图采用说服手段时，他也采取宣传花招，而不是启发式的论点。他吸取了各个不同时代和国家统治者征服人民的种类不同的阴谋诡计。由于革命宣传把信任人民作为其指导原则，即信任工人阶级；又由于它曾经批评政治欺骗是为阶级压迫服务的，所以过去的报复必然要引起各种思想的大冲突，使其发生了思想危机，最后在这一代人中共产主义的面貌就被改革了。这是权威和社会冲突长期发展的后期阶段。权威希望彻底地从上面来塑造社会，而社会却希望拥有自决的自由。

这种冲突并不是只存在于俄国革命中，它在每一次革命和每一种宗教教义中曾多次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代夫兄弟》中有一段文字，那位宗教法庭庭长同基督之间进行的一场深刻、阴郁而激动的争论。正是这种冲突导致这场争论的本质，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法庭庭长一样，斯大林也代表了教会去反对福音。在争辩过程中，宗教法庭庭长说，基督把他的教导建立在对人、对人的自由梦想以及对人在自由中生活的骄傲和勇敢上。因此他对撒旦的引诱给予了拒

斯大林政治传记

绝，并不愿依赖人的奴性而使他们皈依。但是基督教对基督的这些教导却不能真正实现。因此宗教法庭庭长当基督重临人间时就对他说：“我们已经对你的行为进行了纠正，并把它建立在奇迹、权威和神秘之上……人们，因为他们又像羊群一样再一次得到了领导而感到高兴，而且最终从心底产生了那种可怕的天赋权力，这种天赋权力给他们带来的痛苦非常严重。我们的这种教导和行动是正确的？毫无疑问，我们是热爱人类的，当我们认识到人类的软弱无力时，我们用热爱之心去减轻他们的负担，而且只要我们同意，甚至还可以容忍他们的弱点甚至犯罪。为什么您现在要阻碍我们呢？”

宗教法庭庭长紧接着说：“我再重复一次，就在明天早晨，您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温驯的羊群，我们只给一个暗示，就会冲到火刑柱前堆满炽热的炭块中，您会因为阻碍我们而被烧死。您最应受到我们的火刑，明天早晨我们就要把您烧死。”在宗教法庭庭长的牢房中，基督“向那个老人走近，亲切地吻了他那苍白的、已经有九十岁的嘴唇”，仿佛他已经对关于他的教会的自由和尊重人的神秘、奇迹和权威的那番话表示认同了。

许多教义已经接受了这种谈话，布尔什维主义也不例外。如果斯大林过去已对他的高深的哲学做过解释，他一定会公开地讲，俄国必然地需要对“十月革命”进行纠正，并对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所享有的自由、进步和团结的最初信念进行清理消除。他会解释宗教法庭庭长的意思说：“只有建立在上帝的选民和在这种信念基础上而采取的行动才可行，而人类是软弱的，他们渴望着面包和权威。”他会以一种苛刻并且恐惧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阻碍我们呢？”

斯大林政治传记

斯大林明白，老一代革命者虽然已经感到疲倦和受到羞辱，但其中大部分人，从来都不是心甘情愿地皈依奇迹、神秘和权威的；而且他们认为斯大林是一个篡改最初原则的人和篡权者。他把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前政治犯协会和共产主义学院都解散了，这些机构都是老布尔什维主义者最后的精神支柱。这些行动表明了自从他借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名义开始同“前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斗争以来所经历的一切。这时他号召青年人，当然不针对有倔强精神的青年，而是向胆量小但却很重要的青年；这些青年虽然热爱学习并盼望取得社会进步，但不太了解或根本不知道布尔什维主义早期的思想，而且讨厌费脑筋去了解学习这些。这些较年轻的一代，从他们能记忆起，就一直认为各个反对派的领袖是受鞭笞者或自我鞭笞者。从童年起，他们就对笼罩在权威和神秘之中的斯大林感到害怕和恐惧。他早已不再是党的书记处中那位可亲可敬、充满耐心并乐于助人的代言人了，二十年代早期的斯大林早已不存在了。他已不再有耐心在党办公室的楼梯上倾听人们的抱怨。他现在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已经很少了，而且周围总是有一大批随从护卫；这些随从就像朝臣一样，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小心谨慎地遵守着已经固定下来的先后次序。他已经很少对公众讲话，而且每一次讲话都被视为历史的里程碑。他的讲话总是以独裁者命令的形式出现，但对于各行各业的人们确实都有一种实际的意义。他个人距离群众日益遥远，而其影响却处处都有，这使他的形象特别在青年人心中带上了一种令人敬畏的性质，而这是东方统治者经常使用的一种使人民加深印象的方法。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他的随从就是他的政治局。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这个政治局都是他的，因为它的人选都是他以自己的标准亲自挑选的。早在1925年他就写道，文学界的人不能成为这种“新型的”领导者；背着旧社会民主主义的货色的人也不可以；新型的领导者应该害怕而且尊敬党的领袖。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科西奥尔、米高扬、鲁祖塔克、安德烈耶夫——这些人基本上是符合这一要求的。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搞实际工作的行政官员，而且对自己效忠。他们都没有到过外国，都是土生的布尔什维克，这同斯大林是一样的。他们中大部分人是斯大林从小人物中提拔出来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也同责任一样在不断的增加。全国的一切事情，不论是外交和政治的大政方针，还是各省区当局最次要的麻烦事情，都要经过这个机构的讨论，因此它几乎每天都在开会。政治局有对部际间无休止的争执做出裁决，而斯大林在政治局中又能一人决断。政治局的会议他几乎没有主持过。通常他都是静静地听着争论，中间会说一句粗俗的玩笑，做一次半认真的威胁，或者就摆出一种粗暴的不耐烦的姿态，大多数问题就算是被解决了。他们之中的少数人，在多年里，不得不亲自对工业和农业各个部门的措施、供应军队的武器形式问题、教育问题等等作出决定，于是就积累了很多不同部门的技术知识，而这是行政官员在比较不集中的制度下工作所不容易做到的。难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外国政治家和将军对于斯大林对他的巨大战争机器的技术细节了解的极其深入都有深刻的印象。但是这种管理方法过分集中，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它使各级行政机构产生了一种害怕创新和担负责任的不

斯大林政治传记

良风气；它把每一个官员的作用都降低，导致整个机构不能正常运转；或者更坏的是，当上级人员没有及时发号施令时，就会使机器纯粹因惯性的作用而向错误的方向运转。因此，整个行政机构就充满了官样文章和官场虚礼，如果有不怕负责的作家存在，这些情况便给一些伟大的讽刺作者提供了写作的材料。

斯大林对把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国家的一切事务上并不感到满足，他还希望自己能成为与他同时代的人中的惟一的精神领袖。他所以要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精华曾伤害过他的虚荣心，在他还没有把这些人置于自己监护之下时，他们还没有太注意他；甚至最初还嘲笑他关于科学、艺术和哲学的看法。除此以外，还因为他曾经对政治学和经济学上的异端采取禁止政策，但却发现在文学和哲学的刊物上也同样存在着许多的异端学说。对斯大林而言，冒险闯进这些领域，已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现实中，马克思主义已经把政治学、哲学和文学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但斯大林却把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内部联系粗鲁地过分简单化了，以致把科学、艺术和历史降低成了政治的附庸。每当他发表新的经济和政治指示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作家都必须认真地核对一下，查找他们最近的著作中是否有同这位领袖的定论发生冲突的地方。

其中历史学家的遭遇最惨。早在 1931 年时，他就在著名的《致 无产阶级革命 编者的信》中对历史学家严厉批判。这是一本专门刊登革命史的杂志，曾刊载了“托洛茨基派的秘密文章”。于是最近的历史必须要重新改写，以便按照斯大林的意愿来描述他的对手。随着斗争越来越激烈，由斯大林授意写作的历史著作证明对他敌手的贬低还不够，于是就不停地撰

斯大林政治传记

写新的著作。由于权术上的需要，官方也改变了对较远古历史的态度，旧俄的历史也就不得不重新改写了。托洛茨基曾经在文学评论方面影响巨大，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官方权威，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文学评论家的缘故。于是整个托洛茨基文学评论派就不得不被彻底消除。哲学家们曾经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进行讲授；尽管列宁同这位孟什维克领袖在政治上是对立的，但仍对他的著作给以很高的评价。而斯大林却召集哲学教授和讲师们到办公室来，他们“腐朽的自由主义”遭到严厉的批评，并禁止哲学家前辈德波林教授和他的很多学生，在大学讲课和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可以列举出许多强制统治知识界的事例。到了最后，这位伟大的领袖被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吹捧为他们时代和一切时代的最伟大的文学评论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迪斯雷利一次曾吹捧维多利亚女王说：“陛下是文学界的领袖”；但麦考利和卡莱尔的写作并没有被要求去按维多利亚女王的风格进行。现在斯大林被宣布为文学界的首脑，“像斯大林一样地去写作”，苏联作家们有了义务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写作。

结果，俄国文学编年史中可憎的是：斯大林个人的风格变为了俄国的国民风格。在评论和小品文的写作中都不得不直接引证一两段斯大林的话，而且他们还得非常谨慎地使自己的句子在风格和语汇上尽可能与引文保持一致。因此，俄国报纸和大多数期刊都变得非常单调。口头语言也“斯大林化”到了一个荒谬的程度，至少当人们评论意识形态和政治时是这样的。仿佛整个国家都陷入耍嘴皮子的功夫中。

这种统治者的风格上升为国家的统治风格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但如果这位统治者确实有较高的文学才能，那也许能够

斯大林政治传记

让人容忍。事实上，这个国民的风格已经急剧退化，其特点就是僵硬，令人厌烦的重复、粗鲁，再加上伪科学的夸夸其谈以及杂乱的语法和逻辑。在斯大林掌权后，他的风格比以前更加粗鲁了。一个人在其作用上是伟大的、富有戏剧性的，但是写作和演讲的风格上却是异常单调的、让人感到沉闷，只是在偶尔引证一下俄国通俗的讽刺作品或开一个庸俗的玩笑时，风格才略显活泼。对比如此明显是令人吃惊的。下面就随手举出具有这种风格的一篇文章，这是他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最后几段文字：

我们的党才是惟一知道把事业引向何处，而且成功地把它引向前进。我们党具有这种优越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党，是列宁主义的党。因为党在实际工作中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毋庸置疑，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这个学说，只要我们掌握好此方向，我们就能在自己的工作中取得成绩。

有人声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某些国家中已经被取消了。有人还宣称，马克思主义似乎被一种叫做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消灭了。这明显是在瞎说。除非不懂历史才会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是代表着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要消灭马克思主义，就不得不先做到消灭工人阶级。而消灭工人阶级是不可能的。自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以来，到现在已经八十多年了。这段时期，有几十个几百个资产阶级政府都有消灭马克思主义的企图。结果怎样呢？资产阶级政府迅速颠覆，而马克思主义一直存在。不仅如此，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完全的胜

斯大林政治传记

利，而且那个国家正是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被彻底消灭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取得彻底胜利的国家现在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失业和危机的国家，而在马克思主义没有获得胜利的国家里，危机和失业的笼罩已有四年，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这确实不是偶然的。

是的，同志们，我们所以取得了这些成就，就因为我们的工作和斗争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旗帜下进行的。

由引得出第二个结论：要坚持不懈地牢固树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旗帜。

在俄国这样一个有过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托洛茨基作为自己领袖的国家里，怎么会允许被如此彻底地抹去它在语言和文学上的光辉呢，对此历史学家都会产生疑问的。也许，这种现象将会给他们带来另一种文学同在革命、帝国和复辟时期令人吃惊的衰落情况进行某种对比。这另一种文学也曾有卢梭、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为世界做出某种贡献。在法国，像俄国一样，在文学天才和精神力量快速地发展之后，接踵而来的却是一种懒散而麻木的状态。不过，斯大林主义文化意义的评判还不能仅仅根据它对于文学艺术的糟蹋而进行。我们应该考虑到斯大林所产生的影响中建设性和破坏性之间的矛盾。当他无情地扫除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时，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他把基本的文化因素带给了毫无文化的群众。在他的统治下，俄国文化在深度上是有损失的，而在广度上却有收获。也许可以冒险地这样预言，俄国的这种广泛的文化传播，将会带来一个宽广发展的新阶段，另一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代人将从这一阶段怀着欣慰的心情来评价斯大林时代野蛮的古怪行为。那么我们说，斯大林的风格对于一个本身没有受到很好教养的统治者的任务是非常合适的。他必须迫使农民和从农民中产生的官僚机构脱离那一片混乱的贫困和黑暗状态。

如果我们说，从文化角度来看，所有这些都表明苏联欧洲部分的相对失利，而有利于战后亚洲的边缘地区的发展，那末我们只不过是换一个角度来对待这一个同样的问题。苏联欧洲部分的水平在下降，而亚洲边缘地区的水平却得到了提高。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因为具有独立的精神而出名，而且在追求知识上比他们西欧的对手更为认真和有干劲，现在却被迫放弃了许多远大的志向，专门来等待年轻和粗鲁的知识分子的发展。他们是直接从吉尔吉斯或巴什基里亚草原走进大学的。当苏联的亚洲部分由一个来自欧亚交界处的统治者领导时它发生了程度较大的欧化，同时苏联的欧洲部分也被亚洲半同化了。部分地说来，这种相互的同化是必然发生的而且成就较为明显。但是它也往往使国家的智力产生枯竭。十分令人不解的是，斯大林在集体经济基础上鼓励不平等和社会分化，但他在精神和智力上却主张粗鲁和强制性的平均。这并不是他故意要这样做，而是因为他对于智力和艺术上的创造力执怀疑态度，总是在这些方面发现不合其意的地方。

于是就出现了如下情况：俄罗斯的小说和诗歌的往日光彩都被抹掉了。多年来官方的文学评论家就不断要求“给我们一个苏联的托尔斯泰”。这个要求终未实现，或许是由于生活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史诗式的艺术技巧一直未能出现；或许就是由于在一种使托尔斯泰得不到说“我不能保持沉默”的自由的氛围中，托尔斯泰是产生不了的。俄国当代两个最具创造性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了。很多最优秀的作家希望通过沉默来避免犯错，另一些人则已经被迫沉默了。就像是一个往日光荣的纪念品一样，马克西姆·高尔基波称颂为无产阶级文化的鼻祖，他作为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在三十年代前半期中苟活着。斯大林和高尔基的友谊不能简单的认作是知心的。斯大林需要一个认可他的人支持自己的知识和道义权威。高尔基早在地下时期就是列宁的知友；斯大林认为把这个友谊连同领导的其他一些象征和头衔一起继承下来的做法是英明的。另一方面，高尔基曾多次同列宁发生过剧烈的争吵，列宁宽容了他，其中有的事情是列宁对其他所有政治家都不会宽容的。这位老作家热情地皈依了布尔什维主义，而且还对当初攻击列宁表示后悔，因此做出了不与列宁的继承人进行争执的决定，而这位继承人是绝对不会宽容任何争论的。高尔基有时还企图软化斯大林的脾气，并亲切地采取措施保护某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或某一个乖僻的文人。他甚至希望能够调解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关系，但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死于1936年，从此以后，革命作家的伟大行动到此结束了。

1936年高尔基死后，在清洗的高潮中，哈萨克人江布尔·扎巴耶夫和高加索人莱金·苏莱曼斯塔尔斯基两个诗人在莫斯科一时之间最为知名，他们两人有九十多岁，不识字，都是东方部族行吟诗人的子遗，留着长长的胡子。他们的风格很别致，主要是创作民歌，是后起的当地荷马。他们从高地和草原来到莫斯科，弹琴伴奏，在列宁墓上大唱斯大林的赞歌。

俄罗斯欧洲部分被亚洲部分的同化，导致了精神上的孤立和整个俄罗斯脱离欧洲。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因为，那种对立的程度在二十年代时并未削减，

斯大林政治传记

但俄罗斯的文艺界对欧洲思想和艺术的进步影响采取了广泛的接受。那种孤立状态是在三十年代特殊的氛围中产生的，在大清洗中这种孤立就转为完全的孤立了。

在基洛夫遭暗杀后进行了一些审讯和流放，在此之后，统治稍有放松。1935年下半年到1936年上半年的一年中，公众的注意力主要被第二个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和即将开始的修改宪法所吸引了。斯大林日益频繁的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面带微笑，周围被一些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获得成就的集体农庄男女庄员所环绕，他们都忙不迭地对他给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表示谢意。他还出现在公众节日中，为获胜的运动员颁奖，接受孩子们的献花，并装出各种不同的悠然自得的态度拍照。一切事情似乎都让人看到了一个永久的政治安定时期。过去的反动派领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已经被关在坐落在维尔赫尼—乌拉尔斯克的监狱里，但他们期盼着再一次被释放。布哈林、索柯里尼柯夫和拉狄克则继续同斯大林一起商讨宪法的起草。布哈林担任《消息报》主编，拉狄克主要负责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新闻发言。皮达可夫担任重工业部的副人民委员和实际的组织者的职务。前总理李可夫是邮电部的人民委员；拉柯夫斯基、加拉罕、克里斯廷斯基、拉斯科尔尼科夫、罗申哥尔茨、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尤里尼耶夫、波果莫洛夫和其他许多早就被斯大林解退的人现在被派往国外承担大使、商务代表团和特使的职位。甚至在格鲁吉亚，斯大林的一些老对手虽然在列宁时代曾经对斯大林进行过反对，现在好像也被宽待了。布都·穆迪瓦尼他们主要的领导者又重新担任了格鲁吉亚政府的副总理。斯大林同军队领导人的关系看起来也

斯大林政治传记

很缓和。军队在 1936 年由一支守土军改组为一支常备军，又重新采用了革命前的旧军纪，旧的军衔也得到了恢复。五个军队主要负责人被任命为元帅，这五个元帅分别是：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勃柳赫尔、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

然而，清洗在党和政府的下级机构中，仍在继续进行着。1935 年年底，《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刊登了各种报道，说反对派的秘密小组几乎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所有城市中都被发现了。报纸还报道了工人中反对斯达汉诺夫工作方法的情况。这种方法就是通过增加工厂的劳动强度，然后根据劳动成果付酬。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遭到工人们四处的袭击甚至暗杀，工人还捣毁机器。新参加工业劳动的农民常常由于笨拙和任性而不成熟地损毁机床，在机器发生故障时，他们毫无耐心用斧头和槌子去砸。工业上的事故不断出现。这是俄国人落后、没有文化和由于强迫进行工业革命而产生的失望情绪一起发生作用所造成的“破坏行为”。当时还没有人被认作破坏分子，包括担任工业主要组织者许多年的皮达可夫，或任何以前的反对派领袖。

托洛茨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不断对开除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情况进行报道之后，就企图建立一个第四国际来对抗斯大林的第三国际。他在《公报》中写道：“可以有把握的认为，尽管遭到十三年的诽谤、迫害、极其严重的恶毒和野蛮对待，尽管一些比迫害更为危险的背叛和投降行为不断出现，在苏联第四国际今天已经拥有人数最多、最强大和最牢固的支部。”托洛茨基的断言有一部分是在自我吹捧，因为在七年的流亡中，他已经同苏联的个人完全没有了联系。但是，在俄国国内托洛茨基主义事实上仍然是一股潜在的重大

斯大林政治传记

舆论力量。托洛茨基很自信地宣称，这只能使斯大林的怀疑更为严重。斯大林在读这篇文章时必定对自己说：“我们就等着看结果吧。”六个月以后，苏联和全世界都被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讯惊住了。

我们不打算描述那一系列审讯的情况。我们所关心的是斯大林在这些审讯中所起的作用和他的目的。他本人在法庭上一次也没有出现。这位硬被说成是罪大恶极的凶险阴谋的主要牺牲者，甚至连证人席都未上过。但是在整个让人畏惧的场面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他在证词人的席上出现了。不，他不但充当证词人，他还是无形的作者、监制者和经理人。

在无数次公开和秘密的审讯中，有四次最为重要：1936年8月的“十六人审讯”；1937年1月的“十七人审讯”；1937年6月秘密进行的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红军中一些高级军官的审讯；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讯”。这些审讯中的被告全部是来自列宁时代政治局的成员，除了斯大林本人和托洛茨基不在其内；不过托洛茨基虽然不在现场，却是主要的被告。这些人中包括有一个前总理，两个共产国际的前负责人，几个前副总理，一个工会的负责人，一个总参谋长，所有重要军区的司令员，一个军队的总政治委员，几乎所有的苏联驻欧洲和亚洲各国的大使，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还有两个负责政治警察的人：叶若夫和雅戈达。雅戈达曾负责准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讯“证据”，而叶若夫也负责准备所有其他人的审讯证据。所有的人都以企图暗杀斯大林和别的政治局委员，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对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搞破坏，以及毒死或杀死俄国工人群众的指控而定罪。所有的人都被指控在革命的早期就作为英国、日本、法国和德国的间谍，并且同纳粹签署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了秘密协议，分裂苏联，把苏联的大片领土割让给德国和日本。如果这些审讯所积累起来的指控都是确实存在的话，苏联就早已灭亡了。这些被指控的恐怖分子已经混入最高层的政府机构中，为什么只杀害斯大林的一个主要成员基洛夫呢？在审讯过程中，检查官坚持认为这场阴谋中还有两个牺牲者：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人的古比雪夫和高尔基。但是这些说法只不过是试图使这一无所不包的阴谋及其微小的结果之间极不相称的情况更为明显。这就类似于为了挪动一只玩具船，却要把尼亚加拉瀑布的水全部进行控制。

由于被告们幻觉似的行为，所有这些审讯的虚假性就更突出了。许多著名的人，包括许多文职领导人和所有军人，都是秘密进行审讯的；许多人没有经过审讯就处决了，因为没有办法使他们公开承认强加给他们的罪行。但是所有那些被公开在群众面前审判的可怜的人，却大声地对自己的罪行表示承认，把自己称作魔鬼的儿子，并衷心地赞美那位践踏他们的超人。国家中充满了恐怖和杂乱，到处可以听到一个声音：“枪毙那些疯狗！”检察官维辛斯基一听到这个声音总是马上把审讯结束。被告的自供是起诉和判决的惟一根据。找不到一件可以用正常的司法程序加以证明的证据。在很少的几个案件中，被告们确实承认他们同托洛茨基在国外会晤的事情，但这些情况一经作证，被告的自供就马上暴露出了它的不真实性。例如霍尔兹曼、伯尔曼—尤林和戴维三个被告曾承认，他们曾在哥本哈根的一座旅馆里同托洛茨基约会，但在这个约会的日期以前这座旅馆很多年就不存在了。皮达可夫承认，他曾经乘一架德国飞机在奥斯陆附近的机场着陆，与托洛茨基见面。但是这个机场的当局证明表示，在所说的那个时间中根本不曾有外国飞机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在这个机场降落。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也拿出了证据，其中有些爱德华·赫里欧还曾经签了名。当时爱德华·赫里欧是法国的总理，以对斯大林友好而被众人所晓。这些证据提出，由于身体状况，他们两人不可能出现在指控中所说的时间和地点。

从党内斗争的状况看，这些被告席上的人公开承认错误不再让人吃惊。他们承认错误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二十年代以来，反对派中情绪低落的人就把公开承认错误视为是一种仪式，一种公认的例行手续。他们起初是宣称违反了一般的党纪，最后就是承认犯了严重的启示录式的罪行。在这期间，他们还得走过一段路程，几乎像梦游者一样，很难辨别自己走向何方。他们每一次承认错误时，只是承认比上一次稍微严重的过错。当然，他们每一次都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为了党和为了自己赎罪所做出的牺牲。即使到了他们很快就要结束生命时，他们是否清楚地看到自己面临的是一场大屠杀，这还是不肯定的。

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曾有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一方面他们害怕斯大林的统治，另一方面，斯大林的统治已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他们对此基本上抱有团结一致的精神。不过，光是这种感情还不能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流亡中的托洛茨基也在为这一矛盾而斗争，但他却没有对此屈服。他们受自己的顾虑和悔恨的折磨；但是斯大林的恐怖又把他们吓坏。说他们受到催眠，或吃了神秘的药丸，都是可以的。但他们肯定是受到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的，这就是俄国和其他各处经常使用的严刑拷问。还有，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政治警察拥有把被告的亲属看作人质的权利，而这些人质也的确出现在证人席上。即使那些坚强不屈为了自己的事业完全准备牺牲自己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人，同样认为自己是无权以同样的方式牺牲自己的父母或孩子的。毫无疑问，被告们希望他们的坦白可以拯救自己的家庭；当然也抱有一线希望想拯救自己。基洛夫被刺杀后，曾经下令规定取消恐怖分子的上诉权；但是在审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前几天，又恢复了这一上诉权，仿佛在最后关头还有一线拯救生命的希望。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如拉狄克和拉柯夫斯基确实没有被公开枪毙；一个人获得了生存的希望，就会引起几十个人逃脱死亡的希望。他们一定会觉得，他们所做的自我谴责是如此荒谬，而且明显是受过强迫的，所以不会玷污他们的声誉。因此，如此多的知名人士排着队经过斯大林面前，高喊着可怕的口号：“凯撒，再见了，死者向你致敬！”这种压力和动机种类繁多、错综复杂。

斯大林为什么需要做这种令人作呕的事情呢？在一些人看来，他把这些老近卫军处死，是为了转移他在经济上的失败。这种看法略有一点道理，但十分不充分。因为在几年的审讯里，国家的经济情况已得到了明显的进展。这就证明他肯定不需要这样多的替罪羊；而且即使他需要，判处监禁劳役已足够，就如早期对所谓工业党和孟什维克进行的审讯一样。有些在早期审讯中遭到判决的人，到了四十年代又重新出现并且成为受到很大尊敬的著名人物。斯大林真正的和更为深远的目的，是把那些可以组建政府的潜在力量彻底打垮，也许还不是另组一个政府的人物，可能是组建几个政府的力量。当然，在斯大林的演说和著作中对此是一点也没提到。这种动机只是在以前发生的情况中，在审讯的背景和影响中才能发现。从一开始，他就把所有企图另组政府的这种想法都视为反革命。这些

斯大林政治传记

审讯的肯定和直接的动机就是摧毁一切可能有此企图和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开始着手行动的政治中心。

现在必须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他为什么要在 1936 年来达到这个目的？对这个选择时间的解释是不容易从国内政策的角度考虑清楚的。人民的普遍不满是可能存在的，但这种不满还没有达到彻底定型化，这对他的地位还不能构成马上危险。那些反对派已经被粉碎了，遭到压制并失去了进行活动的的能力。只有当整个权力机器遭到某种突然打击、某种突发性的混乱时，反对派才有可能把自己已被击垮和丧失信心的队伍集合起来。这种危险当时恰好已在形成，而且这种危险还来自国外。在多次的大审讯中，最初一次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讯，发生在莱茵兰遭到希特勒军队进攻的几个个月后；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最后一次审讯结束时，正好是纳粹成功的对奥地利实现占领时。德帝国主义正在重新武装并试图验证自己的力量。关于斯大林针对这种威胁而采取的外交策略，将在下几章讨论。这儿要讲的是：他对战争能否避免是以比较现实的态度来对待的，而且他正在考虑面临着的两种抉择——是联合希特勒还是反对他。在 1936 年时，联合看来是不太可能了。西方的绥靖政策使斯大林充满一种可怕的预感。他怀疑西方不仅默许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而且不会对德军入侵苏联采取支持态度。

苏联孤立地同德国打仗的前景似乎是很可怕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军队虽然是两面作战，但还足以把俄国击垮，并削弱了沙皇制度。当斯大林观察着希特勒最初所具有的力量时，最后一个沙皇的阴影必定不只一次地在他头脑中闪现。人们可以利用之来虚构一段这位活人同那位鬼魂之间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对话。那个鬼魂悄悄地说：“你的末日快到了；我的政权被你利用战争带来的混乱所摧毁。现在你将要被另一次战争的混乱吞没。”那个活人给予回答说：“你从皇位上滚下来，却什么也没有真正学到。你当然不是单纯被战争所击败的，是被布尔什维克党打败的。当然，我们对战争所造成的情况进行了利用，不过……”他的话被鬼魂打断，鬼魂说：“反对派不会利用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这一点你能肯定吗？你还记得当传来德军占领里加的消息时彼得堡发生可怕的混乱情形吗？如果德军又出现在里加，或者出现在基辅、莫斯科、高加索大门口，那又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出现呢？”“我告诉你，当时是难以对付的布尔什维克党反对你，而我现在已经把托洛茨基流放了，并击垮了我的其他一切敌手。”鬼魂听了放声大笑地说：“在1914年和1917年时，你被我下令流放到西伯利亚并且列宁和托洛茨基也被迫在国外流亡吗……”

在战争处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反对派的领袖如果还活着的话，可能出于坚决认为斯大林无能指导战争和带来灾难性后果而被迫采取行动。在更早一点的阶段，他们可能会对他同希特勒的交易表示反对态度。托洛茨基不是在他的著名的“克里蒙梭声明”中早已预示了这种针对斯大林的反动行动吗？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反对派的领袖能够亲眼看到了1941年和1942年红军惨败的情景，看到希特勒已经进逼到莫斯科，德军俘虏了几百万苏联士兵，1941年秋天人民的士气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那时整个苏联的命运处于紧急之中，斯大林的道义权威降到最低，那末他们会怎样呢？他们很有可能会企图推翻斯大林。斯大林是坚决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当然，斯大林对他们的指控完全是凭空捏造。但是这些指

斯大林政治传记

控的根据是一种与“心理上的真理”相逆反的，即一种关于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极其残酷而又扭曲了的预想。他的推理很可能是顺势发展的：他们企图在危机中把我摧毁——我就指控他们已经有了这一企图。他们肯定认为自己更适于对战争进行指挥领导，这是荒谬的想法。政府的改变可能削弱苏联的战斗力和战斗力，而且如果他们取得成功，就可能被迫同希特勒达成停战协定，甚至就像我们曾经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做的一样，也许同意割让土地。我就要批判他们已经同德国结成了背叛性的联盟和把苏联的土地割让给那几个国家。

要对这些老近卫军进行屠杀，没有比这更适当的借口了。如果他们仅仅因为反对斯大林而遭到处决，或者作为企图推翻他的政权的阴谋者而加以处决，那末他们就很可能被很多人看成是为了美好事业而献身的烈士。他们必须以卖国贼为罪名，作为毫无理由的犯罪者，被看作是可怕的第五纵队的领导人被处死。只有那样做，斯大林才有把握使对他们的处决不致引起众人的反叛；相反地，他会被人们、特别是被年轻而统一的一代奉为国家的救星。人们没有必要设定他的行为纯粹出于权力欲望。他可能使那些半信半疑的人确信，他这样做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只有他一人才能正确地做出解释。

那个一直缠绕在斯大林心头的想象中的阴谋，在规模巨大的清洗之中，就必然会采取流血方式了。当恐怖的恶性循环扩大时，每个人都被搞得人心惶惶。有的人被迫采取措施来停止这架可怕的永动机。这种行动并非是无能为力的老反对派的领袖所采取的，而是出自迄今还没有遭到怀疑的人，他们的精神还未被无休止的承认错误所瓦解，他们还掌握着若干部权力。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在 1937 年初审讯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和皮达可夫后不久，斯大林最亲近的随从中便开始对恐怖行动采取反对措施了。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发生了明显的冲突。奥尔忠尼启则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和斯大林二人曾一起被关在巴库的监狱里；斯大林 1912 年在他的提议下，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十年以后斯大林在他的帮助下征服了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在对所有反对派的抵抗斗争中，他都热心地同斯大林合作。这时奥尔忠尼启则为自己的副手皮达可夫和许多工业领导人的被害而感到气愤。这场冲突带来了奥尔忠尼启则猝死的后果，但情况至今不明。后来斯大林派过去的一个主要人物鲁祖塔克起来反对斯大林，他担任工会领导人和副总理。

但是，据估计，真正的密谋是由军队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同事们策划执行的。真实的情况仍不清楚，而且有的人否认曾有任何密谋，他们反复强调，这是由希特勒的间谍机构编造出来的，而且还为这种谎言制造了伪证，斯大林是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转交收到的。根据这种说法，真正编造谎言的还是莫斯科的格柏乌，它在斯大林的默许下设计了这个丑陋的诬陷剧的整个过程。但是有一些非斯大林派的人却坚持认为，这些将军们确实想策划一场政变，而且是出于自己的动机和由自己采取主动的，与外国没有任何关系。政变主要是反叛宫廷的，接着就对总部格柏乌进行袭击，最后是刺杀斯大林。这次密谋的领导人被认为是图哈切夫斯基。他是一位军事天才，他使红军真正实现了现代化；他在内战中多次立功，成为军队中的知名人物。在当时的所有军事领导人中，他的确是惟一同早期的拿破仑相像的人，能够扮演苏联第一执政官的角色。据猜想参加这一秘密策划的还有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雅基

斯大林政治传记

尔、莫斯科军事学院院长柯尔克、西部军区司令员乌波列维奇、军队总政治委员加马尔尼克、布琼尼骑兵部队的副手普里马科夫和其他一些军官。在 1937 年五一节时，图哈切夫斯基还在列宁墓前站在斯大林旁边，检阅五一节游行队伍；十一天之后他就遭到免职；他和他的朋友们在 6 月 12 日被公告已被处决。这些密谋者没有表现任何悔恨之情，被指控的罪行也没有承认。这一密谋据说是由政治警察发现的。图哈切夫斯基在被捕时受伤，后来他被用担架抬到斯大林面前。在同斯大林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之后，他被送回监狱。他的死刑令至少名义上是由另外四个元帅签署的。不久以后，勃柳赫尔和叶戈罗夫也被清洗了。

即使关于这些审讯的最完整的报告，对它们的起因也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说明。真正大规模的清洗是公众所不知道的，没有受害者的供词，一般也没有什么审判。托洛茨基在评论莫斯科的令人惊奇的审判时说：“斯大林在饮鸩止渴。”他处死了几千人，被送到集中营和监狱的有几百万人。他的计划本身具有的性质迫使他不得不这样做。那些有力量组建另一个政府的人已经开始被他消灭了。但是这些人都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曾训练和提升了一些行政官员和军官，而且结识了一些朋友。斯大林担心的就是，从那些受害人的追随者中是否会出现报复者。既然他已经把能够组建一个政府的第一批潜在的领导力量给消灭了，他就不会放过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以至许许多多批。凡是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提拔的党的干部，凡是索柯里尼柯夫或拉柯夫斯基训练和栽培的外交人员，凡是在军事学院档案中图哈切夫斯基写了好评的军官，凡是同皮达可夫一起工作过的企业经理——

斯大林政治传记

所有这些人被列入危险的行列，是可以怀疑的，因而命运是注定了的。从纳粹德国、霍尔蒂匈牙利和皮尔苏兹基波兰流亡来的共产党员，曾经都与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个或那个派别和小圈子有来往，都遭到了恶运。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受害者的人数。按照某些材料来看，只是军队中被捕的军官就达两万名，占全部军官人数的四分之一，有几千名军官被枪毙。整个国家的机构都处于摇摆之中。

在这次动荡中，1939年11月，斯大林在对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公布了新宪法。他使用自由词藻并做出许诺来掩盖他背后的阴谋。列宁的选举制度被新宪法取代，它对产业工人阶级表示了公开的支持，但所有阶级都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包括过去没有选举权的前资产阶级也获得了。直接选举代替了间接选举，公开投票被秘密投票所取代。斯大林说，由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为取得这些进步提供了可能性：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已经成为现实，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农民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一部分，新的知识分子已经同工人阶级紧密连在一起了。在反对他所说的某个人对宪法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见时，他一再强调，宪法必须对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苏联的权利做出保证。在反对另一个企图通过设立个人总统以代替多头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修改意见时，他对公众提出警告，个人总统可能变成独裁者——宪法绝不能有这种机会可利用。他甚至坚持以前的自卫军和牧师也应拥有选举权。但是在这种民主的妄想中，宪法禁止任何反对派的存在仍是其中最真实的部分。用斯大林的话说：“政党自由，只有在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才有存在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这时他从事《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编写这项伟大的任务，这本书被称作是这一领域中第一本准确的和在理论上可靠的作品。在《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中，党的整个历史都被按照那几次的审讯情况进行了改动。以前的所有教科书，即使是像雅罗斯拉夫斯基这样紧密追随斯大林的人所编写的，都被宣布停止发行，认为都是不可相信的。据说这些书对于党史的叙述，都不符合最新发现。这本立即被宣布为党的圣经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是在斯大林的亲自指导下由其秘书处负责撰写的，这只是它的哲学部分，即一篇不成熟的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摘要，是斯大林亲自撰写的。他作为那几次审讯的提词者是众人所不知的，但他现在却以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宪法制订者的角色出现在公众面前了。

断头台一旦被筑成，斯大林似乎最终也难以逃脱。他把老近卫军全部扫清，但他本身也是其中之一。布尔什维克政权一旦失去支撑，他又能够得到谁的支持呢？托洛茨基于1937年9月写道：“斯大林的悲剧性使命已经进入尾声了。他越是觉得不再需要任何人，人们也就越来越不需要他。如果这个官僚制度成功地改变了所有制形式，如果一个新的有产阶级加入，这个新的有产阶级就需要一个新的领袖，这个新的领导人是没有革命历史和更高素质的。斯大林就会听不到人们对他完成的任务的感谢话了。公开的反革命将要报复他，很可能对他实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控制。”他几个月以后又作出了不同的预言：“斯大林正准备在革命的废墟和革命者的尸体上举行波拿巴式的‘加冕典礼’。这个时刻是他在工人运动中的政治死亡之日。”这些预言全都没有发生；而且谈到斯大林的“加冕典

斯大林政治传记

礼”，那是在那些审讯以前所发生的而不是以后。这些清洗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并没有让人们感到惊奇，真正让人觉得意外的是它们没有怎样改变苏联的外表；政权机构虽然遭受了猛烈的打击，却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审讯前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苏联社会似乎一方面还努力于经济任务，另一方面又在一种道义和政治的掩饰下日益败落。审讯前后，斯大林一直都被欢呼为人民的父亲，敬爱的领袖。

罗伯斯庇尔在消灭了他的敌手后，某天在国民公会中的热月党人突然对他进行反叛。像以前那样国民公会仍然充满了猛烈的冲动情绪。人们在这样一个机构中受到恐怖的统治，却激起绝望的勇气，人们采取行动，对独裁者进行谴责，并把他赶下台。但是在 1917 年革命后的二十年中，苏维埃国家中已经不存在任何自发的冲动了。像国民公会这样的机构是不会发出反对“人民公敌”的命令的。而斯大林却独揽大权，亲自操纵着从自己的办公室到政治警察总部、法庭和监狱的一切重大权力，预防任何预见不到的干扰。在任何时期他都不必在公众的反抗声中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人民支持热月党人，这些人民中的所有阶层都已经对恐怖行为厌烦了。热月党人就公开地诉诸人民。如果象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同事那样的人想推翻斯大林的统治，他们的行动应获得人民的支持后再进行，而不能依靠一个极端秘密的阴谋小集团。他们致命的缺陷就在于此。

和我们提到的一样，斯大林获胜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是，他不象罗伯斯庇尔一样，却给他的国家提出了一个社会应拥有的新的和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虽然带给许多人的是贫困和痛苦，但也带给了许多人意外的机会。这些人是在他的统治下的获利者。斯大林在杀害了老近卫军之后并未觉得自己处于无人

斯大林政治传记

支持的孤立之中，这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在大约三年期间，他的统治遍布国家和党的一切机构。1936年还在任职的广大官员，到1938年时已经没有几个了。在公共活动的各种领域中，清洗使许多职位出现空缺。从1933年到1938年的五年之中，行政官员、经济学家、技术人员和其他行业的从大学毕业的差不多有五十万人。对于一个以前在社会中受教育阶层占很小比例的国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这些新的知识分子填补了因清洗而出现的空位。它的成员是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对老近卫军的成员，他们或者持敌对态度，或者对他们的命运毫不关心。他们极其热情地投身工作，不受近来事变的影响。他们的资格的确是非常微弱的，没有什么实际经验。这个国家还需拿出很多经费，使它的官员、军事指挥员和工业经理进行实践学习，而这个实习期一直延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公开的清洗到1939年初结束了。3月间，斯大林在隔了五年以后才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对此进行了公布。党的章程也按照半自由的原则被改动了。即使在列宁时代进行的比较温和的清洗，现在也被全部废除了。斯大林说：“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大批清洗的手段了。”他对外国人的一种看法表示嘲笑，即他们认为对“间谍、暗害分子和杀人凶手”的审讯会对苏维埃国家有所削弱。但是他也公开地询问自己：“我们直到1937—1938年间，对上层托洛茨基分子和上层布哈林分子所进行的阴谋和间谍活动才有所了解，而材料表明，早在十月革命的初期，这些人就开始为外国谍报机关服务，并进行了阴谋活动——这让人感到吃惊……应怎样解释这种错误呢？”他回答说，是由于缺乏警惕性而对苏联的侦察机关低估了。清洗的最

斯大林政治传记

后一幕就是对叶若夫的处决，他是政治警察的领导，自从雅戈达被撤职以后直接负责所有审讯的组织。叶若夫的继任者是贝利亚，是斯大林的一个同乡和传记作者之一，继任前，他是格鲁吉亚政治警察的领导。

真正的尾声并没有在苏联上演，而发生在墨西哥。托洛茨基经过长期的漂泊后，在墨西哥定居。1936年，当托洛茨基呆在挪威暂居时，斯大林利用他在奥斯陆的外交使节，对挪威政府施加压力，达到剥夺他在挪威所享有的避难权的目的。挪威政府受到商业抵制的威胁，这一威胁十分有效，因为挪威政府急于要维持同苏联的商业贸易关系。挪威司法大臣特里格夫·赖伊对拘留托洛茨基表示同意，这种拘留直到他在墨西哥找到避难所。托洛茨基从墨西哥仍未停止抨击斯大林的政策，有力地揭露了各次审讯，并徒劳地想把新的力量注入第四国际。他为一直存在的谋害他的企图而烦恼。他所有的孩子都毫无理由的遭到杀害，因而他指控斯大林是对他们进行复仇的谋杀者。在1940年8月20日，当他正从事一本谴责性的斯大林传记的写作时，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装作他的同情者，用斧头把他杀害。于是，莫斯科审判庭对托洛茨基的处决就执行了。斯大林已经无情地在苏联彻底清除了托洛茨基主义，现在又获得了对他本人的最后的阴暗胜利。托洛茨基的名字，如同列宁的名字，是十月革命的巨大希望和巨大幻想的代表。常有悲剧性的是，托洛茨基的脑浆洒满了对斯大林事业进行描述的稿纸。但是在暴风骤雨的1940年中，由于莫斯科的审讯，这个事件的终结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便悄然逝去了。

第十章 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概况

(一)

(1923—1933年)

斯大林没有提出关于外交政策的严密理论——一篇诗的启示：亚历山大·布洛克的《斯基台人》——革命同帝国主义的分裂——布尔什维主义对凡尔赛和约的反对——1922年签署通过的苏德腊帕洛条约——1932年德国共产主义的反对的崩溃——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所起的作用——共产国际尝试采取温和主义——1928年发生的剧烈转变——斯大林关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评论——未来政策的指向：斯大林1925年论俄国在新战争中的地位的秘密讲话——他谴责关于列强共管和势力范围的理论

在苏联以外的大多数人看来，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斗争、五年计划和大清洗运动，好像是远方传来的时断时续的嘈杂声音，同国际政治舞台上正在进行着的主要阴谋毫无联系。斯大林的形象模糊而飘渺，像幽灵一般。只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已经十分紧迫时，许多事情才隐约可见。苏联国内的一系列运动原来预示着将要上演的这部戏剧中的最关键的一幕，那个在背景上幽灵般的阴影也表明自己原来是这部戏剧中的主角之一。在慕尼黑协定签署以后的那些紧张的年月里，人们越来越

斯大林政治传记

越紧迫地询问这个问题：“俄国打算怎么干？”或者干脆说：“斯大林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人们可以在斯大林的演说中，在党所通过的一些关于外交政策的“提纲”和决议中，找到部分的答案。但是这些对外的公开声明还是少得可怜。斯大林的话仍然是单调和充满矛盾的套话的拼凑物，只是符合当时的需要和正统观念要求的大杂烩。但这种大杂烩也表现出他缺乏系统的思想，没有清楚的外交政策理论。在他后面的人民的情绪就更无法想象了。

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官方记录中，是不容易寻找到俄罗斯人民情绪和本能态度的线索。人们最好是从亚历山大·布洛克这位伟大的象征派诗人的诗中进行查找。布洛克创造了著名的神秘革命诗《十二个》，另外一首同样是写于革命早期的诗《斯基台人》，在俄国知识界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响。布洛克在这首诗里做出了关于苏俄对于世界态度的一种幻想的预言。他利用自己的诗歌才华，透露了民族感情的内在根源。在政治的套话里是很难有他的那种直觉式的指引。

他的幻想超越了遥远的古代、现在和将来，它表明返祖现象的强烈要求和新的革命冲动相交融已经形成一种单一的历史模式。曾经住在俄罗斯草原上的斯基台人，长期在西方保卫罗马和希腊，抵抗自东而来的匈奴人的压力，但是他们却常常受到罗马从西而来的侵略的威胁。直到他们在反对东方和西方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失败时，匈奴人的冲击使罗马的文明最终崩溃了。在诗人的幻想中，古代的斯基台和当代的俄罗斯是一样的。俄罗斯是西方文明的半开化的、充满活力的边缘部分，它知道与西方相比还处于不利地位，但它仍以自己的使命而自豪。它继续在为俄罗斯文明的存在而战斗，即使西方迄今一直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以敌视的态度对待自己。十月革命就是这种捍卫西方所进行的最高行动。我们要问的是，西方是以革命的信息来回答它呢，还是报之以宿怨呢？这一点将受制于现代斯基台人对世界所抱有的态度：

你们有成千上万，我们也是一群又一群。

企图打我们，你就试试看。

对，我们是斯基台人；对，我们是亚细亚人，微睁着渴望的眼睛。

……啊，旧世界。

……………

俄罗斯就像一头斯芬克斯。

怀着快乐与烦恼，

流淌着黑色的血，

她睁大眼睛愤怒地瞪着你，

心中充满了仇恨和热爱。

对，我们热爱，因为只有我们的血才能爱，

而你们早就不再热爱人。

你们已经不记得会有这样的热爱，

所以才烧杀和践踏。

站在我们这边吧。

从战争的恐怖中走向我们和平的怀抱；

在来得及的时候收回宝剑。

伙伴们，让我们做兄弟。

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我们也不会损失什么。
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也能进行背叛；
下一代人已经感到厌恶，
你们将长期的遭到咒骂。

在欧洲入侵我们的丛林之前，
我们就已经解散，
然后我们难看的亚细亚人的脸，
就将向你们扑去。

.....

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包庇维护你们，
就不再加入战争。
我们将眯着眼睛旁观，
当你们在进行生死的战斗时。

当残忍的匈奴人搜查死者的钱财，
焚烧城市，把牛羊驱赶到教堂，
而且烧烤白人兄弟的人肉时，
我们也不会采取行动。

你思考吧，旧世界！
这是最后的时刻了——对和平和劳动的节日，
这是最后的时刻了——对友谊和光明的节日。
野蛮人的竖琴声现在正向你呼喊。

斯大林政治传记

“君士坦丁堡必须由穆斯林掌管。”“我们宣布，1907年俄英签署的瓜分波斯的协定已经被撕毁和废除。”“我们宣布，1915年英俄缔结的瓜分土耳其的协定和夺取亚美尼亚的协定已经被撕毁和废除。”这就是由列宁和斯大林共同签署的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早期宣言之一。布尔什维克不久前才公开了沙皇的外交档案，一切秘密的条约被公诸于世，谴责了俄国从这些条约所得到的利益，并宣布彻底与帝国主义脱离联系，建立各民族真诚、公正、友好的关系。它还宣称，革命能接受的只可以是“不赔款和不割地”的公正和民主的和约。布尔什维克采取这个独特的革命理想主义行动的原因是，他们希望别的国家也能很快地实现社会主义，并摆脱殖民统治。布尔什维克无疑地认为，长久看来，他们抛弃沙皇帝国的既得利益并不会给俄国带来任何损失，因为一个国际社会主义制度在物质和道义上的好处，将比任何国家可能从剥削弱小民族得来的似是而非的利益要大得多。俄国不久之后就觉察到了真正的损失，但是布尔什维克下定决心要为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树立榜样，斯基台人号召西方“在来得及的时候把宝剑收回去”。

即使在内战、遭受外国干涉和饥荒发生的年月里，这个号召都不曾中断。共产国际起初一直希望，西方的工人阶级将主动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然而，苏联的领导人很快就处于自卫状态，采取了某些常用的外交策略。他们临时创造了一套在于恢复欧洲暂时均势的外交理论，以便达到增强自己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的目的。通过凡尔赛和约，战胜国实现了对欧洲大陆的支配。按照法国的联盟体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被赋予双重的作用：它们将成为抵抗东方革命威胁的保护墙，同时又能抵

斯大林政治传记

挡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任何压力。起初这个联盟体系主要是反对苏联，而不是针对德国。苏联人的目标就是针对这个联盟体系来建立一种平衡的力量。通过部分地联合战败国来反对战胜国，即同德国联盟反对协议国、特别是反对法国，苏联外交的这个目的达到了。让人惊异的是，英国和苏联尽管意识形态相抵触，它们的政策却有一致之处。由于不同的目的，英国和俄国从欧洲相对的两边寻求一种力量，来抑制单独一个军事强国对欧洲大陆的控制。甚至在两国舆论对于凡尔赛和约的态度中，这种并行不悖的情况也能让人感觉到相悖的情况。英国和苏联都反对凡尔赛和约。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中的主要论点，用马克思主义的习语进行了解释。不同于英国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苏联没有受到法的义务的限制，可以更自由地对均势进行运用。1922年，契切林签订了苏德腊帕洛条约。甚至在此以前，苏联就已与另一个战败国土耳其有了联合。

布尔什维克起初把他们的外交策略看成是暂时的折衷办法。他们仍然希望西方的社会发生大变动。共产国际是他们外交政策的主要的支持力量，外交人民委员会只不过是一个助手。政治局对外交人员进行严格的规定，不说和不做任何可能使国外共产党感到不安的话和事。大使们按照得到的命令，不能忽视外交礼貌，不能像一个革命鼓动者那样说话；他们最多只能“严肃地、事务性地”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务活动。

这种趋势在斯大林步入三个执政的前列以前，就在外交政策中流行了一段时间。列宁同契切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契切林的助手加拉罕和李维诺夫共同对外交政策进行指导，他们全都是以前的国外侨民，深刻的了解西方国家。斯大林不指

斯大林政治传记

导外交政策，似乎只有一次他被牵涉到外交事件中，这就是寇松勋爵对他对穆斯林的一次贺电表示抗议，把它解释为煽动殖民地人民对英王陛下政府进行反抗。他在共产国际中没有产生任何作用。

斯大林作为三人执政者之一，逐渐在这方面变得积极起来，但起初他还没有对外交政策中的既定方针进行变动。这时俄国正在收获腊帕洛条约的初步成果，“防疫线”的裂口日益增大。1923年、1924年和1925年，许多国家同它的外交和商务关系都得到了恢复，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态度逐渐减轻，这都使莫斯科感到真正的快乐。苏联正在得到缓冲的时间。

但是，这种富有希望的发展趋势却要求在苏联外交和共产国际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平衡。世界革命和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正常或友好的关系，这两个目标在根本上是相抵触的。其中之一必须牺牲，无论如何也要使一个服从另一个。要进行选择，就要根据事件对两个问题的答案如何，这两个问题就是：“世界革命的机会如何？”和“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会不会产生巩固的和平？”这个两难问题的出现并不突然。它是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而慢慢提出来的。它的解决没有采取郑重决议的方式在特定的时间通过和进行记录的，而是在一系列的转变中隐含着，有时让人毫无察觉，有时又特别显眼。

政治局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了四年之后，还不能确信无疑地看到世界革命的前景。但这种怀疑也不是无限度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都坚定的信仰着，在适当的时候，社会主义一定能代替资本主义，就像封建社会已经被资本主义社会所代替一样，然而斯大林并不满意这种一般的历史前景，因为当前迫切的主要问题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答。欧洲废除封建主义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过程长达若干世纪。那末资本主义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呢？列宁估计主要欧洲国家还能存在的期限，最初说是几天，后来认为是几个月，再后来又说是几年。鉴于慎重的态度，又说是几十年了。在这样长的时期中，苏联的命运还是不能确定。布尔什维主义能保持几十年的和平吗？苏联最近在外交活动中的成功，使斯大林抱着乐观的态度。因此，对世界革命抱有极端怀疑的态度，对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事实上会有一个长期的休战确信不疑，这就是他的“社会主义可以单独在一个国家胜利”的孪生前提。

托洛茨基叙述了斯大林对外国共产主义的潜力是如何的漠不关心。斯大林固执的强调，共产国际在几十年内是不能实现革命的。斯大林亲密的同事洛米纳泽在二十年代说道，斯大林曾经说过，“共产国际不能代表什么。它只是由于我们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下来。”斯大林对这番话进行了否认。洛米纳泽可能指的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一次随便谈话。但是斯大林在二十年代中期的大多数公开声明中，虽然说得非常谨慎，却到处都能让人觉察到这样的意思。最具说服力的是 1925 年 6 月 9 日他对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演说。斯大林讲过“如果苏联在未来的十年到十五年内得不到来自西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支持”，它将采取的国内政策。后来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解释时，还假定苏联的和平孤立将持续到 1945 年。这是他的政策的总前提，还不是他的几个可供选择的前提之一，他的听众是一些富有激情的青年共产党员，其中多数人对左翼反对派是表示同情的，对于他们来说，世界革命的间歇之长令他们震惊。而和平前景如此之长，他们对此也不愿相信。因此这位演说者对听众的情绪进行考虑，对他的观点进行慎重的阐释。在他的心目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中，肯定是把苏联孤立的时间估计得还长得多。

斯大林的这种态度就要求共产党的政策逐渐屈从于苏联外交的需要。列宁执政时，外交简直变成了共产国际的辅助部队，现在这个关系完全被颠倒了。按照托洛茨基的话，各国共产党从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锋”转变成了苏联的和平“前沿”。从斯大林的角度看来，拿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体去冒险，来换得希望甚小的国外革命，这是十分愚蠢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主要任务就是不管世界共产主义究竟如何，下决心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产生了分歧并发生决裂。托洛茨基一直到最后还认为，世界共产主义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要更符合现实，尽管世界共产主义存在着各种弱点，也尽管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了不少成绩。其他的绝大部分领导人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动摇，对于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了主意。至于斯大林，在两次大战之间他的政策的这个总前提一直没有改变。

他从来没有完全地暴露出自己的总前提，这让人感到奇怪。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已经到来，这本来是列宁主义的主要动力。斯大林越是急于对革命的前景进行口头的许诺，他同左翼布尔什维克的斗争陷得就越深，因为他被指责为丢掉了列宁主义的遗产。主要是在1925年到1926年的斗争的最初阶段时，他还公开地认为，今后大约二十年里，西方不会出现社会主义的高涨。后来，迫于反对派的压力，他或者模棱两可地说一下，或者就同反对派竞相预言革命很快就要来临。这种预言是他的政策的公开一面，离开了这种保护，他的观点就不能被党内大部分人接受。他的内心想法则从不显露，顶多只同自己一派的领导人讨论一下，但从他的行动中是可以看出这些想法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他的政策中存在的这两方面的矛盾，使得他的行为表现出一种不诚实，虚假的样子。因此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谴责他阴谋策划世界革命，而他的布尔什维克批评者又责备他对世界革命进行阴谋的抵挡。

1923年德国共产主义的崩溃瓦解，对与斯大林主义相联的一整套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加速作用。1923年的夏季，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针对因法国占领鲁尔和德国货币大肆贬值所引起的德国危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一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德国的十月革命”快要发生了。德国共产党领袖海因里希·布兰德勒来到莫斯科，同共产国际一起商议战争策略。正是在这一场合，斯大林第一次运用越来越大的权力干预了共产国际的重大决定。他在致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提出了对于德国形势的看法，其中明显地表现出他不认为德国共产主义会取得成功。他列举了1917年革命中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一些特殊的条件，总结道：“现在德国共产主义不具备这些条件。当然，他们的邻国是苏维埃国家，这是我们当初所没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给他们提供什么东西……如果德国政府这时垮台……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他们必将失败。”他警告政治局，对共产党人冒险在德国举行示威游行一定不要给予鼓励，因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会把它变成一场全面的战争，最后可能会把共产党人消灭。“我认为德国人应该克制而不要冲动。”斯大林认为，在对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机会和德国共产党人在1923年的机会进行比较对存在的差别，在于布尔什维克当时获得了渴望和平的人民和渴望夺取土地的农民的支持。他的这种说法就是在暗示，无论什么时候，德国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共产党人没有希望获取胜利，因为像布尔什维克得到过的那种农民的支持德国共产党是得不到的；最有利的形势就是，只有德国在另一次战争中失败，他们才有可能获得一次机会。对于可能对德国共产党人有利的一个条件，即德国产业工人阶级比俄国工人阶级的作用大得多，斯大林却视而不见。

这一年的年底，德国的动荡越来越严重，俄国人鼓吹采取革命行动的呼声也日益高昂，并开始“鞭策”起德国人来。斯大林不再宣传他的怀疑，并躲藏在幕后。他让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认真负责事情的处理，虽然他们几个人彼此之间的意见存在分歧。布兰德勒带着一套相互孤立和矛盾的指示返回德国。他要在德国去组织一次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同时又深入萨克森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内部；他要在萨克森发动革命而不要在首都或任何别的重要中心发动革命，等等。这些指示会导致所有起义的党错过最好的机会，结果发生一系列不和谐的行动，最后归于失败。这次失败对于莫斯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这决定了苏联共产主义就此处于了孤立状态。

紧接着的几年里，共产国际的命运仍然不确定。斯大林虽然认为作为革命的工具共产国际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但他也不能断绝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同共产国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为苏联的革命使命而感到自豪。它只是代表欧洲工人阶级中的少数派，但这个少数派是很重要的，其实西方无产阶级最有理想、最积极和最热情的分子都在这个组织中。共产国际的活动使苏联的外交确实感到窘困。所以，斯大林才被迫尝试着去驯服这一难以驾驭的组织。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国际对于苏联内部的斗争会造成的影响。那些年，欧洲共产党的领导们虽然接受已

斯大林政治传记

经取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专家关于革命的指导，同他们享有同等地位，而且还理直气壮地认为有权对苏联的事务进行评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起初支持托洛茨基同斯大林斗争，同具有欧洲思想的布尔什维克共同与以自我为中心的、实行苏联等级制度的书记处进行斗争。因此，出于国内外的考虑，斯大林只能继续维持共产国际的存在，但仍习惯于去影响它内部的各种传统、倾向和意见，这正是他过去使苏联党改造成为“坚如磐石”的机构所使用过的方法。

他主要是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的代理人去执行幕后活动的。列宁每次都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发言，而且虽然他是政府领导，却公开地负责共产国际的政策。斯大林在政府中不担任任何职务，也从未在共产国际的任何代表大会上发言讲话。在纪念性的会议上，斯大林静坐在主席台上，接受代表团中多民族群众的欢呼。除了创始人，别人是不会知道的，公开的辩论和投票是不起什么作用的；除非得到斯大林的批准，共产国际的重大决定是毫无威力的。他轻视重大的意识形态辩论，而列宁却热衷于此。斯大林还认为定期的代表大会是浪费时间。在列宁领导的四年中，规模较大的代表大会就召开了四次；而在斯大林领导的二十五年中，代表大会只召开了三次；在1924年召开了一次，它批准了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谴责；另一次在1928年，在会上对右翼布尔什维克和布哈林的影响进行了消除；第三次在1935年，人民阵线的政策在会上被宣布。这个组织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它的执委会去了。与苏联党内情况相同，共产国际内也是核心小组对整个机构拥有支配权力。

当然，斯大林建立核心小组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不被人知晓的。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理论家、反叛者、激进的文人学士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以及在自发时期的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都被斯大林挤走了。他们几乎每一个都与二十年代早期那些倒霉的事件有牵涉，因此是容易受到攻击的；斯大林还利用他们的“偏向”和“错误”给他们制造难堪。欧洲共产党人对于遭到大规模的抨击和污蔑的俄国革命，所具有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如果当初他们的领袖知道是在反对俄国党的权威，他们就不会那样做了。斯大林对他权威的直接运用是极少的。谴责和判决都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执委会又是在国际代表大会上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不过它差不多总是由苏联代表团支配，而苏联政治局对苏联代表团拥有约束的力量。在政治局中，绝大多数人受斯大林统治。他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实现了对共产国际的控制。在名义上执委会中的苏联代表具有的特权并不比外国代表多，但是他们的道义吸引力是具有决定性的。当这种吸引力不够用时，就通过各种压力实现对反对派的推毁。那些具有反叛精神的外国党领袖都被派往莫斯科国际的总部去担任名誉职务，使得他们更易于被控制，并使得他们与追随者的联系被中断；还动员其他共产党的舆论与他们对抗，对他们国内的手和敌手与他们对抗进行鼓励。如果反对他们的一切手段都已施尽，而这些具有反叛精神的领袖仍在自己的党内享有权威，那末共产国际的出纳就采取对他们党的津贴停发的措施。但是这种过于粗鲁的压力只是一种辅助的手段。正是俄国革命的神话色彩，即它的牢固而长久的主旨同迅速消逝的神话交织在一起，使得斯大林能够高居这个由各国共产党共同创立的组织之上。在这些共产党的队伍中，对新生活方式追求的理想主义者，比随波逐流者要多许多。即使是随波逐流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因为他们虽然准备依附于任何主人，但这个主人必须以革命的权威说

斯大林政治传记

话。多年以来，斯大林按照自己的思想成功地训练了这一群人，主要就是因为这一群人乐于为一项伟大的事业而奋斗。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他们把这个事业视为苏联的事业，相比于苏联党政治局中的长期分歧或共产国际的变化不定，相比于苏联外交的诡譎或苏联前途的暗淡，对他们来说这个事业还是更为单纯和宏伟的。

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共产国际不仅具有了苏联党的光亮，而且也具备了它杂乱的内部组合情况。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有人想了解共产党的历史，如果只从这个党的国内环境出发，肯定是无从着手的。他无法解释路线的易变性、领袖们的撤换和任命、以及组织结构的各种改革。所有这些情况的根源，都必须经常地到苏联党总书记那儿进行查找，而不是从当地的社会斗争中去发现。当托洛茨基同三人执政发生对抗时，托洛茨基主义把共产国际纠缠住了。后来，凡是同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观点和感情上有关联的领导人，不是对他进行谴责，就是从此消失。在布哈林同斯大林联合的时期里，他是共产国际的一位有名的人物。他负责宣布共产国际的各项新政策，从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中派和右派联盟怀有同情态度的外国共产党人中挑选自己的人员。在这个联盟瓦解消失之后，国际就在“布尔什维克化”的新痛苦中辗转了。

共产国际产生于革命高潮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而且它希望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力量。在斯大林认为是革命停滞的旧时期中，他就努力改变这个从革命遗留下来的组织。在资本主义的稳定以及工人运动两种力量之间的和解上，斯大林目前对哪一方的考虑更多呢？如果他的判断正确，目前这两个

斯大林政治传记

国际所能做的事只有以或大或小的决心从有产阶级手中强行夺取改革和迫使其做出让步。在这个基础上，它们是可能会采取一致行动的，而且它们的合作也就可能消除它们之间的分歧。在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合期间，他们正是根据这一精神对共产国际的事务进行指导的。这时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正在蓬勃发展；在一种混合经济的结构内，执政党对私营农业和商业采取保护措施。它的这种“费边主义”的态度，似乎也要求在国外实行一种温和的方针，而这是同共产国际的主旨有较大差别的。

二十年代中期，有两个问题使斯大林特别关注，这就是苏联工会对待英国工联和中国的革命的态度。中国革命在其早期是完全受俄国革命影响的。国民党的奠基人孙中山强烈要求他的追随者清楚两个革命之间的联系。孙中山逝世后，斯大林曾发电报给国民党：“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坚信，国民党一定会在争取摆脱帝国主义束缚的伟大斗争中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国民党一定能做到光荣地举着这面旗帜，直到取得对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完全胜利。”俄国的顾问被派去为蒋介石进行的战争提供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莫斯科的命令去参加国民党，于是“四个阶级的联合”就成了国民党的组成成分，国民党本身也发展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联系成员。

这就出现了问题：中国革命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它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共产党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中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即摆脱西方的桎梏和本身的封建分离主义，这是革命的动力所在。这次运动在开头时是以一种统一力量的形式行动的。但是，在这个外表的下面，将军们和农民们、商人们和苦力们之间的社会分裂仍存在，并且这种分裂随着时间日益深刻。在中国沿海的工业和商业城市中，最有力量的政治因素是工人阶

级。

这能成为中国的“十月革命”吗？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回答是“不能”，而托洛茨基却回答“能够”。如果要从俄国历史中查找先例，斯大林倒是愿意拿1905年的情况与此对比，当时布尔什维克都相信，俄国还没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时机，而只能希望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由此斯大林得出结论说，此时中国人也只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他又退到了“旧的布尔什维主义”，而这种“旧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列宁在1917年4月坚决剔除的东西，只是他一直没有成功地从他的一些信徒的心目中彻底的根除它。由于中国革命的任务是统一中国和实现现代化，并取得民族的独立，而不是实现社会主义，所以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应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目标。与此相反，他们应该同资产阶级、农民和进步的民族主义将军们协调一致的行动。他指导中国共产党严格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因为共产党现在只是国民党中的一个派。他还指导苏联的宣传帮助增强蒋介石的威信，把蒋介石看成是中国民族复兴理所当然的领袖。最后从革命中形成的政府，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民主专政”。这是列宁在1905年使用过的形式，适用于特殊的情况，即只有“落后的”国家才合适。在这种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纯粹为了反封建的革命而战斗，并同革命的中产阶级和农民代表进行权力分享。

这种早已为人熟知的关于这一公式的半学院式的论争又重新爆发了。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同蒋介石联盟的主张，并主张中国共产党人直接追求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持列宁主义1905年的传统，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但他们谴责了斯大林的政策，认为它使中国

斯大林政治传记

共产主义运动附庸于资产阶级。这场争论达到极端狂热和尖锐的程度，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最后分裂起了加速作用。

同时，中国“四个阶级的联合”也分崩瓦解了。尽管中国的共产主义采取了很温和的政策，但它的发展却令蒋介石和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物所惧怕。蒋介石粗暴地抛弃了让他不安的同盟者：俄国的军事顾问被他送返俄国，他对曾经接受他的领导并为其服务的共产党人进行了残酷镇压。由于斯大林曾经坚决地对蒋介石采取支持态度，所以现在他的地位和威信受到了严重的动摇。他企图挽救一下他采取的中国政策，就命令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的左派联合在汉口成立政府以反对蒋介石。但是这个联合很快也就失败了，共产主义即使通过否认自己的性质去迎合资产阶级盟友，即使实行温和的、妥协的策略，甚至自己的标记和语言都改变了，也还是会引起资产阶级领袖和政党的恐惧和惊慌的。它一诞生就带有革命的标记，不是受排斥，就是受欢迎，不是引起恐怖，就是带来希望，任何策略上的计谋都不能将它隐藏，甚至也不能抹掉它的印迹。

另一个温和政策的重大尝试同样失败了，这就是 1925 年 5 月成立的英俄统一委员会。政治局期望着当时已经紧张的英俄关系会在英国工联会的影响下得到改善。斯大林派了政治局一个最有影响的成员托姆斯基到英国工联赫尔代表大会去致词。他希望通过同英国的缓和，使国际工人运动中互相对立的两种力量达成充分的协议。原来同共产国际平行的工会国际，对立于西方改良主义工会组成的所谓阿姆斯特丹国际。但工会国际遭到的失败比共产国际还要惨。现在莫斯科乐于承认这个失败，并实现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某种和解。英俄统一委员会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铺垫。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右翼抱有

斯大林政治传记

含糊的希望，以为两个政治性的国际实现了再次联合便是成功的完成了和解的任务。斯大林与往常一样的坚持着，小心谨慎地避免陷入这些有远见的计划中去。但是他却对托姆斯基和布哈林所奉行的方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并为这种方针遭到左翼布尔什维克的尖锐批评而辩护。

英国和俄国工会领袖之间的友好关系，经不起 1926 年总罢工的考验。布尔什维克左翼给俄国领导人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俄国领导人必须经常地批评他们英国同事的温和态度。他们的批评尽管很温和，也引起了广泛的反对。另一方面，英国工联的领导人也由于受到来自保守党舆论的强大压力，对他们同布尔什维克的联合感到拘谨。他们坚决不接受俄国工会作为团结姿态而募集的用来支援矿工罢工的资金。此后不久，英俄统一委员会就解体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企图同欧洲改良主义进一步和解的希望不复存在了。

和解的途径就这样让人失望的结束了。1923 年底，世界以革命者的理由对布尔什维克加以拒绝；到了 1927 年底，世界又对布尔什维克以和解者的身份而加以拒绝。共产国际在中国和英国试图实行温和政策的做法被证明是徒劳的，而且它也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都这样做了。但是共产党人却到处被他们往日的盟友所拒绝或伤害。对于和解政策的失望，共产党人的队伍中产生了一系列猛烈的变化，为新方针铺平了道路，而这种新方针与老方针截然不同。这个变化非常明显，以致在 1927 年年底，斯大林为了挽回在中国政策上的失利，竟然对已经由于野蛮的迫害和屠杀而削弱了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议，即在广州实行起义。在起义发生之前这次起义就注定了是要失败的，而且事实上带来了了对共产党员新的屠杀。整个共产

斯大林政治传记

国际立即进入了长期的“极左”冲动中，企图为它注定要倒霉的温和的政治家风度采取挽救措施。德国共产党在兴起的纳粹主义面前，使极左的政策发展到了带有自杀性的极端程度。

还有一个原因导致了共产国际的这种变化，就是1928年到1929年俄国党内出现了新的组合，这个原因的意义肯定比共产国际队伍中的情绪的意义更为重大。这时，斯大林正在迫使右翼布尔什维克屈服。由布哈林、李可夫或托姆斯基最先提出来的所有的政治概念或口号，都遭到了批判。而真正发生争论的还是俄国本身的问题，如新经济政策、集体化、工业化，等等。但是，由于俄国党急剧的发生左转，也就自动地把这种倾向送到了一直由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内。一部分外国共产党人倾向于站在布哈林一边，所以斯大林必须把反对布哈林的斗争也发展到共产国际里面。他为欧洲各党制定了新的政策，在外表上使其同俄国保持一致。在俄国，共产党人已经结束了与商人和农民的联合，那末它必然造成国外的共产党人应该停止同其他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联合合作。

俄国的所有的运动和折腾都自动地被其他各党所知，这就构成共产国际生活中的反常现象，甚至到了后来人们对这种反常现象都习以为常了，所以，共产国际的很多活动都处于一种脱离现实的氛围中。斯大林在俄国实行的向左转并不仅是非常郑重的，而且它具有民族规模的巨大场面，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社会结构。党的路线所实现的任务转变，以及把口号和诺言最后变成事实，都离不开以巨大国家的全部权力作保障。但是，共产国际政策中发生的这些转变又能说明什么呢？最多只不过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效仿。这就好象一个身材魁伟的运动员正在进行一场勇猛的竞争，环绕他四周的有二三十个人影，

斯大林政治传记

每个人影都模仿真人角斗时的勇猛的姿态，仿佛要惊天动地。事实上这些共产国际的支部并不仅仅作为影子出现，所以这一图景就显得更加怪异了。这些支部是实体和影子的综合物。当它们是实体时，就活跃在民族生活的现实中，企图表达自己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当它们是影子时，它们就参加了那场杂乱的幽灵舞会，在那位总书记的周围乱转。

1927年12月，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后，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说，“我们已经使资本主义的‘稳定’走向了结束，”这使众人之为之惊奇。他说：“两年以前，人们还在谈论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对的平衡状态，谈论它们之间的‘和平共存’。现在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和平共存’的时期已经终结了，现在进入了帝国主义进攻和准备干涉苏联的时期。”他并不想费力去调和这个新观点同他以前关于“和平共存”时期可达十五或二十年的预言之间的矛盾。他的这个新论点最后在1928年夏季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作为新政策的基础。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使外国代表团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他通过幕后活动实现了对布哈林的真正的罢免。

这次代表大会预言资本主义国家很快会出现灾难性的经济危机。根据这些前提，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的策略。人们期望着一系列革命的爆发。西方各国共产党计划进行对资本主义的最后攻势。社会民主党中的改良主义现在被称为社会法西斯，被看作是共产主义最危险的敌人。社会民主党的左翼甚至被当成是比右翼更可能妨碍社会主义革命——“越左就越危险”。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所有来往和联合都会使其遭到玷

斯大林政治传记

污，因此共产国际就把自己的武装力量聚集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条件，在全世界范围发动战争。

尽管斯大林的宣传机构欢呼所有的革命很快就会发生，但他是否相信这些是不能肯定的。他了解的外国情况是极少的，但还不至于使他相信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那些过分的革命幻想。他仿佛对共产国际的吹嘘视而不见，比以往更加强调“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这个最高的信条，认为所有的党包括本国的和共产国际都有遵守它的义务。这时他对于在俄国新建一个工厂看得要比一切外国革命的伟大期望都要高。他的外交甚至处于比以前更谨慎地摸索中前进，而且根据俄国要处于长期孤立的假设去继续工作。他的政策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在俄国实行的，另一条促使共产国际去实施，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矛盾。这两种政策权衡轻重，这是不难分辨的。

共产国际这时进行的确实是不现实的战斗。它的超激进主义是这样的虚幻，斯大林之所以采取支持态度，十之八九是因为他认为共产国际在那些年所做的都是一些毫无现实价值的事情。如果他真的这样认为，那末他就要犯大错误了，因为共产国际的超激进主义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虽然这种作用是负面的。特别是在德国，情况确实是这样的。德国是这项新政策的试验点，那儿的工人运动已经遭到迅猛发展的纳粹主义的威胁。但是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之间的决裂出现了。兴登堡被社会民主党作为靠山去反对希特勒，社会民主党人不同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而共产党却把社会民主党带来的威胁看的比纳粹更可怕。这种极其不合理的分裂，瓦解了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而那时只凭借工人阶级的力量就足以抵挡希特勒夺权。我们这儿不描述魏玛共和国崩溃的经过，反正它的结

局表现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工人组织向褐衫党投降，其中没有使用一颗子弹，没有进行一次真正的抵挡。只要说一个情况就够了。崩溃之后，有一句话在德国左翼中流行，“没有斯大林就不会有希特勒。”当然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1933年以后，德国左翼情绪低落，大多数的领导人忙于为自己的失败进行辩护，把斯大林的恶劣影响看作是导致一切发生的原因。但是，作为共产国际政策的授意人，斯大林的确是应该对此负一部分责任，因为那种政策不明智地为希特勒取得胜利创造了机会。

三十年代早期的共产国际从斯大林自己的谈话和所有的文件中能够明显的看到，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纳粹主义的意义及其破坏性的劲头。在斯大林看来，希特勒只不过是许多反动领导人中的一员，他由于政治上的持久战而一时之间摇摆不定，他不过是另一个勃吕宁或巴本，或者可以看作鲍尔温或哈定。对于这些人，偏偏是斯大林完全忽视了纳粹主义的集权企图和根据这种愿望来行动的力量。早在1924年，斯大林就形成了对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看法：

把法西斯主义看作只是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是错误的。……法西斯主义是凭仗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在客观上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毫无理由认为，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缺乏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支持，而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社会民主党离开了资产阶级战斗组织的积极支持，而能……获取决定性的胜利。这些组织决非相互抵触，而是互相支撑的。它们不是死对头，而是孪生子。法

斯大林政治传记

西斯主义是这两个主要组织联合形成的无形的政治联盟，它是在战后帝国主义危机的环境中出现的，它的目的在于反抗无产阶级革命。

这些话可以看作是斯大林对于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解的代表。在以后，他又含糊地重提了一两次，没有做任何修改。共产国际的许多理论家和作家长期以来都在抓住他说的“不是死对头，而是孪生子”这一点，对这个冲垮了欧洲旧政治结构的新力量没有一种首尾一致的阐释。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后，斯大林的代言人们还在推测而声称纳粹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在商讨秘密和约，但只要共产党再次崛起，希特勒的影响将会马上消失。在希特勒执政一年之后，斯大林虽然已经对纳粹主义带来的战争危险做出了准确的预见，但却含糊地向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说：“革命危机日益增长，法西斯主义决不能长久存在。”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而且他的代言人一直坚定的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希特勒企图将社会民主主义连同共产主义全部摧毁，法西斯主义要把它的“孪生兄弟”监管起来，单独掌握全部政权。应该补充说一句，不是只有斯大林一人才犯了这种错误。一直到最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还希望同希特勒达成妥协，而那些对纳粹主义持有友好态度的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保守派也在自我欺骗地相信，希特勒会按照他们的意愿来采取行动。

研究这些事情的学者，全都看到了这一显著的矛盾：斯大林尽管控制了他所能获得的所有情报和广泛的国际组织，但面对这个重大考验时，他却表现得理解力和想象力极其不足；而托洛茨基虽然孤伶伶地避难于太子岛，却极其敏锐的感觉到德

斯大林政治传记

国的危机并表现出很强的责任感。他在一系列的小册子、书籍和文章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纳粹主义作了当时来说是最详细的阐释。他循序渐进地追溯着希特勒运动的发展，在此之前精心地预言了它的每一阶段，并幻想着使德国左翼、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关注那种很快就带给他们的巨大的破坏活动。

在 1931 年他写道：

有责任提出警告：德国无产阶级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正在走向巨大的灾难，其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慌忙的屈服。德国国家社会党的掌权，首先就意味着德国无产阶级的精华被消灭，组织遭到毁坏，信仰被根除。鉴于德国社会矛盾的极其……尖锐，凶恶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面前，也可能显得是虚弱的和几乎是仁慈的试验。

在希特勒上台前两年，托洛茨基又一次提出警告：

工人们，共产党人们……如果法西斯掌握了政权，它就会非常残酷的把你们毁灭。只有无情的斗争才能使你们解脱。这就要求你们必须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团结战斗才能获胜。赶快采取行动吧，你们拥有的时间很少了！

在那个时期里，斯大林和苏联的其他领导人仍旧用法国领导的反苏十字军给人们施加压力，却没有意识到正在出现的真正的反苏十字军。1930 年 7 月，斯大林还坚持认为法国是“世界所有热衷于侵略的军国主义国家中侵略性最强的国家”，

斯大林政治传记

它正准备以发动战争的方式来反对俄国。托洛茨基驳斥道：“所有‘正常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都不可以在目前冒险发动反苏战争。……但是如果希特勒获得了政权，德国工人的先锋队被他击毁，并使整个无产阶级被他搞的在今后的多年中四分五裂和军队散乱，那末法西斯政府将是有资格对苏联采取反动战争的惟一政府。……万一希特勒胜利，他将成为资产阶级集团中的超级猛士。”莫斯科对托洛茨基的警惕认为是荒唐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继续顽固不化地坚信着斯大林的“死对头和孪生子”的理论。

直到希特勒执政，苏联基本上都在实施着腊帕洛政策。这个政策对战败的德国所给予的反对战胜国的支持不是无限制的。支持的方式有许多种，但整个来说，仍不能满足德国强行修改凡尔赛和约的企图。苏联也最大程度地从与德国联合中得到了好处，特别是当德国遭到其他国家程度不同的抵制的时候。德国工业品的进口，对二十年代俄国的恢复起了帮助作用。政治局授权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召集德国失业的军官和技术人员，来培训红军的军事技术。作为回报，德国的军事技术人员得到了俄国批准可以继续在我国进行那些凡尔赛和约不允许在德国进行的试验。斯大林一直维持了这些安排，这些安排一直持续到希特勒夺取权力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尽管如此，俄国与德国间的关系不具有结盟的性质。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们的目的是与协约国的优势相抗衡，并防止德国联合西方反对俄国。因此当西方国家尝试削减德国的赔款负担时，或者当它们企图在凡尔赛和约的基础上同德国改善关系时，苏联领导人都惊慌地关注着，看看这些行动中有没有反苏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联盟企图；同时他们还鼓励德国去反对战胜国。但是他们对凡尔赛体系的稳定性并没有多少信心。因此在 1925 年斯大林评论罗迦诺公约时说：“如果认为蓬勃兴起的德国会容忍这种情况，这是不可能的……试想采取何种措施保障这个在法律上确认德国丧失了西里西亚、但泽和但泽走廊，乌克兰丢掉了加里西亚和沃伦省西部，白俄罗斯的西部领土被割走，立陶宛丧失维里诺等等的凡尔赛和约和它的继续罗迦诺公约……避免出现与普法战争后从法国割去亚尔萨斯—洛林的那个旧普法条约一样的后果呢？……罗迦诺公约却促使欧洲新战争的出现。”因此，在 1925 年，斯大林就已经很有根据的列举了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个战争策源地。

斯大林在二十年代中期作出的许多预测是特别有意思的，它们对他即将采取的政策包含了直接或间接的暗示。和平只不过是两次战争中间的休战，他将此认作是一条规律。他同每一个布尔什维克一样，也坚持资本家对于原料、有利投资和市场的竞争，必然会导致军备竞赛。现在还存在疑问的是，除了战争爆发的时间以外，就是将来敌对双方怎样相处。在二十年代中期，托洛茨基曾过分夸大了英美矛盾的尖锐性，预言美国同英帝国之间有一场战争将会爆发。政治局接受了这个观点；而且迟至 1930 年，斯大林再次提到了这个观点，说两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建立的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比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都要尖锐。他在另一场合还说：“资本主义的英国在衰落和资本主义美国日益上升”。美国的上升让他产生了各种预感，因为斯大林看到美国主要通过贷款给德国，对日益衰落的欧洲资本主义给予了支撑。此外，直到 1933 年，美国仍坚决不承认苏联政府。

斯大林政治传记

如果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俄国应怎样对待呢？政治局多次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仍未达成定论。布尔什维克习惯于这样回答，但愿交战双方都遭到损失。他们还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来预测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希望交战国家的工人阶级都能同俄国工人阶级所曾经做过的那样举行起义。通常认为，俄国的任务就是鼓励国外对军国主义进行反抗的革命运动。

然而，在二十年代中期的论争中，斯大林对未来的变化采取了全新的和更为复杂的看法。这些辩论的具体情况得不到公开，因为大部分辩论的进行都是秘密的。只是到了1947年，斯大林在1925年1月的一次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才得到了第一次公开，这篇讲话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的态度。

由于战争的前提不断走向成熟而使战争的爆发成为必然。我认为西方革命运动拥有了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在壮大并且日益增强，这种力量能够在某些地方将资产阶级摧毁。这就是事实。但是这种力量的维护是很困难的。……当我们的邻国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的军队问题，我们就面临着军队的实力问题和它的战斗准备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主动的攻击谁。……我们依然高举着和平的旗帜。但是，如果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就应该采取行动。我们必须行动，但我们要在最后采取行动。我们采取行动是为了把能决定时局的砝码、把能够举足轻重的砝码放在天平盘上。

这篇很有启发性的声明值得通篇阅读。对于西方革命力量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那些说法，透露了演讲者对此所持的怀疑态度，既然认为这些力量是“巨大的”，而且正在“日益增强”，但它们却只能在“某些地方”推翻资产阶级；甚至后来它们都无力“保持住这种力量”。斯大林肯定相信，是俄国的军事实力，而不是国外的革命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会具有决定性。红军会为外国革命“保持住这种力量”提供帮助吗？他回避了这一问题，但坚持说，俄国没有这种义务。虽然他对此说得不多，但他是乐于旁观交战的资本主义国家耗尽全力，以便红军“把具有决定性的砝码放在天平盘上”的。也许这就象在1918年美国军队的做法一样。现在他证明了下面两点：第一，俄国在未来的争夺中尽可能多地获取利益；第二，红军的革命力量比西方实际的或潜在的要优秀得多。1925年时，斯大林心目中对这两点认识的明确程度，还很不确定。他可能不过是在向中央委员会讲话时边讲边想的。或者他可能想到了英美战争中俄国旁观的说法。不管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反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这两条就是他的行动原则。

大约在1925年以后，斯大林又宣布了另一种外交政策，回想起来这是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的。他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学生提起了某些外交人员对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示反对。他说，这个反对派对俄国与前协约国讲和表示支持，脱离共产国际，并重新收回被俄国主动退出的势力范围。这些明显是布尔什维克在重新思考自己的外交，对于自己放弃的帝国主义特权它现在感到懊悔了。但是这种重新思考也表示了一种在方法上的英明的预测，斯大林本人从1939年以后就在他的外交政策中遵循此方法，首先是同希特勒通过协议，然后是同邱吉尔和罗斯福达成协议。而滑稽可笑的是，当时斯大林却痛痛快快地指责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了这些预见性的建议：

这是蜕化和民主主义的道路，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府的道路进行的彻底销毁，因为患这种病的人，没有把我们的国家看作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作这一运动的起始和终结，认为其他所有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做出牺牲。对中国的解放运动进行支持吗？为什么呢？没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出现争执吗？我们同其他强大的列强共同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在中国得到许多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能带来好处，又不会有危险……对德国的解放运动支持吗？有必要去冒险吗？同意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接受赔款得到许多利益岂不是更好吗？……同波斯、阿富汗和土耳其保持友好吗？这样做值得吗？同某些大国重新获取“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吗？如此等等。这就是企图推翻十月革命的外交政策和正在栽培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

想念过去的势力范围在当时已在苏联外交中出现并有所发展，这看起来比斯大林对它的谴责甚至还要让人吃惊。在二十年代，这种想法确实是提得早了一点。当时俄国的国际影响能力还太弱，达不到同英国或法国达成协议来瓜分势力范围，这一点也许能够回答斯大林对这一想法干脆不予考虑的原因。他没有必要平白无故地就牺牲了他的外交政策在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随后的岁月里，有关苏联的问题，他的外交总是立足于维持国际形势的现状。在 1930 年 6 月斯大林对第十六次代表

斯大林政治传记

大会说：“我们不占领别人的一寸土地，自己的土地呢，一寸也不允许别人占领。”这就是 1939 年以前斯大林外交政策的主题。

第十一章 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 (二)

(1934—1941年)

在希特勒统治的第一年斯大林十分谨慎的保持沉默——寻找“集体安全”——斯大林接见艾登、贝奈斯和赖伐尔——苏联参加国际联盟；共产国际采取人民阵线政策——世界革命是一场“悲喜剧的误会”——斯大林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赌注——苏联在慕尼黑协定以前和慕尼黑协定期间的孤立——斯大林的迅猛回击——他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和平状况最后几个月中的对外策略——苏联条约的最后准备阶段——里宾特罗甫在克里姆林宫——对波兰的瓜分——第一次苏芬战争——斯大林拒绝希特勒访问柏林的邀请——法国的崩溃使斯大林出乎预料——在巴尔干苏德的敌对——日本特使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成为政府总理以及他同希特勒讲和的最后企图——1939—1941年斯大林外交的资产负债表

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并没有立刻使斯大林意识到有必要对他的对外政策进行一些修改。起初他在等待，观察纳粹政权是否稳定，希特勒是否会接受他前任的腊帕洛政策，或者会不

斯大林政治传记

会按照《我的奋斗》中所表达的他的思想，对苏联执有不可更改的敌视态度。同时，斯大林又极其谨慎地不做出什么带有刺激性的行动。德国的共产主义完全被动的使自己被希特勒所消灭，这可能使人们预期苏德之间会继续增进友好关系；而这件事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它似乎可以对所谓的俄国干涉德国内部事务的流行看法进行批驳。腊帕洛协议与 1926 年的友好和中立条约仍一直有效；在 1931 年两国又延长了这两个和约的有效期限，这次延长在 1933 年 5 月得到了批准，这时希特勒已经做了几个周的总理了。希特勒对所有国内反对派采取的血腥镇压和他的民族迫害行为，都没有太大的影响莫斯科和柏林之间的日常外交事务，这就像没有怎样影响巴黎或伦敦同柏林之间原有的关系那样。斯大林肯定在推测德国外交中所遗留的俾斯麦传统的力量，这个传统就是要求德国不要和俄国发生争执。在希特勒任总理的头一年里，关于德国的事务斯大林没有公开谈论过一次，虽然他的一言不发使共产国际中原本很窘的追随者特别痛苦。

只是到了 1934 年 1 月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才改变了沉默。但是即使那时，他对于欧洲左派遭到的惨痛的失败，还是没有做出任何结论。他还模模糊糊地抱着幻想说，法西斯主义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将证明是极为短暂的。但是他也认为纳粹的兴起是“复仇思想占了上风”，并且说，德国政策中的反苏倾向已经超出了老的俾斯麦传统。即使这样，他仍费尽心思地解释，苏联乐于同第三帝国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就像它同魏玛共和国的关系一样：

一些德国的政治家对这个问题谈论时，说苏联现在采

斯大林政治传记

取了依靠法国和波兰的方针，说苏联已经由凡尔赛条约的反对者变成了它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德国建立了法西斯制度。这是错误的。当然，我们决不会为德国建立了法西斯制度而过分高兴。但是在这里法西斯主义并不是问题的所在，这至少是因为法西斯主义，就像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对苏联和这个国家建立最好的关系并没有形成障碍。问题也不在于我们对凡尔赛条约的态度没有发生像人们想象的那种变化。我们遭到过布列斯特和约的耻辱，是不会赞美凡尔赛条约的。我们只是对世界由于凡尔赛条约而被卷入新的战争表示不满。

接下来出现的事件增强了他的预感。德国和波兰达成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使他心里开始不安，不知道希特勒是否在玩弄波兰统治乌克兰的手段，而皮尔苏茨基元帅过去就是玩弄这种把戏的最著名的鼓吹者。当波兰同意它和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进行延长时，他才对这种怀疑有所消除。与此同时，莫斯科向柏林建议，苏德两国一起管理和控制波罗的海各小国的边界和独立。希特勒不愿给自己带来束缚，因此不同意这个建议。从此，斯大林就专心地维护苏联边界的安全。但是当前的状况并不好。由北方从波罗的海进入苏联的道路是非常顺畅的；从中路穿过波兰进入苏联的路线，似乎也取决于波兰政府不明确的态度；从南翼进攻苏联是非常便利的，因为几个多瑙河国家对苏联采取了反对态度，只是到了1934年夏季，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才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腊帕洛条约以后，斯大林还是第一次认识到，苏联的外交政策应该进行一次全面的修改了。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从这时开始的苏联同德国的西方敌国之间使用的外交手段，也许是现代史中最为复杂的；而斯大林在其中起了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为复杂的作用。不过，这种手法的复杂性并不是因为双方动机和行动的不稳定性而产生的，而是由于它们的一致性和单纯性所导致的。相继发生的一些对立和僵持，与两个人在对弈极其相似，他们都在自己一方持续地采取平行行动，棋盘上因此出现了复杂的变化。每一个德国未来的敌人都在遭受折磨，它们一方面天真的认为战争会被避免，另一方面又隐约地感到它的不可避免性。它们惧怕陷入孤立，采取了某些行动来实现同盟保护体制的增强，它们都不愿承担明确的军事义务，害怕这种义务可能会加速战争的发生，或使战争更加接近自己的领土。未来盟国的所有成员都极其希望，重新兴起的德国的军国主义势力，可以转移到不损害自己民族利益的方向。起初，德国军国主义的弱点使它们采取消极旁观的态度；后来由于希特勒通过利用这种消极的态度来增强他的力量，它们又开始对这种弱点进行利用。未来盟国的每个成员都希望利用土地来赢得时间，并损害自己的盟友和朋友，一直到空间和时间全部丧失为止。

当然，有关各方并不能采取同时的平行活动。在每一阶段中，要想打破僵局，某一方必须先走一步，某一方还必须做出一些小的牺牲。因此，尽管有关各方采取了一些巧妙的极其相似的行动和计策，各方却在同一时期炫耀自己的公正，而把对方看成坏蛋。当法国和英国错误地实施绥靖政策时，苏联却勇敢地鼓吹着维护集体安全的号角。后来，为英国历史中最值得自己骄傲的时刻而自豪时，苏联却忙于同德国进行肮脏的交易。后来，为了加强盟国的团结，它们开始相互容忍；但是一

斯大林政治传记

旦战争停止，它们又重新相互攻击。

1934年，斯大林开始寻找保护性的同盟。他慢慢地、但可以让人感觉到地从反对凡尔赛体制转变为捍卫它。9月间，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原来克里姆林宫同国际联盟是互相不能容忍的。照列宁看来，国际联盟是一群强盗的联合，是为了实施凡尔赛和约、使殖民统治持久存在和镇压全世界的解放运动而成立的组织。斯大林也认为，“想参加国际联盟，正像李维诺夫同志所正确说过的，就必须在铁锤和铁砧之间选择一者。然而我们既不希望成为敲打弱小民族的铁锤，也不愿意做强大民族铁锤下遭打击的铁砧。”但是德国的报复行动毕竟比凡尔赛体制坏得多。李维诺夫迅速的变成了“强大的”国际联盟的最有激情的鼓吹者，认为它应该能够抵制或惩罚侵略行为。在斯大林对国际联盟具有的新热情中，他带有一点和平幻想的情绪。他打算构建一个东欧公约，同样也可以这样说，按照这个公约的构想，苏联、德国和东欧的一切国家都相互承诺，当其中一国遭受侵犯时，其他国家应主动地进行援助。苏联构建一个东方罗迦诺的努力，获得了来自法国外交部长巴都的有力支持，但是由于德国和波兰的共同反对而以失败告终。

到了1935年初，当斯大林建立区域性的东欧防务体系的努力成为徒劳时，他就转而计划联合西方。1935年3月，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安东尼·艾登。这位未来的外交大臣当时只不过是一个低级的大臣，他是对布拉格和华沙进行了相同的访问之后来到莫斯科的。大约此时，希特勒受到了一位英国的高级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在柏林的访问。不过，克里姆林宫对艾登表示了热烈欢迎。经过许多年的碰撞和敌视之后，他是第一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个正式访问红色莫斯科的英王领导下的大臣。两个国家之间的僵局好像已经被打破，而且斯大林也全力地去加速打破它。他打破总书记很少出头露面的惯例，亲自主持接待了英国贵宾。他还违背布尔什维克的规定，命令演奏英国国歌《天佑我王》。但是，这次访问没有期望会产生而且也确实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后果。后来到了5月，在希特勒刚刚恢复征兵制以后，又有两个重要的访问者赖伐尔和贝奈斯来到莫斯科。结果通过了苏法同盟和苏捷同盟。赖伐尔和贝奈斯受到了斯大林的亲自接待。他虽然名义上不是政府成员，却同外国重要的政治家进行过谈判，并正式接待过他们，从此这就被视为了正常的外交程序。

赖伐尔访问中出现了一次引起轰动的事件。他回到巴黎后声称，他被斯大林授权，宣布他同情法国为加强防务而做出的努力。在此以前，法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一样，在原则上对国防都是持反对态度的。它的议会代表对军事预算总是投反对票；它的党员们在军队中进行革命宣传。斯大林的意思看来似乎是不赞成这种态度；而且让人觉得有些讨厌的是，他竟然挑选赖伐尔来传达这句话，而法国左派认为赖伐尔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最凶恶的叛徒。在国民议会中法国的共产党代表在一个时期中对国防开支仍持反对态度。党内反军国主义的传统仍很猛烈，这不是可以轻易进行讽刺的。此外，赖伐尔也没有使刚刚缔结的同盟生效的意向；他拖延了它在国民议会中的批准手续，避免法国的军事领导人同他们的俄国同事对防务计划进行商讨。因此，共产党人也就不想对他的军事预算投赞成票。尽管如此，斯大林的声明预示了共产国际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在当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这个变化公开地表现出来了。从 1928 年以来曾经提出来的所有理论、口号和策略——法西斯主义和民主是“孪生子”的理论，坚决不允许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合作，等等——都已成为共产国际的历史了。保卫民主和反对法西斯主义，被确定为工人运动的最高任务。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被鼓励实行联合，建立“人民阵线”，其中包含了所有的资产阶级党派和集团，不论是激进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只要他们宣布自己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意向就可以。共产党人还不能使用过激的要求和反资本主义的口号抵制资产阶级自由派。这次代表大会后，共产党人迅速转变为民主国家国防的最热情的、甚至是大肆宣传的支持者。共产国际非常热心的执行这条新“路线”，从这一观点出发，它在左派的队伍中寻找遗留下来的反军国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他们被视为极其险恶的异端分子；而对于传统的反德右派像法国的孟戴尔和英国的邱吉尔，则被看作实际上的同盟者而受到欢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的代言人曼努依尔斯基过去对法西斯的痛骂比任何人都厉害，现在格奥尔塞·季米特洛夫取代了他，他是莱比锡审判德国国会纵火案的功臣人物，他的名字这时已被作为了反法西斯的标志。斯大林随时随地都要把他同季米特洛夫的私交向众人显示一番，于是这位保加利亚人的领袖就经常在各种检阅和典礼中站在他身边。

斯大林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派寻找支持人时是否是诚心诚意的呢？这个疑问在后来 1939 年的事件中似乎得到了证明。但是甚至在 1936 年时，法国前往俄国的军事使团的团长还写道：“俄国希望打败西方的一场风暴，在东方也将要出现这样的风暴……它不愿卷入这种很快就要发生的欧洲冲突。在这场

斯大林政治传记

冲突中，他希望自己可以像美国在 1918 年所做的那样，在被残酷的战争摧毁的衰败不堪的欧洲扮演仲裁者的角色。”斯大林 1925 年的演说好像证明了这种观点，当时他把苏联这个旁观者看作是未来战争中的，那位法国将军可能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不过，尽管这些情况确实存在，人们还是有理由断言，在 1935 年到 1937 年期间，甚至在以后的年代里，斯大林是为反希特勒联盟真正做出过努力的。他也是被形势所迫。当时，似乎所有的事情都证明，俾斯麦的传统在德国外交中已经被完全抛弃了。在 1936 年 9 月纽伦堡的集会上，乌克兰和西伯利亚被希特勒说成是德国的生存空间，他口气的肯定和激烈使人似乎感到他对同斯大林哪怕是实行短暂的谅解也没有作任何思考。在这一年的年末，轴心国的领袖共同通过了反共公约的缔结。那段时期，俄国和日本的边防部队经常发生冲突，有些还表现的非常严重。于是俄国的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似乎都被乌云笼罩。即使不是因为反法西斯，也是出于自保的需要，使得斯大林要在一个巩固的联盟中寻找安全。

这时他主要还是劝说西方国家接受明确的义务，或者诱使它们履行义务。在这方面，他连续受到挫折。即使在赖伐尔下台而勃鲁姆和达拉第通过人民阵线选举获得政权之后，苏法互助公约仍是毫无意义的。对于希特勒挑起的各种事端、重新武装和入侵莱茵兰，法国和英国保持完全的沉默，不予反击。斯大林决不会相信西方的绥靖政策是因为软弱和缺乏远见。说软弱吗？在希特勒恢复征兵制两三年之后，德国国防军还是一支军事力量不太强大的部队。类似于大多数政治家，斯大林也一直认为法国陆军由于在 1914 年至 1918 年中取得了胜利而处于登峰造极的地位；而且我们以后看到的，直到 1940 年以前斯

斯大林政治传记

大林一直在作过高的估计。他从军事和外交顾问那里得知，在那个阶段，德国的敌手们只要采取军事威胁，就能做到暂时阻止希特勒，这话没有错误。说短视吗？德国大企业、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联盟并不仅仅由于要洗清凡尔赛的羞耻，而且随着德国军事力量的逐渐壮大，它的帝国主义野心也会日益膨胀，这个事情应该是清楚了。正如我们所知，西方支持绥靖政策有很多原因，其中就有软弱和短视的因素。但是，斯大林绝对是不会因为这些情况而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政治家的软弱表示谅解的。

他不敢肯定法国和英国默许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原因在于它们企图把它的矛头指向苏联，就是有可能的话，斯大林也会把这个矛头转向西方的。即使他认为西方国家所实行的外交路线是由于性格和心理上的缺点造成的，而不是有意要反对苏联，但是他对此也不能十分相信。因此他就必须采取行动，来处理万一会出现的最糟糕的紧急事件。不可否认，对于英法统治集团来说，即使往日对苏联的敌视态度已经被清除了一部分，但是仍讨厌与苏联联盟的策略；西方的某些主要政治家把纳粹主义看成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有力保护；其中的少数人还在想把这个屏障转变为进攻武器；最后，即使在那些已经看到同苏联联盟必要性的人中，也有的相信，首先让德国同苏联发生战争也许是稳妥和明智的政策。

在所有这些外交谋略、友好姿态和遭受歧视的后面，隐隐表现出旧的意识形态上的敌对。斯大林显得温柔和顺从，想以此来驱除西方的怀疑、偏见和恐惧。首先他要把过去世界革命这个鬼怪驱走。他向一个询问他关于世界革命的外国访问者声明：“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计划和打算。……这是一场误会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产物。”他的话被访问者中断，访问者问道：“是一场悲剧性的误会吗？”斯大林回答道：“是喜剧性的，或者不如说是悲喜交加的。”他的话半真半假。布尔什维克确实没有计划过输出出现的革命；他们相信，每一次革命的发展和成熟过程都必须要在它的本土完成；但是他们也希望有外力加速它的发展过程。……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这时对辨别所有这些仅仅是喜剧性的或悲喜剧性的误会已是非常困难了。

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信任斯大林，并不只是因为有关过去的记忆。甚至到了这个时候，他要摆脱世界革命的观念仍很难，因为他总是有意无意的要追求世界革命。不论他为人民阵线提出的口号多么缓和，而且完全是民主的，不论多么的合理合法，而且“完全”是爱国主义的，他却不能够消除这些“阵线”的革命出现可能性的力量。不管他是否情愿，他不得不去发展这种潜力，并利用革命潜力为自己寻找利益。人民阵线的选举在法国和西班牙胜利，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情绪和信心自然就增加了，他们隐约感到，这如果不是革命的前奏，也是彻底改革的预示。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要注意群众的情绪。法国已被从未有过的异常强大的罢工、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动摇。西班牙也处于内战的动荡中。整个西欧都在新的社会危机中困难地摸索着。共产党的领袖们受到来自苏联的压力，经常尽一切努力来压制旨在造成资产阶级恐惧、挑动对法西斯的潜在同情心和挑起对苏联不信任的事件和运动。但是人民阵线的目的并没有实现。它们希望达到使资产阶级西方同苏联讲和的结果，却使它们的距离更大了。它们本来企图施加压力改变本国政府开始的态度同苏联联合，但随着它们压力的加重，这些未来可以成为同盟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了。从

斯大林政治传记

法国和英国的上层阶级看来，李维诺夫号召集体安全和为英法获取利益，是同罢工示威、每周四十小时工作日、高工资以及人民阵线企图在停滞的法国经济中强行摸索的社会改革的其他一些形式和措施相结合的。

要想获得积极的结果，就必须依靠一场现实的革命。但要达到消极的目的，即挑起反革命的报复，只需一点点暗影就足够了。在慕尼黑协定前夕，这种反革命的反扑在法国迅猛地加大。人民阵线明显地土崩瓦解；苏法同盟甚至比过去更不合实际了。1938年3月李维诺夫告诉一个外交界的同僚说：“法国对苏联不信任，苏联对法国也存在怀疑。”

西班牙内战给斯大林带来了同样的两难问题。他非常盼望佛朗哥失败，这不仅因为他当时采取了反法西斯的立场，而且因为如果西班牙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就很可能使法国更加惧怕德国。另一方面，这次内战包含着革命的复杂性。为保卫共和国政权而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可能企图建立共产党的或无政府主义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像在旧俄国封建主义里，没有土地的农民或许对土地革命同样有强烈的要求。但是如果“十月革命”在西班牙爆发，西欧就会更剧烈地分裂，苏联同西方就更难于达成协议了。因此，共产国际训令它的西班牙成员，只能局限在保卫合法的共和国政府以反对佛朗哥。没有要求他们实现工业的社会化和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李维诺夫被指派去参加了由列昂·勃鲁姆发起的不干涉委员会；而且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中，苏联的确明确的不干涉西班牙的事务。

但是，斯大林后来放弃了这一立场。这是因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经采取了行动，而这位左派的保护者就因为这一点也是很难继续保持超然立场的。于是他也采取了干预行动，而且

斯大林政治传记

通过法国共产党迫使法国效仿。他最基本的目的是，如果法国进行干预，就会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因害怕而停止入侵西班牙。但是他也还有更大的目的。如果西方的民主国家进行干预，它们就在反德的军事战线上有了明显的进步。西班牙现在已成为欧洲的一个靶场，甚至可能会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实际的战场。西方各国政府正是由于害怕世界性的冲突因西班牙战争而开始，或者由于不愿为人民阵线击败佛朗哥提供帮助，或者由于这两个共同的原因，一直采取不干预的立场，即使由于它们的不干涉而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得利也心甘情愿。结果，西班牙问题在不干涉委员会中不断地被扯皮，苏、英、法之间的关系极度地恶化了。

这样一些矛盾围困着斯大林，就像他在苏联指挥一场西班牙内战中的内部斗争。西班牙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共产党人采取的不革命策略极为不满。在加泰隆尼亚区，一个名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半托洛茨基党企图在斗争中采取更为激进的社会改革。斯大林对于这些左派中的非正统分子采取镇压的政策。他以向共和国政府出售苏联武器为条件，对共和国政府提出了清除这些人的要求。他除了派遣军事教官外，还为西班牙派遣了政治警察的代理人 and 清洗异端的专家，在共和派中实施了恐怖统治。仿佛是为了引起人们对这种工作的荒唐古怪产生注意，1917年的英雄和前托洛茨基分子安东诺夫——奥夫申科被斯大林命令去负责加泰隆尼亚这个团体中“异端分子”的清洗工作；而在安东诺夫——奥夫申科从西班牙返回之后，他自己又遭到了清洗。所有这些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斯大林想要西班牙的人民阵线继续保持共和派，并防止英法政府产生反感。结果他没有保持住谁的体面，而所

斯大林政治传记

有的人都对此反感。西方保守的舆论界对于西班牙左派的内讧毫无兴致，又被斯大林政策的诡谲搞得莫名其妙，因而谴责斯大林是革命的主要煽动者。

为什么在慕尼黑协定以前苏联的外交信誉如此急剧地降低，其中另有一个原因，就是莫斯科清洗带来的影响，而这是无法掩饰的事情。英法的将军们曾参加了 1936 年红军的演习，他们对于红军的军事素质和技术装备，总体印象非常好。而清洗必然地同这种印象相抵触。这些清洗看起来就像苏联这座大厦出现的凶恶的裂痕。不管西方的军方人士和政治家对被告们的罪行是否相信，他们的结论不能不贬低苏联作为盟友的地位。如果这么多著名的政治家、行政官员和军方人士已经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可怕的第五纵队，那末就应该问一问：一个国家里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其民心士气究竟是怎样的？如果这些指控是虚假的，那末能够作出这种事情的政府岂不是从头到脚地腐烂了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问题不仅仅是这样的简单；但这些情况在局外人看来就是这样，而这些局外人的看法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对于红军和整个苏联行政机构的清洗事件确实造成了最严重的破坏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破坏性还没有达到使它不能逐渐地、代价巨大地和可靠地恢复起来，虽然为了这种恢复，需要一种十分反常的外部力量来加以刺激；而希特勒的入侵正好为苏联带来了这种刺激。

后来，由于各种因素，当德国的扩张力量最强大的时候，苏联却在国际上遭到了几乎所有国家的孤立。慕尼黑危机使这一孤立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和让人无法忍受。斯大林在整个危机中就像他在这种时候的一贯做法，保持着不安的沉默。他感到

斯大林政治传记

惊慌和剧痛。几个月后他说道：“可以设想，他们把捷克斯洛伐克各区割让给德国人，以此为代价促使德国进攻苏联。”为什么张伯伦和达拉第心甘情愿地去帮助希特勒分割捷克斯洛伐克，他想不出其他的原因。不仅关于集体安全的所有讨论现在都已成为笑话；不仅国际联盟被绕过和忽视了；不仅苏联遭到同它没有正式盟约的英国的孤立；而且法国在众人注视下实际上相当于解除了苏法联盟。苏联同法国、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同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合是互相交错的。法国和苏联承担了军事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但是只有当法国实施了武装行动之后，苏联才有义务进入战争。法国没有看到它的盟友的利益和自尊，把它潜在的敌人看成了真正的同盟，而把它名义上的盟友几乎当作了敌人，这就使得苏联要用同样的方法回击法国。当然，正式说来，英国对苏联或捷克斯洛伐克不承担任何的义务；但是是张伯伦发起了慕尼黑交易而不是达拉第，因此英国同样遭到了侮辱和伤害。

在危机期间，李维诺夫受斯大林命令告诉捷克人，苏联准备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参加作战，如果法国能够实现它的承诺。波兰人受到警告说，如果他们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与苏联为敌。这就是说，由于法国不守诺言，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苏联也就可以不履行诺言，但它却没有失信于人。后来波兰人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但他们被苏联告知说，他们并没有犯下任何敌视苏联的罪行。这就又一次出现了这一问题：在1938年斯大林究竟是否真心准备做他在1939年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李维诺夫在那关键的时刻一再向捷克人提出的保证斯大林是否会执行？如果西方当时就进入战争，斯大林会不会仍旧要退出这个盟约？对这些事件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可以去作这

斯大林政治传记

样的推测，但对1938年9月时斯大林内心究竟在想什么是无人知晓的。如果根据他当时的行动来判断，他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一直到最后，他还作出参加作战的表示，颇有一点英勇士兵的风度，好象只是由于战斗结束的时间不当才使他未能大显身手——不过这一次没有出现真的战争。情况很可能是，斯大林在慕尼黑协定前后的心情不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割改变了东欧力量的均势，使苏联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斯大林看来，1939年的危险性要大于1938年。他对西方企图让德国进攻苏联的猜想加剧。因此相应地，他也就想脱离西方了。

慕尼黑协定中有一条不成文的原则，就是要把苏联排挤出欧洲。不仅是西方的一些强大的和表面上强大的国家有这种想法；东欧一些小国的政府也对苏联痛骂道：“别出来，待在你的窝里。”在慕尼黑协定前的一些时候，当法国和苏联正在讨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同行动时，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就坚决不允许苏联军队通过国境去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它们不给予红军过境权的理由是，它们不仅害怕共产主义，而且它们还要讨好希特勒。在许多事件中，有一件事非常特殊，斯大林从中看到了这些政府的思想。这就是在签署慕尼黑协定之前不久，有六架苏联飞机通过罗马尼亚上空飞往捷克斯洛伐克，虽然苏联人没有违反任何一项飞行规则，却仍然引起了一系列的抗议。首先是波兰外交部长贝克上校，然后又是罗马尼亚外交部长。还有许多这样的侮辱和闲言碎语，很长时间以后仍然存在。

肯定是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不久，斯大林的头脑中就出现了同德国重归于好的想法。这时，慕尼黑协定的策划者所抱的巨大和平希望立即化为乌有了。显然，希特勒这时正想集中

斯大林政治传记

兵力，避免受到分散，以便对付西方或东方的抵抗。这正是斯大林试图对希特勒的想法进行左右的大好时机。但是任何主动的行动都是冒着巨大危险的：如果希特勒拒绝，就会给苏联作为反法西斯联盟倡导者的声誉造成很大的破坏，而自己却得不到任何利益；而且就会使英法政府有了借口，让希特勒在东方自由行动。斯大林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很大的灵活的随机应变性。他不得不暂时尾随别人采取行动。当然，他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方法来探测一下希特勒，但这是十分危险。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冯·舒伦堡伯爵是一个俾斯麦派的外交家，对俄德联合表示支持；但是正因为如此，他的观点代表不了德国外交部，更不用说代表希特勒本人了。苏联驻柏林的大使梅利卡洛夫是一个水平很低的外交人员，想接近第三帝国中有影响的人物显得非常困难。除此之外，也可以秘密地交换信件，但这种做法造成的后果危险性很大。于是斯大林相当精明地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他本人通过在公开的场合作出含蓄的但意思极易被明白的暗示。

1939年3月1日，在间隔了四年之后，召开了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他赢得了时机。作为总书记他通常是要把前四年国内和国际的情况进行总结的。他的报告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事项，毫无疑问会被国外十分注意地听取，避免错过外交方面的重要暗示。另一方面，在总书记的例行报告中好像是顺便地提出了含蓄的主动表示，这会比使用其他的方法更易于让人接受。3月10日，斯大林向大会作了报告，其中模棱两可的谈及国际形势的部分可谓是少有的杰作。

他说：“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已经爆发两年了，这次战争是遍布从上海到南布罗陀的广大地区的，有五亿多人被卷入战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争。“新的帝国主义大战”一词隐约地表明，他把未来的所有交战国都看成帝国主义，苏联必须弄清界线。他接着摆明了正在到来的萧条和战争的关系。但是后面他又干脆把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称为“侵略国家”，并且说它们即将为了摆脱严重的萧条而进行世界大战。他在对外交的经济背景进行详细地描述时，强调了美国和英国在经济上和军事潜力上的优势。他报告中的现实主义不仅在于对各种力量做出了正确的评价，而且还在于他直接地假定美国最终会参加战争。这个假定当时看来好像不太合情理。接着他就直率地谴责了西方的绥靖政策说：“参战的侵略国，从各方面对非侵略国的利益都造成了损害，首先是英国、美国、法国的利益，而英国、美国、法国却多次后退，不断对侵略者妥协。”在一段经过严密推理的论点中，他分析了绥靖主义者的目的，这就是他们惧怕革命，想在侵略者和牺牲者之间保持中立，想实现德国和苏联的相互抵消，然后，当它们相当疲惫时，自己就以充沛的力量参加作战……并迫使那些疲惫的交战国满足他们的要求。真是价廉物美啊！”他的演说虽然充满了严厉的谴责，但听起来仍然象李维诺夫对于集体安全的呼吁。演说中隐约透出，俄国不愿孤立地进行战斗，而希望加入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联盟。但是接着他又把话锋急转，说即使西方企图挑动苏联去反对德国，苏德之间的所有矛盾都是没有来由的。他用极具讽刺意味的话挖苦那些西方的纳粹友人，他们企图诱使第三帝国反对苏联，但纳粹领袖们让他们极为失望。他暗示，负责的纳粹领袖们是不会与那些梦想征服乌克兰的“德国疯子”站在同一队伍中的；对于那些疯子，俄国会找到可行的方式进行约束的。他最后列举了他的外交政策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却是相互抵触的。他要求苏联同所

斯大林政治传记

有的国家增强来往，即使他曾亲口强调说，现在已经是不存在正常事务联系的时代了，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他要求苏联改善同所有邻国的关系，只要它们不反对它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利己主义原则。同时，他还承诺苏联支持受法西斯侵略的所有受害者。这样，他就想尽各种方法。他要求法国、英国和美国进行坚决的反对侵略者的行动，并公开地反对绥靖主义；他要求侵略者不要破坏苏联的和平，并暗示说，如果它们让苏联保持和平的话，他本人就会提出自己的绥靖主义，即可以与张伯伦相比的慕尼黑协定。他的论点中对反法西斯这个主题做了特别的强调，因而这种绥靖主义的试探让人不易明白。他仍然极力希望同英法达成协议，一个星期以后，他发出命令，命令李维诺夫谴责希特勒进军布拉格，并宣称对这个纳粹的保护国苏联是不会承认的。

我们在这儿只对后来几个月发生的精彩场面进行描述。3月18日，即李维诺夫指责纳粹占领布拉格的那一天，英国外交部要求苏联做出答复，如果罗马尼亚遭到侵略，苏联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莫斯科主张由英国、罗马尼亚、法国、波兰、土耳其和苏联共同召开会议；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会议就等于一个反德联盟，而苏联便是其中的主要领导之一。张伯伦甚至坚决不予考虑这个建议。几天以后，张伯伦宣布英波互助条约，紧接着美国又做出了保证希腊和罗马尼亚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只是在英国与自己的传统相背而对东欧承担了义务以后，它的外交才与世界那个部分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稍微靠近了。4月15日，苏联被问道，苏联对保证罗马尼亚和波兰的边境不受侵犯是否同意。这将是“一种单方面的保证”。这头熊仍然被要求呆在它的窝里，但它也被要求能随时满足那些

斯大林政治传记

可能需要它帮助的小邻国的要求。

4月17日，斯大林从对立的方向采取了两个外交行动。他拒绝按照英国的命令单方面地履行对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义务。他反过来主张英法苏之间缔结军事协定和同盟，然后三国一起保证向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所有国家的反侵略行为提供帮助。但是，就是在那一天，苏联驻柏林的大使梅里卡洛夫在德国外交部处理日常事务时，谨慎地提出了苏德恢复友好关系的问题。斯大林密切地关注着这两个行动的反应。来自巴黎和伦敦的反应让人失望至极。西方国家企图把苏联作为一个后备的盟友，而决定不和它正式结盟；如果不行，也要避免苏联在结成联盟时具有任何真正的影响。它们认为波兰的军事实力有苏联那样强大。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国家又一次郑重地宣称，它们没有必要同邻国结盟。波罗的海国家的政府，害怕，斯大林要求在它们的国家里随意地采取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威胁了它们的独立。这种威胁后来被证明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斯大林也确实提出了非常充分的理由——如果拒绝他防护从波罗的海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通道，那就不能期望避免战争的危险。波兰政府声称，它不需要结盟，因为如果出现战争，波兰军队有足够的力量捍卫自己的领土，而不需要依靠红军的援助。西方国家的政府指出波罗的海国家的反对意见，没有接纳苏联的建议。斯大林认为，西方国家提到波罗的海国家的反对意见，是作为借口而已；他认为，西方国家如果愿意同苏联结盟，它们是会抛弃或解决这些反对的。他感觉到，此时他从伦敦和巴黎得到的只能是欺辱和阻挡。

正是在同一时间，他投到施普来河中的网似乎被某种东西

斯大林政治传记

触动了。4月28日，希特勒发表了一篇关于使用战争威胁波兰的过激演说。他一反常态，没有说一句有关苏联的不友好的话。他的报纸也不再刊登过去常出现的反布尔什维克的长篇大论。到了4月底，斯大林日益增加了同德国讲和的希望，但是他仍然不敢冒与英法破裂的危险。5月3日，他撤换了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李维诺夫是一个犹太人，态度偏向西方；接替他的是莫洛托夫，一个土生土长的布尔什维克，而且是一个“雅利安人”，比较适合同法西斯进行最后的谈判，斯大林对他的信任要大于对李维诺夫的信任。

5月19日，英国首相在下院说了许多非常蔑视苏联的话。5月20日，莫洛托夫就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同冯·舒伦堡伯爵建立联系。德国人曾经表示愿意看到以前破裂了的贸易谈判得到恢复。关于这件事，莫洛托夫说，首先必须为这类谈判建筑“政治基础”。这位德国大使企图诱使莫洛托夫透露出真实的想法，但没有成功。他向柏林报告说：“显而易见莫洛托夫先生决心只谈到这些而不会再说些什么。他固执的态度是有名的。”显然，莫洛托夫的这种固执做法是受到斯大林命令的。斯大林既然已经走了第一步，他就等待希特勒接着走第二步。但是希特勒也还不情愿限制住自己。这时，斯大林只批准了一个不知名的官员格奥尔格·阿斯塔霍夫即俄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参赞对德国外交部更加自由地进行试探，并且说出的一些话耐人寻味。如果不成功，斯大林可以轻易地拒绝为阿斯塔霍夫承担责任，而使他成为牺牲品。斯大林如此的谨慎，他召回了驻柏林的大使梅利卡洛夫，而且长达一整年没有返任。大使的长期离任带来的益处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它使苏联对阿斯塔霍夫的接触负比较少地正式责任；另一方面又可对这些试探的真正目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进行掩饰。

到了六月底，斯大林的策略在柏林、伦敦和巴黎表现为一种停滞状态。几个首都都表现出不信任，故意延长时间以便观察变化。但是在这场暗地里进行的全方位的神经考验中，希特勒的神经好像第一个崩溃了。通过齐亚诺这条曲折的途径，斯大林得知德国的态度有亲苏的转变。他还不知道，里宾特洛甫正在急不可耐地要求他的驻莫斯科大使让俄国人揭开真实目的的面纱。大使半含歉意地说：“我们没有成功的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拽过勃兰登堡门。”到了7月22日，战争的乌云低压着波兰，苏联人最后表示愿意进行贸易谈判，没有再强调首先建立“政治基础”。但是三天以后，伦敦和巴黎最后同意往莫斯科派遣军事使团。斯大林的两面派政策已经走到了决定性的阶段，他仍竭尽全力要确保他的侧翼。他仍向英法敞着前门，而同德国进行的接触只限于在后门。他选派了最重要的军队首脑、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去同西方军事使团会谈。主要由阿斯塔霍夫负责同纳粹接触。

甚至到了现在，已经发表了关于这些事件的许多文件，斯大林当时特别看重哪一方面，还是不能确定的；是在前台展开的密谋，还是他正在阴暗的后台进行的反密谋。毫无疑问，如果西方国家的政府曾经企图迫使他与希特勒发生冲突，那么它们的困难现在要比过去多得多。英法军事使团的动身就延误了宝贵的十一天，他们乘坐速度最慢的船，在路上又多花了五天。当使团到达莫斯科时，它们又没有明确的信任状和职权。那些国家的政府，几乎是在希特勒的迫使下屈尊地把首相和总理派往慕尼黑的，却坚决不同意派出任何有名望的部级官员前往苏联进行联盟的谈判。它们派往苏联进行军事谈判的军人，

斯大林政治传记

比派往波兰和土耳其的地位都要低。如果斯大林曾经打算结成联盟，那么这种故意的怠慢就会使他放弃这种打算。相反，如果他是为了达到同希特勒和解的目的，而他同西方国家进行谈判只是为了寻找一个道义上的借口，好把吹嘘已久的大规模的反法西斯联盟的失败的责任推给英法，那么英法恰恰以一种奇怪的热心毫无代价地提供给他这种借口。

在1939年初夏，他可能仍未下定决心。他的那个老的想法，即最好使苏联避免陷入战争，肯定不再有吸引力。对他来说，首先作为一个旁观者是再好不过了，然后在这场马上就要到来的竞争中充当仲裁人。只有同希特勒进行交易，他才能够实现这一目的，因为如果同西方联盟，从战争初始阶段，苏联就有义务参加战斗。鉴于这种想法，斯大林有意于去寻求同他的主要敌人的讲和。但是希特勒对这种交易有意愿吗？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斯大林仍未能解答这个问题。一直到了七月底，事情的进展实际上仍仅限于含糊的试探，即仍未突破早春所达到的阶段。从那时以后，还没有任何一个特别的行动被采取来准备苏德之间的协定。既然情况是这样的，斯大林在另一方面也肯定担忧，他不仅无法使苏联避免陷入战争，而且还可能使它被孤立于西方之外，成为德国侵略的下一个目标。当然，在苏联和德国之间还有波兰，它是希特勒直接侵略的目标；而且西方已经承担了支援波兰的义务。但是，正如斯大林后来对邱吉尔所说的，他认为，波兰可能遭到西方国家的抛弃，就像捷克斯洛伐克曾经被他们抛弃一样，德国和苏联到了那时就会直接相撞。要防止这种情况，同西方国家联盟仍是保障的唯一方法。他虽然一方面想同希特勒进行交易，但鉴于一切都还不确定，所以他很可能仍然准备着同首先愿意与他结盟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国家进行合作。如果西方国家提出的条件可以使苏联在联盟中发挥他认为应起的作用，那么他会考虑加入反法西斯联盟的。在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前不到三个星期，舒伦堡向柏林报告说：“我的感觉是，苏联政府当前已经做好准备同英法签订协定，只要英法能够满足它的所有要求。”

八月下半月，形势急转直下。希特勒下定决心开始加强和斯大林的联系。这位追求者的迫切之情日益增强。阿斯塔霍夫报告了德国外交部十分迫切地要同苏联寻求友好的解决办法。8月3日，舒伦堡把里宾特洛甫的一封信转交给莫洛托夫，其中基本是声明放弃反共公约，并承诺“尊重苏联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利益”。斯大林到这时才做出决定。他毕竟能使苏联避免陷入战争了。但是，他还不急于对希特勒的请求给予答复。他的答复同样是：

如果你确实爱我，那就诚实地宣布吧，
但如果你认为对我的征服不是太困难，
我会为此生气和想不通并向你说声不，
所以你应该竭尽全力地追求……

莫洛托夫表示不同意郑重地对舒伦堡说，他还没有看到德国内在的真正变化。他对德国提出的一项建议持反对意见，即在将要签订的贸易协定文本上添上一部分有关苏德友好关系的描述；他继续给舒伦堡明确的暗示，德国对波兰的入侵是犯罪的。里宾特洛甫这时确实等不及了，谋求同斯大林会见。他起初遭到一些理由的拒绝；后来斯大林让莫洛托夫对舒伦堡反复提出的要求给予了回答，总是说会见希特勒的这位特使，不能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不做精心的准备。这位外交上的贱民这时终于得到了那个在欧洲深有影响的人的奉承。

最后斯大林确定了结束“生气和想不通”的时间，我们能够比较确切的定于8月19日下午三点一刻。在这一天下午的早些时候，舒伦堡又一次提出要求请莫洛托夫为他的部长的拜会安排一个时间。莫洛托夫没有理睬这位大使的提议，再次说，“由于需要做各方面完全的准备，甚至大约确定一个拜会的时期的可能性都没有。”里宾特洛甫也抱怨说，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无论如何也要让他去做一次尝试。莫洛托夫在下午三时同德国大使分手，并马上向斯大林汇报了谈话的情况。只是到了这时，斯大林才命令莫洛托夫马上让舒伦堡回国，交给他一份条约草本，并告诉他，斯大林计划在大约一周内接见里宾特洛甫。下午三点半，莫洛托夫又一次同德国大使碰面。第二天，希特勒特意申请斯大林提前两三天接见他的特使。这时战争迫在眉睫，已经十分临近了。斯大林答应了希特勒的请求。这还是两人私人交换电文的头一次。希特勒在电文中流露了虚夸和自负。他大肆地谈论“长期政策”、已走过的几百年等等。即使当他认为要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出政治家风度的时候，也免不了要对波兰发出街头演说式的疯狂恐吓。他不停的运用第一人称单数：“我接受”，“我的部长”，“我欢迎”，“我以为”。斯大林十分得体的做出回答，简洁明了，说理冷静，而且几乎是不使用人称：“……苏联政府让我告诉您，他批准冯·里宾特洛甫先生于8月23日到达莫斯科。”

8月23日的傍晚和深夜，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两次会谈，他们对双方都关心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了商讨和解决，通过了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和一个“秘密的附加议定书”的签署。在条约中，它们互相承担了严格中立的义务，如果其中任何一方卷入战争的话。这个文件中没有做出友好的保证，除了两国政府保证对双方争端的处理要“通过友好地交换意见”。斯大林完全相信，这个条约立即就使希特勒能成功的从两线作战中解脱出来，以致最后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斯大林倒是不会有什么愧疚感的。在他看来，战争是无论如何不能制止的，即使他不同希特勒搞交易，战争早晚都是要爆发的，而且是在他的国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爆发的。他不认为自己是肇事者，因为是希特勒在世界上引起战火的。他，斯大林只不过是让苏联摆脱战火。正如后来事情所表明的，他期望波兰能够做出长时间的抵挡，但不怀疑波兰最终将会屈服，而且西方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提供有力的支持给他。因此他看到了德国打算向苏联入侵的出发点已经东移数百英里了。正如他已经看到的，他的任务就是对此变化中蕴含的战略上的风险进行削减；而要减少这种风险，他不得不也对波兰进行分解。这体现在“秘密议定书”中。这样，此时他就要放弃所喜爱的外交原则——“我们不需要别人的一寸土地”。

苏联开始了领土扩张的时代。斯大林当时的目的就是寻求安全，这类似于十八世纪沙皇们的情况，当时沙皇们害怕普鲁士军国主义国家的壮大，参与了三次对波兰的瓜分。这一次是第四次的瓜分，苏联开始获取了沿那累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以西的全部领土。它的边界线延续到维斯杜拉河东岸的华沙城郊。秘密议定书还规定了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置于苏联侵占范围之下，而使立陶宛留在德国的管理之下。苏联因此因为它非常危险的第二首都列宁格勒构筑了防御的缓冲地带。在

斯大林政治传记

南面，各国承认了苏联再一次对比萨拉比亚进行合并的权利；德国宣称，在政治上它对巴尔干“没有兴趣”。这个秘密议定书的用词是模糊的，因为正如里宾特洛甫以后进行的说明，双方充满了怀疑，而且害怕被看穿和受欺骗。没有说清楚“势力范围”的具体含义，不过它确实意味着任何形式的控制，也包括完全明显的占领。巴尔干国家的前途都没有做出详细的讨论。在这个阶段，斯大林是能够提出有关巴尔干的要求，希特勒当时迫不及待的希望享有行动自由的权利，对别的民族的土地是非常慷慨的。但是，斯大林只是根据当时的安全目的行动，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进行扩张领土；由于德国没有在巴尔干行动，他也就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特别是讲俄语的比萨拉比亚，在革命期间罗马尼亚把它吞并了，莫斯科一直没表示认可。

斯大林对于战争的想法是什么？他认为同希特勒协议的巩固程度如何？人们还不知道，在那个阶段他是否回顾了亚历山大一世同拿破仑结盟的历史事件。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仿佛给人的印象是他老在考虑那个先例。现在他已经签订了自己的提尔西特和约，虽然还不像他那位戴皇冠的亚历山大一世先驱那样，同他的对手在河心得到固定的木筏上会谈。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以后，亚历山大有了四年的缓冲期，只是当许多场战争爆发之后，他同拿破仑的冲突才真正出现。1941年6月在希特勒使斯大林感到失望以前，斯大林每采取一个步骤，都希望能同样长的延缓冲突。他肯定没有想到希特勒会获胜的。他现在就是希望达到争取时间的目的，实行他的经济计划，使苏联的力量得到强化，然后当交战各国打得精疲力尽的时候，再投入力量。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他的这种观点，从他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中是能够加以推断出的。关于这方面，我们只留有里宾特洛甫的记录，它是很不完整的，而且存在一些歪曲事实的地方，但是它毕竟还是再现了符合斯大林性格的形象。苏联方面所有的资料都没有被发表，当然就会急急忙忙地出来指出里宾特洛甫记录中明显歪曲的地方。

斯大林和希特勒使彼此用一种讲和的敌对虚假语气在交谈；他们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敌对之后，又要尽力掩饰自己，故而显得热诚过度。其中的一人仿佛在说，“说给我听，你过去在一些场合中想对我进行何种阴谋？我也会说给你一些你所关心的内幕消息。”这两个和解了的敌人虚假地表现出一种快乐的样子，尽情地喝酒和纵声地大笑，但是每人都很警觉，生怕说错话，泄露了什么重要的情报，或作出了不正确的提议。除了他们行将成交的买卖外，还彼此承诺提供尽量多的友好帮助；但是任何的承诺都不会变成现实。

这确实就是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之间的友好闲谈。里宾特洛甫说，英国人已经花了五百万英镑去收买土耳其的政客们。斯大林打断说，哦，我能向你保证，他们使用了更多的资金。接着又转而谈起反共公约。斯大林大肆地夸张说，只有伦敦城和一小撮商人才会关心这事。里宾特洛甫不再拘谨了，他说，你知道，有的英国人说您很快也要参加反共公约了。针尖对麦芒，笑话不间断。斯大林经常暗示，他仍然认为希特勒是侵略者，而且虽然希特勒强烈要求战争，但德国人民却呼吁和平。斯大林对访问莫斯科的英国军事使团作了“不满意的评论”。这个使团惊讶于刚刚他同希特勒的条约，显然对于自己受到的烦恼和羞辱还未思考。但是斯大林没有告诉里宾特洛甫关于他

斯大林政治传记

长期同英法谈判的所有情况，也没有给他提供同军事使团交换而来的所有的重要程度不同的情报。他向里宾特洛甫推脱说，英国使团“从未告诉苏联政府它的真实目的”。接着，里宾特洛甫又一次对他本人和元首提出关于帮助日本和苏联实现缓和的建议，斯大林为此只是认为他作为一个高加索人比里宾特洛甫对亚洲了解得更深。里宾特洛甫还有另一个关于提供“友好帮助”的计划，他受希特勒的命令，告诉斯大林，德国对波斯普鲁斯海峡和伊斯坦布尔不感兴趣。但是，虽然讨论了土耳其问题，对伊斯坦布尔和波斯普鲁斯海峡未做任何提示，显然这是因为斯大林同希特勒的冲突性要求，对这一问题还没有什么兴趣。当这位特使对土耳其的不可信进行埋怨时，他仅点头表示认可。

他想诱使里宾特洛甫透露出意大利的军事计划，但没有得到什么启示。话题就转向英国和法国。斯大林谈论到英国军备不足，并对英国的反感进行了抱怨：“如果英国统治了这个世界……这是由于别的国家的笨拙，它们总是被自己吓怕。比如，几百个英国人就把印度征服了，这是很可笑的。”但是他接着说，“尽管有弱点，英国仍会狡诈地和固执地进行战争。”这种观点显然是得不到这位纳粹外交部长同意的。里宾特洛甫对斯大林对法国军队的高度评价表示不同意。从这儿我们就能够意识到斯大林政策的一个主要错误和主要前提：他期望英法可能长时间地抵抗住德国；他对英国在军事上的不足和它进行战斗的决心做出准确的估计；但他过高估计了法国的军事力量，过低评价了德国的打击力量。他万万不会想到，在他同希特勒签订条约满两周年时，他会针对它提出“打倒德国侵略者”的口号。

斯大林政治传记

斯大林的第一个、但并不重要的一个预测失误在九月初就已经有所显露了。他对波兰武装抵抗的迅速失败表示惊异。9月5日，里宾特洛甫开始敦促苏联人向他们获取的那部分波兰领土进军，但斯大林尚未做好发出进军命令的准备。他这时有些犹豫，并重新进行思考。他做不到公开地援助正在被击败的波兰，但可以肯定，他也坚决不会在波兰失败前采取行动。他重新考虑的是怎样在苏联获取的那片同波兰族聚居的部分划一条分界线。这时他还没有采取行动以占领这个区域的意愿，因为那是明显违背布尔什维克政策所公认的原则的。他这时倒是愿意把这条分界线确定得更东一些，即从维斯杜拉河到布格河，目的是让俄国获取到的那部分主要是由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居住的地区。把这部分土地同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再次合并，在政治上是可以被理解的。它使红军能够有权利正当越过国境，不是被看成波兰的征服者，而是被视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解放者。他这时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说成是“血缘兄弟”，已经渗透了他的纳粹对手所宣传的种族主义影响了。当斯大林一直不采取行动的时候，里宾特洛甫就开始欺骗和诱使他说，波兰东部会出现政治“真空”，一些“新国家”将建立。这些“新国家”可能会处在反苏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领导下。希特勒对斯大林提出的一项公报表示反对，其中说，红军越过边界目的是保护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避免纳粹的侵略。这时，斯大林注意到德军已经在波兰东部采取了行动，心里十分焦急。他要求德国大使保证德军撤离那个地区。在一个短时期中，他反复考虑过要不要建立一个残余的波兰国。后来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命令红军进军。

九月底，里宾特洛甫又来到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夜的宴

斯大林政治传记

会，并听取斯大林再次思考后的看法。后来达成了一项新的协定：德国继续统治波兰民族居住的整个波兰，立陶宛则由苏联实行统治。

斯大林对于希特勒在波兰的闪电式的胜利记忆犹新，从而丧失掉大部分的自信心。西方从事的那场说不清楚的战争使他非常担心：英法放弃行动是否为了鼓励希特勒去进攻俄国？这时该他来向希特勒讨好了。结果在互不侵犯条约上又补充了一个友好条约，它写道：苏德共同拥有的一个特殊的任务是在波兰“重新建立和平的秩序”，并“承诺使那里的居民能够过同他们民族性格相符的和平生活”。西方国家对德国和苏联的获得物是没有评论的权利的。斯大林已经不再采取冷静的保留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他已承担起波兰被纳粹占领时所实行的恐怖政策的共同任务。他不仅表现为希特勒在交易上的合伙人，而且就是他的共谋犯。在一项特别的秘密议定书中宣称，双方政府有义务共同镇压波兰人恢复波兰独立的宣传。史无前例的是一项联合声明，它呼吁立即实现和平，并把继续战争的责任推脱给英国和法国。在支持希特勒“和平攻势”方面，斯大林是比任何人更伪善的。因为这时任何人都没有斯大林那样热心地祈求战争的延长。如果西方这时缔结停战协定并默许德国对波兰的征服，希特勒很可能在1940年夏季就入侵苏联了。

这种伪善已经成为1941年6月以前斯大林对待希特勒的特点了：他对那位元首越是怀疑和越害怕他的侵略，他就越竭力地和夸张地宣称他的友谊。如果希特勒的部队似乎在远离苏联边界的地方遭到阻挡，他说话的语气就会变得不那么友好，态度也就会变得更僵硬了。在这场交易中，双方都是既有收获又有损失的，斯大林当然是要努力的做到少失而多得。苏联为

斯大林政治传记

德国提供谷物和原料，而从德国获取机器和机床。条约缔结之后，斯大林首先要做的就是派遣各种军事使团到德国去。这些使团妄想趁第一阵友好的高潮去偷窥德国的战争工厂，以致使得凯特尔、戈林和雷德尔在十月初就对这些使团过分的好奇感到不满。后来不久，纳粹的经济领导人同样非常不满地说，俄国人所要去生产大炮的机床已太多了，而且还要太多别的战争物资。

波兰战争结束初始，斯大林就担心地注视着苏联和德国之间那一块无人防守的广大土地。实际上，自8月以后，波罗的海各国已经有人防守了。9月和10月，苏联军队已经驻守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这三个国家还存在着旧制度和政府，斯大林的行动目的好象只是为了确保战略基地。这时他第一次表现出对巴尔干国家的短暂担心，这确实是一块无人防守的土地。10月，莫洛托夫要求保加利亚同苏联结盟，保加利亚坚决不同意，斯大林没再追究这件事。这时他的注意力正被吸引在同芬兰的麻烦冲突上。芬兰坚决不同意让给苏联防御列宁格勒所必需的战略基地，也拒绝把自己看成苏联势力范围的一部分。

在1939年11月30日苏芬战争爆发。斯大林在这场战争的军事上被迫采取了一时的策略，这是历史开的一次恶毒玩笑，因为芬兰独立正是他本人在十月革命后第一个月宣布的。芬兰人这时尽一切努力打保卫战，在初期他们取得了重要的胜利。这一方面是因为气候的反常，一方面也是因为近期的清洗而使苏联的指挥部削弱了。突然间，苏联的威望和控制能力大大削弱。而且这场冒险还会引发出严重的麻烦。英国和法国对芬兰的同情态度日益强烈。这两个结盟的政府正式答应对芬兰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进行军事援助；两个国家里已经征召了志愿军；而且当齐格菲防线和马其诺防线还在一种神秘的寂静中时，法国政府却宣布有大量部队在魏刚将军指挥下向中东地区集合，正对着苏联易受攻击的高加索边境。12月14日，苏联被国际联盟逐出门外，而国联过去对法西斯的意大利和第三帝国总是非常宽容的。斯大林怀疑西方国家是否真的想把战争从德国“转换”到苏联。这场芬兰战争的损失比获取更大；但他陷得太深，以致无法脱身。正是在这种犹豫不决的心情下，他在1939年12月举办了六十岁生日的庆典。他利用这一机会用既荒唐又拙劣的态度向希特勒表示友好。他回复希特勒的贺电说：“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建立的，因而是永久的和牢固的。”斯大林后来急切希望在记录上把这句话抹去，不惜一切代价他也是愿意的。

1940年3月芬兰战争结束了。苏联军队的威信获得了一些恢复。希特勒这时做好了侵略西欧的准备，很可能一直担心斯大林在背后入侵。这两个人的态度再次发生了变化。3月28日，里宾特洛甫给他驻莫斯科的大使打电报说：“元首对于能在柏林欢迎斯大林不仅将感到无比荣幸，而且他一定会使斯大林受到与其地位和重要性相称的招待。元首将给予他在这种场合所应具有的一切荣典。”斯大林没有迫不及待地答应这种荣典，或者象另一位领袖那样同希特勒一起检阅游行队伍。甚至莫洛托夫对接受这一邀请并不着急。冯·舒伦堡伯爵只好在元首面前说好话，解释斯大林的保留态度是由于他不习惯于出现在一个生疏的环境中。

很快令斯大林震惊的事发生了，这就是法国迅速的崩溃和投降，以及英国撤退欧洲大陆。斯大林的战略打算也泡汤了。

斯大林政治传记

由于害怕同希特勒在欧洲出现冲突，他毫不迟疑地切断了苏联的波罗的海的通道。他不信任波罗的海各国政府，因为它们在意形态上偏向于柏林而不是莫斯科，于是就派了日丹诺夫到爱沙尼亚、捷卡诺佐夫到立陶宛和维辛斯基到拉脱维亚，命令他们推翻当地的政府，建立由共产党掌握政权的新行政机构，并打算把这三个共和国合并于苏联。

这样，在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中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和重要的转变。最初在波罗的海国家建立基地，他只是从战略上的暂时需要出发的。他没有明显的意图要改变它们的社会制度。由于法国的瓦解而使他的危机感更为紧迫，迫使他要在这三个小国家中采取革命行动。这还是他第一次对他自己的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有所偏离，而这个理论是他不断地反复灌输给苏联整个一代人的。他偏离这一理论的原因，也是由于他那种灵活的实用主义态度。但是他的做法与老布尔什维克所曾梦想的传播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他是用军事力量把革命从国外带进去的。波罗的海各国的工人阶级很可能对他所规定的工业社会化是给予支持的；但苏联的军事力量在其中是有决定性作用的，而不是当地人民的情绪。老布尔什维克依旧认为革命首先是人民的运动，是劳动人民的工作，是他们自己的党领导和组织的。现在这个大变动却被作为一个大国战略上的机械的副产品。

在一切大的或者中等程度的国家里，要贯彻执行这种大变动是困难的，因为它的社会有机体离不开自身的新鲜血液的运动。但是这三个小共和国与其使用巨大的、喜歌剧似的警察政权，却被它们的大邻国所挑起的行动直接粉碎。它们曾经得以存在，一部分是因为俄国在 1918 年的软弱，一部分应是因为

斯大林政治传记

早期布尔什维克的慷慨。斯大林的苏联既不是软弱的也不慷慨，因此斯大林现在是作为旧俄国属地的收复者、沙皇遗产的要求人出现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对于外部世界，到了1940年他才第一次发挥了这种作用。头年9月，他还不es敢随意合并原先沙皇统治下的那片波兰族居住的土地，而只希望得到那些从种族理由来说苏联至少同波兰一样有权利提出要求的土地。现在他却控制了波罗的海各国，而苏联对波罗的海各国是既没有也不能装着有任何种族上的要求的。但是，他仍不可以公然地提到沙皇时代的地契，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正统观念不允许他的这种做法。这种正统观念同样禁止他承认为了战略上的原因而奴役弱小的邻国，因为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来说，这就有点帝国主义的表现了。为了挽救面子，他假装是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并导演了一场公民投票，结果是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都要求加入苏联。其他大国领袖也努力控制或者去侵占战略基地，因而斯大林的做法不应受到过分的苛责。但是表面看来，这种行为是更让人厌恶的，因为它非常直露地违背了他承认过的原则，也因为他采取了如此笨拙的手法来掩饰这一违背。

整个夏季，他都非常警惕地关注着希特勒对于波罗的海各国苏维埃化的反应。整个来说，希特勒还是满足于维护这种交易关系，因此没有采取干预措施。当斯大林从罗马尼亚中分化出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时，希特勒也没有进行任何干预。这些就是他们之间比较成功的联合的最后一幕。

到了1940年夏末，在不列颠之战期间，斯大林采取了比过去更曲折的策略。他对希特勒战胜一切的胜利仍抱怀疑，但他显然也猜测到英国可能会投降。无论如何，他想方设法要留

斯大林政治传记

给希特勒的印象是：他，斯大林觉得，希特勒的胜利几乎已确定，苏联已经打算在纳粹的这种“新秩序”中进行调整和适应。法国投降后不久，莫洛托夫就对意大利大使说，他的政府认为战争已接近末尾了，苏联现在所关心的主要是巴尔干，它想在那儿对保加利亚施加影响，并迫使土耳其丧失绝对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权利。肤浅地看，斯大林是在搜寻希特勒“最后”的“战利品”。实际上，他的这些要求是因为害怕从南边遭到德国的围困。希特勒认为，这些要求又有俄国人想要围困德国的样子。在他们自称为友好的第二年里，充满了在巴尔干问题上的相互欺诈。

斯大林一方面向希特勒表示他极有信心地认为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一方面又派出外交使节和代表去国外宣传和鼓励任何反对“新秩序”的迹象。在此以前莫斯科的报纸只是不屑一顾的提到同盟国，现在也以同情的态度报道不列颠之战，并呼吁法国爱国者抵抗对他们国家的控制。甚至在这以前，德国外交部就被迫对苏联驻瑞典公使柯仑泰夫人的反纳粹宣传提出抗议。

但是，这些行动都是背后隐藏着做的，或者是由斯大林可以宣布其言行不受限制的人去干的。支配一切的形势仍然是对德友好。斯大林特别注意避免给希特勒一个印象，以为他正在寻找机会同英国——希特勒的惟一还在坚持进行战斗的敌人——的接触。另一方面，斯大林十分需要同英国保持接触。1940年7月初，他亲自招见了新的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这是自从里宾特洛甫访问以后他第一次如此郑重的接见外国使节。这位新大使是因宣扬英苏友好而为人所知的；他的任职行为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表明了温斯顿·邱吉尔甚至到了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这时还希望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斯大林不管是否承认这种友好姿态都是很尴尬的。他倾听着英国大使谈论德帝国主义带给苏联的灾难，以及苏联维持在巴尔干现状的排他性权利和维护它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黑海的利益。但是斯大林坚决不会明确地表示态度。他不承认德国对苏联有任何威胁，不承认关于苏联在巴尔干有排他性权利的提议，虽然他证实了他希望有一个新的解决海峡问题的方法。他担心讲出的任何一句话会被误解为同情的表示，所以谈话时含糊不清，虽然还不是不友好的。他认为，英国当然希望使苏联同德国陷入冲突中，因此任何一句粗心的话，特别是它被登在英国报纸上，就可能使苏德之间马上卷入纠纷。他谨慎小心到如此的程度：竟指令莫洛托夫把他同英国大使交谈的一个合适的副本交给了舒伦堡伯爵。据说从这个副本中可以看出，斯大林谈话比实际上更为严厉，而且有许多对“主要德国政治家”奉诚的话。

甚至在不列颠之战结束之前，苏联和德国之间公开地表现出对巴尔干无人驻守地区的竞争。希特勒没有同斯大林商量，就为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划清了新界线。他还给予罗马尼亚调整边界的承诺，这就意味着直接反对苏联。德国部队侵入了芬兰和罗马尼亚。当莫洛托夫对以前协议的这些违反表示抗议时，他被告知，德军进入芬兰和罗马尼亚，是为了避免遭受“英国的威胁”。在整个无人驻守的地区，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了冲突。东欧和东南欧正在迅速地变小，以致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个人在此不能共存了。希特勒说：我来了，你就得退出！

由于德国正与英国处于对立中，希特勒就不能再把红军在东欧的力量看得毫无作用了。现在只有斯大林愿意加入他的阵营并从而成为他的卫星国，他同苏联的和平关系才会得到维

斯大林政治传记

持。他企图把这件事做得能受人欢迎，以诱使斯大林能满足他的愿望。1940年10月13日里宾特洛甫给“我亲爱的斯大林先生”的信中写道：“根据元首的意见……苏联、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共同采取一项有远见的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划分它们的利益……看来是它们的历史任务。”希特勒没有再说起过去遭到拒绝的对斯大林的邀请，只是要求莫洛托夫到柏林去，并让里宾特洛甫选择一个日期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面。德国方面认为关于四国公约的建议将会被接受，于是里宾特洛甫就告诉斯大林说，为了这个宏大的场面，他计划同意大利和日本的特使一块到莫斯科去。

对于里宾特洛甫这一夸大其辞的长篇大论式的信，斯大林只是简单而乏味地回答了几句，而且故意延长了一个星期。他在“原则上”对里宾特洛甫的建议没有表示不满，但不愿潦草决定。他愿意派莫洛托夫到柏林去，并在莫斯科招待里宾特洛甫，但是“同日本人和意大利人一起商讨”必须进行一些“事先调查”。从莫洛托夫在柏林的表现，可以转而易举地推断出他是怎样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行事的：莫洛托夫抱着一种友好的态度，认真的倾听了所有建议，不承担任何新的义务，而在巴尔干这个利害关系上则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莫洛托夫从柏林带回的报告，简言之就是：希特勒亲自重申了关于四国公约的建议，显然企图通过苏联的参加而可能使英国投降。俄国将获得那个“破了产的拥有四千万平方英里的世界大庄园”——英帝国的一部分作为回报。四国将瓜分那个“破了产的庄园”，而结束自己的内部纠纷。在元首看来，从长期来看，德国、日本、苏联和意大利的利益只需向南方一个方向进行扩张。意大利和德国将在非洲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日

斯大林政治传记

本则在南亚建立殖民帝国；苏联准备朝印度方向扩张。莫洛托夫努力地希望使谈话从希特勒描绘的让人陶醉地图景转到更切实际的许多小事情上。对他来说，控制巴尔干，其价值就等于英帝国控制下的所有殖民地。他企图使希特勒处理好苏联和德国在东南欧的势力范围，但失败了。

斯大林这时采取的措施是有最严重后果的，它等于希特勒的建议被回绝了。他表面上同意加入四国公约，但在这样做以前，要求希特勒的部队撤离芬兰，承认苏联的保加利亚这个势力范围，支持苏联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取得长久的基地，等等。希特勒只有抛弃进攻苏联的一切计划和他不再担心苏联发动任何进攻，才有接受上述要求的可能性。实际上他既不愿放弃进攻苏联的计划而又惧怕苏联发动进攻。结果这个四国公约的建议就被放弃了，以后再也没有被提起。希特勒收到斯大林的答复后三个星期，就给总参谋部做出了代号为“巴巴罗萨”的反苏战争的第一个命令。

在1941年的头几个月中，苏联被彻底排挤出巴尔干，克里姆林宫为此非常气愤。一月间，它突然宣布，德军入驻保加利亚，既没有与他商讨也没有获得他的同意。到了3月，他甚至以更为强硬的词句再一次提出这一抗议。这时一切对希特勒反对的迹象都受到了鼓励。克林姆林宫接待了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加夫里罗维奇，“就像兄弟一样，他们在那儿密切地讨论、筹划和签署协议。斯大林……还同他一起留影，并且……同他终夜讨论友好的前景。南斯拉夫大使问斯大林：‘如果德国人生气，转而反对你，该怎么办呢？’……斯大林面带笑容地答道：‘那就让他们来吧！’”1941年4月4日，苏联同南斯拉夫签订了友好条约。莫洛托夫听南斯拉夫大使说，德军计划

斯大林政治传记

入侵希腊和南斯拉夫，两天之后他就告诉德国大使，他希望德国能同南方斯拉夫人的和平关系得到维持。

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彼此成为公开敌人、发生冲突以前，只有一次斯大林在希特勒以前偷偷采取了行动。1941年4月13日，他接待了日本外务相松冈洋在，对一个中立条约进行了讨论。这一条约使苏联免除了两线作战的危险，也使日本可以全力以赴地进行太平洋战争。松冈刚从柏林返回，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在那儿都曾明确的提示他，德国很快要入侵苏联，并要求他在莫斯科不要签订什么条约。但是日本和苏联此时都害怕卷入两线作战，而且这种担心超过意识形态上的友好和敌对。

在松冈两次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表现得特别活跃，甚至变得不停地说话。他告诉他的拜访者说：“我们都是亚洲人。”他不断提到这个主题。这部分是外交辞令，部分也是斯大林对他的血统的夸耀。自从他取得辉煌成就以后，苏联的亚洲人的地位已经被提得很高了，现在他又亲自把它提到顶点。他仿佛是在想引起人们注意，苏联能够获得宝贵的和平功劳在于他，而他是从欧亚交界处发源的。他向日本客人高兴地表明他的亚洲人的观点。这两位的风华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别之处，就是直言不讳而又各怀鬼胎。松冈是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后代，却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精神上的共产党人”。斯大林安静地倾听了松冈叙述其祖先的英雄业绩和他自己的承诺，说什么日本虽在中国作战却对中国人不抱反对态度，但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派全心希望推翻日本的“精神共产主义”。从政治哲学出发，这两个人转而在萨哈林岛北部的让步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他们采用一种东方人的方式激烈地争论，斯大林用手势表示，松冈想扼死他。

斯大林政治传记

斯大林对自己的亚洲血统进行夸耀，这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他刚从现实中得出结论，尽管他采取抵御，德国仍然已经占有了巴尔干，没有留下一点点欧洲的土地让苏联的势力进行扩张。他被迫采取退却。在六星期以前，考虑到苏联在欧洲的利益，他还派莫洛托夫去同希特勒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现在他以一种隐蔽的态度试图让希特勒明白，他，斯大林已经退离这场竞争，准备像希特勒能过莫洛托夫向他提出的忠告一样，满足于在亚洲的利益。在4月18日松冈离开莫斯科的那一天，斯大林作了一个虚假浮夸的姿态，意在使希特勒注意他的新态度。他完全出人意料地从隐居的生活中突现出来，亲自到火车站去欢送那位日本大臣。在许多外国记者和吃惊的外交人员面前，他拥抱了他的“亚洲人伙伴”。后来舒伦堡转述说，斯大林“公开地找寻我，当他找到了我，就走向前来，搂着我的肩膀说：‘我们必须继续友好，您现在就必须竭尽全力地实现这个目的！’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又转向德国……武官克莱伯斯上校，首先得证实他是一个德国人之后，对他说：“不管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仍是你们的朋友。”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一定会清楚所有这些事情的意义。对于他们在11月的建议斯大林好像已经同意了，并表露了他愿意进行谈判。

可是已经太迟了！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柏林和莫斯科之间因为边界侵犯问题双方发生了争议。德国飞机飞越苏联领土，苏联飞机侦测德国的地形。在边境上大约有一百五十个师的德国部队集结，同它们相对的苏联部队在数量上略有优势。正是在那些时候，大约是4月底，斯大林收到了来自英国的信息，这是邱吉尔在他6月22日的演说中讲过的，他警告斯大林，德国很快就会开始进攻。这个警告是很准确的，按照一些

斯大林政治传记

说法，它提到拿破仑入侵俄国的纪念日 6 月 22 日很可能是德国入侵的日期。

在莫斯科，这个警告至少有两个人拒绝仔细思考，这就是斯大林和舒伦堡。那位德国大使的错误是有理由的。他忠实于他的俾斯麦传统，希望德苏之间的摩擦不会带来战争。在 4 月的最后几天，他向希特勒呼吁和平，就象一百三十年前另一位大使高兰柯尔向拿破仑请求放弃侵略俄国一样。舒伦堡带去了苏联第二年提供给德国五百万吨谷物的建议；他还试图向希特勒解释苏联军队集结边境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俄国要三倍保险的要求。如果我们出于一种目的派去一个德国师，因为保证安全他们就会为了同样的目的派去十个师，我不认为俄国会对德国采取进攻。”但是希特勒没有任何的反应。

令人费解的是，斯大林也希望苏德之间的和平尚能挽救。不过，这可以追溯一下他在关键性的几周中所采取的整个行为。这时他犯了一种过于狡诈的人所容易犯的错误。他忽略了所有凶兆，坚信依靠他自己的方针对策和对政治上灵活的洞察力，是可以挽救形势的。

5 月 6 日，斯大林担任总理的消息使莫斯科感到惊讶。从 1923 年以来，他还是第一次不承担总书记一职，承担政府的直接责任。原因是什么呢？一些重大决定的前景还不确定。它们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刚刚过去的五一节检阅已经被看作是一场特殊的军事力量的显示。在他当选总理的前夕，斯大林参加了军事学院的军事演习，并发表了一篇对毕业的军官篇幅非常长的秘密讲话，称颂了红军的英勇。那么是要打仗了吗？希特勒的对手们都屏息地关注着斯大林这位总理最初采取的行动，而他们都为之惊奇。斯大林拒绝承认大军集结边境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传闻；同亲德的伊拉克政府的外交关系得到了恢复，而在此之前它是否认它的；最令人惊奇的是，他要求比利时、南斯拉夫和挪威在莫斯科的使节禁止开放他们的使馆并撤离苏联，因为他们的政府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最后一个行动，特别是他所解释的原因，很明显目的是想安抚希特勒的。不易说清楚的和让人们感到惊讶的究竟是他的不择手段还是眼光短浅，不过，当他想方设法希望再次取得希特勒的信任时，他也害怕这种做法会带给本国人民软弱和失败主义的影响。因此，他把关闭三个使馆的决定向苏联军民进行保密。然后经过一个月，斯大林看看希特勒是否有表示赞许的可能性。但却看不出一点可能性。

他作了最后一次毫无希望的和喜忧参半的努力。6月14日，正好是德国入侵前的一个星期，他下令让新闻机构发表了一个声明，它突然改变了外交惯例，猛烈地抨击英国大使所宣扬的“苏德战争迫在眉睫”的谣言。这篇声明轻而易举地就能辨认出是斯大林的手笔，它否认德国曾向苏联提出任何领土和经济的要求，不承认因为苏联拒绝了这些要求，两国正在进行作战的准备。同莫洛托夫给里宾特洛甫的几个秘密照会截然不同，斯大林这时却坚定地认为德国将会“不折不扣地履行”它同苏联的协议；而且他虽然不再拒绝承认边界两边大军集结，却把德苏军队在那集结的目的是为了打仗的一切说法抨击为“捏造的、荒谬的和挑衅性的”。

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外交记录中也看不出一丁点比这更可悲的事了。在这个奇怪的声明中，斯大林面对整个世界颂扬了下一星期就将揭开面纱而成为苏联死敌的人们，而又嘲笑奚落了下一星期就将会与苏联唯一结盟的人们。但是这个声明并不完全是不真实的。诚然，就像斯大林所说到的，德国并没

斯大林政治传记

有对苏联提出要求。但是显而易见他是想让希特勒提出要求来，以便对它们可以进行争辩。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波兰时，确实在入侵前提出公开的要求和进行大声的恐吓。斯大林显然认为，希特勒还会再次使用此种手段。由于他没有看到这种通常的危险信号，所以他也就否认了就在眼前的危险了。在他的声明中，他使用希特勒在 1939 年 3 月中已经熟悉的那种迂回方式，邀请希特勒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开始采取商谈，但希特勒并没有理睬这种提示。

然而到了这时为什么斯大林还要嘲笑英国呢？他认为，英国肯定有意来破坏他同希特勒作最后讲和的计划。他认为英国大使言行失检，并因此而非常生气。但是，即使英国人在这件事上一点私利都没有，他们也还是会使他愤怒的，因为对他来说仅是对暴风雨的预言，就等于使暴风雨距离更近了。另一方面，伤害英国的感情不会让他感到害怕。这时，英国已经同德国的孤军抵抗了一年，他知道无需去追求英国的援助；如果苏德战争爆发，苏英之间的联盟几乎就会自然地形成了；到了那时，就不会去追究过去了。

在 1939 年到 1941 年之间斯大林同希特勒的交易，造成了激烈的争辩。他的批评者说，在那些年代里，在他之前的政治道德记录已经非常差了，后来甚至达到了背叛的程度。他的维护者驳斥道，虽然他的道路充满了曲折，但他的行事是合法的，一直不曾失掉最后的目标，也一直不曾抛弃他的原则。

战争爆发后不久，斯大林本人进行辩驳。在 1941 年 7 月 3 日斯大林说：“也许有人要问：苏联政府为什么能同像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不守信用的人和魔鬼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斯大林政治传记

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犯过错误吗？”他不承认“犯了错误”，并提出他的政策的优点：“我们使我国取得了一年半的和平，使我国可以准备自己的反击力量。”除了获取时间以外，苏联当然也得到了领土，即它迫切想获得的防御缓冲地。它在民心士气上的所得就是，使人民明确地认识到德国是侵略者，而他们自己的政府从头到尾都在追求和平。

在这三个所谓的收获中，士气上的收获才是真实的。俄国军事史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俄国士兵与德国士兵不同，在保卫自己的家乡时作战勇猛，而且这种为民族生存而战斗的坚定信念，在随后的年月里使他们具有了最好的品质。至于苏联所获领土的战略价值，让人感到是不牢固的。在前东部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一些军事前沿地带，开战几天以后就完全丧失了。但这些前哨的建设过程却是那样地艰巨和讨厌；它使许多民族产生了非常大的不满，特别是在把“不可靠的”波罗的海人和波兰人驱赶到苏联内地之后。总之，这些军事前哨在战略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或者无论如何，反正是很快就丢掉了；但是这些领土的获取所造成的道义和政治上的坏处却是很大的。衡量利弊，整个事情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和可悲的失败。

时间上的所得也不是完全绝对的。斯大林的确利用了这二十二个月的缓冲期，集中地对苏联的战争工业进行了大发展，并根据新的军事经验重新对军队进行了训练。但是希特勒同样利用了这二十二个月的时间。他避免了两线作战的险境，征服了差不多整个欧洲，德国的战争机器把十多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和人力都投入使用。在1939年到1941年之间苏联战争储备的新积累和军事工厂有了巨大的和非常重要的扩张，却不能和希特勒同时自然增加的力量相配。有三年的时间，红军几乎是孤

斯大林政治传记

军奋战地在陆地上同希特勒的部队战斗，失去了广袤而富饶的领土，流的血超过了任何军队，而且迫切和失望地等待着西方开辟第二战场。不过，如果在早期的一个阶段中斯大林就把苏联的力量参加战争，那么第二战场在 1939 年到 1940 年间就会得到开辟；而且还可能在以后长期存在着。

确实，就是利用这一段喘息的时间，他也没有做出太大的贡献。由于他直到最后还是企图避免战争，而且对战争必然性和临近紧迫性的许多预示置之不理，他就没有把力量全部动员起来防止德军取得开始时的巨大胜利。他只是动员了一半力量来抵挡希特勒的猛攻。1941 年 6 月，苏联和德国动员起来的师在数目上几乎是相当的，但苏联的师只有一部分做好了来对付经验丰富和装备优良的对手的准备，而且这个对手由于获得一长串巨大的胜利而充满信心。但是红军在人数上占优势是存在可能性的。斯大林所使用的政治方法太复杂了，使他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地位。他带着非常恐慌的心情动员了一百七十个师，并把其中的大多数师派到边境；但是由于他的自负，或者说太过于害怕“激怒”希特勒，所以没有达到必要的动员规模。关于这一点，我们掌握着他所做的权威阐释。在 1941 年 7 月 3 日他说道：“所存在的问题是，德国军队是作战国的军队，它已经实现了全部动员……已经处于全面备战的状态，只等待下达进攻的命令了；而当时苏联的军队的动员不充分，还需要继续向边境集结。”斯大林事实上就是承认，在遭到进攻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他白白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而他竟然还通过使用获取了时间来为他的政策辩护。他又继续说：“这里还有一个起了一些作用的情况，就是法西斯德国……突然不守信用的毁坏了……互不侵犯条约。”这就是说，斯大林让整个世

斯大林政治传记

界都明白，“漂亮的诺言和卑鄙的伪造品”出卖了他的“纯洁”。

在这奇怪的二十二个月的对峙中，共产国际不明智地给希特勒提供的无偿的服务还是应该看到的。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才签订 1939 年 8 月的条约，共产国际马上就把反希特勒的讨伐运动取消了，而这是它的宣传者们长期以来就号召各国政府和人民起来做的事情。反法西斯的一切战略和策略，所有用心提出的论点和口号，全部被抛弃了。斯大林在欧洲的影子们都采取了模糊的中立姿态。这时的说法是，交战双方都是追求帝国主义的目的，因此对它们两国都不可能进行选择。工人阶级被号召去争取和平和反对战争。从表面看来，这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取的革命的失败主义政策极为相似。但这种类似是虚假的。列宁是站在革命立场上坚定地反对战争，而共产国际的政策只不过是为了适应斯大林外交政策的暂时需要，它同那种政策本身都是目的不纯的。这种对战争的反对方法有时显而易见地带有亲德的性质，例如 1939 年 10 月时，共产国际作为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的传话器，呼吁双方谈判和平，并把战争的责任推脱给英法。这种政策的效果，特别是在法国，只代表了失败，而不是革命。它正好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准人民牌的失败主义，丰富了已经腐蚀法国上层社会的那种失败主义。只是当已经遭到了损害时，在莫斯科骇于希特勒的胜利而开始鼓励反对纳粹占领时，法国共产党才从而采用了新的政策。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条约对于德国反纳粹分子没有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但也是重要的。它使他们陷入了剧烈的混乱之中，加深了他们的失败感，其中的一些人被诱骗赞同希特勒的战争。

斯大林政治传记

如果认为斯大林没有意识到同希特勒“友好”的后果，那就太幼稚了。在同已经得到的一些实际利益作对比时，他几乎肯定地认为这些后果是不重要的。他的实用主义思想把他困在有关防御的具体战略概念、河流、军事基地、突出部和环形战线等等之上；而由于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这些东西已经大大失去了原来的价值。对于德国或法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对于波兰人、芬兰人和别的波罗的海人的民族怨恨，他认为对这些考虑是没有价值的。不过，由于缺乏对这些的考虑，苏联过去和现在都遭到了惩罚。在这一点上，他在重大的政治过程中不重视非物质的因素，就成为他坚强而有局限性的现实主义的主要不足。

当我们必须对斯大林的失算和错误进行评论时，如果把这一切仅仅认为是他个人的缺点，那也是错误的。他的政策后面有一股人民感情的有力潮流，亚历山大·布洛克对这股潮流已经如此强烈地预感到了：

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就不会再包庇维护你们，
就不会再参加战争！

《斯基台人》中的这些诗句向西方概括地传达了 1939 年苏联的社会情绪。大多数的苏联人民，由于多年高强度的经济建设而感到疲劳，由于热爱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互相团结，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敌视或冷漠感到愠怒，觉得在自己追求理想主义过程中遭到了背叛和孤立。这样的人民就会主动地站在斯大林的一边，“当凶恶的匈奴人搜查死者的腰包”时，他们坚决不会为之心动”；甚至当纳粹准备建设麦丹涅克和奥斯威辛死亡室

斯大林政治传记

“烧烤白人弟兄的人肉”时，他们也要追求和平。

苏联人民中不仅有这一股感情上的潮流，而且还有一股恐惧和焦虑的暗流。党存在一种犯罪感，军队感到一种模糊的屈辱感。而在这一切之上，可能就是人民希望摆脱残酷的战争命运的要求。

第十二章 大元帅

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斯大林的举止行为——斯大林在1941年7月3日的讲话——他领导战争——他挽救莫斯科和下令发起第一次反攻——“1942年获胜”——盟国内部的害怕与怀疑——“这不属于阶级战争”——第二战场的开辟——1942年8月的邱吉尔同斯大林会晤——斯大林格勒保卫之战——俄国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涨——斯大林企图使列宁主义和俄国的传统主义相融合——他把共产国际解散和恢复东正教的地位——政治局和总参谋部的行动进展——作为军事领袖的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比较——斯大林以及他的元帅们

1941年6月22日，莫洛托夫用德国入侵的严重消息唤醒了苏联人民。斯大林仿佛是因为自己的希望被灾难性地打破而感到困惑，不愿再出头露面。大约有两个星期，他没有对公众发表一点言论。显然他是在坐观初战的结果、英美的态度以及全国的反应。在密室中他同军事领导人商讨动员措施和战略计划。他把广阔的作战区分为三个部分，北部战区由伏罗希洛夫指挥，提摩盛科指挥中部战区，南部战区由布琼尼指挥，他作为最高统帅。他的总参谋长是沙颇什尼科夫，他从革命以前就工作于总参谋部，因为学识广博和工作刻苦闻名，但却不是一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个见解独特的战略家。战争的最高指挥权集中掌握在国防委员会，五个成员分别是：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主要负责外交，国内政策由贝利亚承担，伏罗希洛夫主要确保军队和政府机构的联系，马林科夫作为总书记助手之一代表党。这个委员会则由斯大林领导。

斯大林尽管有过许多失算之处，但对于应付紧急事变还是有所准备。他曾经坚定地武装了他的国家，并把军队进行了重新组合。他的实际思想不局限于任何片面的战略教条。他没有麻痹红军，使他们在苏联的各种马其诺防线后存在不真实的安全感，而这种静态的防御体系在 1940 年曾导致法国军队趋于灭亡。他能够利用苏联宽广的空间和恶劣的气候。这时已经没有谁对他的领导权产生争议。他已经掌握了绝对统一的指挥权，这是现代战略家希望获得的。

但是，那些优势的条件被一些不利的条件抵消了。只是到了这时红军才真正地接受了火的洗礼。它的士气还不是稳定的。农民反对集体化起义过去不过十年；人们对于大清洗也是印象深刻的。从战线上最初带回的消息描绘了一幅混乱而矛盾的图景。一些地方的师团分化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被德军俘虏的士兵数量巨大，表明苏军极其缺乏战斗精神。但是另一些地方的兵团虽然遭到围困和中断了联系，却顽强地进行抵御，拖延了敌军的前进。还有一些地方虽处在高压之下，部队仍能作有秩序的撤退，为以后的战争保留生命力。但是，希特勒的军队到处都在勇往直前。后方谣言四起，处于慌乱之中。

1941 年 7 月 3 日，斯大林终于不再沉默，开始给他不知所措的国家进行指导。在一篇广播演说中，斯大林谈到面临着的“严重的危险”。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听起来缓慢而无力。这篇

斯大林政治传记

演说同以前的一样是刻板和乏味的，其中不存在像邱吉尔许诺其人民的“流血、流泪、劳苦和流汗”那样令人激动的语句。这篇演说的风格不仅同当时的事件不相配，而且同其本身的内容、同反映了他的坚定的胜利意志的号召和训令也不和谐。

他在开头说：“虽然敌人装配精良的师团和他们精良的空军部队已被击毁，被埋葬在战场上，但是敌人又往前线派遣了生力军，继续进行战斗。”他不想把严峻的现实告诉人民，只好在前面讲了许多不加考虑的、乐观和显而易见虚假的话。他继续为他同希特勒缔结的条约辩护，这已经要使人们听厌烦了；他只补充说，希特勒得到了突然袭击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不会长久的。然后他像农民似的粗略地谈论着敌人的目的：“敌人是残忍的。他们的目的是企图强占我们用自己的汗水灌溉所得的国土，掠夺我们辛苦劳动而取得的粮食和石油。他们的目的是企图重新恢复地主政权，恢复沙皇专制制度……德意志化，把他们变成德国贵族和公爵的奴隶。”这是关于人生存最基本的问题，“苏联人……不要再对此置之不理。……对敌人毫不留情……。必须使无信心的分子和胆小鬼、不知所措分子和逃兵在我们的队伍中彻底清除……”他号召同侵略者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克服后方的杂乱和恐惧。最后他号召人民针对被迫交给敌人的地方实行“焦土政策”：

当红军部队被迫撤退时，必须带走铁路上的全部车辆，一部机车、一节车厢都不让敌人得到，不给敌人留下一公斤粮食、一公升燃料。集体农庄庄员要把一切的牲畜赶走，把粮食上交国家机关保管，以有利于运到后方。凡是不能带走的所有贵重物资，其中包括有色金属、燃料和

斯大林政治传记

粮食等，都要全部清除。在敌占区，必须建立骑兵和步兵游击队，组建破坏小组，以便同敌军斗争，以便遍地进行游击战争，以便摧毁桥梁、道路，毁坏电话和电报联络，焚烧森林、辎重和仓库。在被侵占地区，要造成使敌人及其所有走狗没有藏身之处的态势，步步追击他们，清除他们，毁坏他们所有的设施。

这就像是 1812 年俄国的再现，而且是斯大林亲口说出来的。他确实回忆起俄国对拿破仑的胜利，并且说，希特勒不比拿破仑更强大。他提到，对“英国首相邱吉尔先生关于帮助苏联的历史性的演说和美国政府关于提供给我国援助的宣言，表示真诚的谢意”。正象 1812 年一样，俄国进行的是一场“民族爱国主义的战争”，也是一场为一切民族获得自由而奋斗的战争。在结束时他号召人民“紧紧地团结在列宁—斯大林党的周围”。他让人惊奇地使用了第三人称提到自己，使他的演说加重了不和谐的感觉——这篇演说既伟大又平淡，既具有坚强的精神又没有振奋人心的力量。

苏联是用空间来赢得时间的。交出的空间要使敌人没有用处，但却要使敌人付出无情的代价。在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和失算之后，这是唯一一种可以应付欧洲侵略者的方法。他用超乎寻常的意志力来对抗希特勒，但他是否真能做到像所说的那样在任何时候都充满信心呢？根据在那几个关键的月份里斯大林所作的一些小心的谈论，人们有理由对此产生怀疑。在他 7 月 3 日的演说中，他不仅提到了拿破仑在俄国遭到的失败，也谈了德皇威廉的遭遇。威廉虽然曾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最后

斯大林政治传记

却“被英法军队”打败了。斯大林没有提到，德皇的军队在被英法军队打败以前，就已经战胜了俄国。显而易见，斯大林是从拿破仑回想到德皇，再由德皇回想到拿破仑。他必须要思考，德皇已经做到的事，难道希特勒做不到吗？当他在7月30日同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哈里·霍普金斯会谈时，这种思想一定在他的脑中出现过。他承认自己没有想到希特勒会发动进攻；他还进一步说，“战争将是艰辛的，或许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他的四分之三的军事工业都建造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和列宁格勒及其周围，很快就要遭到敌人的侵犯；他愿意让美国总统明白，他——斯大林“将欢迎完全在美国自己指挥下的美国军队加入俄国战线的任何地区进行战斗”。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作者提到斯大林的最具有启发性的一次描述。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斯大林曾拒绝任何不属于他领导的外国军队参加他的作战。他也不让外国观察员前往他的战区；甚至除了极其特殊的少数例外情况，他照例不允许盟国的飞行员在苏联上空飞行。那么当美国甚至还没有参战，而他的建议又是那样虚假的时候，他在1941年7月那么热心地“欢迎完全在美国自己指挥下的美国军队参加俄国战线的任何部分作战”的原因是什么呢？人们只能得出结论说，他是在信心不足、或许还是大失所望的情绪下说这些话的。这本来也是自然的，因为当霍普金斯和斯大林谈话时，希特勒的军队用了不足一个月已经向前推进了四百五十英里，北部的斯摩棱斯克战役已经爆发；南部布琼尼的部队正在溃败。在布琼尼从第聂伯河灾难性的败退以后，9月间又有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两个来访者，他们注意到斯大林有情绪低落的表现；而且他还询问英国能否派一些部队前往乌克兰作战。这一年的秋末，当德军靠近莫斯科时，他

斯大林政治传记

向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表露了急切焦虑的心情。他对这位英国大使说，莫斯科将抵抗到最后，但他也设想到德军可能会占领它。他继续说，如果莫斯科失守，红军将要从整个领土撤退到伏尔加河以西。在斯大林看来，甚至到了那时，苏联也还可以坚持战斗，不过将需要很多年才能重新回到伏尔加河这一边。

这次大战结束后不久，他隐晦地承认了这一点。1945年5月24日，他在克里姆林宫为胜利而举杯，祝福词说道“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时，他说道：“我国政府走了不少弯路，1941—1942年，我们处在相当紧急的关头，那时我军所以采取退却……因为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是别国的人民，他们也许会对政府抗议说：你们辜负了我们的期望，让开吧，我们要建立可以与德国讲和……的政府。但是俄罗斯人民没有这样做。……感谢我们人民的这种信任。”在战争的起初一段时间中，斯大林一定是满心忧虑，即使他对世界扮出一种坚强的样子。

他以惊人的毅力和自控力使自己扮出坚强的样子，也许这种样子是他的武器中力量最大的，它使他的胜利意志表现出一种英雄的、几乎是超人的外表。苏联是有非常脆弱的环节的，对于一个通过半强制和半说服的方法控制国家前途的人来说，稍微有一点情绪低落的迹象，都可能增加薄弱的环节，造成致命性的后果。斯大林自然明白，比起希特勒的其他敌手或牺牲品，他个人的没有主见或没有能力更容易招致不光彩的结局。这种自我力量的保存使他必须这样表现；而且现在他个人的利益超出其他所有时候，同国家的利益更能紧密地合而为一了。所有集权主义的政权，都是既强大又软弱的。在某个时刻，一个强大国家的全部命运似乎与它的专政者联在一起，他的崩溃

斯大林政治传记

或灭亡，都将造成让所有人都无法填补的空白。

许多在战争中访问过克里姆林宫的盟国人士都很吃惊地看到，在军事、外交或政治方面的许多大小问题，都是由斯大林亲自决定的。他实际上是国防部长、总司令、供应部长、军需司令、外交部长，甚至还是礼宾司长，他把所有职务集于一身。红军的总司令部就安排于他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他从办公室的书桌前直接同各条战线的司令员保持直接和经常的联系，对战场上进行的各个战役给予关注和指挥。他从办公室的书桌前也控制着另一个巨大的行动，即从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把一千三百六十座各种不同类型的工厂撤退到伏尔加河、西伯利亚和乌拉尔，这次撤退包括设备和机器，还包括几百万工人及其家属。在其他方面，斯大林还同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关于西方盟国为苏联提供的步枪或铝的数量与防空武器的口径进行争论；或者对从德国占领区来的游击队领导人进行接待，并同他们共同讨论在敌人前线后面几百英里的地方采取袭击行动。1941年12月，正当莫斯科战斗处于高潮阶段，街头已经传来了希特勒不吉利的炮声，斯大林还可以安排充足的时间同前来缔结苏波条约的西科尔斯基将军进行外交手段的较量。在后来的日子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大使、访问者和特使日益增多，他通常都是在黎明和深夜时接待他们。在军事报告、行动决议、外交争论和经济指示非常集中的一天之后，他在黎明时就认真的思考一下前线传来的最近的情况，或者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送来的关于民心的机密报告。正如一位负责英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的将军说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汇报了前一天的关于苏联、甚至关于斯大林办公室的、关于它的盟国及其计划的所有事情。那位英国将军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精心藏好的窃听

斯大林政治传记

器”，记录下他的每一句话。在四年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斯大林就是这样一天天地工作。他真是一个固执、耐心和警觉性极强的人，差不多无所不在，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事情。

10月，希特勒正式下令进行莫斯科战役，即所谓“史无前例的重大进攻”。列宁格勒已被围困并中断了各种联系。差不多整个乌克兰和亚速海岸都被德军侵占。布琼尼的部队彻底溃败，在第聂伯河被德军俘虏了五十万人。斯大林罢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的指挥职务。这两个曾被托洛茨基称为“军士”的察里津人在这场摩托化战争中是承担不起责任的。新的司令员瓦西列夫斯基、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很快就取代了他们。

11月，德军计划实现全面围困莫斯科。他们的先锋部队已经推进到距离莫斯科二十到三十英里的地方，其中有一处的距离只有五英里之遥。一切政府其他部门和人民委员部都已撤退到伏尔加河岸的古比雪夫。在莫斯科，官员们正在焚烧带不走的档案。11月6日是十月革命纪念日，莫斯科苏维埃仍然按照常例进行了庆祝集会，不过这一次庆祝集会是在地下的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举行的。斯大林用平缓的语气向大会致词，虽然他在讲话中向人惊奇地承认，苏联坦克“与德国人的相比少几倍”。11月7日，他站在列宁墓上，对军队和人民自卫队的志愿师团进行了检阅，他们从红场直接开往这座城市的郊区前线。他号召士兵们从对内战的回忆中寻找力量，那时“我国四分之三的领土都控制在外国武装干涉者手中”，而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没有自己领导的军队，也没有联盟者。“敌人并没有那些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所描绘的那样强大。魔鬼也并不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不象人们所形容的那样吓人，……德国是不能长时间存在下去的。再坚持几个月，再过半年，也许一年，希特勒德国必然会由于其罪行之深重而跨台。”他在结束演说时莫名其妙地和出人意料地召唤了帝俄时代圣人和勇者的亡灵：“让我们伟大的先辈——季米特里·顿斯科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札尔斯基、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的勇敢的形象，在这次战争中给你们鼓励吧！”这是他第一次召唤过去的那些亡灵，而对于这些东西，革命似乎是永远要加以轻视和拒斥的。最后他补充一句：“在列宁的旗帜下走向胜利！”

关于政府撤退的消息让莫斯科的人民感到非常吃惊。从心理上来说，这是一个最危急的时刻。任何政府在战争中发出的从首都撤退的决议，都必然损害作为一个战斗国家的士气，并强化人民的离心力。1940年的法国亦是如此，当时法国政府抛弃了传统的权力基地，脆弱的就像一个离了壳的蜗牛一样。政府越是集中，它的稳定性和权威越是植根于熟悉的权力界碑之中，差不多也就是扎根在首都。政府从莫斯科撤退后就发生了一些混乱和震荡。人民认为这座城市已经遭到抛弃，一伙一伙的人冲向食品仓库。有些党员毁掉了党证和徽章，有些反共分子准备同共产党员进行斗争，换取侵略者的好感。在前线和伏尔加之间的广大地区里，许多地方都表现出一种无政府的样子。

那些日子仍停留在莫斯科的人们，后来叙述了人们听到斯大林仍然在莫斯科以及政府的其他部门下定决心继承莫斯科大公国精神的消息后欢迎的程度，他们以此证明，体现在斯大林身上的胜利意志仍然是坚强的。他到了最后时刻仍出现在克里

斯大林政治传记

姆林宫，这确实是在挑战命运。仿佛是全世界的命运都聚焦于这座古老堡垒上。对于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来说，克里姆林宫已经被看作是他们野心的标志。当斯大林拒绝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希特勒下令说：“炸毁克里姆林宫来庆祝布尔什维主义的灭亡。”正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环境中，斯大林的形象才达到今天的这个高度。斯大林同这种环境及其历史联系已经融在一起，因此他好像是惧怕离开这里。至少他的部分权力来源于同人民的疏远，如果他离开，这种疏远的符咒就会失去作用。那时人民认为，他就可能像一个正在逃跑的独裁者。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在这个国家某处让人发觉不到的地方来指挥战争。但是不管怎样，离开莫斯科对他来说总是难堪和没面子的，因而他最后也不情愿这样做。

顺便说一下，在整个战争中他都主动的呆在克里姆林宫中。看来他从来都不曾有要去同他在战场上的部队直接接触的想法。托洛茨基在内战中曾坐着他那带有传奇色彩的火车，从一条战线转到另一条战线，有时是在敌人炮火的风险中去考察前线阵地和审核战术安排。邱吉尔也曾在诺曼底的海滩上和非洲的沙漠中同他的士兵们呆在一起，以他特有的严肃的话语、滑稽的帽子、雪茄和 V 字手形向士兵们打招呼。希特勒曾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在他的野战总部里。斯大林对于实际的战争毫不关心，他也不需要同部队亲自接触的结果。不过，毫无疑问地他还是部队的真正总司令。他的领导决不局限在决定抽象的战略上，这一方面是任何一个文职的政治家都可以承担起的。他最关心的还在于研究现代化战争的技术方向，一直到它的微小的细节，这表明他实际上不过是业余爱好者。现在看来，他主要是从后勤的角度来对战争进行研究的。保证人力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储备和武器的供应，以合理的数量和比例把它们在合适的时间分配和运输到恰当的地点去，积聚具有决定性的战略储备，在关键性的时候把它投入战斗——这些工作就是他的主要任务。

到 1941 年底，正是从这方面看，形势似乎是令人彻底失望的。沃兹涅辛斯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曾经写道：“在 1941 年 11 月遭到德军侵占的土地上，居住着全苏联五分之二的人口。战前全苏联百分之六十五的煤由那儿生产出来，百分之六十八的生铁，百分之六十的铝，百分之五十八的钢……谷物中的百分之三十八，百分之八十四的糖……百分之四十一的铁路线也由那儿生产。……”从 6 月到 11 月，工业生产削减了百分之五十多；钢产量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现代化机器离不开的轴承，比正常年份减少了百分之五。此时，苏联吹嘘的“无穷无尽的后备”已经不再成为现实。它的物质资源比德国少很多；甚至它的人力也不占优势，至少远远赶不上德国和它的卫星国加在一起的人力。因此，苏联的抵抗，特别是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就是在决心和精神优势方面获取的成功，这种精神使青年共产党员在莫斯科郊外作战不怕牺牲，他们高喊口号：“我们后面就是莫斯科——已经找不到退路了。”

12 月 8 日，希特勒宣布，他已经下令在冬季暂停所有的军事行动。他的部队曾作出过两次试图突袭莫斯科的尝试，但都失败了。德军因现在天气的突变而无法行动，一个严寒的冬季提前几周到来了。希特勒不知道，在他宣布停止 1941 年战役的前两天，即 12 月 6 日，斯大林却下令进行一次反攻。

在后来的时间里，苏联人曾经反思过他们在 1941—1942 年被迫退却的情况。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在战争爆发后不久，斯大林提出开始苏联遭到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希特勒得到了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进行突然袭击的好处。到了 1946 年，他对于事件提到一种与过去不同的说法，暗示他曾经有意地诱使德军深入苏联内地，目的是在那儿消灭他们。在写给军事史学家拉辛上校的一封信中，他提到他所依据的两个历史范例：“古代的安息国人就已经对这种反攻方法有所了解，当时安息国人曾引诱罗马的革拉苏统帅的部队深入自己的腹地，然后实施反攻把他们消灭了。我们极优秀的统帅库图佐夫也很懂得这一点，他使用经过严密准备的反攻行动，摧毁了拿破仑和他的军队。”这个第二种说明是故意拿出来去制止追究 1941—1942 年失败的原因，因为这样的深究必然会对斯大林的威望产生损害。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苏联是由于遭到了德国的巨大压力才被迫退却的，从最富饶的地方退离到根本不会成为他们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地区。斯大林并未象库图佐夫一样准备把敌人围困在莫斯科城。1812 年时，俄国从事战争的能力并没有受到领土损失的损害；而且拿破仑的行军被它限定在沿大道向莫斯科前进。在现代化的战争中，进行这种规模的有意撤退，像苏联在 1941—1942 年那样遭到如此的损失，如果不是更坏的东西，也是非常冒险的。

但是，斯大林解释他的战略时的两种说法，并不是像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互相排斥。如果形势真的迫使他放弃大片领土，这就要求他下决心很好地处理这一灾难性的形势，招募新的部队，避免作决定性的战斗，使自己的部队摆脱一连串的围困，等待希特勒部队的入侵，然后就打击他们过度拉长的交通线和侧翼。斯大林使用他的原始的、东方式的、但多次试用并不好使的狡黠，在希特勒的自负上进行赌博。因为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胜利，希特勒确实变得过分的骄傲，导致在对莫斯科攻击

斯大林政治传记

之后，他没有采取任何甚至最基本的预防步骤。他没有命令他的部队撤退到防御阵地上去，而是命令他们驻扎在莫斯科可看见的地方建筑冬季营房；冬季的衣被也没有得到充足的补充；他也没有考虑到苏联的霜冻和泥泞会造成他的战争机器停摆，而冬季这一因素给苏联军队带来了压倒敌人的优势。斯大林的军事错误决不是来源于过分的谨小慎微，而他很快就发现了希特勒的粗心。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建立起他的行动计划。他不仅因此使莫斯科获救了，还迫使德军作空前的代价——巨大的远距离撤退。

在苏联军队取得第一次胜利后，全国开始有了信心。在战场上的军队猛然间发现他们已经取得了其他部队一直都不会得到的某种东西。在几个星期中，德军经常遭受正规部队的攻击和游击队的袭击，似乎就要像拿破仑大军的命运一样在雪野中遭到崩溃。倒是没有出现崩溃。不过苏联士兵现在已经认为，能够打败敌人一次，也就能够再把它打败一次。

斯大林鼓舞着这种情绪，并号召“1942年获胜”。在战争初期，他曾经告诉哈里·霍普金斯说，他预测这是一次长期的和耗费巨大的战争，将持续三四年。那么是什么迫使他现在提出这一新口号呢？形势确实不同于过去了，这不仅因为苏联近期取得了胜利，而且因为美国现在参加作战了。尽管有这些新的情况，他还必须思考以下的许多事实：莫斯科反攻获得的胜利，功劳主要在于冬季的天气；美国潜在的巨大力量正在被转变成实际的力量；遭受了欧陆败退打击的英国军队还没有恢复过来。假如会出现“奇迹”的话，才有在1942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但是难道防御莫斯科的战争不是一次“奇迹”吗？事情可能是，斯大林迫切的盼望这场战争尽早结束。但它也可能

斯大林政治传记

是，虽然他明白在 1942 年获胜是没有希望的，但他不能警告苏联人民，说他们的战争仍要坚持几年。这种考验是令人生畏的，因此坚决不可以把这种残酷的事实说出来。

显而易见，战争能够持续多久取决于西方盟国的态度。苏联已经同美国和英国达成了协议，美国将提供给苏联十亿美元的贷款，并获得承诺可以从西方持续地得到战争物资。但是斯大林仍然十分警惕，害怕战争中到处存在的突然事变的发生。同盟国这个联盟的成立是在违背了它的各个成员国的意志下进行的，联系它们的纽带似乎还是很脆弱的。在竞争、失败、互相指责的重压下，它也可能很轻易地就发生断裂。在骨子里，旧的敌视和紧张情绪仍然存在。斯大林仍然要思考，西方是否会忽略苏联同德国的单独媾和？斯大林认为，德国法西斯资本主义同英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相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苏联同英美任何一方的基本敌对，表现的是更为直接的。从这一事实斯大林看到了历史的荒唐：英国的保守党为了保存自己，正在同反共力量的领袖、欧洲反革命的实际领导希特勒展开作战。他必定已经进行了推论，这个历史的冲突，可能隐藏着危险的象征。我们知道，联盟的另一方也认为苏联同德国单独媾和存在可能性。罗斯福和邱吉尔一直为此焦虑，唯恐由于苏联会有巨大的损伤，而且两个集权国家存在着一种亲属关系，可能导致斯大林像 1939 年那样同希特勒讲和。当时，双方都存在着的同样的恐惧，使战时的政治行动有所变化。

斯大林谨慎地避免这场战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下进行，他显然认为，这将会导致联盟的分裂。他对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指导各国共产党战时行动的指示和方法全然不

斯大林政治传记

顾。按照那些指示，共产党人有义务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宣传，并抓住战争带来的任何时机来实现这个目的。相反地，他们现在服从各盟国政府的领导，对它们所进行的战争给予支持，以便帮助苏联。在大部分被法西斯侵占的国家中，他们承认抵抗运动的资产阶级领导人：法国的戴高乐，荷兰的威廉敏娜女王，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奈斯，等等。甚至他们对德国、巴尔干和意大利诸国也不再进行关于推翻资本主义的宣传了。他们向那些国家的人民进行宣传，号召人们以民主的而不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下去抵抗他们的统治者。莫斯科现在受民族利益、情绪、甚至偏见的影响，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来向各民族进行宣传的。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当天，邱吉尔就宣称“这不是阶级战争”；而斯大林似乎是对邱吉尔的看法表示认同。他有意地装扮出整个联盟所共同的民主意识和单一反法西斯精神的外表。由于情况需要，他牺牲了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共产国际被下令解散了。这是斯大林紧密联系伟大的反法西斯联盟战争中实际需要所做出的政治贡献。

斯大林始终忧虑英美同德国单独媾和。他认为，虽然不是很严重但现实存在的是这样一种危险：西方盟国将不采取任何行动，让苏联和德国双方消耗力量。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天，英国政府成员塔拉的布拉巴松勋爵公然的向盟国提出了采取这种态度的建议，这使斯大林的怀疑更为加重了。结果塔拉的布拉巴松不得不从英国政府中辞职，而且罗斯福和邱吉尔两人谈到苏联的战斗和他们的盟友斯大林时都怀着极大的同情心。但是苏联政府的内部总是记得这位粗心的大臣所说的话。毫无疑问斯大林认为，塔拉的布拉巴松的话所以遭到拒绝，是由于他的粗心大意，以致说出了他的大部分同僚不敢讲出来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话。斯大林认为，事情的发展总是那样的：阶级间敌对的收回仅仅是暂时的，而由于俄英之间长期的对立，英国在俄国人看来总是“背信弃义的英格兰”，企图让俄国农民去做炮灰。最后但不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在1939—1941年斯大林本人的态度，受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影响，现在已经使他自食其果了。于是他就敦促西方盟国马上加入欧洲大陆的反德战争，他努力希望从它们那儿得到关于这方面的郑重承诺。

此时，他始终关注着极为复杂的外交问题。在联合希特勒时，他已经把苏联的疆域扩展了。他转换了合并地的社会结构和政治观点，并在苏联宪法上添加了许多合适的条款，把这一合并确定下来了。现在他同希特勒的联盟已经破裂了，因而想采取措施挽回他从这一合伙关系中得到的东西。他要求西方盟国承认他所得到的东西的合法性，而西方盟国却认为他们曾经进行的交易是不合法的。美国和英国都不急于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合并表示承认。但这个问题不是主要的。波兰问题的困难更多一些。波兰是最老的一个反德联盟中的成员。在它准备向德国臣服时，它的东部边界被苏联侵占了。单是为了这个伟大联盟的体面，就要使波兰的意愿得到满足。这倒不是因为波兰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交界处不存在有争论的所有权，而是因为这些地区是通过非常卑鄙和粗野的方式被剥夺去的。但是，斯大林是不可能还给波兰这些领土的，因为这会带来乌克兰人的仇恨，而乌克兰人抵抗德国侵占的运动是他要加以保持的；因为它将暴露1939年他命令在波兰东部实行的公民投票是一场骗局，其真正意图是为了得到关于这些土地的合法权利；因为它将暴露他在苏联宪法中添加的条款也是一种骗人的手段，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他肯定是无地自容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所以他对波兰人只做了一个姿态，暗示他会使他们的愿望得到实现，而实际上却什么都没给他们。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里，他的政府就宣称，通常认为，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关于波兰的条约早已没有效力了。西科尔斯基将军即波兰流亡政府的首脑将此理解成为苏联同意把东部边界的地区还给波兰。但斯大林并没有这个意思。当莫斯科之战处于高潮时，安东尼·艾登正在苏联首都，斯大林向他要求英国对苏联把希特勒入侵时的那条界线看作自己的边界表示认可。这位外交大臣更愿意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为此提出建议希望同西科尔斯基会谈。这位波兰的总理回答说，波兰的宪法没有赋予他对国家的边界进行谈判的权力。从此以后，斯大林也援引苏联宪法，声称宪法规定禁止他割让苏联的任何领土。这样，苏波冲突在拖了很久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批波兰人遭到放逐而到了苏联，这使得冲突更加剧烈了。

斯大林为了实现三个目的——承诺不单独媾和，促进开辟第二战场，以及盟国认可苏联 1941 年的边界——于 1942 年 5 月命令莫洛托夫前往华盛顿和伦敦。莫洛托夫的使命取得了表面上的成绩。他缔结了斯大林于 1941 年 9 月首先向比弗布鲁克勋爵提出的英苏同盟条约，条约的期限是二十年。此外，英国人做出公开的表明，他们同意苏联人提出的“关于迫切需要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罗斯福和邱吉尔都私下向斯大林做出承诺，实际上他们的军队将于 9 月横渡海峡进入法国。但是，莫洛托夫没有完成使英美承认苏联 1941 年的边界的任务。从表面的情况看来，斯大林完全应该感到满足了。联盟的所有成员都已表明了战胜德国的相同的坚定信心；

斯大林政治传记

苏联的地位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西方曾经认为苏联的军事力量很微弱，莫斯科战争之后，美国和英国对苏联军事力量的评价提高了；苏联马上在这一联盟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西方过去的反苏情绪，很快被对苏联的所有事物和斯大林本人普遍表现出的一种天真而真诚的佩服所代替。邱吉尔和罗斯福拼命的对斯大林进行吹嘘，他的形象也开始得到了某种广泛的热爱，而在此以前，西方是抱着一种疏远的、不理解的，甚至还是厌恶的态度对待他的。

公众舆论并不是受到单方面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在苏联，人民也忘记了原来的抱怨和猜忌。宣传员已经不再使用资本家的和无产阶级的、殖民地的和帝国主义的这种方式来划分世界了，而是分成法西斯的和民主的。不仅“新政”的领导者、促进美苏友好关系的罗斯福，甚至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的前任领导人邱吉尔，都被称颂为进步人类的象征、朋友、伙伴。当于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被宣布之后，这种情绪发展到了极点。1942年7月，邱吉尔被斯大林邀请到莫斯科商讨共同的军事行动，仍然可以感受到这种情绪的存在。

邱吉尔于8月间到达莫斯科，但他的这次访问是非常不成功的。他被迫通知斯大林，英美总参谋部已经决定把进取法国的行动计划取消了，而准备取而代之进攻北非。斯大林和邱吉尔的这次会谈，使用了严厉的语言，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在苏联半官方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如下一些对话：

邱吉尔：……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我觉得不好开口，但是……

斯大林：首相，这儿的人都具有坚强的精神。

斯大林政治传记

邱吉尔：今年进攻欧洲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斯大林：这便意味着，美国和英国的领导人已经背离了今年春天向我们做出的承诺……

邱吉尔：我们希望能够入侵西西里。

斯大林：这属于政治战线，而不是军事战线……

邱吉尔（承诺将在 1943 年入侵西欧）。

斯大林：怎么能够相信这个庄严的诺言不再被抛弃呢？

莫洛托夫：英国首相又向我们表明了，他的国家是不能出现人员牺牲的。

不能肯定地是斯大林的语言是否真的那样粗鲁。但是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和极为相似的叙述，已经被英美所收集的资料所验证。斯大林在交给邱吉尔的备忘录中说，开辟第二战场的拖延，是在道义上“给予苏联公共舆论……的一次打击”，而且它“对于苏军指挥部对夏季和冬季行动的计划”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苏联前线的情况确实是再一次出现了危险。德军已经逼近高加索，几乎来到了伏尔加。这时斯大林格勒的战斗才刚刚爆发。军队面临丢掉高加索油田的危险。虽然苏联已经不像原来那样软弱了，但斯大林完全有必要忧虑这会成为一场消耗战，这会使他的坦克、运输线和飞机得不到使用。他尤为关注斯大林格勒之战，这意味着“斯大林的城”，他的旧察里津，一旦斯大林格勒失陷，就会对民心士气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因此，当邱吉尔告诉斯大林那个消息时，就可以理解他会怒气冲冲地说，这让苏联感到非常失望。他过去多次讲道，他不愿为

斯大林政治传记

别人冒太大的危险，现在他仿佛感觉到，他毕竟被诱骗去做一件自己不情愿做的事情了。在苏联对邱吉尔这次访问的记载中，曾引证了斯大林在邱吉尔结束访问归国之后所说的话：“一切都明确了。只是在意大利和非洲发起战斗。他们只是企图最先到达巴尔干。他们要我们耗尽生命，然后再把他们的条件硬塞给我们。……这是异想天开！斯拉夫人是和我们紧密连在一起的。……他们希望我们失去斯大林格勒和失去发动一次攻势的机会。……”

这一记述很明显是在事后进行了夸张。斯大林说邱吉尔在1942年8月就产生了准备入侵巴尔干的计划，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那时邱吉尔对这个计划还是没有完全考虑成熟的。但是，邱吉尔向他列举的关于推迟第二战场的理由——主要是登陆舰艇不足——肯定是不能让他完全相信的。他认为，德国的军队主要投入在苏联战线上，希特勒已经派不出充足的兵力来防御大西洋沿岸了。

后来邱吉尔承认，他对斯大林变化多端的行为不能理解。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不再被提到后，斯大林又表现出对邱吉尔异常的亲切，极为友好地听取了邱吉尔对入侵非洲的计划的阐释，对于英国准备实行对德国城市的疯狂轰炸表现得兴高采烈。这是极易理解的，斯大林的“反复无常”是因为他态度上的矛盾：对于第二战场问题他肯定特别生气，但是他过于看重苏联同西方的结盟，非常害怕单独媾和，以致被迫在争执过后向他的客人作出让步。当然，对于这种严重的分歧外界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人们只知道，这两位首相“是在友好和坦诚的氛围中展开会谈的”。不过，苏联士兵还是感到其中包含了问题。他们在这场考验中对自己的西方盟国日益感到厌烦和沮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丧。入侵西欧是在两年之后，对于这件事如何影响了群众的情绪，就无需多谈了。不过，红军是带着被孤立的压迫感来进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

在这次战役爆发之前，苏联军民的情绪非常糟糕。英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的团长描述道：“在南方罗斯托夫的周围，俄国人的士气几乎下降到了极点，他们几乎不再奋战了。据信，斯大林元帅亲自前往那段前线。总之，事情表现的非常明确，很快就进行了大范围的清洗。……取得了成功的结果，南方俄国人的士气马上就提升了。”据说斯大林主持了一次军事审判法庭，几名将军因玩忽职守罪受到审讯。党的宣传部长雅罗斯拉夫斯基指责高加索的政府，认为它没有采取任何准备措施防御该地的城市。德国企图在高加索的部族和民族中挑起矛盾，并在其中网络有意归附者，这种企图取得了一些胜利——对于这一事实，战后当局对此承认当时有几十万印古什人和车臣人以及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被指控为敌人提供帮助而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所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兆头并不是好的。但这是一场与个人前途相联的竞争，斯大林是不能再接受失败了。在战斗持续的半年里，他监视和指挥着这次战斗以及随后所采取的反攻的整个过程。

这一战役从一开始的运气就很好。德国人起初并没有认识到这座城市的重要性。苏联人只是在7月中旬才派遣军队进行防御。的确，在军事上不存在必然的原因使斯大林格勒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战场。德军轻易地就可能在斯大林格勒南面切断里海和斯大林格勒之间的伏尔加生命线。现在迫使希特勒进攻的原因主要在于心理上的目的。德国的将军们对事情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经过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到了8月下半月，对斯大林格勒就开始有意的提升。俄国人在那儿驻扎了更多的后备力量。……与增援高加索相比，向斯大林格勒的增援是更容易的，因为斯大林格勒与他们的主要战线距离较近。希特勒因一再受挫而异常愤怒。这个地方的名字——‘斯大林城’——意味着一种挑战。于是他抽调主要战线和其它地方的军事力量，力图攻克它，甚至把他搞得异常紧张。”在前一年，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人的野心曾经在克里姆林宫中的激烈争论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现在两人的野心又十分明显地反映在争夺斯大林格勒上。

到8月下半月，苏军撤退到了斯大林格勒防御区的中心。斯大林派朱可夫最能干的司令员、总参谋长瓦西列夫斯基和马林科夫到情况危险的战区去。他向斯大林格勒的防御者下达了著名的命令：“坚决不准后退一步”。这并不是撤退中的军队的司令员所常常提到的一句场面话，也不是斯大林热衷于静止防御，就象希特勒在战争的目标转向反对他时所做的那样。相反地，合适的撤离和避免不利战争迄今为止都是斯大林“纵深防御”的主要因素。但是对敌人向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推进采取阻挡，这对他来说是极端重要的事情。他的神话正面临着危险。

德军仍在前进，但速度很慢，牺牲惨重。9月上半月，战斗的目标指向了到达该城的要道上；下半月战斗将在它的郊外和中心进行。斯大林格勒工厂的工人和崔可夫的第六十二集团军一起参加战斗，工人中的一部分在二十二年前就由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领导着在这儿参加过战争。防守者被驱赶到了伏尔加河岸；所有的退路都遭到了中断；补给和增援部队只能从河边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运过来；水上运输很快就由于浮冰而受

斯大林政治传记

阻。10月5日，斯大林再次向被围的守军讲话：“我要求你们竭尽全力来捍卫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坚决不能被敌人侵占，必须收复那一部分已被敌人占领的地方。”从9月27日到10月13日，在三座工厂中进行着战斗，它们分别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街垒工厂和红十月工厂。从10月14日到11月19日，战斗依次展开。现在德军占领一条街所需要的时间和作出的牺牲要比过去征服整个欧洲的各个国家还要多。11月中旬时，防守者只剩下紧靠河岸的很少的一部分阵地了。就在此时，斯大林在11月7日发布的命令中还希望士气得到激励，他说：“在我们的街头仍然举办庆祝活动”。11月19日，当德军似乎想通过使用最后的力量彻底控制城市的时候，斯大林命令采取反攻行动。

在9月动荡时期他就着手计划这一攻势。他向瓦西列夫斯基总结形势时说：“我们还是在孤军奋战，我们的局部反攻并没有实现原计划的目标。一些师被消灭了。将军们对我们的要求不统一。有的人坚持认为我们把德军逐出斯大林格勒就足够了；还有许多人又希望劝服我们，等待盟国的帮助。而每一个将军都要求储备后备兵力。”他认为，只有发动巨大的反攻，危机才会得到解决，而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他授权瓦西列夫斯基制订行动计划。

斯大林的反攻考虑，还是根据莫斯科战役曾根据的相同的心理前提和对希特勒思想相同的观察力，虽然在军事行动方面，这次战役要比莫斯科战役更为复杂、有效和成熟。斯大林再一次依靠他的敌人的狂妄自大来取胜。他坚定地认为，希特勒以为在夏季中南方苏联军队已经被打乱和解体，集结起来进行一次反攻是不可能的。斯大林还进一步认为，德军再也不会

斯大林政治传记

有重新部署自己的队伍，实现从进攻队形改为防御队形目的的可能性了。希特勒在10月14日的命令中实际上对他的士兵做出了明确的承诺，苏联的反攻是绝对不可能的。斯大林给斯大林格勒守军布置的任务就是，在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中实现对德国南方集团军这支精锐部队的牵制和消耗。同时他还增强了战略后备，毫不理会来自战场上受压最厉害的司令员关于增援的绝望要求。他训令他的总参谋长：“无论他们如何抱怨，都不要答应给他们任何后备力量。莫斯科前线的任何兵力都不能调出来给他们。”他没有再犯导致希特勒失败的分散兵力的错误——希特勒那时正把他的后备军队漫无目的地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之间来回调动。斯大林授权朱可夫负责后备队的使用。朱可夫把这些后备队极端秘密地分配给斯大林格勒侧翼北面、南面和西北面的三个集团军。这三个集团军的负责人主要是瓦图丁、叶廖缅科和罗科索夫斯基；沃罗诺夫承担这次战役的主要武器炮兵群的指挥工作。这三个集团军都集中对围困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后部进行攻击，并把他们同西面德国集团军的联系切断了。苏军首先对德军战线的薄弱结合处进行了打击，即由半心半意的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部队防御的那一部分战线，这是又一个有心理影响和有政治远见的例子，这次计划的制订正是根据这种远见。11月19日，瓦图丁从北面发起攻击，第二天罗科索夫斯基紧接着发起攻击，然后是叶廖缅科从南面出击。到第四天，围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本身已遭到了围困。

斯大林这时对他的将领发出指令，不去关注冯·保卢斯被围困的师团，而是对外围的德军进行打击，并把他们从伏尔加驱逐到顿河和更远的地方。这时，曼施坦因的一个德国集团军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从南面被派来支援、解救冯·保卢斯；希特勒还下令他的空军打开一条到斯大林格勒的空中通道，把弹药和食品送给遭到围困的部队。斯大林投入了他的空军后备队，堵住了这条“通道”。后来他的将领在先对付冯·保卢斯还是先对付曼施坦因上出现了分歧，他决定首先对付曼施坦因。进攻取得了胜利；到12月底，德军主要的部队已被驱逐到距离斯大林格勒一百二十英里处的地方。2月1日，冯·保卢斯和二十三名德国将领以及他们的师团都向苏军投降了。不久以后高加索的德军也被消灭了。这样，这次全部同斯大林的名字紧密结合为一体的战役就结束了，苏军消灭了德军中的精锐部分。同这次战役相对应的是二十五年以前的那次战斗，那时斯大林作为一个军事领导，蹒跚的迈出了第一步，而现在在世界人民看来他几乎成了一个巨人了。

1941年和1942年的事件对苏联观点的改变起了很大的作用。斯大林多次提到，战争使苏联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也最后对苏联人民进行激发的原则和思想的正确性进行了证明。的确，这个政权所能够经受的考验比它的反对者、甚至比它的某些赞美者所认为的都要多。它的基本力量在最严重的危机中得到了表现。但是战争也的确打乱了这一政权存在所依赖的那些思想习惯，就象三十年代的情况那样。同时斯大林受战争所迫采取了公然的或秘密的政治调整，以便克服国内已经出现的分裂，并创造出胜利所必需的在目标上的统一意志。

全国的民心士气曾经两次发展到破裂点：在莫斯科战役爆发前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前。日益恶化的形势表现出一些严重的迹象，如茫然不知所措和逃脱责任；如果类似的情况再发

斯大林政治传记

生，这些迹象还会再次表现出来。其他方面，如大规模地同敌人联合，特别是在乌克兰和高加索，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三十年代的仇恨和不满所导致的。斯大林认识到，这个国家有必要在国内采取某种停战。他能够比较容易地做出这种停止作战的决定，因为对他来说，这并不需要同哪一个有竞争力的对手进行商讨——那些政治对手早已经被清除了。他需要做的是打消某一些人心中隐藏的不痛快和难以启齿的忧怨仇恨感，这部分人的数量及其重要性也很难说。认为这个国家中的大部分人对政府有敌对情绪是不正确的。如果情况真是那样，那末采取爱国的号召、激励或镇压等方式，都不能防止希特勒仍在坚决使苏联在政治上崩溃的企图。战前这个国家已经实现的转变，尽管存在某些负面的影响，却在道义上增强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上的进步使大部分人深受鼓舞，使得他们拥有抵抗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少部分人绝对是感到生气和怨恨的；而且从战前社会混乱的规模和敌对利益产生影响的范围来看，还应重视这少数人。在满意和不满分子之间，还有一部分抱有不确定和观望态度的人。如果遭到惨重失败时，全国就可能出现情绪的波动，上下起伏，突然而迅速地摆来摆去，以致于造成政治上的失衡。政府想方设法来稳定全国的情绪。只有情绪得到稳定，人们才有可能响应政府的紧急要求，才可能调动人民最大的热情，如果缺乏这种热情，就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战前，全部的宣传机构都在重复着党内斗争的故事，时时刻刻牢记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和其他偏向的罪恶，时刻保持对“人民敌人”的“警惕”。在战争期间，这个主题已经被小心翼翼地丢向别处了。面对希特勒真实的阴谋，人们就不

斯大林政治传记

会记得过去伪造的那些阴谋了。被粉碎的反对派中的幸存者，只要对战争做出有用的贡献，都从集中营中放出来，并担任了国家中的重要职务。图哈切夫斯基的追随者曾被流放和撤职，现在都返回到军事总部。一个可靠的报告宣称，罗科索夫斯基就在其中，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取得了胜利，他是前波兰共产党员，曾经在图哈切夫斯基总部担任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官。被释放的还有拉姆金教授，他优质的服务受到称赞，荣获最高的勋章和奖赏。三十年代“工业党”的领袖就是他，他曾以搞阴谋行动和联系外国势力的罪名被控告。事实上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过去极力宣传把苏联转变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族共和国，而现在是以莫斯科主要报纸撰稿人的身份出现的。这些都是十分明显的例子，对含糊的国内停止作战情况所作的叙述。说它是含糊的，这是因为它没有任何正式的和解行动或者大赦作依据，而只是根据斯大林的暗示。对所涉及的人来说这些暗示的意思都是明确的，但斯大林却不用担负任何义务，也不意味着他在作“自我批评”。

但是，民族主义的高涨仍是最重要的新发展，而在前不久，这种思想还被认为是与布尔什维主义有冲突的。这一高涨部分是自然出现的。占领区传来消息声称，纳粹对苏联人的亲属们进行大肆地虐待，而且希特勒宣称斯拉夫人、特别是俄罗斯人是劣等民族，这激起了广大苏联人的愤怒，并油然而生了一种民族的骄傲感。由于盟国侵入西欧的延迟而产生的孤立感使这种愤怒和骄傲感进一步深化了，作家、诗人和新闻工作者都表达了这种感觉。亚历克赛·托尔斯泰曾这样表述过，苏联认为自己是“阿特拉斯神，一人挑起了世界的重担”。不过，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民族主义感情被斯大林作为一项政策来人为地鼓吹。我们已经看到，在战争刚刚爆发的几个月中，他就曾经对库图佐夫、米宁、苏沃洛夫和波札尔斯基的亡灵进行过召唤。大量的宣传者以斯大林为榜样，大肆的对俄罗斯帝国的过去进行称颂。后来他又向国家发布了大量的有关改革或反改革的法令，都是为了达到鼓动这一新的情绪的目的。

这个国家需要一种能够点燃它的幻想力和支持它的英勇精神的东西，一种口号或思想。内战时期，红军的斗志受到了国际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激励。后来，广大的布尔什维克坚定地认为，战争一旦爆发，苏联就要把它转变为一种按照各国的阶级来区分而不是以国家来划分的斗争。这种对革命国际主义的信念在慢慢地减弱；只是当在一个国家中长期地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对国际主义做出解释的那些人在大清洗中牺牲之后，国际主义的信念才逐渐消失了。斯大林专心致力于维持苏联和西方国家的联合，这就意味着旧的革命国际主义的恢复遭到了决定性的威慑力量。民族主义的高涨就意味着反抗国际主义；在军队中这种高涨被强化到了顶点。

正是在军队中，充满了这种新精神，出现了最令人惊叹的变化。革命和内战的遗留物以及在军队中仍存在的习惯、举止和制度，大部分已消失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过程中，1942年10月颁布了一条特别法令，政治委员被取消了，而在此之前，政治委员是代表党对军官们实行监督的。事实上，政治委员还是保留着的，不过是受军事指挥员控制和领导罢了。这个措施在军事上是合理的，它统一了指挥权，使纪律性得到了加强。但是它的政治意义并非是不重要的，它暗示了将要回到革命前的军事传统。1942年11月《真理报》在评论关于废除军

斯大林政治传记

队中的“社会主义竞赛”法令时十分明显的写道，士兵不承担任何社会主义义务，就象他的前辈们曾经做过的那样，他的职务就是为祖国服务。彼得大帝的军事规章制度被视为典范来进行学习。苏军建立了近卫团和近卫师，设立了库图佐夫和苏沃洛夫勋章。曾经被看作为沙皇压迫标志而遭到蔑视的哥萨克兵团又重新出现了，它原有的神奇也再次出现了。最后，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二十五周年前夕，军官制服上又开始使用了肩章，而在头一批布尔什维克法令中，有一条就是禁止使用代表军队中的反动等级制度标志的肩章。敬礼制度作为一种义务，它的实施受到了严格地规定。成立军官专用俱乐部，上下级军官的食堂被严格地分开了。仿佛是为了认可这整个趋向，并着重突出他个人同这一趋向的关系，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之后，于1943年3月斯大林接受了元帅军衔。他还大量封赠他的军官团。只在12月一个月中，他就把三百六十名指挥员提升为将军；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报纸上每天都刊登了长长地提升名单。他把元帅杖授予一些最卓越的司令员，接着又非常热衷于表现他自己就是军官团中的一员。

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倾向不只是被局限在军队中流行，而且在全国的政治领域中都有这种倾向的渗入。斯大林谨慎地避免他个人对这一新路线承担太直接的责任。因为他明显的感到，老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是坚决抵制这些东西的；但是他以自己的那一种特殊而又让人不易把握的方法批准了这一新的路线。在莫斯科战役中他对国家社会主义进行谈论时说：“希特勒分子是否能被视作是民族主义者呢？坚决不能。希特勒分子事实上现在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帝国主义者。”他继续说，当希特勒使德国实现领土统一时，还有理由说他是民族主义

斯大林政治传记

者，但是当他侵占德国以外的领土时，他就不再是民族主义者了。这是斯大林所说的一个奇怪的论点，因为过去布尔什维克们从来没有拒绝把他们的对手和敌人认作是民族主义者的，因为在列宁的信徒看来，这是一个贬义词。现在希特勒被拒绝视为民族主义者，就使这个词不再具有贬义的性质了。他仿佛在说：“我们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我们的敌人不是。”他的宣传人员抓住这个暗示就大肆宣传，他自己则神情恍惚地在残余的国际主义和鼓吹民族主义的倾向之间保持平衡。因此在这次讲话中他又说：“既然德国人有打歼灭战的想法，他们就肯定会得到歼灭战。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所有入侵我国领土的德国人——占领者全部消灭掉。”希特勒的宣传机构大肆地利用了这些话，德国士兵被告知，红军绝不会放过俘虏的，从而诱使他们疯狂的作战。后来斯大林对自己的提法进行了纠正，把对他的话的解释称为“可笑的谎言和对红军的卑鄙的诬陷”。他接着说：“如果把希特勒匪帮同德国国家、同德国人民混为一谈，那是荒唐的。历史经验证明，希特勒集团可以得到或失去政权，而德国人民依旧是德国人民，德国国家同样还是德国国家。”他的宣传人员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始终没有搞清楚其中的差别。他们同其他盟国的许多宣传者一样，呼吁人民抵抗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国家，而不只是反对纳粹。斯大林在结束作战命令时离不开这句话：“把德国侵略者消灭掉！”这句严酷的话不停地加以重复，并且当在报纸文章和诗歌中出现时，就会马上激发起并长时间的保持住这个战斗的国家中的共同对敌之心。这好像就使复杂而多面性的战争逐渐缩小以致最后消失。

一方面是希特勒种族主义的粗暴行动，另一方面是斯大林

斯大林政治传记

对民族主义的大肆宣扬。这就使得苏联人几乎没有向德军的普通士兵进行呼吁的可能性，在国家社会党员和其他德国人民之间也不可能打入一个意识形态的楔子，恐怖屠杀的政治战争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削减。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激励，使得苏联士兵不能投降或动摇。这是苏联的一个不足，因为存在这个不足，苏联要获取成功是离不开巨大和恐怖的代价的。的确，要区分以下两种情况中哪一项更重要是不容易的：苏联不幸的碰到了这样一个领导，它用很小的损失和牺牲是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的；或者苏联会非常幸运的拥有这样一个领导，它能够在做出了比其他一切国家付出更为高昂的牺牲后，把一个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度面临着投降和屈服而无其他路可走的国家获得了胜利。

1943年9月4日，斯大林突然做出的恢复东正教活动的决定使世界大为吃惊。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教会都被看成旧社会的东西而遭到镇压。斯大林接见了谢尔盖大主教，他是教会的实际领导者，经过同他长时间的友好的会见，发布了东正教的教务委员会得到恢复的命令。他解释这一行为时说，在战争中教会曾作出努力来进行合作，这是忠于祖国的证明。这当然是事实，但同样真实的是，占领区中的牧师和主教也曾同德国人进行过合作。转向热衷于俄国的旧传统，要求恢复教会的活动，是因为在那个传统中教会占有中心的地位。由于宗教对农民存在着一定的掌握力，由于宗教情绪在最近的这场磨难和考验之中有些复活，对教会的这种新的处理方法可能有助于消除政府同教民之间的隔阂，从而有利于政治上的战争的结束。

斯大林的考虑是更多的。红军在进行夏季攻势的过程中，解放了乌克兰的大部分；斯大林预测红军终究会跨过边界进入

斯大林政治传记

巴尔干的，那儿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就是东正教。他可能对自己这样说，考虑到苏联在巴尔干的影响，对东正教活动的恢复是值得的。宗教曾被沙皇们看作他们外交的驯服工具；斯大林从他的沉着的机会主义打算出发，现在也走上了沙皇的道路。他作为一个接受正教学校教育的学生，已经虚假参半地又回到了教会，这在历史上也算一个极巧的偶然，罗曼蒂克的历史学家可以据此得出一种特别的意义。但是，在共产国际解体后不久斯大林就恢复了教会的活动，这是一次更具有政治意义的偶然。这两个行动是互相一致的。下面这一事实使这种一致性就更加突出了：《国际歌》本来是一位巴黎公社社员写来赞颂世界工人运动的，在此以前苏联一直都把它作为国歌，现在它已被另一首更能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歌曲所代替。

也是为了附和这种大趋势，斯大林发起了一个新的亲斯拉夫运动。革命前极端泛斯拉夫主义和亲斯拉夫主义曾经被看作是俄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沙皇曾经把它的一个变种作为外交的一种工具。在沙皇同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作战时，它号召在沙皇统治下的斯拉夫臣民——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捷克人——同俄国实现种族团结。另一种亲斯拉夫主义的变种具有一种“民粹派”的、革命的色彩，它声称要实现斯拉夫农民国家的团结，共同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否定了各种亲斯拉夫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是看不起对种族团结的一切宣传的。现在复活的亲斯拉夫主义具有了早期两个变种所带有的特点——它既是外交的工具，同时又是斯拉夫人所特有的一种共同的革命利益的暗示。

斯大林虽然对新的传统主义进行宣扬，但他必须要看到，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这两种观点，一种是沙皇大俄罗斯主义的重现，一种却是来自列宁教导的启发，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互相排斥的。他不能同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现实紧密的结合。他已经远远的背离了列宁主义的俄国，但他又不能停靠在俄罗斯，于是他就游离于两者之间。当然，这两种观点不会产生公然的争论，因为政权及其意识形态都不得不异常的坚固。甚至谁也不能肯定，政治局的成员中谁表达了这一原则更多一些，谁表达了另一原则更多一些，或者他们之间到底是否存在差别，因为在那些年里外界的人几乎是不了解政治局内幕的。但是，传统派和革命派两个派别，在人民的感情和思想中静静地处着，也在斯大林本人的心灵中存在着。对他战争时作的演讲有所研究的细心读者，通过研读他的一系列意识形态的弯曲的改变和重点的转变，可以感觉到两派重要性转换的例子，以及他们相互制约的例子。例如，斯大林在庆祝 1943 年十月革命节的行为就极为形象地反映了他在观点上的双重性。在纪念日前夕，他佩戴了苏沃洛夫勋章。他在莫斯科苏维埃大会上按照惯例作纪念演说时，穿着元帅制服、佩戴着绣金的和镶嵌了钻石与珠宝的五星的肩章在那里露面，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当外面大放礼炮和烟火庆祝基辅解放时，他就像俄罗斯的化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似的站在苏维埃的台前。但是他在演说中却一点儿都没有顾虑到帝俄的崇高象征，与此相反却回忆起了“列宁的伟大的遗训”，随后又对获取胜利的过程进行了细微的描述。仿佛是为了削弱几个月前抬得很高的对军队的迷信，他现在说：“无论是在和平建设年代，还是在战争时期，列宁的党始终是苏联人民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

从他的行为、甚至整个的形势都可以看出，他正企图使党

斯大林政治传记

和军队之间某种潜在的紧张关系得到些许缓和。在军队中集中反映了民族主义的感情倾向。军队荣获了很多的荣誉，从而使党的形象有所减弱。这两个部门本来没有制造让人恐惧的阴谋或争权夺利的必要，甚至说它们之间的联系迄今一直都是坚固无比的，因为军官中的很多人都是党员，而且外来的危险促使他们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了一起。但是，一定程度的竞争还是在所难免的。在和平时期，党热衷于维护它对其他一切组织的领导地位，但战争一定会使这种领导地位有所减弱，而给军队以新的重要性。受形势的影响，政治局和总参谋部的地位平等，并使军官团享有比党书记处文官统治集团更大的权威，毫无疑问具有的魅力也就更大了。党被迫容忍这些，但它同时也对这些产生厌烦情绪。

希特勒因为他的将领同他意见的分歧而大为恼火，有一次曾对他的朋友们说，他非常羡慕斯大林，因为斯大林能够比他更冷酷地对待固执的将领。在这个问题上这位“波希米亚的下士”的看法，也同他对苏联产生的一些直观的看法一样，都是表面的和不正确的。他考虑的很可能是有关对图哈切夫斯基及其集团的清洗，而这件事正好是在希特勒同施莱歇尔将军摊牌后三年发生的。的确，红军军官团就是国内唯一如此的一个组织，斯大林对它没有施加集权主义的全部压力。显而易见，他掌握着对军队的控制权，但他也谨慎地避免它过于卷入对党和国家产生影响的一切争论和阴谋中。他对具有非政治化的将军进行激励，要他们对工作忠诚，一心做好工作，只要不定时的对党在口头上做出忠诚的表示即可。从前对不同的派别表示同情、但在政治上却不是积极的将军，是没有必要进行污辱性的悔罪仪式的，而禁止文职人员中在政治中有同样污点的对此规

斯大林政治传记

避。在政治上数量不多但仍重要的领域中，军事艺术算是在试验精神和创造性上被斯大林所激励的一个，他没有根据他的假辩证法教义对它作出硬性的判断。在 1937 年以前，图哈切夫斯基在有关战术和战略的问题以及军队现代化方面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可以自由行事。这样，军官团中的很多人就摆脱了暴虐的精神训练，而多年以来这种精神训练曾经使许多文职人员遭受了迫害和摧毁。诚然，情况因 1937 年的清洗变的更为恶化了。但是意味深长的是，被控告的任何一个军事领袖都没有被叫去当众背诵自我谴责书进行悔罪。他们面对审判官和执行官时都是非常镇定的。仅这一情况就足以表明，军官团在那种集权主义的气氛中，已经取得了非常少见的一种独立、独特的思想观点和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力量。

在战争的初始时期，军队除了遭到其他损失以外，自信心也被严重地挫伤了，而这是清洗运动带给指挥人员的后果。不过，这件事很快就得到了斯大林的重视。他允许他的将领们重新享有自由行动的权利，鼓励他们说出真实的想法，让他们通过试验和总结错误的途径去获取使问题得以解决的方法。他解除了他们对“老板”发怒的惧怕，而这种惧怕正是重压在希特勒将领们心头的事情。他因为他的军官们没有勇气和足够的警惕而严厉地处罚他们；他们因为没有才能而被撤换，甚至当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表现无能时也同样如此；那些有效率和有创造性的人也得到了他的提升。希特勒的将领们对比了斯大林和希特勒，他们更为敏锐地对斯大林的方法进行了评判，在苏联的上层指挥中“存在很多有能力的人，因此他们得到批准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而且可以无所顾虑地坚持以自己的方法行事”。

斯大林政治传记

当然，同希特勒一样，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和一些不重要的军事问题上斯大林都作出最后的决定。那么，人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一方面是斯大林常常插手战争的指挥，另一方面他的下级又可以自由行事，这两者怎样才能达到协调呢？问题在于，斯大林作决定时有他特殊的方式，他不仅不约束将领们的意愿，相反地还鼓励他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希特勒通常是事先考虑好了主意——有时是漂亮的，有时是混乱的——然后试图去强加给象布劳希契、龙德施台特和哈德尔那样的人。希特勒是一个无自知之明的业余爱好者，在战略问题上作出的决定全是废话，却不能容忍那些对他的计划或特殊教条的“优点”视而不见的同志。斯大林不是这样的。他不强加给别人战略上的教条，但他的行动计划也不会直接交给将领们。他根据自己关于形势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所有方面的卓越知识，指给他们一般的想法。但是除此之外，他就让他的将领们独立地确定自己的意见，制定自己的计划，然后他根据这些再作出决定。他似乎在发挥一种在将领中作一个沉着的、有经验的和超然的仲裁者的作用。在他们发生争论时，他就集中相关人员的意见，对其利弊进行衡量，把局部性的观点同一般性的考虑紧密地结合，最后做出自己的结论。因此他的决定并没有彻底的否认将领们的想法，而经常是将领们曾经多次考虑过的那些主意得到批准。对斯大林来说这种领导方法并不是新奇的。在二十年代早期，他使用相似的方法实现了对政治局的领导。当时他就十分谨慎地弄清楚了大部分人的意见，然后依据这些形成自己的意见。现在这些将领很容易的就能接受他的启示的原因，也正是他本人易于接受他们的建议和想法。他不同于希特勒脑子里不会老是产生一些战略上的新花招，而是在工作方法上有所保

斯大林政治传记

留，让他的指挥员们能够发挥共同的创造力。他还赞成在下属和总司令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关系，这明显的好于德军最高司令部中广泛存在的那种情况。

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只是简单地追求指挥人员中的大部分人的建议。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即使这种多数人的意见都是他本人所创造的，他也不会简单的追随。在遭到严重失败时，他快速的补充和更换了最高司令部的人员。他抛弃了老资格人员的任何没有预见性的建议，只重视在战争中的实际表现。当战争发生时，他现在所有的元帅和将军几乎都还是无名小辈或下级军官。在莫斯科战役时，他开始在这些新出现的突出的军事人才中进行挑选，于是就出现了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瓦西列夫斯基和沃罗诺夫这类人物。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仍旧进行了挑选，于是瓦图丁、马林诺夫斯基、叶廖缅科、罗特米斯特洛夫、崔可夫、罗第姆采夫等人就大量涌现出来了。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这种挑选几乎停止了。年轻的切尔尼亚科夫斯基在此次战斗中发生了像彗星一样的一生中的重大转折，在三年的时间里，他从少将升为大将。这些人的年龄几乎都在三十到四十几岁，都不拘泥于旧的条律，在战争实践中拼命学习，直到他们成为敌人势均力敌的对手，甚至后来比敌人更强大。

军队、指挥人员的新生和士气都是苏联所取得的最杰出的成就，功劳在于斯大林。但是斯大林对于这一新生的政治含义却是很不满意的。他的元帅和将军们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此以前，在政治局的所有成员中，斯大林的地位是最高的。在人民眼中，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曾处于他的副手地位，谁也没有拥有过如此广泛的尊敬和爱戴。斯大林一个人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只有在权力金字塔的最下层的地方才出现几乎是

斯大林政治传记

没有什么性格的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安德列耶夫、日丹诺夫。一种暗淡的毫无生气的气氛曾经笼罩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现在这种气氛大部分消散了。新的名字与光辉的胜利紧密相连，载于人民的口碑。他们是一种潜在力量的象征，虽然它完全不是反对斯大林的，却也是同他的政治风格不相符的。我们曾经看到，很早以来，布尔什维克就特别害怕革命会发生类似波拿巴的变形。虽然有人曾一直骂斯大林本人是现代的波拿巴，但他现在也不敢对在他的统帅中正在日益发展的军事传奇小看了。

第十三章 从德黑兰到雅尔塔 到波茨坦

斯大林在 1943 年的外交活动——德黑兰会议的准备
工作——斯大林、邱吉尔和罗斯福；三人性格的对照和比较——关于“第二战场”的争论——“事实上、思想上和目的上的朋友”——发生在 1944 年的“十次打击”——斯大林对西方在苏联和波兰之间调解的活动持反对态度——划分势力范围——斯大林分别对东欧和西欧的政策——1944 年 8 月华沙起义中斯大林的行为——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的行动——他在太平洋战争中获得的优势——他的两条政策路线——1815 年的亚历山大和 1945 年的斯大林——关于“人民民主”的故事——斯大林如何看待德国共产主义——斯大林在大国共同统治的问题上受挫——斯大林在波茨坦的活动

在 1943 年展开的夏季攻势中，红军收复了三分之二的苏联领土。这次攻势之后，斯大林就不可能怀疑战争的结果了。在他的历次胜利中，这是第一次没有发挥将军的作用。在数量上，苏联的野战军还没有超过德军，只是到了后来它才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正如斯大林在德黑兰亲自对罗斯福和邱吉尔所说的，与德国相比他只多六十个师，这些师被他从各个战区中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迅速地调来调去，是为了在选择的地点和决定的时刻保存进攻的优势兵力。他的部队也还没有具备比德军更为精确良好的武装设备。1942年苏联的工业逐渐地从迁移后的情况中得到恢复，但产量还很小。只是到了1943年，刚刚建设的工厂和从西部慢慢搬迁到乌拉尔及其东面的工厂才生产出大量的坦克、大炮和飞机。那时铁路稀少，这些武器运到前线去都要经过非常糟糕的公路，大约是一千到二千英里的路程。在1944年以前，这些武器在战斗中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与此相同的，西方国家提供的战争物资只是到了1944年才达到了最多。因此斯大林知道，他仅仅使用了他能够迅速调度的力量中的一部分，就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他虽然还警告人民切忌懈怠和自满，但他的话说明了他的信心在日益增加。现在他已经可以说：“红军已成了最训练有素和最强大的现代化军队。”

他对于德国同西方国家单独媾和的忧虑，如果说还没有彻底消除的话，也必定是减少了许多。希特勒已经投入了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地面部队来进攻苏联，而且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也没有办法增加在东线的力量来战胜苏联。甚至还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所有有利条件的结合，其中包括相当重要的希特勒在战略上的错误，苏联存在不依靠英美入侵欧洲大陆的情况下赢得战争的胜利的可能性。他当然不会来进行这样的赌博，但是他明白，他对盟国辩论的地位异常地增强了，因为现在是它们更有理由担心单独媾和，更加迫切地需要保持这个联盟。他还明白，它们也迫切需要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而这个前景此时还是很不清的。在所有政治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像他那样拥有这样多的决定性砝码。

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实现他在1941年提出的那些目标，

斯大林政治传记

因为英美到现在为止仍没有对苏联与波兰东部边境，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合并表示认可。邱吉尔和罗斯福劝他把同波兰的问题保留到战后去解决。但是斯大林决定现在就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波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曾声称它要收回在 1939 年前波兰的每一寸土地，因此斯大林明显地要避免在波兰建立这个政府。1943 年春，一个含糊的事件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帮助作用。德国人宣称，他们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村找到了一个埋葬着波兰军官和战俘的规模巨大的坟墓；他们说，这些人是苏联人杀害的。在伦敦的波兰人要求派一个中立的调查团对卡廷村的坟墓进行调查，并暗示说，他们认为德国人的说法是正确的。事实上，很久以来，他们已经对那些军官的命运感到不安了。在 1941 年西科尔斯基访问斯大林时，他曾问到有关这些军官的问题，斯大林对此并未给予满意的答复。无论怎样，波兰人给予德国人间接的支持的说法，是很不明智的，而且还存在一些因素可以去怀疑这是德国人自己的罪行，因为曾有几百万的人被他们杀死。如果斯大林正在找寻借口，达到宣布波兰政府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末现在他找到这个借口了。盟国之中没有一个国家为波兰人的行动进行辩护。莫斯科中止了同伦敦的波兰政府的关系，并着手筹备建立一个亲苏的波兰政府的筹备工作。于是盟国之间对波兰问题的分歧现在不仅表现在边界问题上，而且表现在它的政府问题上。但是斯大林显然认为，不管他怎么干，盟国都会宽容的。他坚定地相信，是苏联军队而不是英国或德国人将被美国军队逐出波兰，因此就是他而不是罗斯福或邱吉尔将在维斯杜拉河上发布命令了。

胜利已成定局，斯大林的野心也就与日俱增了。他对于保护他同希特勒合伙时所既得的利益不再感到满足，他还没有忘

斯大林政治传记

记当初因为希特勒的反对而从手边失去的东西。1940年他已经要求苏联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占居优势地位，现在他又再一次提出坚决的要求。他对将来和平的构想已经成形，这种构想是同势力范围的那些概念相联系的。二十年代时曾有许多苏联外交家为这一概念所吸引，但当时就遭受了斯大林本人的直接谴责。现在还不可能十分准确地追溯这一发展的各个阶段。反正提出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是在1943年10月盟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讨论的结果含糊不清，问题因此悬而未决。也许可以假设，斯大林是通过莫洛托夫来探明盟国态度的，但这个问题在以斯大林为核心的班子里早已被讨论决定了。

大约就是此时，即1943年下半年，斯大林着手全身心地对向德国提出的和平条件进行研究。1943年1月罗斯福总统在卡萨布兰卡公布了一条政策的指导原则：拒绝德国谈判和平条款，它必须接受“无条件投降”。罗斯福是考虑到美国内战而提出这个原则的，在那次内战中北方各州坚决不同南方谈判投降的条件。罗斯福提出这项带有严重后果的政策，事先没有同斯大林和邱吉尔商议。斯大林是以一种复杂的感情接受这一原则的。他在这一公式中发现了一项附加的承诺，即西方国家不会伤害苏联而同德国进行讲和——当罗斯福提出无条件投降的政策时，战争的发展还不是十分有利于苏联，因此斯大林还能宽容那个附加保证的轻蔑。在1943年5月1日他曾下过的命令中也谈及了无条件投降，把它作为自己的政策。但是他也认识到，罗斯福的政策首先一定会使德国进行长时间的顽强抵抗，而使盟国单方面承担争取和平的重担。他企图劝说罗斯福总统修改他的政策，至少也要在和平条款的一般定义上放松一些。英国也向罗斯福提出了相似的建议。但是罗斯福固执地坚

斯大林政治传记

持自己的主张。

无条件投降的口号安抚了一切盟国的民族感情。对德国实行处罚的“迦太基式”和约，这种思想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甚至到了1944年9月，邱吉尔和罗斯福两人都还非常赞同使德国“田园化”的计划，即废除德国的重工业。斯大林的观点也是这样。1943年9月，他的经济顾问瓦尔加教授公开宣扬下面的观点：应使德国向盟国做出巨额赔款。苏军愈向前推进，越是看到德国人有意把占领区破坏为一片废墟，这个要求就越加赢得民心。大约就在这时，斯大林谈到了他有关重新划分德国边界的构想。1943年7月，他让正在伦敦完成一项特别使命的迈斯基以他的名义声称，苏联同意合并波兰的但泽和东普鲁士，这个计划已为罗斯福总统接受。但是斯大林此时还未曾建议波兰的边界向西延伸至尼斯河和奥德河。把德国的几个省区合并过去，目的是“补偿”波兰人在东部边境地区的丧失。但也是为了把波兰推向德国复仇主义者之前，为了使它绝对地依赖苏联的保护。大体看来，当斯大林在1943年11月同罗斯福和邱吉尔在德黑兰会见时，他关于和约的构想和他的野心已经全部暴露出来了。

德黑兰会议的准备工作中是很奇异的。斯大林努力避免同他的伙伴们会晤。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他坚决不参加他们在开罗举行的会议，原因是蒋介石参加了这个会议，如果他参加就可能过早地把日本激怒，而苏联是很不希望陷入同日本的纠纷中的。当向他提出单独会见罗斯福的建议时，他也坚决不同意。1943年10月，科德尔·赫尔参加莫斯科外长会议，努力诱使斯大林同意会晤。斯大林做出了让步，但又坚持会议一定要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在德黑兰举行，因为德黑兰当时处于苏英军队的占领之下。他固执地拒绝到距离苏联太远的其他地方去；在回答罗斯福的一再建议时，他提议把会议拖延到 1944 年春季，届时他打算在阿拉斯加的苏联战时基地费尔班克斯与他的伙伴们会晤。他的借口是，在军事行动过程中，他必须呆在莫斯科，而且只能到那些可以直接同他的总参谋部取得联系的地方去。他可能是不想离开克里姆林宫，因为他在那儿有对他言听计从的秘书和保镖簇拥着，有充分的权力和安全感；或者他可能希望达到诱使他的伙伴们到苏联来会晤的目的，这样就会使他已经提高了的地位更为加强。他所以这样躲闪不定，还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他想向他们表达，他对盟国一直推迟入侵西欧是略感愤怒的。他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向他们表明，他认为，同在苏联的巨大战役相比，盟国在南意大利的作战是极其微弱的。他也可能是希望免于向他的盟国透露其政治和军事计划。最后，邱吉尔和罗斯福两人只好接受了在德黑兰与他会晤的提议。

人们可以想象，脾气、利益和背景如此不同的人，作为盟友或者伙伴走到一起来对最严重和重大的问题进行决定，这还是十分罕见的情形。在谈判桌上面面对面的这三个人，在观点、身世和抱负上是非常不同的！斯大林和邱吉尔就是两个极端：一个是马尔巴勒公爵的后裔，而另一个是农奴的儿子；一个出生在布莱尼姆宫，另一个出生在简单的茅屋；一个人尚生活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英国的精神世界里，并依靠罗曼蒂克的气质富有活力地去捍卫这种皇家传统，另一个人则带着沙皇和布尔什维克俄国的那种严厉气质，曾镇定而冷静地经历过很多风暴。一个人拥有了四十年的议会辩论经验，另一个人长期地在秘密小组和保密的政治局内活动；一个人具有古怪的癖性，

斯大林政治传记

喜欢高谈阔论，另一个是语言枯涩且可信度低；最后，一个人要丧失一个帝国，而另一个却似乎要赢得一个帝国。

罗斯福站在他们两人中间，但更多地倾向于邱吉尔。罗斯福成长的背景，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出身，受到各种不同政治传统的影响，都区别于斯大林。但是罗斯福比邱吉尔的要年轻和得人心的多，因为美国资产阶级到底是比英国贵族年轻。也许由于这个原因，罗斯福能够更偏向斯大林。他有时同斯大林一样对邱吉尔的虚夸表示厌烦；但是当斯大林在把译员翻译邱吉尔的话听完后表现出冷漠或嘲讽的时候，他又经常在两人之间进行协调。斯大林和邱吉尔分别是阶级意识的两个相反类型的代表。在他们两人看来，作为资产阶级进步派左翼的预言家的罗斯福必定时时表现为一个不合逻辑的中间分子。斯大林尽管已经作过改动，但仍然是根据《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来阐述自己的观点。邱吉尔却使用了一句警句来总括斯大林的观点：“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这仿佛是特意为了同马克思主义的那一理论作出反击的。罗斯福身为一名清教徒和国家领袖，从过去以来总是避免陷入最坏的阶级斗争暴力和最糟糕的战争灾难之中，要同意那两种概括是很困难的。

斯大林把他的两个盟友都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对于他们的民主表述，他即使不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也是不太重视的。在他看来，他们的民主是虚假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仅是为了掩盖巨大的剥削机构和制造剩余价值的工厂，那么在表面上看来民治政府的意义又何在呢？他用一种冷静的好奇心关注着他的伙伴们，就像一个科学家对自然元素的观察，深信他会弄清楚它们的结构，能够正确地预测到它们在某种情况下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反应。这儿就是那个不同于自己的社会的两个活标本，“另一个世界”的两大领导人。由于历史的矛盾，那“另一个世界”现在却突然发生了分裂：其中的一部分正同苏联拼命地斗争，而另一部分则由于同盟的关系而和苏联结合在了一起。盟国之间的隔阂是可能沟通的，但它却不能消除，不管向世界人民宣称的友好和一致的庄严声明中讲得如何美妙动听，斯大林的心中必然是在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的。

邱吉尔的思想也不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别，不过他是从另外一个极端的方向出发的。在1941年6月22日，邱吉尔曾经说道：“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我决不会收回我对它讲过的一些话，但是在目前展开的战场面前，所有这些都已慢慢消退了。”人们当然知道，邱吉尔对于自己所说过的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些话，是坚决不会“收回”的，这就是关于仇恨、恐惧和轻蔑的话。这就使人们意识到，“这一切”并不能彻底地从他的心中消失。但是人们也可以预见到，邱吉尔对斯大林持有的态度，在某些方面比斯大林对他的态度更为复杂，因为邱吉尔必须做到除了用政治家的眼光外还用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的眼光来审视他的伙伴。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致力于有策略性地把他同这个他认为是危险的盟友的关系妥当处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很可能因为那位伟大的“否定者”的继承人促使苏联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展开联想。最近俄罗斯传统主义的高涨，迫使他感到，斯大林已经开始对他的邱吉尔原则部分地表示相信了，正在把保守精神向一个革命的社会中进行灌输。这一点以及共同的军事利益，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当邱吉尔提及斯大林时，经常会出现一些真正同情的语言。作为一个艺术家，邱吉尔必然会对这个

斯大林政治传记

阴暗的人及其阴暗的一生产生兴趣，虽然由于过分的阴暗，让他偶尔也不由自主地产生反感。

当斯大林对西方这两位领袖人物的态度稳定下来并趋于合理时，当邱吉尔在对苏联这匹“战马”表示同情又夹杂着反感时，罗斯福对于他必须面对的这种奇怪现象感到难以理解。在他看来，苏联，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苏联还是一个不曾探知的领域。他曾谦虚地向他的助手坦言：“我不知道怎样分清好的俄国人和坏的俄国人。法国人的好或坏，意大利人的好或坏，希腊人的好或坏我都能够分得清。但是俄国人我就不了解了。”斯大林显然是超出了罗斯福的所谓的那种“好”和“坏”的说法。

斯大林邀请罗斯福同他在苏联大使馆一起住，说德黑兰有人正在搞一个诡计。这样他们就相识了。斯大林自己搬到大使馆内的一间小屋子，把自己住的地方让给他的客人。虽然有种关心的姿态，罗斯福后来对他的评价仍然是“端庄、僵硬、严肃、不苟言笑，没有一点人情味”。罗斯福努力想“打破这个冰层”，当他设法讥讽一下邱吉尔想以此取悦斯大林时，他觉得这一效果他已达到。实际上，罗斯福和邱吉尔之间不和谐的任何迹象，就算非常小，也都对斯大林有抚慰的效果。他邀请总统作为他的客人，很可能是为了避免罗斯福过分地接近邱吉尔，并非为了适应他自己在策略上的方便。

显而易见，这是出乎意料的。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并不需要再去搞什么小动作，因为在他们协商、争论的焦点上，罗斯福和邱吉尔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表面上，争论只发生在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发展上。实际上争论的范围是更宽更广了，包括了对战后欧洲的政治观点——即那些军事行动赖以决定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基础条件。邱吉尔在会议上提出了他关于英美军队入侵巴尔干这一计划，它将进一步推迟入侵法国的计划。斯大林和邱吉尔之间的紧张关系，自从他们在 1942 年 8 月会晤以后就一直存在，现在又立即恢复了这种紧张的气氛。1942 年时，斯大林就对推迟开辟第二战场的背后动机有所怀疑，也就是怀疑盟国打算让苏联和德国互相消耗到精疲力尽。当 1943 年夏季入侵法国还未实现时，他的这一怀疑可能仍未消除。但是到了现在，也就是 1943 年年底，他已不再害怕这种消耗战了。他也不再认为邱吉尔还在指望这种消耗战增强本国的优势。他现在的怀疑肯定是：邱吉尔想认真地与苏联进行实力对抗而不是攻击或利用其弱点；邱吉尔新计划的目的是事先防止苏联对巴尔干国家的占领。的确是这样，邱吉尔把他关于在地中海进行冒险的新计划同英美苏联合占领巴尔干的计划联在了一起。

斯大林僵硬地反对这一计划，要求在法国登陆。邱吉尔、罗斯福和他本人都未接触到实质性的东西，即根本的政治问题，虽然他们心中必定在考虑它们。会谈主要是军事上的正反两面意见。斯大林处于优势地位，原因是军事上的争论对他有利。邱吉尔建议盟国部队的登陆地点选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地方：在意大利北部，这样能够解救被德军封锁在意大利南部的盟军。如果是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就能依靠铁托游击队的帮助以武力进入多瑙河河谷；若在爱琴海地区，可以与土耳其一起向北攻。斯大林说，这些行动都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只是无谓地浪费盟国的力量。相反，如果通过海峡入侵，盟国却会具备交通线最短和防备最好的优点，可以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他们解决法国会使德国的士气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最后，他们就会有一条最短和最直接的路线，径直摧毁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

斯大林政治传记

斯大林直率而简洁地提出自己的这些论点，中间还有一些讥刺的语词，使得邱吉尔咆哮如雷，面红耳赤。这个争论在三次全体会议和政府首脑的两次秘密会议上都被提起。在所有的时间里，都是斯大林单独作为苏联代表团的代表发言，这个代表团仅有他本人、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一个翻译人员。

斯大林的论点占据主导地位。美国三军参谋长赞同斯大林的意见。而邱吉尔的主张却遭致某些英国将领的反对。罗斯福最开始有点拿不定主意，后来也采纳了斯大林的意见。尽快地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以及使入侵部队的损失降到最低点——这就是罗斯福的愿望。以这一观点为基础，横渡海峡的侵入战比地中海战役获胜的机率更大一些。按照罗斯福实用主义的、排除阶级的想法，他比较重视这一入侵以及它是否能立即一步到位，而不顾战争的后果可能引发敌对情绪以及使正在困扰着他与英国朋友的紧张关系恶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势必影响了他的决策，这就是在会议开始时斯大林发表声明说，苏联一旦从欧洲的斗争中脱身，就会立即参加对日作战。不管罗斯福的理由是什么，斯大林的决定解决了这一问题。大家达成共识，将在明年5月进行“霸王行动”。

这是斯大林取得最大胜利的时刻。可能惟独他和邱吉尔了解这一内涵。在军事方面欧洲已一分为二；而且在军事的分裂幕后，还隐约地呈现出社会和政治的分裂。在一个迥异的社会背景下，又唤起了俄国外交的传统企图——使巴尔干处于俄国的影响下。

在获胜之后，斯大林的态度变得轻松和温和起来了。他积极参加了横渡海峡实现入侵方案的争论。他表现出宽容大度的态度，以一个阅历丰富的胜利者的姿态来对待现在刚刚开始进

斯大林政治传记

行第一次真正大冒险的盟友们。他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并愿意奉献他的经验。他坚持认为英美必须实现统一的指挥，并敦促它们立即派遣本国的总司令联合行动。迪安将军说，在他的促使下，“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艾森豪威尔的选派”。他一再提醒英美要防止出现拖延和疏忽。而当邱吉尔谈到必须伪装、保密和进行牵制性行动时，斯大林暗中透露了他的某些战争策略：他有二千架假飞机、五千辆假坦克和诸如此类的东西，用来诱使敌人发出攻势。最重要的是，他答应在西方军队登陆欧洲大陆时发起规模巨大的援助行动。

邱吉尔军事计划被否决并非只是斯大林取得的惟一成功。“三强”还在苏波边界问题上达成了内部共识。四国外长刚刚在莫斯科开过会，他们对这一问题没有达成共识。邱吉尔和罗斯福都感到，现在如果再一如既往地建议把苏波之间的长期不和放到将来的和平会议上解决，已经是没有意义可言了。红军正在迅速地抵达波兰以前的边境地区，肯定要把它重新归入苏联的。由于这个重新合并的行动具有突发性，邱吉尔显然宁愿由盟国来裁决这一行动。于是他提出了一项可行的方案，“三强”承认把所谓的“寇松线”作为苏联和波兰的新边界。斯大林欣然接受。寇松线是于1920年由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提出而得以命名的。这次经过一些细微的改变后，把那些有争议的土地划归了苏联。罗斯福接受这一建议，但仍试图否认波兰对里沃夫城的占有。

斯大林对于现在所得到的利益只能表示满足。他必定了解到了邱吉尔动机中的某些玄机。的确，他使邱吉尔面临不易驳倒的道理：1941年时西方国家欢迎苏联成为盟友，而当时苏联的边界就是那样，因此西方国家不可能指望斯大林同意在付

斯大林政治传记

出高昂代价获得胜利之后却将苏联的版图缩小。但是波兰人也有可依据的理由，波兰人辩护道，英国已经同拥有东部边境地区的波兰结成了盟友，因此他们有权要求英国不加入到剥夺他们领土的活动中；此外，波兰早于苏联成为英国的盟友，同刚刚在东线显示出来的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相比，波兰人的要求就显得无足轻重了。邱吉尔之所以这样做，也不单是屈服于权力，他是想在寇松线上抑制共产主义的传播。这条线将成为相对立的两个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新分水岭。他在斯大林面前让步，正是为了更好地在看似相当牢固的一条防御线上阻止住他。他希望，伦敦的波兰政府将在寇松线以西建立；他并且敦促斯大林解冻同该政府的关系，因为目前西方国家已经不再对苏联的所得提出任何异议了。邱吉尔还希望，通过劝说和压制的软硬两手，使在伦敦的波兰人接受这个新边界，因为不这样斯大林就不愿意同他们进行谈判。斯大林显然希望邱吉尔失败，这样他就可以着手去倡议建立另一个波兰政府；而且如果西方国家承认了寇松线，由于他们立场不同，就将不得已认可那个已经接受新边界的波兰政府。在德黑兰会晤前不久，他已经对驻苏的波兰共产党人表明，他希望在波兰组成一个政治实体，它虽然还不是一个有实力的政府，却可以对伦敦流亡政府代表波兰说话的权利说出不同的声音。波兰民族委员会就是这个实体，它实际上已在德黑兰会议后一个月于德国的波兰占领区内成立了。这场关于波兰的错综复杂的好戏才刚刚拉开帷幕。

在对第二战场和寇松线达成共识之后，“三巨头”随意地交换了关于德国未来处理的观点。他们的意见非常含糊，以致没有一个参加者觉察到这一未来的巨大争论。“三巨头”看来

斯大林政治传记

大致上同意了“迦太基式”和约，虽然斯大林比起其他两人无疑都更坚决地鼓吹这一方式。

在会议接尽尾声时，会议开头时各国之间的那种紧张和敌意似乎已经消失了。在邱吉尔六十九岁生日的宴会上，斯大林称他为“伟大的朋友”而举杯向他祝贺。在另一个场合上，他从邱吉尔手里接受了以英王名义赠给斯大林格勒的一把剑。后来罗斯福回想起这事时说，他看见斯大林以一种奇特的骑士姿态俯身吻剑时，眼里充满了泪水。眼泪也许同他的性格不相符，但也许斯大林真的非常感动，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因为有谁曾料到，英王陛下有一天会给予一个用格鲁吉亚农奴的儿子、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巴库监狱的囚犯、列宁的追随者的名字命名的苏联城市如此高的殊荣？又有谁曾料到，这个“卓越的否定者”的信徒坦然地接受了这样一个荣誉？

三国政府的首脑于12月1日离开德黑兰。在分别前夕，他们发表了一个关于达到一致意见的联合声明。全世界人民并不知道，在达成协议前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在战争期间当然不能如此的草率。“三巨头”庄严地宣称：“我们是满怀希望 and 信心到这里来的。当离开这里时我们已成为精神上、事实上和目的上的朋友。”

1944年，斯大林战争中接踵而来的在获得军事胜利。在这一年初，苏联人还在为突破对列宁格勒的封锁而奋战；这一年为结束两个盟国政府的公开争吵，有人提议由美国出面调解。这个建议显然使斯大林勃然大怒，他认为，德黑兰会议召开以后，西方国家无权对他控制波兰东部边境地区的权利提出

斯大林政治传记

质疑，也不允许波兰人对此提出争议，因此任何调解都无必要。

他以一种极为奇怪的间接方式表示了他的不满。莫斯科发表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报道，谴责英国没和苏联打招呼便同德国议和。这个谴责是在德黑兰会议后不久发出来的，使英国人感到受了极大的羞辱。因为就在几星期之前，他们曾拒绝了希特勒的警察头子希姆勒提出的讲和条件，而斯大林对此一定是有所知的。这一事件很有可能反过来使英国和美国怀疑苏联是否在寻找时机企图单独与德国媾和。斯大林使他的盟友们陷入这种暗示的威胁之中。这个暗示是如此的模糊，以致于不能使人们肯定地说，斯大林无论如何都不想去单独媾和。因为他的军队正逼近 1941 年的边界，他或他的某个随从会顺理成章地冒出这样的想法，现在是不是可以稍作停歇，以制止恐怖的大屠杀，并磋商和平。难道库图佐夫不曾规劝亚历山大一世停止在俄国边境对拿破仑的大军的追击，不再继续那场只对英国有好处的战争吗？对于那个岛国，库图佐夫是希望它早日沉沦的。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像亚历山大一样雄心勃勃，要使他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敌人的首都；而且如亚历山大一样，他是不会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人们可能还不知道，在他的总参谋部或政治局里，是否有人曾经对他提到有关库图佐夫的上述建议。但是可以预测的是，如果他坚信，通过单独媾和的所得能比通过同西方国家共同胜利所得到的多，他摧毁德国的决心也是有可能减弱的。但是他不会动这个念头，因为西方国家已经一再地向他做出了承诺。

他拒绝西方在苏联和波兰之间进行干预和调解，这不单是因为照他看来在德黑兰会议上解决了波兰的边界问题。他固守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原则是，盟国不应干预纯属苏联及其邻国的内部事务。因为东欧早晚会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正是在这个阶段，在德黑兰会议召开以后的几个月中，将欧洲划分为势力范围的计划更加清晰了。甚至在德黑兰会议以前这个想法就已有有人提出了。盟国曾经商讨过三国共管，每个国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是因为仅三个大国的力量就足以来赢得战争的胜利和保卫和平。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相似的方案，即四国共同维持世界秩序的计划。盟国外交家们的外交思维又回复到了拿破仑战争后操纵欧洲的神圣同盟和距今时间不长的凡尔赛和会经验上了。上一次的凡尔赛和会，尽管从表面上看存在着一些民主性的痕迹，也是由几大国达成共治的。斯大林的外交家们则参考了一些秘密条约，它们是革命前由俄国的统治者缔结的，后来被列宁公布后进一步地加以谴责。其中包括 1907 年的英俄条约，以这个条约为基础，两国在波斯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还有 1915 年签署的《伦敦条约》，其中规定，英国同意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其海峡土耳其和色雷斯的占有，并且对巴尔干地区拥有支配权。斯大林的外交家们现在显然可以确认，对于沙俄在共同战争中所做出的微不足道的贡献，英国人尚付给了这么多的报酬，为什么他们不会把同样的奖赏或者是其中的一部分分给斯大林的俄国呢？

过去战胜国所以能够实现相对的团结，是由于它们的统治者都来自同一社会阶级，或者代表了相似的利益；是由于他们说着相同的或类似的语言，因而相互间被某种团结一致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目前的这个试验所以新奇和让人惊讶，则是因为它是由有着冲突的原则和敌对的利益的人们所进行的。而更令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人惊奇的是，共产主义的最主要的敌人——英国首相却是这一计划的主要倡议人。

关于划分势力范围的第一次带有一些正式的安排，明显的是由英国政府于 1944 年 6 月提出的。英国建议，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应该成为苏联的范围，而英国的势力则应在希腊居于最高地位。斯大林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划分。现在也同 1939 年的情况一样，不是他而是他的伙伴将担当划分势力范围所引起的公众的愤怒。他想知道的是，这是不是邱吉尔自愿进行的行为和是不是由他一个人负责。他问道，罗斯福对这一安排表示同意吗？罗斯福这时的态度是不明确的。他事实上完全不愿看到他在德黑兰会议上的态度所引起的后果，而在那次会议上正是他为苏军成为巴尔干的惟一主人提供了帮助。邱吉尔这时正对他在德黑兰会议上的失败进行总结，想方设法地要把希腊留在苏联范围以外。但是罗斯福也未曾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所以斯大林就十分坚定地认为，在 1944 年 6 月的协议下，美国 and 英国已经把大部分的巴尔干地区分给苏联了。1944 年 10 月，艾登和邱吉尔到达莫斯科，又肯定和扩大了那个安排。在他们的会谈中存在着一一种非常可笑的趋向，那就是两位政府首脑和他们的部长们竟然确定了他们各自在巴尔干取得的百分比。正如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向国务卿作出的报告那样，他们同意苏联在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享有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的优势，而英国所占比例却是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在南斯拉夫，两国将每国一半为基础来发挥自己的影响。

在 1944 年 6 月的时候，双方还宣称划分区域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它将是一种规定很严的军事安排。到了 10 月，双方已直言不讳它的政治意义了。他们达成了秘密协议，“如果英

斯大林政治传记

国认为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来压制希腊内部骚乱，苏联将不会插手干预。作为报答，英国将承认苏联享有领先在罗马尼亚维持秩序的权利。”邱吉尔要防范什么样的“内部骚乱”，斯大林是非常明白的。英军刚刚在希腊登陆，并发现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民解”游击队事实上控制了整个国家。邱吉尔希望事先避免内战，而且正在为此进行准备工作。斯大林实际上是宣布他不会关注希腊左派的命运。作为对此的报酬——英国答应不对罗马尼亚进行干涉——也等于说邱吉尔对罗马尼亚权利的命运也是毫不在乎的。

这是从未有过的好交易，它自然要涉及到其他一些国家。这个交易一经确定之后，斯大林和邱吉尔便互相热心地为对方的行动进行辩解，互相在口头上为对方吹嘘，这使世人为之震惊。斯大林在邱吉尔访问后不久说道：“值得惊讶的，倒不是存在分歧，而是分歧太少了，而且基本上每次都照例是本着三大国行动协调和意见一致的精神解决的。”接着他又说：“近来在莫斯科同……邱吉尔先生和……艾登先生进行了气氛友好和精神完全一致的谈判，应该认为是……更鲜明的标志。”邱吉尔也作出了友好的回报，他对下院说：“同西方民主国家保持体面的友好与平等关系是斯大林元帅和苏联领导人的共同愿望。……我还认为，他们向来是言而有信的。在我看来俄国的苏维埃政府是最严格地遵守义务的，即使不是它的意愿。我在这儿不会讨论关于俄国的真诚问题。”邱吉尔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因为1944年12月的时候，希腊已开始内战，苏联报刊和电台对希腊左派游击队却没有丝毫的同情。“谜一般”的沉默表明，斯大林对这类事已不再关注。这是斯大林同邱吉尔友好关系的顶峰了。“好的密谋造就好的朋友，而且前途光明；极

斯大林政治传记

好的密谋就结成极好的朋友。”

实际上他们并未明确地规定协议的条款，斯大林也未曾坦率地表示过同意镇压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共产主义，或公开宣布过他仅想在国内建立共产主义。在他或邱吉尔看来，这个问题都可能是模棱两可的；而且虽然他们达成了协议，这两个伙伴仍然彼此怀疑，所以他们都不愿态度鲜明地表明观点。即使是“势力范围”这种说法，在官方的记录中也甚为罕见。他们使用的语言都是晦涩含蓄的暗示和暗喻。差不多没有一个政策声明中没有这样的神圣句子：对别的国家“不干涉其内务”。事实上，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每一个强国都要干涉这一国家的内部事务，如果那里存在或涉及自己的任何的军事利益。英国和苏联联合插手波斯内务，并推翻了它的亲德政府。英国曾经插手埃及和伊拉克，苏联也在波兰和它曾郑重宣布不干涉的那些国家中实施了干涉行为。美国曾在法国的达尔朗、吉罗和戴高乐的争论中参与了自己的意见，对意大利维克托·埃曼努埃尔、巴多利奥和反对派之间的争执也颇有微词。为了反对1945年3月的查普尔特佩克法，科德尔·赫尔曾经写道：“我想能够……让俄国持合作和不干涉的态度，但美洲的各共和国却都想在某种情况下在实际上干涉他们之中的任何一国的军事。只要我们对这种干涉的新立场没有异议，俄国就会变本加利地去干涉邻国，那么我们反对它这样做就会更加困难。”但是，科德尔·赫尔的反对并未阻止查普尔特佩克法成为美国的政策。斯大林是“缺乏幻想的人”，他把“三大国”在各自范围内进行内部事务的干涉视为理所当然。这种干涉一方面是出于军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想把军事需要作为一种借口。

斯大林很早就表明他对英美的势力范围不染指的态度。而

斯大林政治传记

实际上他的插手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欧，尤其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为其自身赢得了赞誉，因而在战争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强大而有感染力的威望和权威。虽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莫斯科作为共产党人的圣地这一地位却并未动摇。所以斯大林在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内具有的强有力的和不断增大的影响就一直在持续。法国解放后不久，他利用他的影响的方式或方法是这样的：即假装赞同保守派，以免引起邱吉尔和罗斯福可能有的担心和怀疑。很明显，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因他的鼓舞表现出异常的、无私的温和。虽然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已被以纲领的形式加以禁止，他们还是史无前例地在广泛的民族联合的基础上参加了各国的政府。虽然当时在它们各自的国家里并不存在比它们强大或与它们一样强大的党了，他们却同意在政府中居于次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现在或者以后都是没有夺取政权的希望的，而且在最后，其他党派几乎毫不费力地就把它排除出了政府。保守派起码是反共团体的手中依然掌握着军队和警察的。西欧仍然在自由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下。

斯大林有时表现的不拘一格，震惊了最软弱的社会主义左派和最温和的自由派。例如，在势力范围协议达成以前，也就是1944年3月巴多利奥的意大利政府就得到了他的承认。而此时意大利的左翼和中间党派强烈要求免除巴多利奥的职务，原因是他征服了阿比西尼亚，而且又是维克托·埃曼努埃尔国王的亲信。斯大林此举使巴多利奥同反对派对立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消息报》此后不久还忠告强烈要求失去威信的王后退位的意大利左派，要他们暂时不要同王室争论。甚至在很长时间以后，在意大利制宪议会中，墨索里尼同梵蒂冈缔结的拉德

斯大林政治传记

兰条约还得到共产党议员的投票赞成，所以他们就不顾违反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主张，由天主教会来统治国家的精神生活。法国共产党对服从了戴高乐将军的领导也没有表示太多的不满，而戴高乐的独裁欲望、反马克思主义态度以及同教会的联系早已是有目共睹、世人皆知的事。

斯大林也没有很明确地说他将赞助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国家革命。而此时民族主义的甚至教会的调子却为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党所宣传。罗马尼亚的国王米哈伊尔退位还获得了苏联最高的军事勋章，原因是他在罗马尼亚脱离德国的政变中所起的作用。苏联的将军们以及那些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不仅向巴尔干国家的东正教会表示敬意，而且在波兰，他们还极力迎合天主教会，工业的社会主义化暂时停下来，只在延误了很久之后才开始实行土地改革。

1944年春，斯大林因为一个念头而实行了一个奇怪的行动，即同教皇进行和解。这个尝试最终成了一个喜剧性的插曲。他于1944年4月28日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来客，即波兰裔美国天主教牧师S. 奥尔列曼斯基。这位牧师从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来，是一个简单而虔诚的人，这位牧师对高层政治中的圈套一无所知，他怀着某种使命感离开他安静的教区来到莫斯科，想对两个“历史性”的和解作出个人的贡献：一个是克里姆林宫和梵蒂冈之间的和解，另一个是苏联和波兰之间的和解。短短几天时间，这位普通而善良的牧师成了众目睽睽的人物。更具有戏剧性的是，斯大林不仅接见了，而且先后与他密谈过两次，每次时间都很长。奥尔列曼斯基在教会中并无权威，也不是代表教会进行谈判，甚至离开教区时连主教的批准也没有得到。但他最后居然得到了斯大林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亲笔签名的一份庄严的书面声明，在声明中斯大林建议他同梵蒂冈的主人和解。至于如何使用这个建议，则由奥尔列曼斯基自由决定；奥尔列曼斯基带着这份重要的文件返回了他的教区后受到了其主教的猛烈抨击，主教指控他违反了教规，并威胁说要把他革除出教门。可怜的奥尔列曼斯基被弄得意气消沉，他搬到一个修道院去，以苦行来赎前愆。于是，克里姆林宫和梵蒂冈修好这一伟大的尝试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斯大林尽管很精明、狡猾，有时还很有远见，但也经常表现出一种天真的笨拙，这一事件更是增加了一点滑稽的成分。他非常独裁并与一般民众之间也无太多的亲和力，就是在自己国家的首都，也与重要的外交官打交道不多；他是三巨头之一，那时也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人，决定着世界未来的命运。然而他竟然在他自己亲手组织的强大攻势中，同一个声名不扬的怪人进行秘密协商，想通过他来向世界公开一个关键的政治宣言。如果斯大林需要他完全能通过任何重要的天主教政治家去接近教皇的；他也能通过盟国的政府进行相互周旋。因此情况也许是，与和梵蒂冈寻求和解相比较，他更愿意做的是让他那可敬、温和的态度得到宣传。即便如此，他也是无需玩弄如此伎俩，因为在几天之中，这使他贻笑全世界。不过，这个事件表明了当时斯大林政策中的右倾倾向。

与此同时，他还尽力设立了两项原则，而且还得到了盟友的支持。这两项原则，用来指导苏联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生活都是含混不清的。其一是他应能不受约束地在其邻国反对亲纳粹和法西斯的政治社团或其他组织，确立民主秩序。其二是邻国的政府必须是“亲苏友好”的。斯大林把这两个原则第一次应用于波兰问题。战争进行到最后一年，波兰问题已经成为盟国

斯大林政治传记

之间交往的障碍物。斯大林的最终目标是让西方盟国抛弃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原因是它既不民主、对苏又不友好。作为一个一贯刚愎自用的人，斯大林现在却来赋予或拒绝赋予其他民族以民主行为是否良好的资格，这种行为表现是极为罕见的。他的盟国也非常认真、郑重地参加了这次奇怪的表演，目的是为了保持这个伟大同盟的民主利益一致的外在形式。然而，把斯大林的行动仅仅说成是诡计，也不尽正确。他确定地认为，他的所有行为是为了意义深远的民主目的；而除此之外，他的论据之所以使人信服，还因为伦敦的波兰政府的确是各党派、组织的协调与配合，其中有半保守的小农党员，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还有按“东方”或“西方”标准都不是民主派的人们。波兰政府的核心是其独裁者皮尔苏茨基和里兹—斯密格莱的追随者。实际上，这个政府的成员，民主也好，反民主也好，只有少数人具有波兰政策中传统的“仇俄”倾向，而1939年以来波兰人在苏联手里的遭遇更加深了这一倾向。实际上，所有的波兰党派中，只有共产党对苏友好，斯大林就以仇俄倾向作为借口，当红军一进入波兰本土时，就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共产党和左派社会党人在其中发挥领导性作用。然而即使到了此时，斯大林同波兰人的关系依然不正常，这从下面的小事件中就可以看到：斯大林在波兰有一些门徒，有些人是1941年后才从苏联监狱和集中营中获释的。有一次斯大林为解放委员会召开招待会时他走到一个委员会的领导人面前，这是一个老的左派社会党人，曾经受迫害于波兰，斯大林问他：“同志，你在监狱中呆了多少年？”这其实是一个前政治犯问另一个政治犯的典型方式。这位老的左派社会党人答道：“哪个监狱，波兰的还是苏联的？”斯大林说：“如果你们把苏联监狱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事记得越少，对我们两个国家就越好。”

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是斯大林摆到邱吉尔和罗斯福的面前
的一个难题。如果他们按这些原则行动，也就是对苏友好的政
府才能在波兰存在，那么他们就必须承认这个委员会；或者他
们就必须置这个原则于不顾，继续支持他们一贯支持的波兰
人。起初他们想避开这个难题，让斯大林同斯坦尼斯拉夫·米
科拉伊兹克——一个保守的小农党员谈判，西科尔斯基死后，
米科拉伊兹克领导了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只有极少数波兰流亡
政治家认为，就是接受寇松线，事先也可以对它大肆地协商、
谈判，米科拉伊兹克即是其中一个。1944年7月底，他果真
到了莫斯科，刚抵达就听到苏联政府宣布承认这样一个卢布林
委员会。斯大林进行了强烈的干涉，在波兰选择并设立了政
府，然后就任何干涉波兰内部事务的企图加以否认，建议米科
拉伊兹克去同“卢布林的波兰人”谈判。

争论过程中，曾有过悲剧性的事件，斯大林当时的态度是
极为暧昧的，甚至是阴险的。1944年8月1日，反对德军的武
装起义在华沙爆发。领导起义的军官得到了在伦敦的波兰政府
的指点。此时红军已很快接近华沙，而且这次暴动的领导人错
误地认为，德国守军马上要撤出城。起义的群众受到了鼓舞，
想自力更生地解放自己的首都。但是，他们的领导人犯了一个
极大的政治错误，他没有和行进中的苏方军队指导员的苏军指
挥员搞好关系，就发布了指令。当然，政治形势也是这个错误
发生的原因。起义的指挥者希望，要么苏军进入之前就控制波
兰的首都；要么失败了，也能够对苏联人施加道义上的压力，
让苏联承认那些曾帮助过他们驱逐德军的人在政治方面的利
益。

斯大林政治传记

结果说明，起义根本未到时机。罗科索夫斯基的军队已被德军困在维斯杜拉河，后来又被打下去。德国守军根本没有撤退的希望，结果只好与起义者拼了。在这场悲壮而又绝望的战斗中，波兰人表现了罕见的罗曼蒂克的英雄主义，而德军报复性地烧光了每条街和每所房子，直到华沙这座城市实际上化为一片废墟。波兰人开始求援，米科拉伊兹克也向斯大林求救。斯大林的态度至少看来也是非常奇怪的。开始他不相信起义的报告，认为不可靠。后来他虽然承诺援助，却没有实现这个诺言。一直到目前，仍然可以对他的行为作一种宽厚的解释。也许是由于罗科索夫斯基被德军逐退，无力解救华沙，此时斯大林正在指挥南线的主要进攻力量，无法改变他的战略布置，去回应那个意外的起义引起的求援。但是后来他的某些行为，却使各个盟国不寒而栗。他不准英国的飞机从本国起飞去给起义者投掷武器和食品，也不准英国飞机降落在战线后方的苏联基地上。以此把英国对起义者的援助控制到最低限度。后来苏联派飞机去援助那座燃烧着的城市，但为时已经太晚了。人们很难看出，斯大林究竟想从他的这种暧昧、冷漠中表现的真正目的。华沙的这场悲剧，使波兰的反苏情绪更加高涨，而且它甚至震惊了西方的斯大林追随者。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他是出于什么政治上的考虑，才采取这一最玩世不恭的态度。实际上这根源于那种深切的仇恨，在国内的几次大清洗中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 1945 年 2 月斯大林、邱吉尔和罗斯福在雅尔塔召开会议时，盟国已经胜券在握了。他们知道，只要内部出现矛盾，就会有可能导致失败。的确，这也是希特勒所期待的事，他就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一再谈起有关腓德烈大帝的事迹。在七年战争期间，由于腓德烈的敌人内部纷争迭起，使他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三个盟国的领导人这时也同样急切地击垮敌人，因此他们就把纷争暂且加以回避。

斯大林这时已经不再是德黑兰唯一的胜利者了，因为英美军队已经驻军莱茵河畔。但是苏联仍保持他的军事优势。红军已经进驻奥德河，准备对柏林发起攻势。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的两个礼拜左右发生的一件事情，似乎使苏联的军事优势更加明显了。德军在阿登地区进行了最后的一次反攻，一时之间他们好像马上就要冲破英美的界线。1月14日，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助手泰德空军上将到莫斯科去，要求斯大林命令苏军发动一次攻势，以缓解德军对西方施加的压力。斯大林接受了这一请求。三天之后，红军进驻华沙，并从维斯杜拉河出发横扫奥德河。因此当斯大林在利瓦底亚接见他的来宾时，他内心洋溢着苏联对胜利作出贡献的自豪感，而他的客人们不得不对此深表感激。

“三巨头”仍然盘算着怎样把目前的团结维持到和平时期，并根据他们分区占领和势力范围的原则来预测未来的发展势头。但是战争越接近尾声，他们心中的焦虑和疑虑就越强烈。一国都对另一国作出一些让步，但又为这种让步寻求相应的补偿。对每一个达成共识的行动，双方都费尽心思地加上一个协议书。在军事上每走一步，都与社会利益和意识形态相关或产生分歧。仿佛是上帝安排的一样，“三巨头”被迫采取一个接一个的军事权宜之计，而每一个权宜之计都埋下了未来冲突的祸根。

他们的所思所想，可以用斯大林和邱吉尔的一组交谈来加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以阐述，这发生在雅尔塔讨论联合国组织的章程时。讨论的焦点是有关否决权的条款，各大国都想在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中占一席之地。斯大林比他的两个伙伴更加强调这一点，要求对否决权严格把关，以扫清任何削弱它的企图。邱吉尔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这个组织还应该有能力采取行动，反对某个大国可能出现的统治世界的企图。斯大林回答说：“我倒想请邱吉尔先生指出哪个国家有统治世界的野心。我肯定英国是没有这个企图的。这就从黑名单中消除了一个。我肯定美国也不在这个行列之内，因此另一个国家又被排除在外了。”邱吉尔打断话头问道：“我可以作答吗？”斯大林不耐烦地明确自己的观点：“等一等。将来的危险就在于存在于我们自己中间”他挑明了邱吉尔的弦外之音——邱吉尔很明显是不信任苏联的，而且希望使联合国的章程尽可能地难为苏联。邱吉尔由于斯大林看穿了自己的意思而感到有点难堪，他回答说，只要他们三个联合并肩指挥这场伟大的战争就不会发生冲突；但是他们的继承人还能够继续并肩作战吗？斯大林仍然有些不快，他提醒客人们牢记苏联的旧帐：1939年，当爆发第一次苏芬战争时，国际联盟曾经当众使苏联出丑，并把它排除在这个组织之外。可是同一个国联，却从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反对希特勒，反对任何侵略行为。……不，绝不，苏联不允许在将来忍受这样的待遇。

使人不解的是，在战争进行到这一阶段时，斯大林一方面极力地鼓吹“三大国”共管世界，反对任何打算削弱这种主张的建议；另一方面，对于将要成为苏联共管世界的伙伴，又时时显现出恐慌和疑心。当邱吉尔和罗斯福建议让法国加入到管制德国的行列当中来时，他予以否决，说“法国曾经开门揖

斯大林政治传记

敌”。他的传统论点是，任何国家在未来和平中的地位，都要同它的实力和它在战争中所作出的牺牲成正比例。显然，这个原则对于苏联来说是最有利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遭受的牺牲比它更大。邱吉尔戏谑地说，“三大国”是“一个排他性特别强的俱乐部，入会凭证至少是五百万士兵或它的等量物。”斯大林对此愤恨地说，苏联付出的要远远多于这些。他顽固地对类似的提议持否定态度，即允许小国在未来的国际组织中有权力反对大国。他显然是害怕大国可能鼓动小国去反对苏联。他一度坚持联合国必须组建自己的军队，特别是一支在各小国都有基地的国际空军。美国虽然反对这个建议，却似乎证明他对“三大国”并肩作战有足够的信心。但是后来又因为害怕苏联在联合国中没有足够的支持率，他要求承认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有投票权的联合国成员国。主要是为了能够证明这种要求是有依据的，在1944年2月他修改了宪法，至少在名义上取缔了他的1924年宪法的主要原则，把苏联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共和国联邦，每一个加入联邦的共和国都有权保留自己的外交部和自己的军队。

人们不禁要想，一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和严重的对立，另一方面由此所产生的讨价还价的事情又是那样的无谓和琐碎，这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政府首脑们、部长们和大使们用了几个月来争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表决权，好像这一问题关系到未来的和平。斯大林在雅尔塔如愿以偿了。但是即使在他看来，除了也许满足他多变的野心以外，他一无所获。最后，还萌发了一个奇特的想法，“三大国”从雅尔塔号召世界上的中立国在1945年3月1日前对德国宣战，实际上是指在战争实际胜利以后，只有参战的国家有权力参加在旧金山举

斯大林政治传记

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3月1日一过，“售票处”就要关闭了。

在雅尔塔和波茨坦达成的那些纷繁但却极富吸引力的买卖和发生的所有争论，在此无需细说成加以概述。“三大国”团结一致的根源仅仅是，只有当军事利益受到威胁时，它们才能步调一致，并切实地加以实行。但是一旦这种利益消失了，它们的共同立场就失去了根基。它们在雅尔塔制定了继续作战的方案和勾勒出来各国在德国的占领区的轮廓。但是它们几乎未打算明确地把德国划分成四部分，而只是在德国的制度和经济方面做了一些商讨。此外，现在它们团结一致的根源远不是在欧洲存在的共同军事利益，而是计划中的协同对日作战的新联盟关系。早在1943年，斯大林就允诺投入到对日的战斗中去。在雅尔塔他进一步承诺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这时，邱吉尔、罗斯福和对于原子武器试验成功与否尚不确定；脱离苏联的援助，他们还没有信心能够轻易地战胜日本。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在亚洲乃至欧洲问题上对苏联作出让步；如果事情并非如此，他们是不可能作出这种妥协的。

斯大林在太平洋战争中无任何利益可图？根据苏英盟约和美苏协议，苏联都没有责任加入英美的亚洲同盟。对日作战在苏联并非人心所向，因为日本只是德国的盟友，而并非它的敌人，况且一个战争已经把它弄得精疲力尽，而不想再去卷入另一个战争了。如果斯大林不管怎样都要决心冒一次险，那是因为他深信，这样做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当罗斯福和邱吉尔都认为他们有必要在远东打一场艰巨的持久战时，斯大林却设想他的军队至多需要三个月就可以结束战争了。他是有足够信心打胜仗的。他的打算是收回自从1904—1905年俄日战争缔结《朴茨茅斯条约》后俄国割让给日本的一切土地。在雅尔

斯大林政治传记

塔，斯大林同罗斯福签署了一项不为人知的协议，苏联不仅将收回曾让给日本的中东铁路，而且还得到萨哈林的南部、旅顺口和千岛群岛。斯大林宣称这场战争是对1904—1905年的报复。他在日本战败投降时曾说道：“……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使俄国人民悲痛万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耻辱。我国人民一直期待着总有一天会将日本打败，洗清这一耻辱。我们作为老前辈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四十年。”斯大林的话与事实有些相悖，因为老一辈的人，当中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甚至自由派，都曾为沙皇1904年的失败而欢呼雀跃。列宁曾这样评述俄国在旅顺口的惨败：“欧洲资产阶级存在着使其恐惧的因素，无产阶级存在着其愉悦的因素。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灾难不仅意味着俄国自由的来临，它还预示着欧洲无产阶级新的革命高潮。”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斯大林在一篇公告中呼吁梯弗里斯的工人：“高加索的工人们，报仇血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他的新历史观点，他对俄国过去的屈辱重新感到遗憾，是完全符合他制定政策的一贯作风的。他现在以旧俄领地的收复者，沙皇遗产的继承人的姿态，出现在太平洋岸，一如他从前出现在波罗的海海岸一样。他正是以这种方式向罗斯福和邱吉尔表达自己的理想，而拒绝承认对亚洲革命的图谋。他不但默许了美国实际上单独管制日本的事实，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甚至做出了这样极端的事情：不想对中国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事业承担责任，扬言国民党是惟一能够统治中国的政治力量。

不论我们翻阅斯大林关于亚洲的还是欧洲的政策记录时，总是能够发现革命的和传统主义的部分奇怪地交织在一起，这使他的盟友和敌人都非常迷惑。斯大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

斯大林政治传记

有时借用革命的外衣来达到恢复帝国目的的策划者呢，还是利用帝俄传统工具来隐藏其目的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推动者？英美的政客们在试图看透斯大林的动机时一直在琢磨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斯大林的性格只有一个方面是真实的，另一个则是虚假的。其实两种性格都具有真实性。甚至人们可以大胆地猜测一下，斯大林自己有时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一种人。这种两面性是太普遍了——革命和传统确实在俄国人民的理智和情感中同等地并存着；而且它在斯大林内务和外交的社会活动的每一领域中都是一贯如此的，所以不能用单纯的人为伪装和矫揉造作来加以解释，虽然斯大林偶尔确实伪装了他的行动，来达到欺骗他的敌人或盟友的目的。

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的政策中所体现出的这两个因素几乎是相互交融的。传统主义的部分通常处于第一位，以致斯大林的行为、愿望、采取行动的方式，甚至他的姿态和骄横，都特别形象地同亚历山大一世在结束拿破仑战争后的行为、愿望和姿态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趋同性大都是真心的，但其中肯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刻意模仿的成分。这场战争被斯大林正式命名为“保卫祖国的战争”，而这一名称正好是俄国历史中所记载的 1812 年史诗的名称，这一点就表明他是在刻意模仿。拿破仑军队失利后沙皇亚历山大试图以牺牲俄国和英国的盟友和奥地利、普鲁士的利益为代价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他想把它们所拥有的波兰领土同他的波兰王国统一在一起。普鲁士作为“补偿”则可以得到萨克森。现在只要把普鲁士换成波兰，就足以表明斯大林的对外措施了。英美的外交家同斯大林会谈后的报告，在多处都使人联想到卡斯累里同亚历山大谈话后的报告。这位 1815 年的英国外交大臣写道：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这位皇帝暗示，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解决波兰问题的原因是他已经占有了波兰。我说，陛下已经收波兰为囊中之物，而且他必定知道，对他的占有我所持的反对意见比任何人都少；但是我确信在欧洲普遍反对的大气候下，陛下不会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戴上侵略者的头衔。

亚历山大和斯大林都关注俄国在巴尔干的影响；而且两人都试图要控制土耳其海峡。俄国同它的西方盟国的冲突关系，在 1945 年和 1815 年一样的尖锐。这两个统治者在外交上的秘密措施，令盟友瞠目结舌的策略，以及他们软硬兼施的态度，都同样令他们的盟友感到困惑。两个统治者的外交大臣都同样不敢自作主张，都同样听命于主子的安排，都同样在交易中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以考验对方的耐力。英美的谈判者抱怨斯大林变幻莫测，这也可以引用拜伦对亚历山大说的话来作进一步的解释：

现在是半解冻到彻底解冻，
但每当黎明严寒时又冻得非常硬。

……

他多么高贵地赏给波兰人国会，
然后又告诉善战的波兰人要老实地听话。

使人不解的是，事无巨细都有相似之处。亚历山大急于提高俄国的威望，希望在巴黎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并受众人瞩目。斯大林命令朱可夫元帅，在德国在英美总部来姆斯签署了

斯大林政治传记

投降书以后，又在苏联在柏林占领区中举行了德国战败的不寻常的投降仪式。在波茨坦一次会议中发生了奇怪的一幕，使人联想到另一件事情。斯大林在抵达波茨坦时就表明，希特勒还在世，藏在德国以外的某地。许多天以后，他仍确定地不断重申他这一定论，使英美为之诚惶诚恐。斯大林似乎联想到了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和百日执政一幕——难道希特勒不想以同样的方式复出吗？由于拿破仑的重新出现，使战胜国在维也纳会议上重现团结的局面，斯大林似乎也想利用希特勒在波茨坦的幻影，从而从希特勒生前所形成的盟国的团结中受益。

然而即便有诸多的相似点，斯大林不是、也不可能是亚历山大的再翻版，当时的国际格局不让他完全扮演那个角色。亚历山大即使率领的是欧洲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它所进入的欧洲，也不象斯大林军队进入的欧洲那样地动荡不安，那样地压缩成一个真空。维也纳会议迫使沙皇不得不同反对者进行斗争，这些敌对势力不仅来自英国，也来自中欧的奥匈帝国、东欧的普鲁士和南欧的奥斯曼帝国，甚至战败的法国在会议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 1945 年，战败国德国已经在政治上一蹶不振；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以及其他的大陆国家，几乎都奄奄一息。基于这种不寻常的真空状况同苏联表现出的全新力量之间形成了显著的对比，斯大林的形象在欧洲世界显得比亚历山大更为鲜明。一些国家把他视为更大的威胁，而对另一些国家来说他却又是一个更大的希望。

他的形象还不仅出现于欧洲的政治世界中。全世界已经注意到，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权力两极化的现象。抽象的统计数字表明苏联的经济实力远远赶不上美国。但是由于苏联走向欧洲世界，它所发挥的作用远非它的经济实力

斯大林政治传记

所能比拟的。到战争结束时，斯大林或许认为美国的力量早晚要退出欧洲大陆，因此在更大程度上加强苏联的优势地位。但是这也不是定论。同苏联力量增长形成反差的是，它由于战争的造成巨大创伤，必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而且这些缺陷必然会制约它势力的扩大。

除了 1945 年和 1815 年以外，现在还应考虑斯大林在外交事务中的革命因素。到了战争结束以后，斯大林才重新信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以表明自己与亚历山大的差异，但是他的这种倾向早在雅尔塔和波茨坦时就已经初现端倪了。在战争的最后一段时间内，那种最后遍及了苏联占领区几乎所有国家的革命模式已经开始蔓延了。

在那些国家中，在名义上政府是由不同的政党联合组成，其中包括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教徒、农民，甚至还有准法西斯。然而在每一政府内部，共产党人至少管理两个最重要的部门：军事部门和警察部门。首先他们通过这些部门控制整个国家，然后再操纵政府中的其他势力，直到他们能够铲除这些异己势力，或者迫使这些人在革命中与之合作。在实现这个计划时，共产党人可以借助于这样的事实：依据停战协定的条款或特别声明，各国政府有责任从自己的政治机关和行政部门中扫除那些与苏联敌对的法西斯分子、纳粹分子、军国主义分子，等等。它们还有责任确保苏军安全通往各国的交通线。这些条款是西方盟国同意的，它们足以使斯大林在不公开违反盟国之间的协议的情况下，指导和进行一个进程，使东欧以往的统治者陷入完全的混乱，与组织脱离，在政治上变得软弱无力。事实上，这些阶级中的大多数都属于反民主分子，在战争中由于他们的亲德或反苏态度而同敌国妥协。消灭了旧的统治者，就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为共产党统治地位的确立打好了基础。那些中间势力，它们或许是代议制政府的拥护者，但缺乏真正的传统基础，而且极度地虚弱与无能。当反对势力被消灭之后，就轮到这些中间势力遭受排挤了。不清楚何时斯大林或当地的共产党人能完全地按照与西方盟国商定的款项行事；何时他们只不过借这些条款，同他们急于要加以镇压的党派算老帐。事实上，两种情况都会有所体现。

这一系列的排挤活动，一直进行到了四十年代末期。通过这些排除异己的活动，共产党的统治得以建立，而没有引起苏联的重大干预。只是在出现了真正的障碍时，尤其是在早期阶段，斯大林才命令进行有效而强劲的干预。例如，1945年春当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尔不同意撤销大臣拉德斯库的首相职务时，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出现在罗马尼亚朝廷上，强迫国王在两小时内变革，并威胁说，如果不执行此项命令，苏联就要视这种行为是违反了停战协定。结果亲共的政治家格罗查取代了拉德斯库；而且斯大林为了巩固这位新首相的地位，宣布把希特勒赏赐给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归还给罗马尼亚。在苏联对此事进行干涉之后，当地的共产党就得以进一步地改造政府了。

由此，国际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动。俄国革命一开始就有着一种清规戒律。革命发起于一个强大的群众运动，出于自卫的目的，它强化了自己的警察机构，并授予它巨大的权力。后来这个新国家却屈从于它自己所发明的工具之下，从而变成了一个强制的警察国家。现在斯大林在半打国家中实行的革命，其整个过程好像是反转过来的。革命最初取得的成果，即首要根基，就是警察。不管是掳获的还是土生土长的警

斯大林政治传记

察，都已经成为社会变革的執行者。固然，群众仍在舞台上发挥其作用，但却不大明白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行动是出于自愿呢，还是受背后的统治者驱使呢？

这场革命很久以来一直不明确自身的原则和目标。它的历史就是一系列的战略和诡计，最终这一切就成为一种革命的模式，而且是卑鄙和低劣的。这些诡计中最邪恶的就数伪造普选了——总之一定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对现存政权投赞成票。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最初称他们的统治为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剥夺了前统治阶级和有产者的选举权；他们出台了选举法，为确保产业工人对人数更多的农民的优势地位。但是在这种公开性的小范围内，选举不管怎么说还算是真正的选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朋友和敌人都明确它的具体主张的内容，甚至它的对手也不能不怀着某种崇敬的心情承认布尔什维克宣布其阶级原则是公开和明朗的。俄国革命的东欧后继者则伪装成更加民主的模样，愤愤然地不承认他们同独裁统治者有丝毫相似之处，强辞夺理地扬言自己是通过公开和秘密的投票而得到压倒多数的票数，从而具有一种优越感。对于这种厚颜无耻的伪装，连他们的朋友也感到义愤填膺。

话又说回来了，斯大林所发起的这场奇怪的革命，却帮了东欧人民，而对于这种帮助，不可极端地责难它为邪恶和功利主义。在两次大战之间，几乎所有的人民都身处困境；他们过着极度困苦和艰难的生活；具有传统风范的集团操纵着他们的政治，这些集团只要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就不管他们的臣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的倒退。这些欧洲人民，经受了二战和纳粹主义的摧残，变得越发的贫穷和悲惨。对于这些人民来说，使用暴力可能成为脱离这种困境的惟一途径，正如斯大林所怂

斯大林政治传记

愿他们的一样。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所发动的土地革命，达成了几代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梦想。在整个东欧，共产党人在使主要工业国有化以后，积极实施工业化和扩大就业的计划，致使超出了物质基础和本国“私营企业”的接受能力，使得资本、技术和进取心方面都极度匮乏。他们还以全新的士气去加强教育工作，试图避免旧统治者多年以来的失误。他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平复民族间的世仇和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总而言之，他们为东欧开创了共同改革和进步的光辉前途。事情似乎是，苏联把它在社会组织和集体劳动上尝试新途径的愿望传给了它的邻国。也许还应该附加一句，基于这一变动会产生剧烈而广泛的后果，斯大林和他的下属在完成这个任务时将不可避免地使用暴力手段，也的确会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政变，但是他们却没有在任何属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引发诸如在希腊发生的内讧。这一点是值得深思的。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斯大林争夺势力范围时，他是否已经决定由共产党控制其范围？是不是早在德黑兰或雅尔塔时期他就已经孕育了这一革命计划？这一计划最终形成是不是在波茨坦时期？中伤他和支持他的人都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因为两者都使我们看到在他的行动背后存在着一个极度睿智的计划。但是斯大林的行动有很多奇怪而明显的令人不解之处，所以还不能觉察到他已经有了任何革命的统治方案。相反，他们认为他压根就没有类似的方案。下面就阐述他最显著的矛盾。假使说斯大林一直想要在华沙建立共产党执政的政府，那末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固执地拒绝在东部边境地区对波兰人进行丝毫妥协？譬如乌克兰和波兰的边境城市里沃夫，由共产党的华沙或由共产党的基辅来统治，对他而言难道会有何不

斯大林政治传记

同吗？而如果作出相应的让步举措，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稳固剩下来的波兰的地位。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他早就谋划在东德进行革命，那末他为什么要分割奥德河以东和尼斯河的所有德国地区，并入波兰，致使波兰人都欣喜若狂呢？为什么他坚持要把全部德国居民从那些地区驱赶出去呢？而这个行动必定会进一步激怒德国人民，使他们不仅仇恨波兰人，而且还敌视苏联和共产主义。斯大林对六国即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的战败赔款要求，从乌克兰和苏联其他地区承受的战争损失来看固然是情理之中的，但对于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事业来说也存在着不利的因素。斯大林命令清查德国的大部分工业部门。在德黑兰会议中他就已表明，他决意要提出这一要求；在雅尔塔会议上，他倡导在战争结束后两年以内，将德国工业的百分之八十使之瓦解；直到波茨坦会议时他仍坚持这一想法。他很清楚，这个计划是残忍的，也不是切实际的，在实际操作中，就会涣散德国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却是共产主义主要的具有号召力的和能够提供支持的社会力量。所有这些政策，几乎没有一项有益于革命的进展。相反，斯大林的每一个行动，都是费尽心机地为革命添设阻力。反此一点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含蓄的说他的动机也是极端地自相矛盾和相互冲突的。

米科拉伊兹克曾公开了他在 1944 年 8 月同斯大林的一次奇怪的交谈。这个波兰的政客有点农民的狡猾，试图打探一下斯大林对德国的打算。他对斯大林讲，被波兰人俘虏的德国兵据说表达过这样的愿望：战争结束以后，德国将信仰共产主义，并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将进行对世界的统治。米科拉伊兹克说，斯大林气愤地回答说，“德国要实行共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产主义就像把马鞍子配在牛身上一样的不协调”。这一带有蔑视的名言无疑地显现出了他的思想。它同他对德一贯的政策是完全吻合的，与众所周知的他对于西欧共产主义的不信任是完全一致的，而同他过去的言行也是十分符合的，因此它不可能是单纯的政策上的空话。

确实，在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法上，斯大林的革命主义和民族主义产生了深刻的矛盾，民族主义的因素一直处于第一位。他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不久说道：“如果认为它不会企图恢复自己的元气和采取新一轮的侵略行动的话。……只需二三十年的时间，德国就会从失败中复苏，并恢复自己的实力。”在德黑兰会议上他涉及到了相同的观点，只不过预言德国会在更短的时间内恢复自己的实力。他差不多对每一个拜访过克里姆林宫的人都重复同样的话，看起来他几乎无法逃脱未来德国复仇的思想。当他涉及到各主要盟国在和平时期需要团结时，他指出那种潜在的威胁。当他提议削减德国工业，重新划定德国国界，把奥地利从德国分离出来，或者成立亲苏的波兰政权时，他同样重申了这样的话。他专注于防范德国以确保苏联的安全，引用了克里蒙梭、福熙和彭迦勒在一战后所曾采用过的语言，这种语言属于保守主义的语言，他们视过去为未来，又把未来视作是各国之间的争斗与战争。他关于德国“在二十三年内”就要复仇的警告，就相当于他坚决认为德国“在二十三年内”仍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因为“德国要实行共产主义就犹如把马鞍子配在牛身上一样的不协调和不可思议”。如果他曾指望过在德国爆发共产主义革命，他就会看到他所倡导的惩罚性和约条款没有存在的必要。

他的这种说法，确实是表达了苏联人的愿望的。可以毫不

斯大林政治传记

隐瞒地说，所有苏联人都希望看到，胜利之日就是审判德国之时，而且要由德国的受害者来实行这种审判。国际主义的思想同外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感情，虽未被民族主义的思潮彻底吞没，但它们却对敌国未产生任何效果，因为德国工人阶级既没有采取任何举措来防范希特勒的侵略行径，也没有起来反对这种侵略。的确，由于连续地舆论宣传，也由于斯大林每时每刻都在重复冷酷无情的口号“铲除德国侵略者”，强烈地鼓舞了苏联人民的民族主义情感。如果没有这些宣传，民族情绪可能不会升级到后来如此高的程度。然而起因和结局都有相对性。即使没有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传播，德军的倒行逆施，有计划大范围的屠杀妇孺，实行奴隶劳动，以及丧心病狂地毁灭城市和乡村，所有这些都特别能说明问题。从斯大林格勒打到柏林的官兵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因为他们就是脚踏着德国制造的废墟前进的。这样，作为胜利者，他们就要把仇恨报复到战败者身上，就指望他们的政府通过德国工业和人力来重建苏联，并消灭德国重新发动战争的能力。最后，当他们的红旗飘扬在帝国议会大厦上时，这就象征着苏联对于德国的胜利，同时标志着德国的失败。

但是，苏联对德国的这一令人畏惧的仇恨，当战争接近尾声时，却被认为是政治上的一大笔债务。它引起德国的恐慌，并使德国加大了它的抵抗力度。直到最后，希特勒的军队在东方比在西方战斗力要顽强得多。斯大林也看出了这一问题。驻意大利的德军总司令凯塞林陆军元帅于 1945 年 3 月第一次建议对英美全军投降。当斯大林获悉英美在同凯塞林商谈时，他非常不安，因为这是他以前担心西方盟国和德国单方面和谈的一种迟到的反映。不久以后的 4 月间，他就不再宣扬民族主

斯大林政治传记

义，并授权苏联宣传机关重新发表他几乎抛在脑后的话：“希特勒一伙的去留都无关痛痒，而德国人民还是德国人民，德国国家还是德国国家。”这种想缓解德国对苏联恐惧的尝试太迟了，最终收效甚微。在战争最后的日子，大批德国士兵由于虚弱和惊恐，从苏联人手里逃到英美那里去当俘虏，而德国的代表尽全力试图要同西方盟国而不是同苏联安排停战。斯大林怀疑地观注着这些伎俩；当他最后能够宣布德军也向苏联投降时，心里充满了无比的宽慰和兴奋。战争接近尾声时发生的事情表明，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制造出来的德苏之间的鸿沟，在战后许多年都无法用一般的外交和革命手段来弥补。

因此，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具有自发性，是国内和国外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现在的情形依然如故，他在很大程度上受事件的影响而不具有操纵事件的能力。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某些来自国内的压力。至于在国外方面，从雅尔塔会议到波茨坦会议之间存在的盟国之间的怨恨，以及波茨坦会议上出现的极端尖锐的辩论，都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在划分势力范围上各国已经达成一致，尽管斯大林对希腊内战持中立的态度，西方国家仍然对苏联出兵罗马尼亚以及波兰与南斯拉夫不满。关于联合国问题上的分歧本来在雅尔塔会议上已经消除，现在重新浮出水面。斯大林回绝了罗斯福关于莫洛托夫必须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请求，以示他的不悦情绪。在那些日子里，斯大林无疑感到，他的盟国正试图剥夺他们所赠予的阵地，心怀着这种怨气，当哈里·霍普金斯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对他说：“即使俄国人是单纯的人，而西方却经常误认为他们是傻子。”

“三大国”共治的想法在还没有出台之前就破产了。既然

斯大林政治传记

盟国赋予它任何重大的权力，要建立它就是无用的。大家彼此攻击对方，因而很难搞清谁第一个“违反了誓言”。盟国的誓言毕竟是不明确的，到处都是缺陷，以致双方都可以引用原文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问题在于，盟国之间的根本利益分歧不可避免地导致一方或双方都不理会本国该负起的责任。这种始于利益冲突的合作，双方在最初就在心里想到不可避免的要土崩瓦解，而且几乎最初的时候，双方就会考虑到各种利害关系给自身带来的影响。

关于划分势力范围的事宜，虽然在某些方面对它的作者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但却存在着荒谬之处，不可避免地引起他们的懊恼与反思。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领导人来说，把这样多的新阵地让给苏联，这是不正常的。即使罗斯福和邱吉尔的决心已定，但他们不可避免要考虑国内具有这样倾向的部分人的舆论。这种舆论或者根植于保守派对东欧社会主义革命的仇视，或者来自于民主派对于警察国家的厌恶，都强烈地反对同斯大林有任何的接触。这些接触对于苏联国内那部分重要的舆论必然也存在着不合理性，这部分舆论尽管还没有明朗化，却通过许多变相的手段来加压。莫斯科媒体对西班牙内战讷口不言，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表现得异常的不愠不火，这些都使许多布尔什维克深感迷惑。相对来说这些还离自己很远，离国内更近的苏联占领国的事态发展才是至关重要的。对于那些苏联占领军，至少是对许多有政治思想的官兵们，以及国内的有觉悟的党团和团员来说，无法容忍在本国红军奋力解放的国土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虽然最近受到传统主义的影响，但毕竟从小深受社会主义制度的熏陶，因而他们忍不住要发问：难道我们现在要维护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吗？正是这个资本主义

斯大林政治传记

制度把欧洲带进了纳粹的时代，即便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会改变欧洲现状，因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并不是欧洲历史偶然走入误区，而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反映。他们这些战胜者，现在要求他们无论从他们经历和愿望来说都是与自身相对抗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完全是荒谬的事——对他们的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来说，这将是可耻的背叛。

斯大林特别重视这种思想倾向。最初他明显只想迁就他们一下，于是他宣扬“人民民主”的思想。换言之，在苏联邻国建立的制度，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而是两者兼而有之的结合。人们基于后来的事态发展经常认为，这个口号不过是为了欺骗资产阶级，斯大林最初的动机就在于搞苏维埃化。不过，作为同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二者有别的人民民主观点，一度受到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高度的重视，苏联一些政治理论家同样对此加以认真地对待。人们记得，正是斯大林杜撰了一个制度既不完全是资本主义而又不是社会主义。这个想法还归功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定式，一直到1917年他还坚持这一定式，在1925—1927年期间对中国革命的讨论中他又再次搬出了这一想法。在战争接近尾声和后来的日子里，这个想法又在他的脑中浮现。

就他而言，他正在实践中试行的这种中间制度，主要是它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有助于他去维持“三大国”共管的主张，但是这种希望将化为泡影。“人民民主”革命气息太浓厚，制造者的印记也太明显，最终招致西方国家的反对。它产生了斯大林想要避免的一切紧张和摩擦。这使他清醒地看到，西方国家准备在苏联边界上重新扶植一些老的反苏党派和集团，最后把苏联消除出欧洲。无论是对过去俄国的传统主义者还是今天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布尔什维克。西方国家的这方面用心是显为人知的。正因如此，在拿破仑战争以后，西方国家急于对俄国的即得利益予以否认。正因如此，在圣斯蒂凡诺条约之后西方盟国就联合起来反对俄国，并在 1878 年的柏林大会上夺取俄国控制巴尔干地区的权利。斯大林的雄心是不让俄国的势力再次被攻破。在过去，俄国势力在欧洲的扩张范围是暂时和不稳定的，它对巴尔干的影响也随着政治潮流而起伏不定，因为在沙皇统治下，俄国的势力很难深入到那些它试图控制国家的社会体系中。亲斯拉夫主义和东正教还没有能力保持永久的地位。这次苏联的主宰地位如果是建立在东欧的革命和社会结构的改造上，它的统治将能保持住任何外交手段和诡计都不可能改变它的权威地位。由于苏联同它的盟国之间的争论有扩大之势，斯大林也更愿意放弃他的这个中间制度的尝试，把“人民民主”压缩成为掩饰共产党独裁统治的门面。当然，他朝这一方向每前进一步，都增强了苏联同西方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曾追问邱吉尔他所说的有的国家试图统治世界的真正含义，而邱吉尔也谈到三位战时领袖的继承人可能要产生分歧。到了波茨坦会议时，几位巨头的语言就更加明朗化了。会上邱吉尔埋怨布加勒斯特的英国代表的处境，坦率地对斯大林说：“在他们的周围降下了一道铁篱！”铁篱就演化成了后来的了“铁幕”，成为以后的热点。斯大林也当即反驳说：“这完全是谎言！”当他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政策遭到驳斥时，他立即批驳英国在希腊亲保皇派的所采取的措施，虽然在此以前，他在这一问题上一直不发表任何意见。但是一旦英国不再攻击苏联政策时，他也就不再对此过分追究了。不过，冲突的范围不断地升级。波茨坦会议前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不久，斯大林要求在土耳其海峡设立苏联基地——这是先前诸位沙皇们的夙愿。在波茨坦会议上他看到，他的这种尝试同样会受到他的盟友、特别是曾经打碎了沙皇愿望的英国人的干预。于是在讨论到托管墨索里尼非洲帝国问题时，他出人意料地要求由苏联来托管意大利的一个殖民地。邱吉尔对这个新的要求惊奇不已，说他未料想到苏联会想“获得非洲海岸的一大片地方”。这一提议必然会成为对英国控制地中海的一种威胁。看来斯大林也并不奢求满足他的这一要求，因为他已经没有资格去讨价还价了。无论怎么说，他的这些要求，总的来说涵盖了老的东方问题的危机因素，而正是这个问题在十九世纪时导致了俄英关系的紧张。

但是，即使这个东方问题的新形式，也并非是导致盟国冲突的根本原因。盟国无法达成一致的症结所在还是德国问题。由这个问题上产生的矛盾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它们达成共识的一个问题上产生的，这就是它们曾经共同决定对德国进行若干年的军事占领。但是占领的期限却从无定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都被建议过。单这一个问题就足以使盟国的政策冲突迭起。由于德国政府瓦解，各盟国就得担当起德国政府的角色，但是它们停留得时间越长，就越要在自己的占领区中以自身的模式去塑造经济和政治生活，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苏联有关当局的官员不会在东德采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一如美国军事当局不会按照社会主义模式去改组西德。因此，盟国军队在德国的长期共存，就势必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分裂德国。

但是，战胜国答应过要维持德国的统一，并为此目的而携手管理事务。它们在波茨坦会议上非常郑重的重申了这一保

斯大林政治传记

证，并成立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在各国德占领区享有主权。但是，各战胜利在波茨坦会议上就已经或应该明白，共同管制德国可被看作是一场拔河比赛。各大国实际上都不希望对方干预自己占领区的事务。斯大林决定由波兰管理奥德河和尼斯河以东的整个地区，就是把一个既成事实强加给他的伙伴。从表面来看，波兰仅仅是对那些地区进行管理，同时斯大林也是这样向西方盟国解释的。但由于形势的需要，波兰对那些地区的管理就相当于波兰对这些地区的占有。当西方盟国同意斯大林将这些地区的德国居民全部驱逐出去时，这就相当于这一事实得到了默认。当然，西方盟国的默许是有一个附加条件的，即只有将来的和会才有资格划定德国和波兰的最后边界。但是它们既然先前允许驱逐奥德河和尼斯河以东的全部德国居民，这个附加条件也就只是形式了。斯大林必定从这一态度中下这样的定论：他们如愿意停留于现状，那末他们不会对东德产生丝毫的影响。西方国家也坚决反对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再三提出的让苏联与盟国共同管制鲁尔经济的建议，这就使得苏联对西德无法施加任何影响。

由于在赔偿问题上的含糊的让步，进一步加深了德国的分裂。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曾试图使英美同意苏联应得一百亿美元的赔款要求。罗斯福总统只是模棱两可作答，赔款数量再作商讨。在波茨坦会议上，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赔款要求不予以考虑。部分理由是，苏联已经将拆卸了东德的工厂，转运到了苏联，而英美却无法监督这一过程的规模。但是这种新的矛盾还存在着更深层的起因。斯大林一再倡导他的“迦太基式”和约的计划。但英国和美国，已经不希望进一步削弱德国的工业力量了。这一问题上的冲突，被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一项协

斯大林政治传记

议所掩盖了。这项协议内容就是，每个占领国可以通过在其占领区内随意地拆卸工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使每一个国家都有权来单独管理该占领区的经济和社会事务，这也使斯大林有权在东德实行由政府发起的革命。这个革命开始于波茨坦会议召开后不久，它的第一个革命目标就是没收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阶级的财产，它曾是德国官僚机构和军国主义的支柱。斯大林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一个强大的社会反动力量，而这是德国过去一个多世纪都未达成的心愿。第二个行动是对东德的某些工业实行国有化。第三个行动是事实上削弱了社会民主党，表面上是把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的社会党。

革命的范围于是就从奥德河扩展到易北河。在德国的历史中，易北河是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分水岭，这并不是头一次了。但是以前德国保守主义的阵地是在易北河以东，而要求改革的革命派大多来自易北河以西。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改革的社会影响仅限于这条河的一侧。似乎是为了补偿这一点，现在的另一次革命却从东蔓延，直到易北河上。但是现在这条河不仅使德国分割成两部分，它也变成了“两个世界”的分水岭。这两个世界的代表越是长的彼此对峙，这条边界就越像引发战争的导火索。

波茨坦会议中发生的一个事件，预示了这个胜利的联盟中潜伏着冲突和危机。“三巨头”7月24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之后，杜鲁门总统用一种近似乎随意的口气告诉斯大林关于研制原子武器的事。据詹姆斯·贝尔纳斯报道说，“斯大林只是回答道，他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他希望我们将使用它。”他对这一件事没有表示出很大的热情，也没有问及相关的情况，这使

斯大林政治传记

美国的这位国务卿认为，他要么没有意识到这一发明意味着什么，要么就是他认为询问这件高度机密的事是不合时宜的。苏联情报机关也许获悉比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所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情报，所以才会出现斯大林的冷漠态度，是由于这件事并不在他的预料之外。考虑到他通常地和富有耐心地对技术武器十分关注，以及他对苏联科学家的重视，认为他不理解这一发明的意义，这是不容易让人相信的。即使他确定没有马上理解这一意义，那么会议接近尾声时，他肯定已经认识到，由于这一新武器的发明，军事力量的对比马上会有利于美国，这很可能加深盟国之间的敌对更加引人关注。

邱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曾经说过，他们这些盟国的战时领袖也许不会彼此敌对，而他们后继人将会那样。在波茨坦会议上，部分话题已经转变成为了事实。会议的前半部分，战时的三巨头只有邱吉尔和斯大林两人参加。在会议的后半部分，由于英国大选中工党获胜上台，于是邱吉尔和艾登分别被艾德礼和贝文接替了。这并不是说，如果演员表不出现任何变化，这场戏的进一步过程就会出现非常大的不同。邱吉尔毕竟很快就已成为斯大林言词最锋利的对手，而且如果罗斯福没有去逝，他也不可能像某些人所想的一样会作为苏美友好的守护神。无论如何，对于波茨坦这场戏剧，演员表的变动很可能马上就产生负面的影响。虽然产生的新角色和盟国内部政策并无干系，座落在希特勒首都废墟中的这座腓德烈大帝宫殿里，斯大林独自一人作为战时的领袖仍在致力于创造人类的和平，这是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这个伟大的同盟正处于崩溃过程中。

第十四章 胜利的辩证法

苏联胜利的悲壮——斯大林政策中关于民族主义和革命的论述——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胜利”到“社会主义在一个地区胜利”理论的演变——斯大林是自上而下革命的提倡者——“铁幕”发生的历史和意义——西方对苏联产生的影响——论述斯大林和朱可夫——列宁主义的再次兴起——两难问题：在原子时代中“世界是一个还是两个？”——对斯大林作用的总体评论

1945年6月24日，在列宁墓前，斯大林对取得伟大胜利的红军队伍进行了检阅，这是为了纪念苏联遭到希特勒侵入四周年而举行的。在斯大林的身旁，站着他的副手朱可夫元帅，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柏林战役中他都获得了胜利。由罗科索夫斯基元帅领头的队伍从他们面前走过。骑兵、步兵和坦克兵举着许多面希特勒部队的军旗，在泥泞的道路上经过，由红场飞速而过。部队到了陵墓下面，那些希特勒部队的军旗被扔在斯大林的脚下。这个寓言式的场面虽然很新鲜，却又是很熟悉的，因为法国的军旗也曾被军图佐夫的士兵掷于亚历山大的脚下。6月25日，斯大林因为1941年保卫了莫斯科而受到全城的称颂。第三天，他被以“苏联英雄”命名，并被授予大元帅的头衔。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这种光荣和胜利是人们所未想过的。不过，1945年的苏联，胜利和失败并存共行，这也是相当少见的。也许从前的胜利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次一样，悲惨和壮观如此交替出现。

斯大林这时尽情地享受着人民的感谢和赞扬。这是一种油然而生、真实的感情，不是官方依靠宣传制造出来的。“斯大林时代的成就”这种在过去看来过于夸张的口号，现在增添了新的意义。青年人当然是这样，老一代中怀疑和不满者也是这样。全国都对斯大林的许多过失主动地表示谅解，而只记住他所做的好事。因为一事成功，而万事顺心如意，甚至他的一切过失，包括1939—1941年的那些，现在许多人都将此看作是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行为。甚至又重新认识和评价了三十年代的残暴行为，认为苏联人民得以继续生存的原因就是这些有益的行动。

对于斯大林的这种新评价，并不只是由于成功和高兴而做出的。应该承认的是，如果苏联，特别是它的东部地区，不是实行了全面的工业化，这场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存在大批农庄的集体化，这场战争取得胜利也是不太可能的。农民在1930年之前从来没有操纵过拖拉机和机器，是不会在现代化的战争中起任何作用的。全国普遍存在着集体农庄连同它的机器拖拉机站，这些可以看作是农民打现代化战争的预备学校。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也使红军能够募集许多掌握着知识的军官和士兵。“先进国家领先我们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用十年以内的时间赶超这段差距。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这正好是斯大林在希特勒计划着手入侵苏联前十年说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话作为一种已被证明了的伟大的预言，作为一种对行动最及时的号召，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人们肯定会获得深刻的印象。的确，假如苏联推迟几年实现现代化，那么是胜利还是失败仍是难以预料的。

与此相对，苏联为取胜而做出的牺牲仍是应该被提及的。按官方统计：七百万人丧生；伤残数百万人；大部分的城镇和欧洲部分的绝大多数农村沦为废墟；工业受到破坏，例如顿尼茨的煤矿整个遭水浸泡；二千五百万人失去家园，居住在壕沟、窑洞和泥舍里，而对于数百万的撤退到乌拉尔及其以东的人就更是无家可归的。最后但仍然是重要的一点是，人民的极度厌倦也是为了获取胜利所做出的消耗，因为为了保障工业化和战备，多年以来人民最必需的生活日用品都是极度缺乏的。

国家遭到削弱了，而且处于饥饿之中。人们可能盼望着胜利能出现奇迹，政府创造奇迹。他们普遍抱有快速地恢复工农业和重建城市的要求。他们渴望生产更多的衣物和食品，创办更多的学校和娱乐设施。但是苏联的资源几乎已是被全部消耗和不复存在，是不能很快地满足这些要求的。随着胜利而来的悲惨情况让人更加难以接受。斯大林是害怕让人民失望的。为了提高重建工作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速度，他被迫使用别国的资源。

在理论上，为做到这一点他能够选择三种不同的方法。他可以向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申请支援，在联盟的鼎盛时期里，曾有过关于美国提供给苏联贷款和多次商谈苏美贸易，但是在后来紧张关系和冲突增加后，经济合作的前景就不存在了。斯大林也必定不愿意使自己的国家对别国形成相对依赖性，因为处于这种相对依赖地位之后，任何债务人都难免要同他的债权人发生对立。事实上，他只能在两种办法中做出选择，一种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另一种方法是革命的。民族主

斯大林政治传记

义的方法主要是指向战败国提出赔款要求，拆卸它们的工业以运往苏联，强行从它们当前的生产中索要赔偿，以及干脆拿他们的劳动力直接使用。革命的方法，其成果可能更慢一些，但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些。它包括苏联和它的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实现经济上的结合，从而计划经济赖以运转的基础得以扩展。逐渐地把几个中等的和小的国家集中成一个计划经济体系，这对苏联发展的速度和重建工作将会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要实现这种结合首要的条件就是，那些有关的国家当权的一定要是共产党。为走这条道路，斯大林默认了托洛茨基表情的表述，即苏联的生产力将对它的国界有所反抗。苏联的经济机体已经处于这种状况：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是无法实现的，除非这种恢复是迟缓的、痛苦的，并且战胜国所难以忍受的众多的苦难都会掺杂其中。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一些关键性的方面民族主义的和革命的这两种政策发生了矛盾。但是，斯大林在这两种政策中并未做出明确的选择，他同时实行这两条路线，但在战时民族主义的路线占了优势，革命的路线则在战后一段时期内占有优势。

这种发展使斯大林在政治演变中形成了最显著的矛盾——一个最为滑稽的矛盾。二十多年以来，他始终在宣扬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并努力维护苏联社会主义的自力更生原则。他如果不是在口头的表述中那也是在事实上使苏联偏离了世界革命——或者是苏联导致斯大林背离了世界革命吧？现在当他享有了无与伦比的胜利时，他又重新一次如果不是在口头的表述中那也是在事实上拒绝承认他自己宣扬过的理论。他丢掉了他的关于苏联要自力更生的原则，重新把注意力转向苏联

斯大林政治传记

对世界革命的兴趣上。布尔什维主义好象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初始点。的确，这种斯大林胜利的古怪辩证法，似乎使这一胜利转变成托洛茨基死后的殊荣了。这就像是斯大林通过出人意料的对他的已经死去的敌手进行平反，而为他自己那些费尽心思所进行的争论和清洗贴金。

但是，这种观点只可代表一半真理。可以肯定的，1945—1946年的斯大林与我们已知的1925—1935年的斯大林已经判若两人了。他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变化得不再是他自己宣称的那个人和他实际上是的那个不寻常的人了。但是时代的潮流使他还没有返回自己的出发点，即他曾经同列宁和托洛茨基共同坚持着世界革命的观点。现在他已经使用一种可以称之为“在一个地区社会主义胜利”的思想代替了“在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思想。在列宁和托洛茨基认为，在本质上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持续的全球性过程，否认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敌对力量之间会存在长时间的休战期。按照这种思想，是禁止在两种制度之间有意地来区分势力范围的。这种以划分势力范围为根基的几大国共管的思想，在老布尔什维克看来，似乎是否认了一切的社会主义原则。在斯大林主义的观念中，世界革命的过程同样具有全球性，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敌对，就象早先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敌对一样，都是现代文明天生具有的。但是它们的敌对战争只是在更为宽广的哲学和历史意义上继续下去，很可能很多代人都要经受这种斗争。在实际政治的现实中，中断革命过程同继续革命过程如果不是更重要、也是同样重要的。对立制度之间激烈的冲突之后，接着将会是长时间的休战，也许会长达几十年，而在这个过程中，两种制度的冲突将表现出和平竞赛的性质。这种和平竞赛的性质对安

排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订立契约和进行交往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事先还做了积极准备。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诸如划分势力范围这样的国际上的实用主义原则甚至都是可以接受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这种势力范围的划分，固然增强了世界那一部分地区中资本主义的地位，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得到好处，它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而且其势力深入了对方的范围内去。

有关这个观点的另外一个态度上的区别是，在四十年代的事件中它的表现引人注目。老的布尔什维克认为，“高度工业化的西方”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这场革命在俄国开始了，西方将继续进行这场革命，并将取得胜利，然后“落后的俄国”会受到这种社会主义精神的反作用。现在，照斯大林主义看来，对事物的这种预言变得落后而荒唐。它的原因一部分在于西方仍然无力进行革命；另一部分原因则是，苏联进步的结果，程度巨大的削弱了西方争取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从而在这次势力范围的平均分赃中坦然地把西欧让给资本主义。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对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以致他们被视为二十世纪革命的主要代理人；而斯大林主要关注地却是华沙、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布拉格。在他看来，在一个区域内社会主义的胜利，在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已被视作政治战略上的最高目标。

但是，革命的方法才是最重要的区别。通常认为，老的布尔什维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力量上是寄于厚望的。它认为，作为外国工人阶级有创意的经验和斗争结果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他们自己决定政治和社会的最可靠的行动。还可以表述为，在老的布尔什维主义者看来，革命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就像

斯大林政治传记

1917年的那种大变动。现在斯大林在中欧和东欧所进行的主要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在本区域处于领导地位的大国对此加以规定、激励和管理。它的执行者和中间代理人尽管是当地的共产党，但处于幕后的最大的革命党还是苏联红军。这并不意味着当地的工人阶级没有参加这场大变动。如果这场大变动中没有当地工人阶级的参加，那末这场冒险的结果就是非常短暂的。如果排除相关国家重要部门的自愿合作仅仅是自上而下，任何革命都是不能实现的。因此，发生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事情是革命和征服参半的。这使得对这一现象的估价不会太容易。如果它仅仅是征服，那就很容易地以苏联帝国主义的为的名义加以谴责。如果它仅仅是革命，那末坚信一个国家有权自己进行革命，就可以坦然公开地为这个革命欢呼。但革命和征服在这场变动中交错存在，这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区域胜利”的本质。

作为倡导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斯大林，在欧洲现代史中是惟一的。他与拿破仑和俾斯麦同属一类，却又在其他方面存在很明显的区别。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存在一种独特的相同点，从而使他具有了这种作用。“十九世纪时，在法国以外的欧洲，封建制度显而易见地已经面临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在莱茵河以东，一系列法国大革命模式的剧变仍没有把封建主义推翻，人民群众那种绝望和仇恨的爆发也没有将此推翻，而且在1794年某些雅各宾党人所期望的那种自下而上的革命也没有实现对封建主义的推翻。相反地，由于一系列自上而下的革命而把欧洲的封建主义减弱或推翻。拿破仑驯服了国内的雅各宾主义，他在意大利、波兰和莱茵兰等外国本土上进行革命，全部或部分地废除了农奴制度，

斯大林政治传记

而且一些封建特权按照他的《法典》的规定也被废除了。他执行了雅各宾主义的部分政治遗言，但这并不是自愿的。更为奇怪的是，俾斯麦作为保守的容克地主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他为德国资产阶级发展清除了许多封建主义残余物。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二代人亲自关注了一个更加怪异的事情，即俄国和波兰的农奴制被俄国沙皇亲自废除了，前不久“雅各宾派”还希望能实现这个目标。封建制度面临灭亡，不能再生存下去了。但是法国以外的人民群众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能一致起来“自下而上”地将它推倒，因此它就自上而下地把所有一切都清除了。拿破仑对于法国各邻国的冲击，类似于斯大林主义对中欧和东欧的冲击。在历史的主要方面上，两者是相似的：东欧的社会制度已经无法再继续了，拿破仑时期莱茵的封建制度也是这样。但是革命的力量又不够强大，不能一致起来把它推翻。于是革命和征服就同时出现在这个变动中，进步和倒退同在，最终改变了社会结构。

胜利的斯大林主义另外还存在一个“辩证的矛盾”，即“铁幕”，主要是指斯大林严格地要求苏联一整代人孤立于世界之外。事实上，这种孤立对于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必要的因此，可以认为斯大林是“铁幕”的主要建筑者。但是，有多种原因和因素导致采取孤立态度和构成了孤立，正是这些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才使“铁幕”这样地牢固、厚实和不可穿越。

第一个因素就是在世界革命的希望受挫以后布尔什维主义采取了自卫的态度。布尔什维克的苏联把自己独立于敌对世界之外。在这一方面，它同英国的克伦威尔时代和法国的雅各宾

斯大林政治传记

时代是完全一样的。清教徒的英国总是担心和惧怕“法国的阴谋”和“法国的金钱”在反对它。而像幽灵似的“英国的阴谋”和“英国的金钱”也一直不放过雅各宾的法国。在两种情况下，革命的国家都是完全有道理表示怀疑的，因为带有敌意的“阴谋”和“金钱”确实存在。同样，在两种情况下，非常强烈的对外部世界进行怀疑和防范，这是任何革命时代中群众感情共同具有的特点。

俄国的民族传统使布尔什维克苏联的这种精神状态，大大增强了。类似于其他许多方面，民族的风俗习惯的维持是更容易和更强有力的，因为它们同革命的真实而明确的需要是协调的。俄国同西方的长期隔离，是由于军事上的原因，是由于天主教受到了东正教的敌视，在后来则是由于沙皇的专制制度迫切的需要防止西方自由派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侵入。诚然，俄国的知识界在十九世纪曾部分成功地打破了这座墙。但是即使取得了某些胜利，也是经过了艰苦的斗争，孤立的基本事实就更加显著了。这座墙虽然有了缺口，但仍存在着。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最初希望把它推倒，后来他们发现这座墙的用处还很大，就不仅保留了它，甚至还把它的缺口又修理了。

换一个角度考虑，“铁幕”是经济保护主义发生变化后的一种。所有的现代的大国，其中英国是特例，在发展本国工业的时候，为保护自己都采取了高关税的壁垒和其他一些限制性措施，来抵制较老的工业国的竞争。正是通过这类保护主义，美国和德国保证了他们工业的成熟发展。在一国胜利的社会主义，必须采取同样的办法。其他的国家在发展工业时，都从外国资本的援助中得到了好处，或者像美国的情况，两大洋的地理形式给予了它“保护”。这样的好处在布尔什维克的苏联是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不存在的，外国资本不会帮助它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在新的总体战争给它带来威胁并被迫它把大部分财富转入军备方面以前，它的工业化几乎还没有真正认真地开始。这就使得它的工业革命具有的痛苦比其他没有这种情况的工业革命要更多，而这也就导致它的保护主义特别地严格和苛刻。

普通的工人首先感觉到这种严格和苛刻。政府和计划当局被迫把国家的资源分配给交通和工业的发展、农业的机械化、个人和军备消费。越多的资源分配给工业和军备，剩下的分配给个人消费的就相对地越小，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经济逻辑。这个逻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在不同程度上为所有交战国所认识或再认识到了。但是经过了许多年，苏联才惊恐地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很低，现在国家政策的更高目的又要求他们做出牺牲。尽管这样，在三十年代晚期，已经开始感觉到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这是很短暂的提高。生活水平因战争而再次降低到可怕的程度。

苏联的人民群众看到，国家迅猛地越来越富，而绝大部分的人却仍然贫穷，甚至贫困的程度越来越严重。的确，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几乎每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都要经历的事情。十九世纪保护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对外国廉价的商品涌入消费市场进行抵挡，以便刺激和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和壮大。但是，在国民财富的积累和个人贫穷之间的对照，所有的国家都不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那样尖锐。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国家都不会把这种对比看作是无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的等同物。斯大林向工人阶级提出要求不仅要拼命工作，忍受牺牲，而且还要相信，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相比它们的生活更容易和更舒服。毫无疑问这不是也不可能是真的，但这却不是社会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主义的过错，一般看来，这也不是斯大林及其政府的过失，虽然他们的某些错误曾更加恶化了这种情况。但是斯大林是有过失的，这就是苏联人民悲惨的生活水平被他视作社会主义的最高成就而奉献于人民之前。

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虚伪的欺骗由这种歪曲的说法所引起。它的最初的结果是，禁止人民群众真正地对比苏联的和外国的生活水平。第二个结果是，很多年以来，宣传机构不仅过份美化国内的生活状况，而且坚持极其荒谬地夸张国外工人阶级的悲惨情况。第三个结果是，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苏联公民才被允许通过阅读外国书报或者通过直接观察对国外的社会生活来进行研究。保持“铁幕”就成了斯大林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利益所在。

苏联自身孤立于世界之外，简直使自己无法呼吸，在大清洗中就表现出乖张的精神状态。总检查长维辛斯基的那幅描绘了阴险的、无孔不入的外国阴谋的图画，因为被告们的坦白，甚至变得更为不妙了。据说在国家的任何部门中都存在阴谋的代理人，而对于“阴谋分子”都采取了极为恐惧的处罚——由于这一切而导致对外国的事情都过于敏感。同外国人和外国事物的接触，尽管非常的小心翼翼，都被看作遭受了感染。老年人当然想到了这一切都是阴谋；而出于害怕，他们也就认可了这种孤立。但青年人只对它的外在价值表示认可，他们对外国的罪恶事物当然害怕，但对国内的事物也持异端看法。其中一部分是他们正常的心理状态，一部分受他们的性格影响。他们几乎从婴儿时代起就被那个坚固的像铁板一块的国家所塑造；他们被灌输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粗暴的拜占庭式的翻版。他们一直被禁止形成接受真理时表示怀疑的做法；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他们也不具有在观点和原则上确实产生对立的一切经历，即不具有独立思考的经验。大清洗最终达到了使青年一代的思想完全摆脱扰乱人心的外在影响的目的。

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因素，“铁幕”实际上就起了“进步的”和“反动的”两方面的作用。在这个铁幕之后，革命获取了某种程度的安全，政府获得机会能够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工作。同时，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欺骗和传奇得到了“铁幕”的保护。“铁幕”的这种双重作用，已经成为斯大林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

现在，这场胜利对斯大林维持这一条件形成了威胁。苏联突然发现自己的每个方面都被卷入外部世界的生活和事务之中。十几个国家中入驻了苏联几百万的士兵。他们感到了一种类似于拿破仑告诉入驻外国军队时所提到的那种航海一般的感觉。几百万劳工被迫在德国遭受长期拘禁后重返了家园。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大量军官，天天接触着不同于自己的世界。于是“铁幕”就被打破、穿透，几乎遭到了粉碎。

苏联人对资本主义西方产生的印象，决不像某些自我恭维的人所认为的总是良好的。苏联人看到大片荒废的欧洲。上千万的人多年来一直在铁丝网包围的德国集中营里生活着，或受到毒气室的威胁。他们看到的是欧洲文明令人恐惧的、不正常的残余部分，而不是过去它那诱人的样子。对于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来说，外部世界图景的黑暗程度甚至要超过国内宣传机构曾经描述的。即使是那些不具有这种悲观经历的人，也坚决不会转而采用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在他们多数人看来，所有生产资料不采用公有制的社会，本身就意味着不正义，是一种莫名其妙或荒唐的时代错误。但是，在接触外部世界中，多年孤

斯大林政治传记

立所养成的思想习惯如果不是彻底瓦解，起码也开始在减弱。苏联人注意到，外国人的生活水平即使在战争的蹂躏下也比他们高。他们对战败国中所过的舒服生活感到眼花缭乱。他们非常羡慕地看到，匈牙利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和捷克人所承受的压抑比他们少，在发表自己的思想时的限制性因素也少；总之，他们拥有某种程度的自由。

同外国的接触使他们的精神为之振奋。这种振奋的程度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得到反映：受到这种振奋影响的千百万人返回家园之后，被迫把他们经历的某些事情说给他们的亲朋好友听。但是，这种情况引起的政治上的轰动没有马上出现，这种激动也没有能够形成任何明确的政治思想，因为还不存在能够形成这种思想的独立的组织或团体。过去迫使人们去形成自己的意见，现在还不能立即重新认识这种习惯。所以，在他们思想中开始形成的，似乎是一种难以发觉的依照新的原则重新思考价值观念的过程，还没有人能够预言它能够持续多久和它最终将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这种最近的经历使全国产生新的强烈的要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愿望。斯大林的政府很可能要采取向战败国征收赔款和积极恢复国内经济的措施，来满足这种愿望的一部分。物质利益的范围除外，还可以感到一种不清晰的对自由的渴望，以及新的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政府被迫只能部分地去满足这种渴望和好奇心，胜利传给这个国家先进的观点，起码也是传给它的知识分子这种先进观点。人们的感情经受了最严重的考验并达到了成熟，这使得他们认为他们已经长大了，曾经对他们十分有用而又使他们遭受很大苦难的那种监护再也不需要了。诚然，全国在胜利的心情中，是愿意对斯大林过去的过失表示原谅的，但也许更为真实的是，人们不愿意

斯大林政治传记

再看到那些过失重现。

我们过去提到过，使这种新的激动形成政治思想的组织和团体还不存在。这种说法需要进行深入的证明。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军官团成为这种组织萌芽的代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分析了那些使它免于集权压力和允许它获得明确身份的情况。战争即将结束时，在道义上军官团已经居于全国的首位。军官团有一个值得尊敬的领袖，即保卫过莫斯科和攻克过柏林的朱可夫元帅，他的威望仅在斯大林之后。这也许是更为名副其实的，因为官方的宣传对此并未有任何功劳。但这并不是说斯大林的地位已经面临危险，或者朱可夫是与他敌对的角色。这还需要很长一段时期才能演变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且当斯大林在世时，这一点能否实现，还是很不肯定的。但是，尽管斯大林的地位并没有面临危险，他还是像三十年代那样，急于再次镇压另组政府的潜在危险性，或者说还是没有他指定的政府继任人出现的可能性。他也许不会忘记亚历山大一世的军队在接触了欧洲后所产生的激动的后果。在与拿破仑的战争取胜后的几年里，沙皇的军官团中遍布了秘密组织，它用的成员都是一些观察了外国生活从而想为国内改革而战斗的人。那些秘密组织在亚历山大死后，就准备和实行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作为一系列革命动荡的前导。

因此，斯大林主要致力于使党重新恢复它过去的崇高地位，不被其他的一切组织强占这种地位。于是一些著名的元帅和将军就不再引人注目了。在停战后的几个星期，几乎没有对他们的名字和事迹的任何宣传。也许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正常而合理的现象，所有不是军事独裁统治的国家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情况仍有差别。军官团的削弱是有其政治意义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这些行动是被精心策划和始终一致的。到了 1946 年，情况就明晰了，朱可夫元帅彻底从公众的注意中消失了，从那以后，他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甚至莫斯科保卫战中的作用，在官方的战争记述中日益不清晰了，一直到柏林战役三周年时《真理报》刊登了纪念性的文章，其中朱可夫却没有被提到过一次。他的名字在编年史上早已被擦掉了，就像很多名字从革命编年史中被擦掉那样。

斯大林一方面使党在道义上重新享有了最高的权力，一方面又致力于重建党的观点，达到对前几年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反对的目的。在这场革命和传统的拔河似的较量中，前者明显地再次维护了自己的地位，虽然对后者也没有实现彻底的压倒和消灭。和平时期如同它以前的战争时期一样，在公众生活的政治、经济、历史和哲学的写作以及艺术和小说的任何领域里，都进行了许多意识形态的调整。那个众所周知的俄罗斯母亲之神，前不久被重塑金身，而现在则被悄悄地扔进了垃圾箱，假如没有被彻底抛弃的话。召唤苏沃洛夫、库图佐夫、波札尔斯基和米宁的名字，已经不再被视为优秀的爱国主义风格的表现了。颂扬伟大的沙皇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已经过时了，而在前不久作家和历史学家还怀着崇敬的心情颂扬他们是斯大林精神上的先驱。甚至亲斯拉夫主义的宣传也不见踪迹了。一般说来，已经再也没有必要使人民的思想太多的面向过去。恢复“布尔什维克意识”是现在的新任务。青年们被教导评价事物要根据新旧俄国的相异处而不是相似处；而且他们还需要了解，苏联的今天主要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和斯大林所阐释的马列主义的功劳。现在是倡导和鼓励复兴列宁主义的。

这种新的转变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对战争期间过分提倡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民族主义的一个真正的反动，也可能是出于斯大林个人的想法。在 1941—1943 年时，他还对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的吹捧表示认同，并以 1812 年和 1941 年极其相似的两次卫国战争而自豪。他是站在祖先的肩膀上来表现自己的伟大之处的。但是现在作为一个胜利者，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不再需要了。彼得之流、库图佐夫之流、亚历山大之流，与他相比，真是相形见绌。把自己再次视为列宁的继承者，这对他来说就非常不同了，因为列宁毕竟一直居于很高的地位。但是除了这些考虑以外，斯大林还有更为深远的动机促使他鼓励列宁主义的复兴。他希望以此实现对抗资本主义西方对苏联的新冲击。人民曾被民族主义唤起，奋力为生存作殊死斗争，但人民不会因为民族主义的宣传而奋力去反对外部世界的“腐败”影响和提供新的希望。布尔什维克鼓吹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而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只有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这种理论，人民才会理解，在西方大肆吹捧的事物的表面下，却隐藏着无可救药的衰落。斯大林企图把处于半熄灭状态的往日对意识形态和对共产主义热情的火焰再次点燃，以便坚守自己的阵地，在苏联的内部和外部一起反对西方。他特别希望这种热情被点燃后，知识分子的信念可以得到恢复，使他们再次屈从于他的严酷统治。历史又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列宁主义现在被用来弥补斯大林“铁幕”的缺口。

由于斯大林的内外政策明显地存在着矛盾，这些工作都将是毫无功劳可言。他的外交政策是要把苏联保持在欧洲范围内，但他的国内政策又把它思想限制在欧洲之外。他要实现的目的不仅是使苏联再次孤立于欧洲大陆英美的势力范围之外，而且还必须孤立于苏联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因为苏联同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人民民主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风气是存在区别的。还有一部分理由是，俄国人、捷克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的民族传统是存在差别的。即使在苏联，斯大林主义也经历了很多年的形成过程，而且依赖于许多经济上的变动、政治上的冲击和迟缓的变化。经历了长时间的磨难后形成的最终结果是不能现成地传输给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国家的。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方面的制度，以及私人在它们农业中占有的优势，实现工业化方法的不同，工作效率的不等，都导致他们同苏联存在很多差别。波兰人和捷克人的生活水平在传统上就比苏联人高，与苏联不同，它们是不允许为了工业化而被压低的。一切情况都表明了会产生离开正统观念的方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真正接触——自由交流思想和自由旅行——成为苏联内部骚动的另一个来源是极其容易的。因此，两个“铁幕”就得到了斯大林的保留，一个把苏联同它的势力范围分离了，一个把它的势力范围同西方分离了。西方的舆论更多地想着后者，其实两个“铁幕”中最穿不透的一个正是前者。但是，苏联凭借这两座墙能否有效地既存在于欧洲之内又存在于欧洲之外，还是存在疑问的。

但是，一个更为广阔和更为危险的两难问题正摆在胜利的斯大林主义面前。斯大林对整个的苏联势力范围实行革命化倾注了全部精力。他显然认为，这个目的一旦达到，伟大的休战就能得到确保。正如他所表述的，即资本主义的西方和共产主义的东方实现“和平共处”。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实行革命及两种制度实现和平共处这两个目标，肯定会彼此妨碍。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休战，是以一个不稳定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均势为基础的，现在这种均势基本上是无法再重现了。当时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苏联的软弱这两个要素构成了这种均势。这两者都属于过去的事情了。所有新的均势都离不开这样的条件：美国要甘心于苏联在东方的优势，而苏联对于美国在西方的优势也要能够接受。它还需要各国在世界上划分的势力范围得到永久性的固定。即使它们能够做到这些，但由于世界权力日益增强的两极分化和两个制度不断出现的磨擦，这种新的均势也是十分动荡的。更为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提出下面的问题：在进入原子世纪之前，世界对于两个敌对的制度来说变得是否太小了？这不是一个崭新的问题。民族国家和帝国由于工业技术的进步早已变得陈旧了。但是，苏联体系和美国势力的突然扩张，是与工业革命同时发生的，因而这一问题又以令人迷惑的坚持性和难以忍受的尖锐性被再次提出。面对这个问题，胜利的斯大林主义类似于世界的其余部分，看来是会失败的。

到此我们对斯大林的生平和工作的描述暂告一段落。我们并不幻想能够从中得出最后的结论，或者根据它来对斯大林以及他的成就和失败作出毫无疑问的判断。在经历了如此多的高潮和低潮之后，他的戏剧似乎现在才进入高潮；而我们不知道这最后一幕将有什么新的景象。

毫无疑问的是，斯大林就像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一样是属于那种伟大的、革命的、专制的暴君一类的人。这个形容词的任何部分都应该得到着重强调的阐释。他之所以是伟大的，是从他工作的规模、行动的气势和管理权限的宽广来衡量的。他之所以是革命的，这不仅因为他的一切始终忠诚于

斯大林政治传记

革命的创造性思想，而且因为他使一个社会组织的崭新原则应用到了实践中，不管他本人还是紧密联系他名字的政权如何，毫无疑问这个社会组织是能存在下去的，能充足人类的经验，使它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人们注意到一些国家的政府都企图偷偷地学他，宣称它们也采取计划经济，显而易见，这是斯大林的成功。最后，他的残暴的专制主义不仅把他的成就毁于一旦，还激起猛烈的反抗。人们在反抗中，很容易暂时忘记他们究竟是在反抗斯大林主义的专制，还是在反抗它进步的社会功绩。

当试图对比他和希特勒时，斯大林作用和性格的复杂性就显而易见了。他们有着许多明显的相似点。他们都毫无怜悯和毫无顾虑地对反对派采取镇压；他们集权国家的机器都得到了加强，他们经常的、无情的给人民施加压力；他们都企图重新把国家的思想塑造成一种单一的模式，对任何“不合需要的”影响或冲动加以排斥；根据严格的领袖原则，他们建立起自己不受挑战的统治地位。

以上就是他们的相似点，他们还有很多的差别。在希特勒统治时德国民族在任何一个领域中没有超出他掌权以前的水平；但在大多数领域中，却出现了巨大的后退和令人恐惧的退步。在1933年他上台时，经济萧条和社会紧张现象在德国一直存在，但它却是一个富强繁荣的国家。它的工业在欧洲大陆是效率最高的，它拥有最现代化的社会服务事业，这些都是其它欧洲国家无法相比的。它的大学是知识的重要中心，拥有著名的科学人才，他们为此自傲。德国青年的先进分子是活跃的、认真的和有理想的。德国的剧院被极高的评价和广泛的模仿。德国报纸中的最好的部分是欧洲大陆报纸中最灵通和最明

智的。

希特勒留下的德国已经极度贫乏，倒退到未开化状态。我们并不是在谈论德国因失败而受到的影响，而是在谈论不和战败相连的国家状况。国家在希特勒统治下拥有的物质生产机构，除了许多特殊的军事工厂以外，与他当政以前没有太大的变化。它有一半的社会服务事业已经被毁坏了。它的大学已成为对人进行恐怖而残酷的训练基地。它的著名科学家有的被迫逃亡国外，或者被迫接受冲锋队的指导，并对一些狂妄的种族主义滥语进行学习。它的医疗人员都变成了纯粹的种族血统的专家，对一些被认为有不纯血统的人进行暗杀。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已经占据了国家哲学圣殿中伊曼努埃尔·康德的壁龛。在二十年的纳粹广播、报纸、电影和戏剧“教育”下，德国的集体思想已经得到了荒唐而堕落的发展。单靠一个新的思想或一个积极的成果是不能挽救这些恐惧的损失，除非人们把一个种族或国家拥有统治的权力或消灭别的种族和国家当成是这种新的思想。德国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下，其社会结构本质上也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当纳粹主义的门面崩溃以后，全世界都注意到，德国的社会结构仍旧是希特勒以前的那种，大工业家、蒂森之流、克虏伯之流、容克地主、富农、中产阶级、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共同存在。虽然不是从政治意义上说，而考虑到社会意义，1945年的德国仍然是霍亨索伦王朝掌握政权的，只不过是因一幕漫无目的的悲剧性的暴乱而被抛进了令人生畏的混乱和骚动之中。

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毕竟是大不相同的。斯大林统治时的国家，除了数量极少的一些有知识的人和先进的工人外，整个国家是未开化的。这并不是对苏联的民族性格的责难——苏联

斯大林政治传记

“落后的、亚细亚的”条件是它的悲哀而不是它犯的错误。使用一句著名的话，斯大林使用野蛮的方法对苏联的原始未开化状态进行了清扫。由于他的使用方法所具有的性质，使得苏联生活中大部分已经肃清的野蛮状态，又重新显现出来。但是，国家在许多领域中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1930年时它的物质生产机构，尚落后于欧洲任何中等国家，现在已经快速的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使它成为欧洲最大的和世界第二个工业化强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它的城镇数量翻了一番，它的城市人口增加了三千万。各级学校明显地成倍增长，学校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它的思想非常清醒，以致于它无法再次睡去。它对于科学、知识和艺术的热爱和关注，斯大林政府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已经达到了难以满足和令人为难的程度。顺便强调，斯大林虽然使苏联摆脱了西方当代的影响，却鼓励和提倡了他所称之为西方“文化遗产”的学习兴趣。也许任何国家都不会象苏联那样，对于别的民族的古典文学艺术青年一代抱有最大的喜爱和崇敬，这是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教育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另外一个区别是，斯大林不象希特勒那样坚决不允许新一代阅读和研究不符合他的思想观点的本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当他采取专制措施来对待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小说家、诗人、画家、历史学家、甚至作曲家的时候，整个来说，却表现出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虔诚的态度对待已故的人们。象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里、别林斯基、契诃夫和其他许多人的作品，其中存在对于过去专制的嘲讽和指责，非常类似于今天的情况，但却照印数百万册分发给青年阅读。俄国的海涅或莱辛的作品未曾遭到宗教裁判所的焚毁。还应看到斯大林主义所固有的理想主义的本质，即不是人对人的统治、民族

斯大林政治传记

对民族的统治、国家对国家的统治，而是大家基本上平等，即使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它也只是为了向一种不存在阶级的社会过渡；而且它是平等和自由的联合体，而不是独裁。这些说法对人仍是具有鼓舞作用的，因此，许多珍贵、积极的因素仍存在于斯大林主义的教育影响中。从长期来看，这些珍贵、积极的因素可能会要转过来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消极方面。

最后，整个苏联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刻的变化，因此它发生逆转是绝对不可能了。我们可以认为，苏联人民对于他们长时间生活的戒严状态将会出现凶猛的反抗。甚至可以想象，某种政治上的复辟可能发生。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即使这种复辟对苏联社会的触及也只限于表面，而且在革命已经做了的工作面前，它会表现出缺乏力量的。因为革命已经作了的工作，与斯图亚特和波旁王朝复辟所做的工作相比都更为全面彻底。对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来说，“二十年做了二十代人的工作”，这句话对苏联的描述比其他革命的国家更符合事实。

这样一些理由的存在，使得斯大林不能再被归入希特勒一类的人物中去。与其他的暴君相比，希特勒的记录是微不足道和最无价值的，希特勒是一个毫无成就可言的反革命领袖，而斯大林却是一场带有悲剧性色彩的、自我矛盾的、但又具有开创性革命的领袖和开拓者。类似于克伦威尔、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起初他是起义人民的公仆，后来却以他们的主人自居。就像克伦威尔一样，他体现了具有连续性的革命的所有状态和变态，他的作用虽然在头一阶段中，不是引人注意的。就象罗伯斯比尔一样，他耗尽了自己党所有的鲜血。就象拿破仑一样，他建立的帝国是半保守和半革命同时存在的帝国，并把革

斯大林政治传记

命延伸到国外。就如同克伦威尔和拿破仑事业中最好的部分使他们流芳千古一样，斯大林同样也是这样的。但是为了使斯大林事业中最好的部分保留到未来，为了使它产生充足的价值，历史还不得不严格地净化和重新整理斯大林的事业，就像历史曾经净化和重整克伦威尔以后的英国革命和拿破仑以后的法国革命那样。

第十五章 补篇：斯大林的晚年

斯大林的伟业与灭亡——战后的五年发展计划——二千万人遭到死亡——新的恐怖时期——知识分子遭受日丹诺夫的控制——冷战开始——“马歇尔援助”遭到斯大林拒绝——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柏林被封锁——美国的核垄断被苏联打破——中国革命：毛泽东和斯大林——铁托被革除教门——朝鲜战争及其后果——兴起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犹太人和斯大林——他是不是患了偏执狂？——他对经济学和语言学的最后见解——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医生阴谋”的执行——斯大林作用的重估——斯大林的逝世

斯大林的晚年带给他成就，但也带给他毁灭。在尾声中又重现了他一生的戏剧，而舞台比开始时更大，他在这个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得到了巨大程度的扩大，甚至使得一个相当伟大的人都显得矮小。半个世界已经被苏联同它的战时盟国的冲突席卷了，现在中国革命又获得了成功，苏联的孤立和“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局面到此结束了。它使斯大林在东欧进行的暧昧的革命迅速暗淡。世界的均势被这行动所改变，而且它把斯大林主义连同它的神圣不可侵犯和民族自给自足的利己主义，都变成了一种让人讨厌的时代错误。

斯大林政治传记

同时，苏联的变化从内部正迟缓而确实地侵蚀着斯大林主义。国家正再次回忆起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历，由于战争已使它倒退，并对它的生长和发展形成了阻碍。“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被斯大林再一次开始。他禁止人民从战争的劳动中有一会儿缓解。他再次动员他们，号召他们贡献出每一份力量来恢复已工作过度或被破坏的工业，重新修建已成为废墟的城镇。他以坚持不懈的残酷绝情来打击人民的极度疲惫，人民被重新编组和训练，他们受到最严厉的劳动法规和紧急条令的重压，他们被迫服从随处存在的警察的控制，他们的任何抵抗和“异端”都被扑灭。

但是，历史并不是简单地重复着。国家再回到它过去的阶段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虽然战争的破坏和屠杀使它损失惨重，但它也获得了新的有利条件和基础，并处于快速而有效的恢复之中。东部各州和共和国的工业化已经得到了加速进行；在遭到德国入侵以后就成为红军兵工厂基地的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以东地区，成为国民经济得以恢复的基地。国民经济的恢复还获得了来自德国和其他战败国赔偿的帮助。特别要注意地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国家与当初的样子已相差甚远了。我们已经看到，由于遭受到 1941—1945 年的经历，它的道德力量已经得到了加强，它的思想中已经出现了激动。社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和群众教育使这种激动得以深入，即使人民的情绪由于战争的灾难性后果的影响还是十分克制的。

斯大林由于性格原因，对待一种新社会意识的激动他总是想尽一切方法进行阻挡和削弱。又由于他的危机感和迫切想使国家生活永远“铁板一块”，他企图使大清洗的运动再次重现和再经历一次。他没有意识到，由于对群众教育和社会现代化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鼓舞，他自己正在“毒化”群众的心灵，并使苏联做好同斯大林主义决裂的准备。他不理解他的教条和统治方法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形势了，而且又被日益浓厚和迷目的烟雾所萦绕，因而在晚年时就日益脱离他的时代、甚至他统治的现实了。

斯大林的后继人，他生前的那些顺从的奴仆，在他死后，使用阴暗的语言对他晚年的黑暗情况进行了描述。他们说他对人民的痛苦毫不理会，理解力贫乏，愚蠢无能。这些证词有许多如实反映事实之处，但也包含对他的继承人的所谓美德进行故意吹捧的拙劣说法。

在战争的余波中，斯大林的行动仍然是胆识和畏怯共存，精明和盲目同在，既有政治家的风度又很愚笨，这是他终其一生的性格特点。他的工作在许多方面现在比过去一切时候都更令人沮丧。

在1946年2月9日的一次“选举”演说中，他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三个或更多一些的五年计划”主要目标的大纲作了宣布。他指出，只有这些计划的目标实现之后，苏联人民才最后获得真实的安全和繁荣。他们自己的经济力量必须要有持续的增强，以便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每年钢的生产量达六千万吨、煤达到五亿吨、石油产量达到六千万吨，等等。他说：“具备了这种条件，才可以认为，才能保障我们的祖国不会发生任何意外事件。”这篇演说是在头两个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之后才几个星期时发表的。因此，他暗示苏联面临了美国核垄断这种新的不安全，敦促人民去回复美国的挑战。

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似乎是不符合实际的。斯大林号召正处于饥饿状态中的工人们——城市消费比最

斯大林政治传记

贫乏的 1940 年还缩小了约五分之二——在顿尼茨盆地的煤矿中，把水从矿井中抽出，每一吨被提升到矿井口的煤都受到珍惜。在钢铁工厂里，人们拼命工作生产出的钢锭才一千二百万吨，只不过才达到美国产量的一小部分。一些年轻的徒工在机械工厂里劳动，人们鹑衣百结，大部分人没有鞋子穿。要求他们“赶上”美国，这几乎是在说笑话。但是，苏联斯大林所提出来的主要工业目标还是实现了，而且比计划的更快。仅在十二年以后，每年煤的产量就达 5 亿吨。在九年以后石油年产量就达到六千万吨。而在五十年代末每年生产的钢铁就达到六千万吨。在同一期间，水泥和建筑业比原来增加了四倍多，在工业上每个工人使用的电力增加了三倍，机床和机器的数量增加了七至八倍。在斯大林时代的最后八年中这个进展的最大和最困难部分最终完成了。

苏联自己的核工业基础在这时得到了奠定。这一事业花费了大部分苏联已经缩小了的财力。各工业部门在 1946 年到 1950 年之间投入的资金，同 1928 年到遭到纳粹侵入时十三年的总投资相等。斯大林和往常一样，还是一心想实现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对消费工业只制订了极其节制的目标，而且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这样低的目标。在极不可靠的农业基础之上又一次进行了这样巨大的建设。在战争期间，全国最富足的粮仓被敌人占据了，国家其余地方的农业生产下降的都不到正常年份的一半。战后第一年全国的收成只达到战前的五分之三。粮食储备已经用完，屠杀了很多牲畜，拖拉机和机器急待修理，而且非常缺乏，甚至储备的种籽或者本身耗干了或者被吃掉了。根本没有人手去耕种休耕多年的土地。

1946 年全国出现了恐怖的旱灾，局势恶化的程度更为严

斯大林政治传记

重了。按照官方的宣布，这是从 1891 年以来五十多年中遭到的最严重的农业灾害。与 1921 年风灾和旱灾相比，这次的范围更广泛。1921 年的灾害曾使伏尔加地区的全部庄稼都摧毁了，三千六百万农民被迫处于饥饿之中，甚至人吃人的惨剧都发生过。这个宣布使人们都产生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因为 1891 年的灾难——沙皇制度因这件事而加速了衰落——一直在人们的心头萦绕着。1946 年的危机恶化了整个农业结构并使之面临崩溃。集体农庄表现为一种半解散状态，农民们对他们私人拥有的小块土地更加关心，而不关心他们公共拥有的土地。他们正是通过对小块土地上的产品进行高价出售，弥补从集体农庄得来的极少的收入。战争期间，农村居民拼死拼活地劳动来维持自身的生活，为军队提供物品，购买战时公债，并把食品小包寄给他们在前线的父兄和丈夫。当战争结束时，能够看到自己家里的人转回乡村的家庭极少。农村损失了最壮健和最能生产的一代人力，在战后的年代，耕种只能依靠老人、残废人、妇女和小孩。

苏联军事胜利最悲惨的方面是，在战争中有二千万人丧生。斯大林对损失的程度采取了谨慎的保密，因为官方公布只是七百万人已经丧生。当然，任何家庭都了解它和它的邻居在这场大屠杀中所遭受的损失有多大，每一个农村都知道所悼念的死者有多少。斯大林的目的是让全国伤亡的数字不再增加，他唯恐这会对全国的民心士气有所影响，而且认识了这对他是一种危险，因为如果他让人民知道曾经有多少人丧生，人民就可能比过去更加坚持地要问一下，造成了这种情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而原因之中斯大林本人的失算和错误就应包括在内。他也不愿让他战时的盟友而今的潜在敌人对苏联从这场浩劫中

斯大林政治传记

所遭受的是何等程度的消耗和削弱有所了解——甚至他的继承者都拿不定主意。十五年以后，在 1959 年全国才展开了战后第一次的人口普查。从这次调查表可以看出，战争结束时十八岁以上的一代人，即在战争中参加战争的那一代人，现在幸存的只有三千一百万男人和五千二百万女人。在幸存的人中有几百万的病弱者和残废者，当然老人还有几百万。整个一代人都遭到了灭亡，它的阴影使苏联的和平为之光泽暗淡。

为了避免全国因痛定思痛而颓然倒下，任何政策的首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战时抽调进入工业中的有几百万妇女和青少年，战后的斯大林政府还在坚持着这一做法，而且又有数百万的人被抽调。许多西方的旅行者参观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城市，有时还发出许多不符合实际的义愤，报道说，在战斗刚结束的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正在从事艰苦的劳动的老年妇女，只靠着一双手就去清除广场上和街道的废墟。事实上，在建筑业里，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劳动力都是妇女；在更适合于妇女的经济部门中，她们提供了几乎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的劳动力；在城市经济中，妇女平均所占的比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一；在农村里有百分之五十七的是妇女。斯大林政府抛弃了一切限制雇用青少年工人的法律规定，战争爆发前不久实行的每周工作时间不得低于四十八小时的规定现在仍在实行，还实行了严厉的工作纪律，工人们稍有违犯就有被送到集中营去的可能性。只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才使在和平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城市的就业工人增加了近一千二百万人，因而与 1940 年相比 1950 年的工人和雇员人数增加了八百万人。任何人都不享有自由选择或改变工作的权利，国家继续拥有了指导劳动的无限权力。最后，斯大林仍对“小资产阶级平

斯大林政治传记

均主义”表示反对，提倡斯达汉诺夫竞赛，采用不同的工资率和计件工资，使收入的差异得到维持甚至是扩大。

人民如何看待他的严格要求，这是很难说清楚的；要说清楚这些要求中哪些是因为国家需要而提出的，哪些只是出于他的专横，也是很困难的。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苏联人的性格中，共同存在着英雄般的无畏精神和被恐吓后的驯服。莫斯科战役和列宁格勒被困的幸存者，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的取胜者，在他们返回家园后，都同样感到了他们面对的艰苦任务和困难环境。在近来的许多困难中，很多人出于对国家的悲惨状况的考虑，不得不在和平时期忍受压迫和贫困；但是也有很多人发誓不能再屈服，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使苏联成为一个更为自由和愉快的国家。现在他们发现按照这个决心来行动还是存在困难甚至都不可能。鉴于他们考虑到已成为废墟的城市和化为平地的乡村，他们不得不接受这种贫困生活和比过去已经习惯了的更大的压迫，发誓以艰苦的劳动实现国家生存基础的重建。他们确实很少能够区别出斯大林的法令中为了公共利益的有哪些和为了个人专制的有哪些。因此，最值得称赞、甚至是高尚的动机，就有时驱使一些英勇的人再次成为屈从于斯大林的仆人。这种屈从的本性和习惯是很强烈的，因为在所有的人心里三十年代大恐怖留下的印象很深。斯大林也尽一切可能地来使人们永远记住这些。他只要发现一点点对他的权威挑战的迹象，就要对此惩罚。西伯利亚和极北部的集中营已经爆满了。这些新难友都是士兵和军官，过去他们是战俘，在德国的战俘营中熬过了恐怖的岁月。他们一回到自己的国家就遭到了审问，甚至他们都没有机会回家看看，就被流放和监禁了。敌占区的很多受到敌人动员到德国去作强迫劳工的平民，他们所有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人都被认为是叛徒。这是因为斯大林命令士兵不能被敌人俘虏，而这些士兵却违背了他的这个命令；至于平民，则被认为曾经同敌人合作过。事实上，斯大林的命令是不可行的，成百上千万的士兵只好不去理会它，而且在俘虏生活中他们所受到的折磨是完全能够补偿“违反纪律”的错误了。甚至从最玩世不恭的态度出发，他们遭到的斯大林的惩罚是荒谬的，因为这使国家的人力资源被损失得更严重。不过，甚至战争还未结束，斯大林就命令把被控为叛国的少数民族全部流放，同在此以前的伏尔加地区的日耳曼人一样，克里米亚地区的鞑靼人和印古什-车臣人，都被强迫从自己的家园离开，迁移到西伯利亚的荒原上。赫鲁晓夫说过：“乌克兰人能够幸免的原因是，他们的人数太多。……”但是，其中许多同敌人合作过的、或者被怀疑同敌人合作过的人，仍遭受到了长时间的劳役。

斯大林向人民发泄着他的愤怒，不仅是为了惩罚那些犯法者，而且是为了扑灭所有新的不顺从的冲动。严厉的判刑和规模巨大的流放，目的就是为了威慑那些从战争中重返家园而具有胆识的试图在国内进行改变和改革的人。斯大林重新“根据这样的原则行事，即只对他的真正反对者进行打击还不够，他还要把产生反对者的环境彻底消除”。但是，即使他的政治警察都常常不能控制混乱和波动，无法渗透进移动着的人流，即成百上千万的重返家园或寻觅新家的复员士兵和撤退者。他们还常常不能压服由于绝望而采取的暴力行动。在曾经遭到德国占领的地区中，纳粹的宣传曾留给人们一种印象，认为俄罗斯人是让人憎恨的。在从波兰手里重新合并过来的西乌克兰，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武装匪徒在喀尔巴阡山的崇山峻岭中出没，破坏苏联重新建立的权威，并传播恐怖的情绪。乌克兰的东部也

斯大林政治传记

混乱不堪，过去同敌人合作过的匪徒和强盗出没于草原，甚至那些已经安定下来的和平居民，反犹和反俄的情绪还存在。莫斯科夸张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使边区各共和国中原来一直隐藏的地方沙文主义的程度更加严重。斯大林为了抵挡地方沙文主义的发展，多次地降低了大俄罗斯宣传的调门，但持续的时间很短。他的这种自我矛盾的态度，是同一般人民之间的分裂和他的官僚机构的分裂相一致的。他一直企图避免这种分裂的具体化，并想方设法把它弄得模糊起来。在战后革命和传统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而且还在继续强化。在斯大林主义坚固的状态之中仍然共存着“两个党”——一个对列宁主义的传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忠诚的党；另一个对大俄罗斯的骄傲与偏见，甚至对黑帮和大屠杀的传统表示忠诚的党。

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感觉到了最尖锐的不舒适。即使在一个像铁板一样坚固的集权制度之下，试图有所创意的艺术家、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必然要挺身而出同官方的国教发生冲突，都必然要表达国民感情和思想事实上的不同之处。因此，这几年里就上演了斯大林和知识分子之间相互争斗的悲剧性和悲喜剧性的戏剧。虽然很多知识分子力图遵循正统的观念，但由于斯大林主义中互相矛盾的因素所导致的紧张状态使他们感到不知所措。他们做不到按照主人神秘而无法理解的命令把这些矛盾的东西结合为一体。一个著名的乌克兰诗人会突然被认为触犯了对“地方沙文主义”进行鼓吹的罪行；有权威的历史学家会由于对沙皇征服中亚和高加索的进步性质过低评价而遭到严厉批评；一个著名的讽刺作家会被以虚无主义加以指责；哲学家们会遭受到因过度颂扬马克思主义的始祖德国的黑格尔而进行的指责；伟大的作曲家因为不重视和不敏感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于斯大林所喜爱的民歌而遭到谴责；文学评论家则被以违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的罪名遭受谴责，如此等等。知识分子们被迫在“无根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夹缝中生存。斯大林指派了安德烈·日丹诺夫，即政治局成员、列宁格勒负责人对理论家的队伍进行整顿和对“失去方向者”进行惩罚。日丹诺夫对文学和艺术进行审查的短时期，被知识分子看成是被迫忍受的最坏的惩罚而终生难忘。

但是，日丹诺夫的命令只是对社会的最上层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下层的农民和工人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如果不是战争带给他们如此深的鸿沟，他们也不会是这样的。在三十年中，苏联人民由于战争、清洗、内乱和饥荒，多次丧失了最积极、智慧和无私分子，丧失了或许会致力于捍卫革命传统以反对独裁专制的人们。现在中年和老年人占据了工人阶级的一半，他们经历丰富，遭到的磨难也很多，从而战斗性被耗尽了；另外一半是青少年，他们的理解力和经验都不强，还形不成自己的政治思想。在战争中丧生的一代不能再讲话了，这就使得整个阶级的觉悟像被一个棺罩封住了似的。农民们甚至更沮丧和消沉。由于受到恐吓，也致力于最基本的生活物质条件的重建，广大的人民群众抛掉了所有的政治抱负，单单考虑自己个人的生活。丧失年轻、成熟和精力充沛的一代人还产生了另一个后果，这是很少被人们提到的。由于二千一百万男人的丧生，使得性别平衡产生了亏缺，深刻影响了社会中一大部分人的家庭关系和性生活，这是人们用语言所难形容的。总之，这种国家的生态失衡，是造成心理上的动荡和社会政治上的后退的另一个原因。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这就是冷战刚开始后不久的几个阶段中苏联的情况。1946年3月，温斯顿·邱吉尔在他众所周知的富尔顿演说中提出了关于“共产主义第五纵队”“对于文明的危险和挑战不断增加”的警告，说这种危险会导致人们“返回中世纪和石器时代”。他说，没有人知道，“苏联和它的共产国际会计划将来干什么，或者它们对外扩张和使人改变信仰的倾向毫无止境”。当邱吉尔要求美国维持在核武器方面的优势和给予东欧人民反抗共产主义支持时，立即造成了全世界的惊惶和恐惧。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大脑中出现了红色游牧部落突袭西方自由人民的幻觉。普通的苏联人民也感到“原子弹在午夜以前就会扔到他们的头上”。

斯大林由于力量不够强大，就决定表现出自信、镇定和强力，以把对方吓回去。由于英美施加了压力，他已经撤出了波斯北部，这是根据同英国的战时协议他的军队曾经所占领的。他在土耳其海峡也没有获得一个海军基地，这本是俄国的西方盟友经常在战争中许诺给它、而在和平时期又拒绝给它的一个奖赏。现在看来，它的盟友正在试图把苏联在巴尔干和东欧的势力给予削减和清除。1946年夏，巴黎和会成了一场控制多瑙河盆地的政治战。在外交上斯大林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而且获取胜利。因为实际上苏联军队占领着这些地方，而西方的外交对响应邱吉尔的好战叫嚣还没有做好彻底的准备。9月间，邱吉尔公开号召组织一个与过去相反的同盟，敦促“德意志民族”结束互相斗争，并主张当德国和法国“异常而动荡共居于美国原子弹的保护下”时，形成一种“伙伴关系”。甚至此时，斯大林还答复说，他认为，苏联和前盟国之间“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削减，甚至能够增加”。为了反驳邱吉尔对“共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产党扩张”的谈论，他向西方承诺：在“一个国家内”不仅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甚至建立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也存在。1947年初，他还拿不定主意是否结束东欧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他在那儿对政府里的非共产党人还能容忍，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资本家的利益。在同西方国家达成关于同巴尔干国家的和约和同意大利的和约的协议之后，他企图也能够同它们达成在德国问题上的协议。这个问题被列入了1947年3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的议程中。

这次会议开始后才两天，达成协议的希望被一记打击给破灭了。杜鲁门总统在3月12日向两院联席会议宣读了一个咨文，它就是后来所谓杜鲁门主义的文本。这是美国关于实行冷战的正式宣言，而过去冷战一直被断断续续和没有声明地进行着。此时正是希腊危机发生之际，那儿已经进行了两年半的内战，由英国资助和支持的保皇派政府没有力量实现对在全国进行战斗的共产党游击队的胜利。英国已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没有力量再进行干预，并正在做撤退的准备，于是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正在修补此缺口，为使希腊不会屈服于共产主义做出保证。如果仅是这一点，美国的决定倒不会使斯大林感到惊慌，因为在雅尔塔会议时他就对希腊问题不再干预了，对希腊的起义者他既不帮助也不鼓励，甚至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帮助希腊还大为恼怒。但是，杜鲁门总统还谈到对苏联觊觎土耳其海峡的基地表示反对，并武装和资助土耳其人。而且，他还宣布，他的政府从此以后将支持任何抵抗共产主义的国家，而且抵抗共产主义是几乎所有国家的义务。因此，美国政府就承担了义务，对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共产党革命进行干涉，并事先使苏联政府处于这种革命的挑唆者的境地。

斯大林政治传记

影响很快就表现出来了：在一片互相责难声中，外长会议散了。在几个星期中，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被排挤掉，它们本来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在政府里以驯服的副手自居，而且致力压制两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在排除共产党方面美国的影响起了决定性和积极的作用，这早就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了。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很快就提出了他的计划，美国向一切正在为克服由于战争而造成的混乱和贫穷而斗争的政府给予经济上的援助。这个计划甚至都深入了东欧的共产党政府。斯大林肯定是犹豫了很长时间，他在6月底以前派莫洛托夫和一大批专家到巴黎去，弄清楚这个计划提供给苏联的可能会是什么利益。从结果发现，只有先起草一张经济资源的资产负债表，苏联方才可以得到帮助。在苏联专家看来，美国附在援助上的条件，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和东欧政府的工业国有化将会产生阻碍作用。尤有甚者，现在美国已经决心恢复西德的经济，而对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向德国提出的赔偿要求置之不理。

斯大林必须要拒绝这些条件。他拒绝向西方提交苏联资源的资产负债表，因为其中一定要泄露苏联让人吃惊的衰竭和他连自己的人民都要对之保密的人力的缺乏。他不仅企图掩盖苏联的弱点，而且还担心美国的经济渗入东欧甚至苏联，可能对当地的一切反共力量产生激励作用和促进反革命的活动。他决定不让西方插手东欧。他的行动虽然是前后一致的，但又很突然和笨拙。他简单地对美国的提议进行了拒绝，而对于美国的条件是一切反资本主义政府所无法接受的却没有指出来。他急于要把自己地位的软弱性加以掩盖，就以一种进攻性的粗暴态度行事，因此西方的大多数人认为，他不仅是拒绝了援助，而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且还把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世界又赶到了新战争的边缘，从而遭到普遍的反对。

苏联的经济贫乏和美国的巨大财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得苏联在那些年里被阴影笼罩，并使斯大林据此确定了自己的政策。美国政府用它的经济力量向反共运动提供援助，这比它的军事干涉行动更重要的多。不过，杜鲁门主义也很快地产生了军事后果。美国的核垄断，使得这个主义中所蕴含的战争威胁是难以想象的。如果这种威胁在事实上还不存在，一部分原因是，要号召西方的人民来反对苏联是有困难的。西方的人民不会忘记，就在不久之前，他们的政治家还对苏联盟友作出了令人作呕的吹捧；而且他们自己对于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的捍卫者的钦佩之情还有所存在，对于他们在东方对希特勒部队形成牵制从而解救了西方，还心存感激。因此还需要一些时间，制造一系列危机、恐吓和警告，使人们认为共产主义对世界和平造成了威胁，才能使西方人民转变情绪，使他们转而对苏联进行反对。这时，美国已经进行复员，它的人民提出了把部队从欧洲撤回的强烈要求，而它的外交家和将军们又指望着核垄断，向他们承诺在同苏联对峙中可以维持长时间的优势。美国假定在近期苏联不能打破这种垄断，一定会让步于美国的压力，这也是杜鲁门主义的基础。斯大林则决心花费一切代价尽早地把美国的垄断打破。但是在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之前，他把军队从一千一百五十万人减少到三百万人以下。他从1948年开始，又对军事编制进行了扩大，到五十年代早期达到了五百五十万人以上。这种动员给苏联的经济和人力会带来明显可怕的负担。但是，在常规武力上苏联的优势，是斯大林唯一可以应付美国核优势的办法。他暗示苏联存在入侵西欧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可能性，作为一种反威胁，来抵挡每一种可能对苏联进行核攻击的威胁，而侵入欧洲是北大西洋联盟各国没有办法抵挡的。因此，西方为杜鲁门主义辩护而使用的那个妖怪——红色游牧部落对欧洲进行威胁——看来就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了，但这种结果只是由于宣布了杜鲁门主义才引起的。斯大林并没有使自己的军队越过已经达成协议的欧洲分界线的意图，但是一种相对的力量均势已由他所建成，或者用后来变得很时兴的说法，一种威慑的均势。这种均势在初期阶段，是通过两种不同的军事力量因素所实现的，即一种是核武器，另一种是常规武器。

凭借军事力量的保护，斯大林在东欧的革命进程得到了加速。如果美国是通过经济力量使华盛顿对它的西欧盟国实现了间接而谨慎的政治控制，那末苏联只是凭借直接的政治控制和完全的暴力就实现了自己的目的。甚至在东欧马歇尔计划也引起了反响，这表明美国的渗透在该地区也是很有利的。匈牙利、波兰的残余分子，东德国内的资产阶级，以及大多数的个体农民，祈祷苏联和共产主义都被原子弹摧毁。工人阶级正处于饥饿状态之中。反革命尚能集合起数量相当多的力量。当然，共产主义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受到人们欢迎的，但在东欧的其余部分，它的力量是很弱的，至少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站住脚的。这时斯大林决定彻底地来解决这个问题。当共产党人被意大利和法国政府排挤出去时，他也认为必须把东欧各国政府中的反共分子排挤出去，并对他们进行镇压。他在苏联势力范围内他建立了一党制。他派出行政专家、全权代表、警察代理人 and 将军去对当地的共产党和政府进行指挥和监督，并把单一的纪律和单一的政策强行它们遵

斯大林政治传记

守。

当这一政治改组进行的时候，他决定复活被他在 1943 年解体的老的共产国际的残余部分。他在 1947 年 9 月成立了所谓的共产党情报局，目的是统一东欧共产党的行动，并促使西欧共产党的政策实行新的转变。如同在共产国际时代，他自己仍然在幕后隐藏。马林科夫和日丹诺夫被斯大林派去指导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出席的只有苏联、东欧以及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斯大林并不真正希望把共产党情报局变成世界革命的真正工具，所以中国和亚洲其他党没有被要求参加这个新的组织。在苏联“势力范围”以外，他所着重关注的是调整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政策，以满足他在外交上的新需要。日丹诺夫在成立大会上，严厉批评了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行动缺乏创新，同本国资产阶级合作，顺从于天主教和社会民主党。在莫斯科看来，在伟大同盟存在的时候是可以赞美这些政策和态度的，但在冷战中这些政策和态度就是有害的了。

可笑的是，正是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和卡德尔对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新路线表现出最热情的鼓吹。卡德尔警告意大利人和法国人说：“工人的党一旦陷入议会主义，那一切就都完了。……一种修正马列主义的新倾向，一种新的偏向已经被我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所发现……”卡德尔解释说，这种新的修正主义反映在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希望争取一个和平议会行动的新时代以及他们对戴高乐和梵蒂冈的奉诚中。他继续说：“意大利共产党对美国政策的意义理解的太慢。因而它提出这样的口号：‘华盛顿和莫斯科都不要。’但事情很明显，离开莫斯科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吉拉斯甚至更坚定地说：“美国有统治世界的野心这是问题的本质。这构成的威胁……甚至比

斯大林政治传记

法西斯主义更大……法国共产党向反动派一步步地退让，对于被解除武装和抵抗运动被解散他们都容忍了。”但是共产党情报局向它的西欧成员并没有提供任何革命的计划，在1944——1946年它们失去了自己的机会后，至于这一点现在已经是太晚了。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仅被期望去抵挡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但是即使它们在这一点上，所做的也是缺少力量和始终不一的。

与此同时，斯大林使东欧各国进入了戒严状态。凭借着诸如苏罗、苏匈和苏保联合股份公司等特殊机构，这些国家的经济被他控制了。波兰、匈牙利、东德、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把煤、铝土矿、机器、小麦和石油运往苏联，或者是作为赔偿、或者价格压得很低，而这些国家的人民却处于匮乏和贫穷之中。由于各反对党已经被逐个地镇压，没有人能代言人民的不满，任何抗议的怨言和呼声都被恐怖统治窒息了。苏联的技术人员和行政官员对东欧的工业进行着监督，苏联的将军指挥着它们的某些军队，它们的保安部队也被苏联的警察所管理。

1948年初，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惟一没有遵循这个新模式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从1945年以来，莫斯科就坚持拒绝捷克共产党采取任何革命行动。不过，结束战争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确实是处于革命形势之下，它的工人阶级已经武装并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的强烈要求，在自由选举中它的共产党得到了近五分之二的票。捷克人抱有真诚的亲苏情绪，这种情绪根源于民族传统，而且从慕尼黑危机以后，对西方的嫌恶，促使这种情绪就更加强烈了。但是，在几乎三年的时间里，它的政府中的总理虽然由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担任，而国家却依然处于资产阶级民主之中。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仍旧是爱德华·

斯大林政治传记

贝奈斯，扬·马沙里克担任外交部长，政府依赖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的议会投票。在冷战中，这个政权已经无法再生存下去了。贝奈斯和马沙里克竭力希望维持中立态度，但本质上他们是“西方的人”，并且他们热衷于接受美国提供的援助这已经表现出来了。

显而易见，这儿存在着斯大林防御的一个缺口，捷克共产党人必须把它修补好。在1948年2月的最后一周，他们进行了拖延已久的革命，并获取胜利。不同于其它的东欧国家的社会大变动，这次革命带有自下而上的革命迹象，虽然它选择的时机是适应斯大林的要求的。共产党人凭借来自大部分工人的支持，使得这一革命由他们独立的得以完成：只通过使用武装的民兵在街上游行，他们就阻止了任何的反对行动。苏联的占领部队早已从这个国家中撤走，仅仅由于担心他们返回来，就完全可以使资产阶级政党气馁了。哥特瓦尔德甚至还遵守议会的游戏规则，那些本来希望防止或阻碍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部长，突然把自己的职务辞掉了，并离开了共产党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哥特瓦尔德和他的同志们然后想办法诱使那些态度不坚决和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他们组成了议会的多数。马沙里克和贝奈斯看到群众给予的革命支持，被弄得不安和绝望。几天之后，马沙里克被发现已死于外交部窗下的过道上，可是一直让人不明白的是他自己跳窗还是被人推下。

这一大变动刚刚结束，斯大林就着手对他防御中另一个更为危险的缺口进行处理。在大国的冲突中，任何地方都比不上德国的冲突激励，而在德国的冲突中，任何地方都比不上柏林的冲突更加尖锐而集中。在那儿，苏联的贫困和美国的富裕形成鲜明对照，引起了每个人的注意。当英国和美国已经给西德

斯大林政治传记

提供经济援助时，苏联却仍然从东德吸取资源以满足自己重建的需要。对于宣传反对苏联的人们来说，把这种战争后果、这种长时间而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看作是考验敌对的社会政治制度。他们宣称，西方资本主义带来了自由和繁荣，而苏联共产主义的生活只能靠奴役和掠夺。看来任何人都不会比德国人更愿意相信这种笨拙的宣传了，因为对于不得不付出的赔偿和遭受苏联的羞辱他们感到极度愤怒，现在迫切地希望加入西方阵营而逃避战败带来的最坏后果。斯大林也迫切希望结束苏联不得人心和经济衰弱同美国具有吸引力和富足这种长时间的对照。虽然已经建立起了横过德国的地方的“铁幕”，但是在距离铁幕一百二十五英里处的帝国旧都，仍然存在着这种对比，并且越来越显著、厉害和具有爆炸性。斯大林和苏联大部分的人民看到在这座城市中苏联的实力和威信不断降低和遭到奚落，一定是非常恼怒的，因为这座城市是他们独立占领的，而且在盟国对共管德国进行考虑的那些遥远的日子里，他们对西方盟国进入这座城市已经表示同意了。

现在共管的迹象已无影无踪了。斯大林坚决不允许西方国家对东德的事务享有一点儿发言权，正如西方国家拒绝他参与管制西德一样。美国、法国和英国已经组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由阿登纳的公开反苏的和保守的政府管理着。这时，原先关于西方派代表和卫戍部队进入柏林的目的就没有了意义，现在柏林被西方国家当作在敌国领土内的一块飞地——甚至在十年以后斯大林的继承者对这一问题仍是十分关注的。这一问题终于在1948年的春天爆发了。西方国家迫切希望加速它们占领部分的经济恢复工作，提出要实行货币改革，使用一种新的马克来代替已经贬值的旧马克。德国的分裂由于这一改革而

斯大林政治传记

永久化，柏林的货币问题马上出现了。苏联坚决拒绝这个城市在金融上同西德合并起来，而西方国家也坚决拒绝它在金融上被东德所同化。如果柏林同时流通两种货币，一定会造成长期的冲突，因为西方不断增加的货物必定为稳定新马克提供了保障，而东德货币的价值就要由于货物的日益缺少而受到损害。为了避免这一点，斯大林冒险采取了一种彻底绝望的赌博。他命令对英国、美国和法国在柏林的占领区进行封锁，所有通向西柏林的交通要道，不论陆路还是水路，很快就被停顿了。

斯大林通过这次封锁希望把西方国家从柏林赶出，至少也要劝使它们放弃利用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结盟来反对苏联的计划。但是，第一个目的并没有通过封锁而实现，其结果只是使西方国家同前敌国联盟的过程加快了。在这场赌博中，斯大林再一次凭借虚势吓人，但他输了。他威胁着要使柏林的工业陷入瘫痪，要以饥饿迫使它的人民和驻军屈从。美国则要以装甲列车开路相威胁，但他没有被恐吓住，他对美国将军们要向莫斯科发射原子弹的大声恫吓毫不顾忌。他建议为赢得民心而向柏林居民供应食品，同时他又挑拨英美对此建议进行拒绝。他准备一直封锁下去，以使所有的抵抗受到削弱。他坚信时间对他是有利的，封锁十分严密，他的对手没有办法打破它，因为他控制了通向这座城市的一切道路，被他遗忘了的地方是，按照盟国内部的协议，西方国家还控制了一条狭长的“空中走廊”，从它们德国的各占领区抵达柏林。它们利用这条走廊就能供应柏林的居民和驻军，甚至还可以满足它的工业需要的供应。他未曾顾及到英美的能力和西方的空中力量，英美不同于苏联，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是长时间进行空中作战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美英在 1948 年 6 月 28 日开始了对柏林的“空运”。这个行动是斯大林未曾想到的，他也还没有力量不允许他的对手使用空中走廊。为此，他亲自同西方驻莫斯科的大使们进行商讨。后来他又打破了这些谈判，坚定地相信由于冬季的开始，这个城市将由他来支配。但是，西方的空运日益扩大，在那几个关键的月份里大量的进行食物、原料和燃料的供应。封锁没有成功。从开始至今几乎一年的时间，最后由于联合国小心翼翼的谈判而达成协议，这一封锁结束了，柏林恢复了现状。

但是，封锁的广泛影响却是依然存在的。当柏林被封锁的时候，事实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经存在，已经宣布了北大西洋联盟的成立。封锁给反苏宣传提供了材料，美英人民被斯大林的行动所激怒，从而热情地称赞他们的政府使联盟逆转。因此，对于杜鲁门主义所要事先对威胁和危险的防备，斯大林的封锁似乎为此提供了事后的证明，而且冷战的气氛被加剧了。

正当西方资本主义从斯大林的悲惨遭遇中得到信心和力量的时候，在东方共产主义却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毛泽东的军队于 1949 年 1 月 22 日开进了北京。美国人和欧洲人对这一事件几乎毫无注意，因为他们的耳朵和眼睛里被德国空运的火光和吼声所包围。在转变命运的斗争中，毛泽东率领的游击队同蒋介石的军队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战斗。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蒋介石的军队就得到了美国武器的装备，有时美国海军陆战队还给予它支持。游击队有时好像陷入屈服的危险中，却最终挺住了，并坚持战斗。但是，在中国以外，几乎任何人都不会考虑到他们即将取得全面胜利。迟至 1948 年，斯大林还建议毛泽东同国民党讲和，就如同二十多年前向陈独秀建议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那样，而当他得知毛泽东计划全面发动攻势时，他却谴责这个计划是不现实和鲁莽的。这位世界上最大军队的大元帅对游击队是看不起的，对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可能性深表怀疑。而且，对于未经他的批准和超出他军事力量范围的自作主张的革命，都是得不到他的信任的。他还害怕毛的冒险会遭到美国的大规模干涉，从而使美国的军队距离苏联的远东边界越来越近。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展开的攻势继续深入的进行着，直到内部已经腐朽的国民党倒台。4月间，正当西方国家宣布成立北大西洋联盟时，毛的军队已经在南京举行胜利的阅兵；而在夏季还未结束之前，他们拥有了整个中国大陆。9月24日，毛宣布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一个共产主义和全世界的新纪元。苏联长期的孤立终于走到了尽头，同许多人的预料相反，十月革命迟延了很久的结果和继续是在亚洲而不是在欧洲找到了。

我们将在以后看到这一事件对斯大林主义的命运是怎样影响的。它目前的影响则是对斯大林对付西方国家的力量给予了增强，西方国家突然发现在亚洲自己被从侧翼包围了，愤怒和进行反叛的呼声正从那儿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中发出来。斯大林在欧洲深受挫败，却能在东方施展实力。而且一种奇怪的巧合，使得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个星期里，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斯大林主义是布尔什维克孤立的集中的体现和产物，现在革命的传播使得它赖以繁荣的某些环境被摧毁了。新的革命国家的巩固，一定要损害斯大林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惟一的权威。众所周知，这种权威是在意识形态和强迫的双重基础上得以建立的，依赖于一切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自发地把苏联视为

斯大林政治传记

“工人的第一个国家”而同它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把自己的愿望放在斯大林存在的从属地位，也依赖于斯大林为了消灭其反对者和批评者而采用的那种强制和压力。这种双重的基础现在被打碎了。外国共产党人已从遭受压迫的鼓动者一变为各国的统治者，在他们看来不会像从前一样长时间地被莫斯科的圣言所吓住，也不会轻易被欺侮了。在道义上他们不再感到有责任，为满足苏联真实的或装出来的需要必须去牺牲自己的愿望和雄心。他们已经不断地提出自己的抱负和需要以及他们进行革命的国家所要取得的利益。在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创造出“多中心的共产主义”这一词以前的很长时间里，“多中心的共产主义”时代已经悄然地开始了。

斯大林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目的是为了重新训练和重新集中各国的共产党，但情报局刚刚成立，斯大林的权威在这个新组织中就遭受到了南斯拉夫成员的挑战。我们知道南斯拉夫代表在成立大会上十分热心地帮忙，他们对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政策的最新转变给予了支持。直到1948年以前，铁托和他的同志们还被认为是一切欧洲斯大林主义者中最狂热和最教条的分子。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名声是根据他们过去的记录而出现的。在大清洗的年代，铁托在莫斯科被提升为党的领导是有原因的。在清洗中当时党的前领导人已经被消灭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铁托因其偏执劲头和正统的观念成为模范，得到了莫斯科的信任。格柏乌在西班牙内战中消灭了很多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战士，这其中铁托的行为并不比斯大林的其它傀儡好。但是，在本国的革命武装斗争中铁托已经实现了从一个傀儡到一个人和领袖的转变。斯大林意识到了这一变化，所感到的怀疑日益增强。他对南斯拉夫人提出了进行“反法西斯的和爱国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主义的”战争的要求，不要搞社会革命，但他们对他的命令并不服从。他谴责他们对苏联同美英的联盟产生了危害，并“在苏联背上插了一刀”。战争结束以后，这种不和更深了。南斯拉夫人极端激进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是极深的，他们正在从英美的手中和在意大利的反对下想方设法地把里雅斯特合并过去。斯大林担心这会使他同西方国家的冲突有所加剧，从而压制了南斯拉夫人。于是他们就对他的“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进行反对。他们对斯大林的将军们和特使的傲慢态度极为不满，他们对苏军在南斯拉夫的不规矩行为进行抗议，当斯大林的间谍机关在南斯拉夫警察和军队中征募间谍被他们发现后，他们不禁勃然大怒。斯大林被这种大胆的反抗所激怒，决定像整治所有的共产党反对派一样整治他们：他把他们看作是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叛徒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他把铁托主义斥责为一种异端。他吹嘘说：“只要我采取一丁点儿行动，铁托就要完蛋。”南斯拉夫人仍然忠诚于斯大林，斯大林的画像被悬挂在会议上和各种场合。但是，对他们的谴责他们表示抗议，并积极地捍卫自己。斯大林于是对其进行了军事和经济封锁手段，其残忍程度同封锁柏林一样，但也同样无济于事。

在斯大林的一生中，这还是他头一次对一个共产党反对派不知所措。地位远在铁托之上的异端派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未达成的事业，铁托却干成功了。他所领导的国家、军队和警察使他免受斯大林的迫害，而他由于蔑视莫斯科而激起的民族主义热忱，对他的安全进行了进一步的保障。他的行动使斯大林的权威和声望遭受了重创。许多东欧的共产党人发现铁托的行为是值得效仿的，他们对于斯大林的不满远大于铁托对斯大林的不满情绪，而且他们也一直期待着能够坚持自己的民族尊严，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以便使本国人民不再把他们看成是苏联的傀儡。即使在斯大林集团内部中，也不乏对南斯拉夫持同情态度的人。

斯大林恐惧“铁托主义”的传播，就采取了血腥镇压办法来进行反击。他扬言，共产党人如果对铁托主义有同情倾向或同贝尔格莱德保持联系，就被视为是反叛。当莫斯科撤出一切驻南斯拉夫特使和顾问时，东欧各国政府也跟着这样做。斯大林还鼓动它们在南斯拉夫边界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但是，要压制对铁托主义的同情并非易事，因为铁托主义所体现的并非是一种新的理论或纲领，而是勇士们的一种基本的冲动，他们坚持本民族和共产党的尊严，以抵制任何大国及其领导人过分利用他们的忠诚和对他们进行地粗暴侮辱。这种冲动存在于一些有国际主义思想的党员和“民族共产党人”当中。斯大林的特务们在暗中监视着他们，并谨慎关注着他们之中可能表现出的“铁托主义”倾向。

判断这种倾向的标志就是共产党人喜欢商讨“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合法性。斯大林本人也在战后的头几年里谈论过这一话题，那时他还在试图压制反对苏联霸权的东欧各种民族主义反对派。南斯拉夫人目前就利用这个口号来攻击他。在每一个东欧国家的首都都存在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的著名人物，如克里门蒂斯、哥穆尔卡、科斯托夫、拉伊克等等，他们从表面上接受了这一口号。共产党情报局所采取的新方针并不能满足他们。他们以前遵循“温和的”、“右翼的”和民族主义的政策，而这是在最初的几年当中斯大林鼓励他们这样做的。甚至在斯大林不再固守这一路线之后，他们仍然坚持那些政策。这就是他们灭亡的症结所在。他们被指控同铁托主义勾结，因此被称为破坏者和间谍而送进监狱，受到严刑拷打，公

斯大林政治传记

开认罪，就如同在莫斯科举行的审判中的被告承认自己的罪行一样。十多年过去了，1936—1938 的年那种恐怖情景又在东欧的几乎每一个首都重新出现了。1949 年 9 月，审讯和处决了拉伊克和一些匈牙利的领导人；12 月，科斯托夫和一些著名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也没有逃脱厄运。在随后的三年里，混乱的公开审讯和大规模的恐怖，弥漫在整个东欧，唯一不同的是，像哥穆尔卡这样的异端分子却一丝尚存，在斯大林死后又光荣地重现。这一清洗在苏联内部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政治局委员、国家经济计划的负责人、战时曾管理国家经济资源的沃兹涅辛斯基，俄联邦的部长会议主席罗吉昂诺夫，1941—1943 年保卫列宁格勒战争的组织者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以及所谓列宁格勒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都成了殉葬品。在这一事件过去了二十年后，人们仍搞不清楚斯大林为何要怀疑这样一些人。是不是他们不赞成斯大林的某些政策，还是他们卷入了斯大林手下官员们所进行的杀气腾腾的争权斗争。他们的审判和处决是不为人知的。在这些年期里，斯大林已不敢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再举行那种当众服刑的审讯，而在布达佩斯和索非亚却仍进行着这种表面性的审讯。

当斯大林正尖锐地批判铁托主义时，一个更为有力而危险的异端在北京崛起了。中国共产党人为突破斯大林的阻挠夺取政权而深感骄傲。作为中国独立的创建者、作为包括对人类和未来都发生影响的革命的发动者，他们意识到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他们敬仰毛泽东，把他尊崇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战略家、一位天才的领袖和理论家。虽然他们过分地夸大了毛对理论的贡献，但他确实是继列宁和托洛茨基后的最伟大和最有创造性的革命实践家。他是比斯大林更有个性和更有胆量和实干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人。但斯大林却蔑视他，从来没有夸奖过他一句，而且还对他的非正统行为持怀疑态度。早在 1927 到 1928 年间，当毛首次把其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入农村时，斯大林操纵的共产国际就对这一行动持否定态度，并把他从中共中央委员会中降职。即使在他复职以后，在毛泽东加强了红军和延安政府的政权地位以后，莫斯科对他仍持令人不解的保留态度。他争论说，中国的革命有别于俄国的革命，它必须以农村为基点，而且革命的重心必须从农村到城市而不是从城市到农村。而莫斯科认为这真是歪理谬论。为了避免同莫斯科产生根本的分歧，毛披上了斯大林主义正统的外衣。斯大林也觉察到毛这一手法的复杂性。在其利益重大的国际政治领域中，他原本是不允许任何共产党有这类事情发生的。但是直到 1949 年，中国在斯大林的头脑中也并非占据首要地位，而且他眼中的毛泽东似乎是堂·吉珂德式的，但表面上看来又是如此的温顺，所以并未把他排除在外。

虽然这样，中国的游击队在其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却从来没有得到苏联的任何形式的援助。他们对此深表不满，但却把自己的失望隐藏起来。自从战争的号角吹响以来，他们对斯大林的行径又有了新的不满和仇恨。日本投降后，苏联军队占领了满洲，仿佛它是被征服的敌国领土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人们仍有这样的印象，日本把中国的广大地区分割出去，并把它置于其扶植的傀儡满洲国的统治之下。1935 年斯大林把苏联接手的中东铁路卖给这个王朝，以达到它与日本和解的目的。后来到了 1945 年，他又收回了中东铁路，而未承认中国对它的所有权。此外，他还延长了对满洲两个海港大连和旅顺的控制期限。所有这些都严重挫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后来他们又愤

斯大林政治传记

恣地看到，苏联把满洲工业当作它的战争所得，把许多工厂拆卸后运往苏联。日本人曾企图剥夺中国本部的工业，但为了自己的便利也曾对满洲重工业的发展产生过促进作用，因而中国人把满洲视为全国发展经济的工业基地。毛的政府被迫向莫斯科多少传达了关于苏联行动所引起的义愤，它迫切地想收回苏联已经占用的机器和设施。

这就是导致严重不和的起因，也是预示了十年以后斯大林继承者感到头疼的冲突的先兆。任何轻率的行动和表示都会使它马上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谨慎而冷静地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宣布成立，他就邀请毛泽东到莫斯科进行访问。

1949年12月，在克里姆林宫，他隆重地接见了毛，表示了对毛十分的友好和尊重。这正是大肆搜捕铁托分子和列宁格勒集团的那些日子，仅仅在几个月前沃兹涅辛斯基失宠，而在索非刚刚开始了对科斯托夫的审讯。但是在他这种大肆进行迫害的气氛中，对于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中一个真正危险和伟大的异端，斯大林却轻松地装出一个和善的主人和英明并乐于助人的老同志。他已经领受了从对铁托的错误中得出的教训。他明白自己不能对毛动一动“小拇指”，更不用提“大拇指”了。他表现出一副愉快和亲切的样子。

但情况还是很微妙的，斯大林被迫进行了侦察，而且他对自己放弃在满洲的战利品是极不情愿的。他拖住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从容不迫的解释，慢慢地进行商讨。他还经常用国宴和私人谈话将这些谈判打断，以表示两个革命领袖之间的彼此信任。但是在私人接触之间，这两个人日益清晰地意识到他们在性格和地位上差别很大。斯大林现在已经是一个完全的“国

斯大林政治传记

际政治家”，一个胸前戴满了勋章的大元帅，一个庞大的官僚统治集团的首脑，就像过去所有的沙皇一样同人民脱离了。毛泽东仍然保持着这二十年来他在窑洞和山沟中对当代历史中最长的内战进行指挥时的那种神态——那几年中他一直在贫苦农民中生活，同他的游击队一起进军和战斗，不允许在衣着和伙食上搞特殊、在官兵关系上有一丁点儿疏远。如果说斯大林是在马克思主义中添加了许多东正教和沙皇制度的东西，那末毛泽东则是通过东方的扎克雷起义和孔夫子的传统文化遗产所表现出的列宁主义。两个人都心有城府，但由于在性格上毛泽东比斯大林更具有人道主义和在思想上毛更具有教养，因而在这方面有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对毛泽东来说，中国革命是他一生的追求。而斯大林认为，这个革命却是他的一笔数额巨大的意外之财，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危险。在冷战的高潮阶段，他突然找到了一个伟大的盟友。在那之后，中国将对苏联极长的亚洲边界进行保护，使他能够把自己的军事力量集中在欧洲。中国的新统治者们虽然有一天可能要公然反抗莫斯科，但是他们在短时间之内对斯大林还有依赖。他们不仅指望收回满洲的工厂，而且还指望在经济、外交和军事上得到苏联的援助和保护。

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最终达成协议，并于1950年2月14日两国签订了一个正式盟约。斯大林开始准备归还他的“战利品”，并把中东铁路最晚不超过1952年底交还中国。他还退让了旅顺口，这是他同罗斯福通过秘密协议确定的，他曾以此作为对在1905年俄国败于日本的报复和一种历史正义行动而进行称颂。对于有战略重要性的大连港和满洲的交通线他仍然继续控制着。但是他承诺将不遗余力地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援助，就这样避免了他同毛泽东之间的冲突以及两党和两国政府之间的敌对。

朝鲜战争在仅仅四个月之后就开始了。在许多人看来，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对此一定进行过策划。一段时期以来，朝鲜共产党的北方部队同反共的南方部队之间沿三八线出现了一些磨擦和冲突。1950年6月，金日成，即共产党政府的首脑指控南方的李承晚政府进行侵略，于是下令展开一场越过三八线的总攻势。在战争初期北方的军队迅速地获得胜利，这表明这是一次经过充分准备的攻击。其准备之好，似乎证明关于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事先的确商量过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甚至进军命令就是他们做出的。毛泽东赞成这种冒险是在意料之中的。对他来说，全朝鲜由共产党统治，似乎就是中国革命的自然结果。如果实现了这一目的，就会使所有的敌对力量不能像过去那样在未来将朝鲜作为入侵中国的基地。斯大林的动机则比较模糊。他是迫切希望防止同西方发生武装冲突的，而且他在朝鲜拥有很少的一部分战略利益。他的行动很可能是立足于他同毛泽东的潜在竞争。不久前他如此丢脸地错误地判断中国革命的机会，所以十分希望消除他在政治上的胆怯印象，从而证明他同毛泽东一样是有胆识的革命战略家。

风险似乎是不重要的。苏联占领军从北朝鲜撤离已经近两年了，美军到1948年底也从南方撤退了。而且，美国人曾表示在朝鲜他们并无要去保卫的重大利益，甚至还暗示，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是“能够被牺牲的”。因此，斯大林有理由认为，金日成发动的是一场局部战争，存在转变成为一场重大的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当美国做出实际干预的决定并号召联合国也这

斯大林政治传记

样做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是错了。当这一争端被美国提交安理会时，斯大林犯下了另一个更大的错误。苏联在安理会中的代表是常常使用否决权的，甚至在一些零碎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所以利用否决权来阻止美国的行动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这次苏联代表却不是这样做的，而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在关键性的会议上威胁性地退出了安理会。于是美国和它的盟国就对苏联代表缺席的机会进行了利用，通过了一项决议，使联合国的一切会员国都有往朝鲜派部队去同共产党交战的义务。于是局部战争变成了一场具有世界性的大灾难。在三年的过程中，它一直有着要变成美中之间一场正规战争的威胁，甚至要发展成一场世界大战。由于错误地导致了这样的形势，斯大林只得实施了预防措施，他虽然武装了北朝鲜和在三八线同美军对抗的中国“志愿军”，但却拒绝苏联军队参战，而且还一直大开着谈判的门。

斯大林统治的最后三年是笼罩在朝鲜战争和它的危险性中的，他的地位仍然是不牢固的。在距这次战争爆发不到一年的时候，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就爆炸了；而美国早在五年多前已经开发出来核武器了。美国在远东的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叫嚣着要对满洲进行轰炸；根据新近缔结的中苏同盟条约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有出来援助中国的义务。现在斯大林已经不能像前几年一样指靠美国人民的和平主义和对苏联的同情来避免战争的扩大，因为当时美国人民的情绪已经变得充满了敌意。而且即使美国在欧洲的自由行动因为卷入朝鲜战争而遭到阻碍，斯大林仍必须保持常规军队的动员，促进核工业的超速发展，使苏联的经济以临战的水平为基础，并在苏联和东

斯大林政治传记

欧加强戒备。他的某些重要目标得以实现了。对西方的压力他坚定地抵挡住了，使美国不敢使战争扩大；苏联的核工业飞速发展，第一颗氢弹在 1953 年生产出来了，只比美国稍微迟了一点。在 1948—1949 年，苏联经济的基本部类已经达到战前水平，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中又有了二分之一的增加。苏联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已经加速。只在五十年代早期，城市人口就增加了大约二千五百万。大学和中学在校学生比 1940 年翻了一番。苏联的工业和军事优势基础已经从世界大战的废墟中重新建立起来了，不久就将使全世界震惊。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苏联人民生活的悲惨情况几乎仍同三十年代原始积累时期一样，甚至比那时更加悲惨。广大人民的生活只能依靠土豆和洋白菜，穿着破烂不堪，住在肮脏的茅棚里。苏联最先进的机床厂的效率与美国同类工厂一样；但它一般欠发达的消费工业却比美国的落后一个多世纪。苏联公民消费的商品，不及美国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随着城市人口的日益增多，住房问题简直难以解决。在一些首府所在地，通常是一间房子或一个厨房有几家人共同使用。政府对于人民的困境似乎不曾采取任何措施，因为重建被破坏城市工作的速度太慢；在一片贫民窟和废墟的背景的同时，斯大林又下令修建了一些豪华高贵的纪念物和政府大厦，它们装饰的典雅是无可比拟的，成为官场粗俗和虚夸的标志。

最糟糕的还是农业的情况。在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四年中，谷物的平均年产量仅为八千万吨，而 1940 年是九千五百万吨，1913 年是八千六百万吨。牲畜的数量也不及 1913 年。政府虽然没收或以半价购买了大约百分之五十的谷物，但城市人口仍处在很危急的粮食供应的情况下。城市居民每周消费的肉不到

斯大林政治传记

半磅而油脂才有四分之一磅。农庄缺乏人力、农机具、拖拉机、运输工具和肥料。集体农庄仍然是一种经济混合体，集体和私营各占一半；除了公共所有的土地外，农民拥有一些小块的土地，他们辛勤地耕作这些个人的土地，而对集体所有的土地毫不关心。政府使用严格管制的办法来使粮食供应有所保障：它对农民在每一块土地上种什么和应该收获多少都作了规定。本属简单而例行的农事活动被大批的监工变成了一场紧张的“粮食战线上的斗争”。

最后，在 1950 年，苏联的农村再次经历了大变动的痛苦，这可以被称为补充的集体化运动。有二十四万个左右的集体农庄，被合并为十二万个、最后又合并为九万三千个大型单位。在这次合并中，农民表现地十分冷淡，而没有像集体化初期那样进行拼命地抗争。但是，农业情况毫无改善，于是对下一步的打算的争论使统治集团出现了分裂。尼·谢·赫鲁晓夫建议，把农庄改组为谷物工厂，在“农村城镇”中重新安置农民。斯大林否定这个建议。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他害怕这样剧烈的变化会把国家暴露给敌人。

由于内部存在着如此繁多的混乱和弱点，外部又存在这么多的灾难，斯大林使苏联的孤立比以往更加严重了。他下达命令说，苏联人同外国人结婚就被视作犯罪，不论哪一个官员对苏联生活任何方面的琐碎材料的透露都是叛国，任何外国人所产生的对这些材料的好奇就是间谍行为。从奥地利、德国和其他国家执行占领任务后回国的士兵，都被禁止谈论他们的经历。报纸把西方的情况描述的一片黑暗，以便使苏联人民还抱有一点乐观的态度对待他们可怜的生活。所有苏联开向世界的门户和窗子都被紧闭了，在它们的后面继续进行着毫无限制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自我吹捧。沙皇俄国的伟大，被吹嘘的甚至比战争期间还要更加刺耳。历史学家对帝国征服的每一功绩都进行了极大地吹捧，每一个伤害俄罗斯帝国属国的暴力行为都被说成是解放和进步行动，被压迫民族还要感激俄国。他们对叶卡德琳娜大帝和尼古拉一世进行欢呼，把他们说成是中亚民族和高加索的恩主和保护人；而把那些为独立进行斗争和抵抗沙皇的民族领袖，描述为反动派和土耳其、英国的走狗。灌输给学生们的是这样的观点：历史是由一系列可恶的外国阴谋构成的，而总是因为他们祖先的英勇和警惕而遭到失败。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俄国是文明的摇篮，社会和人类精神中一切高贵和伟大的东西的发源地。俄国人成了现代技术中一切成就的开拓者、发现者和发明者，只是因为世界的邪恶和无知，这些成就才被归诸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或美国人。报纸中每天都挤满了奇迹般的故事，说伊凡诺夫们或波波夫们曾经最早地发明了印刷机、飞机、蒸汽机和无线电。这种自我吹嘘再加上一点就圆满了，就是《真理报》应该宣称，在第一个轮子被制造出来之前的史前时期人类曾在莫斯科河畔居住，或者干脆说普罗美修斯是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人，因为不是伟大的俄罗斯人谁还能做出这种伟大的英雄业绩来呢？

下面援引了本书作者论述“本世纪中的俄国”的一段描述：

俄罗斯被教导对外部世界进行怀疑和轻视，只称颂自己的天才，只注意自己的伟大，只谋求自己的私利，只盼望自己力量的胜利。斯大林主义妄图把其他民族创造的一切功绩都归功于伟大的俄罗斯。它声称，俄国人如果认为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过去和现在其他民族也有伟大之处，这就属于一种犯罪，但乌克兰人、乌兹别克人和格鲁吉亚人必须要拜倒在大俄罗斯脚下，否则，那也是一种罪行。

自大和排外是治愈有自卑感民族的良药，防止他们被西方文明所吸引，防止他们被美国的财富弄得沮丧和失望，使他们充满坚定的信心来接受冷战的考验。鼓动沙文主义的热度，就可视为测量这个国家战争狂热程度的标准。

由于如此赤裸裸地鼓吹民族自大，那就不用对半藏着的反犹偏见盛极一时产生惊奇了。尽管在其最好的年代里，布尔什维克政府曾反对过这种偏见，但对犹太人的敌意几乎从未削减过。反犹主义的根源很多：东正教和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的民族传统；在战时人民同纳粹主义的接触；犹太工匠和商人不适应公有化的经济，在消费缺乏的情况下，他们所从事的半违法的和违法的商业活动十分兴盛；有不少早期布尔什维克领袖人物是犹太人；即使在这些领袖人物遭到了消灭以后，在斯大林官僚机构的中层里犹太人仍有相对的重要性。犹太人经常被头脑简单的共产党员看成是城市资本主义的残留分子；而犹太人又被反共的人看成是统治集团中有影响的成员。

斯大林的态度是模糊不清的。就他个人而言，他没有受到过粗俗的民族偏见的影 响，他害怕触犯党敌视反犹的准则。在他的随从中，犹太人是有一些知名度的，虽然比列宁时代要差一些。李维诺夫担任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苏联外交部负责人；卡冈诺维奇一直都是斯大林的家庭总管；麦赫里斯担任了部队的总政治委员；萨斯拉夫斯基和爱伦堡则是奉承斯大林的人中最

斯大林政治传记

出名的。但是，当他认为方便的时候，他也会利用反犹的情绪。在同党内反对派进行的斗争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加米涅夫的犹太出身经常被他的代理人所提到——在1936—1938年的审讯中，维辛斯基就多次地提到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是没有俄罗斯民族感情的。在后来的战争期间，希特勒的宣传把这场战争大骂为“犹太人进行的战争”，说犹太籍的人民委员在这场战争中大发横财，并号召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起来反对他们。斯大林的宣传机构对此感到很尴尬，只好缄口不言。斯大林不允许他们做可以对希特勒反犹主义极不人道性质进行直接地反击，他害怕这种反击可能使人民大众认为纳粹的宣传是有其合理性的，并使人们误认为他是在起一种保护犹太人的作用，而当时他是不愿意起这种作用的。他也害怕人民要求反对犹太人，占领区中反犹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积极响应纳粹的主张，更使他相信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

但是，当希特勒的军队前进时，苏联政府曾尽力把犹太人从受威胁的地区中撤退出去，即使某些城市的犹太人对关于在纳粹占领下他们将会有何种遭遇的警告表示不相信，不同意迁移。通过斯大林的批准，一个由知名人士带头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了，它号召西方的犹太人对苏联给予支持。在军队中服役的犹太人作战很英勇，被授予勋章，甚至还获得了很高的职位。但是作为犹太人，他们的功绩却得不到表扬，因为作为一个民族，事实上他们是被遗忘了。对敌后欧洲犹太人的电台和报纸被摧毁没有给予任何报道，只是麦丹尼克或奥斯威辛的死亡营偶尔被提及，或者只被简单一提，使人看不出牺牲者大部分是犹太人。战后，苏联公民中凡是仇视犹太人的和同纳粹合作过的，都被作为卖国贼而遭到处罚。但是即使此时，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仍隐瞒着关于犹太人殉难的情况，基辅的情况是最典型的例子，在德国人占领了该城时，被杀死的犹太人有五万或六万，但却拒绝建立任何纪念碑或别的标志来纪念他们。

在 1948 年，斯大林的行动宛如他是以色列新国家的教父，这是居心叵测和为了他的权力考虑的。他在联合国中的代表为以色列的建立进行辩护，而当时许多国家的政府对它是不是合法还是有争议的。斯大林对东欧的某些政府进行鼓励，要它们允许各强国残存下来的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甚至还提供武器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去进行争取自己独立的战争。不难看出他的这种政策的动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所进行的斗争就标志着英帝国瓦解的一个阶段，它将促使英国加速从中东撤退。由于美国是以色列的坚强后盾，所以斯大林还希望借这一政策改善一下苏美关系。这个希望终将破灭。此外，以色列不久就成为西方在中东的前沿阵地。于是斯大林就谴责以色列领导人背信弃义。同时，苏联的犹太人深受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因为他们仍醉心在圣经的传统中，而且正由于他们的人民忍受着磨难和无形的歧视而悲痛不已。当以色列的第一个外交使节果尔达·梅厄夫人亲临莫斯科时，她立即受到苏联犹太人的热烈欢迎。这件事正发生在斯大林大肆宣扬民族优秀论和民族外以使人民与外界隔离之时，因而苏联某些犹太人拥护以色列的这种情感的突发性表达，不能不引起斯大林警觉。这种自发表露的情绪，公开无视他维持全社会统治的那种机械的纪律，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在他牢固的统治中，最微小的裂缝也会对整个制度造成致命的打击。如果允许犹太人在自发的游行中随意地宣泄自己的感情，他又如何防止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做同样的事呢？于是他禁止了游行，并使一些犹太人被捕入

斯大林政治传记

狱或被流放。党的忠实宣传员开始谴责以色列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砝码；并责备那些倾向于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放弃了对苏维埃祖国的忠诚。

这只是一部分。犹太人迄今还没有享受到作为一个民族应享有的权利，即在规定的范围内实现他们自身的权利，孩子有到国立学校受教育的权利，发行自己各类出版物的权利，发展自己的文学和艺术的权利。这样，斯大林就推翻了他自己在列宁执政时期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时所制定出来的政策。他这样做的托词是，苏联的犹太人已经享有同其他民族同等的权利，已经和俄罗斯人融合，不必再去固守老套的分离主义。这种说法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从犹太人对于以色列的反应来看，他们的融合远不是普遍的或完全的，甚至在最俄罗斯化的犹太人中，由于他们民族最近所遭受的悲惨状况而激发起一种新的犹太人意识，而斯大林现在所推行的强制同化措施使这种意识更加强烈。斯大林的官方用民族不歧视的原则来辩护他们的歧视行动，由于这是在纳粹杀害了几百万犹太人之后发生的事儿，就更加令人震惊了。

当查封了犹太人的剧院、刊物和出版社时，他们个人遭到了迫害。一些同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有关联的著名人士也成了殉葬品。他们之中有罗佐夫斯基，他曾是红色工会国际的领导者，后来任外交部副部长；还有伊兹克·佩弗、大卫·伯格森和皮奈兹·马尔基什，他们都是有名的意第绪语文学家。所有这些都遭到一定程度的迫害。一个意第绪语的天才演员米霍尔斯不为人知地归天了。接着，不幸又降临犹太籍的苏联作家头上。外界只是从报纸上间接地了解一点信息，这些报纸谴责“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和“不忠贞”的人们，其中刊登了一些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以俄罗斯为笔名而为众人所熟知的犹太作家的名字。后来传言，斯大林甚至打算把所有犹太人流放到比罗比詹的“犹太人自治区”去，如同他当年流放过伏尔加河的日尔曼人、印古什-车臣人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一样。如果他真有这种想法，那是不合情理的。犹太人受到国家重要部门的一些知名人士的保护，这些人处在工业的管理部门、党的机构、核研究部门、学术界和军队当中。但是，国家虽然少不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却发现自己处于上下为难的境地当中，前途渺茫，被视为外国侨民，而又不享有任何文明社会中外国侨民所正常享受的保障权。他们感到自己是一种不知名的阴谋的目标；正是在斯大林的统治终结之前，压在他们心头上的黑云越来越浓了。

这些年以来，甚至表面上的“集体领导”也没有阻止住斯大林的专制统治；而对他的个人崇拜甚至达到了极端荒谬的程度。他被尊称为人民之父，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所有劳动人民的良师益友，万物生长之流，给社会主义以生命的力量。在所有的文学作品、党的重大决议文件和学术刊物中，他都被冠以这些殊荣。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一系列伟人当中，与他的先辈相比，斯大林不值一提。如果说君主专制统治是有赖于上帝的恩赐的话，斯大林就是靠历史的恩赐进行统治的。他被信奉为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国家凭借自身的地位，自居于世界之巅，但却拜倒于他的脚下。《真理报》不厌其烦地在头版登载充满溢美之辞的《致斯大林的信》，而其他报纸也不甘示弱。1949年12月，在他七十岁生日的时候，祝贺电文蜂拥而至，《真理报》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全部刊登出来；对他七旬大寿的颂词直到他去世前不久还以专栏的形

斯大林政治传记

式刊登在《真理报》上。著名的莫斯科革命博物馆展览了他所有的生日礼物，这些礼物来自每一个矿山、工厂、工会、集体农庄、党基层组织和学校。同这位专制独裁者“历史性的华诞”相比，仿佛中国革命、同西方发生的严重冲突、朝鲜战争、甚至国内工业建设所取得的成绩都微不足道了。仿佛二亿苏联公民生活中的惟一目的就是敬仰他和送给他大量礼物。为了使这种大规模的奉承行为不会因单一而使人乏味，那些奉承者还煞费苦心地琢磨一些吹捧的新花样，公众吃惊于一些越来越新奇和怪诞的最高级形容词。

以赫鲁晓夫的话说，“斯大林亲自使用一切办法来加强对他的颂扬”。他校订了官方的关于他本人的自传，这本传记中本来就有许多“不着边际的吹捧”，他仍不满足，亲自加了这样一些句子：“斯大林是列宁事业最好的接班人……是当今的列宁”；“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战争的每一个阶段，斯大林发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斯大林对于军事的精通表现在防御和进攻两方面。斯大林同志的天才使他能够预测敌人的作战计划并击破它们。”最后，存在着这种无与伦比的说法：“斯大林尽可能不让他自己的工作由于轻微的虚荣心、骄傲或自我吹捧而遭受丝毫的损害。”就像一个瘾君子一样，他渴望能够过足瘾，就不断增加毒品的剂量。他好像仍在试图逃避已经长久折磨他的自卑感，摆脱心中的不安情绪，摆脱处于权力顶峰的孤独感，以及摆脱由于脱离民众而产生的恐惧。这种不断吹嘘的效果，就是要使人民在心目中把他视为一种几乎超自然的和牢不可摧的力量，这种力量即使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是不可动摇的。

赫鲁晓夫主动而详尽地描述了斯大林随从在这些年里的情

斯大林政治传记

况。强盛的博恰、凯撒家族在处理与随从关系方面，也不会比斯大林对待国家高级官员和政治局委员更为蔑视和多变。他“打着他们的招牌行事……却不征求意见……甚至他时常不把他……有关党和国家重大事情的想法告知他们……在战争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诚然，在1941年10月试图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全国的代表都被召集到莫斯科来，他们白白地空等了两天……斯大林甚至不想同他们见面和会谈。”赫鲁晓夫指出，自从消灭了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之后，斯大林变得异常的骄横和专制。“斯大林以为，从此他就能独揽大权了；他现在只需要一些跑腿的人；他以他的方式同他们相处，即他们只能服从和称赞他。”事实上，在消灭了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之后，斯大林就开始压制他自己的斯大林派。赫鲁晓夫恰好指出了这个大清洗的最后阶段，当时斯大林疑心他的一些随从是伪装的布哈林派或托洛茨基派。因此，他授权逮捕和处决了在1934年召开的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与会者，还有由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一多半的成员。所有这些都属于斯大林派——课本把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说成是“成功的大会”，因为斯大林派曾在会上祝贺了他们对所有党内反对派的最终战果。在镇压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斯大林派的主要成员之后，幸存的人就为自己的生命胆战心惊了。赫鲁晓夫说：“在当时的情形下，我常常同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布尔加宁交谈。一次当我们两个人乘车旅行时，他说，偶尔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一个人以朋友的名义被邀请去见斯大林；但是当他同斯大林坐下后，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是回家还是被捕入狱。’”“斯大林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有着病态的怀疑……他能够看着你说：‘今天你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眼睛为何游离不定？’或者说：‘今天你为什么这样坐立不安，而且还躲开我的目光？’”“他十分骄横，要从精神上 and 肉体上把一个人折磨致死。”战后，“斯大林甚至变得更加多变、敏感和残暴……他的虐待狂已经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

听了赫鲁晓夫说了这些话以后，一般人都认为斯大林害了偏执狂。但是不能确定地说他已经害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错乱症。他的半偏执狂行为是根植于他当时的处境：是大清洗必然带来的后遗症。他甚至对他自己的随从都抱以疑心，这倒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些人曾经与他一同去迫害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但是当这种镇压转变成为 1936—1938 年的大屠杀时，许多最忠实的斯大林派成员也感到惊诧并怀有歉意。他们认同斯大林行动的前提，但不是它的后果。他们曾同意从思想上镇压反对派，但不是肉体上消灭他们。波斯蒂舍夫、柯西奥尔、鲁祖塔克和其他一些人敢于表达他们的悔意和疑虑，并对维辛斯基的审判程序提出一系列疑点。他们的做法，就立即使斯大林对他们忠诚产生了怀疑；确实，他们也正趋向于对斯大林背叛了。在对消灭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必要性发出疑问时，他们并非反对斯大林一般的政治决定，而是看不惯他的道德品质，同时提醒他犯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如果他们的行动始终一致，就注定了要计划颠覆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对斯大林来说他们就可能变得比托洛茨基分子或布哈林分子更具有威胁性，因为他们仍能借助于自己作为斯大林派领导人的影响和权力来与斯大林对抗。他必须承认，他们在言行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他不能坐等着他们利用他们的权力来反对他。为了自卫，他必须先下手为强，而且只有消灭了他们，他才能高枕无忧。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他处于可怕的恶性循环中，即使他拥有健全的精神，也必然要成为虐待狂。他对周围的人越是采取客观的、冷静和健全的看法，他就越加产生一种不信任和恐惧心理。他越是避免自我欺骗，他就会看到越可怕的梦魇。他不能既保持自己的权力而又使整个派别毁灭殆尽；他不得不从二者中挽救其中的一个，使它继续存在下去，把它作为自己统治的工具。但是那些幸存者是以什么心情在为他效劳呢？像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这样一些人，都是鲁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西奥尔和爱依赫这些斯大林主义老近卫军的亲密伙伴，难道他们对处决这些人能够无动于衷吗？如果他们确实没有反应，他们就是丧尽天良的恶棍，那末斯大林怎么能够期待他们坚守忠诚呢？如果他们有所反应，那末不管他们如何小心地掩盖自己的感情，也不能不对他们残忍的主子感到极端的愤恨和敌视。无论如何，斯大林都不能依据表面现象来接受他们的忠诚。他不得不对他们持警惕、怀疑、监控的态度。有时，他试图洞悉他们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想。但是这些思想和感情是深不可测的，因为他自作自受，自己造成了这种情况。他既然迫使他的随从们伪装无限的崇拜和忠诚，戴上了虚伪面具进行掩饰，那么他现在就无法使他们显现出自己的真面目。既然他不可能了解他们在伪装的后面可能包藏着什么阴谋诡计，那末他们正在谋划某种诡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暴君的臣子是他无限权利的最好见证，他们了解自己的命运和公共事务的指挥经常决定于他的突发奇想和自负，因此他们比任何人更容易把专制看成是万恶之源。对他们来说，搞阴谋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宫廷叛乱是他们采取行动方法的特征。

在这几年里，当克里姆林宫成为国家政治活动的惟一根据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地时，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有没有人试图发动宫廷叛乱呢？斯大林的后继者告在诉我们一切内幕时，没有对这一问题作答。但是，他们的确透露出，在斯大林的晚年，他的随从中几乎不间断地在计划着一个阴谋。他的亲信经常处于对他的恐惧之中，在在职和丢官、生和死之间彷徨着。不为别的，起码为了自卫，也必定敦促他们采取某种行动；而且如果赫鲁晓夫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 1956 年能够那样仇视和谴责斯大林，那末这种感情肯定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也在激励着他们，使 they 要试图去摆脱这个可怕的梦魇。斯大林一定已经感觉到这一点，或者说猜出这一点。

那末，没有形成反对他的阴谋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些想搞阴谋的人由于受到一种强烈的束缚力而被克制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在他们的意识中尽管早已是残余的和扭曲的，但使用“个人恐怖”的手段仍是遭到反对的。而更为有力的因素是，这种约束力是从集体犯罪和集体责任中得来的。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他们的朋友们，曾秘密参与了斯大林的许多罪行，因而同他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如果想通过暴力来切断这种联系，那就等同于自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小段时间里，斯大林的追随者首先遭遇了这种担心，他们当时有理由忧虑宫廷叛乱会毁灭国家的防务和士气。战争暂时中止了上层的危机。战后，斯大林得到了来自战争胜利的保护——没有人敢动手来反对处于鼎盛时期的大元帅。在新的灾难、恐怖和失望使那种鼎盛时期的荣耀失去光芒并再次使人们陷入失望以前，还应存在一段时间。所以，只是到了斯大林的晚年，上层的危机才又再次爆发。沃兹涅辛斯基的垮台和列宁格勒事件就是这种危机的首次

斯大林政治传记

反映。在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遭到清洗之前，曾在政策问题和意识形态上有过长时间的和半公开的冲突，这次新的清洗则不同。因此，没有人能说清楚像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辛斯基那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主张和他们的失宠预示着什么，也许就不曾就什么根本的政治问题发生过敌对。对于一个中央委员会书记或政治局委员，现在明智一点才是最好的，不要使那位领袖生气，或者牵涉进一件模糊不清的宫廷阴谋里，不然他就难以脱身了，而他的命运也就是对别人的一个警告。

赫鲁晓夫说，在沃兹涅辛斯基消失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同另一个政治局委员马林科夫为了给同事求情而到斯大林那儿。斯大林向他们狂吼道：“沃兹涅辛斯基已经被作为一个人民公敌而遭到揭露了；他今天一大早就被枪决了。你们打算告诉我说你们也是人民公敌吗？”听了这番话后，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或者被迫要求召开政治局的紧急会议来思考这一事情，而这就意味着发动一次反叛；或者他们只能后退。结果他们退缩了。他们明白，甚至在他们试图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前，他们就会被消灭。在他们设法与别的成员取得联系以前，斯大林就会知道他们的动机，因为每一个成员即使私下在浴室或寝室中，也受到窃听和侦察。而且政治局无论如何也是没有力量采取行动的。斯大林企图使它的成员相互猛烈地竞争，以便各个控制。他由于担心随从们搞阴谋，就残酷地用阴谋来对付他们。

这位七旬老翁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他的精力在快速地减退。爱伦堡看到，他与他在公众场合悬挂着的肖像一点都不一样，看起来就是“一个小老头，脸上布满了皱纹”。但是谁也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不去想，甚至也没有人敢悄悄地问一下他死后应该如何处理。这位作家继续说道：“我们已经长时间记不得斯大林也是一个终会一死的人。他已经变成一个神秘的和无所不能的神。”青年诗人叶夫图申科说：“我想象不到他会死，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理解不了我们怎么会分离。”

他的意志仿佛是处处存在的，但他本人却几乎是什么都看不到。莫斯科人只是在很少的法定节日中离着很远的距离看到他，那时他站在列宁墓顶端，接受群众的致敬；或者就是在某些重要人物的葬仪中看到他，那时他会在棺材旁走一小段时间，等到棺材被送到克里姆林宫墙的葬地。他在约五年的时间里没有公开发表一次讲话。正当朝鲜战争初期令人焦虑的日子里，他选择了这个时机表明过自己的态度，这种表态是在语言学问题上的。《真理报》扩大版面发表了他的一系列信件，攻击尼·雅·马尔学派，这是一个在近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对语言解释最有权威的学说。斯大林没有受到他在知识上半瓶醋的影响，对语言学和哲学问题高谈阔论，语言、同行语和习惯语之间的关系，聋哑人的思维流程，以及在遥远的将来在共产主义中人类实现统一后所产生的单一的世界语言。在信件中他喷射出一点自由主义的玫瑰香水，大骂马尔学派对苏联语言学的垄断，并抗议它压制反对派意见。他声称，这种做法可以同亚历山大一世的名声极其败坏的警察头目阿拉克齐耶夫相匹敌。他给人的印象似乎超然于报纸上正在流行的维护国教的趋势，超然于李森科攻击非正统的生物学家，超然于在艺术界方面日丹诺夫所遭受的“颓废的现代主义派”的折磨，也超然于反对“腐朽的自由派”和“无根的世界主义”的运动。他这位政治迫害的怂恿者，却把自己在公众面前表现为国家的知识的裁判

斯大林政治传记

者，不，简直就是在保护学术自由。但是，当一些人认为，由于苏联所受到的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已经不存在了，而是处于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内，现在应该是国家日益走向消失的时候了，也就是政治上的压制应该抛弃了，斯大林却提出一个说法来反对这些人的意见。斯大林宣称，在大部分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以前，国家不能开始消亡。这就意味着，他用教条主义的语言让知识界“要保持头脑清醒”。

人们欢呼他关于语言学的敕令是划时代的事件；在几年之中，党的雇佣文人坚决不对他们沉默的主人的经文进行一点儿新的解释，只是不断地引证他对聋哑人思维过程论述的学究式说法。直到1952年10月，他才又在公众面前作新的和更为重要的表态，这就是他在经济学教科书讨论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写给许多院士们的信。在对苏联所谓的“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进行考虑时，他提到了苏联经济中社会主义工业和集体与私营各占一半的农业之间的分裂。他指出，农民的私人利益和贸易正在对国家的进步形成障碍。他叫嚣着警告说：“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开始受到这些现象的阻碍了……妨碍……完全把全部国民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如果认识不到这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盲目了……愈向前去，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所受到这些现象的影响愈大。”他因此就给全国一种暗示，对于农业政策在统治者内部是有争论的——早先的一个迹象正式否定了赫鲁晓夫关于“农业城镇”的想法。斯大林现在又对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一项建议进行了否绝，即国家应该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这项建议遭到斯大林反对的原因在于，斯大林认为不能指望农民能像国家那样去实现农业机械的更新和现代化；而且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他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们，就会使已经阻碍国家计划的农业经济中的非社会主义趋势进一步发展。他建议缓慢地限制农村贸易，并实行在政府和集体农庄之间直接交换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政策。但是他又坚持说，这个解决办法只是一个短期性的，他没有给党提供怎样马上解决农业停滞的建议。他把这个困境遗留给他的继承人，即他强迫实行集体化的沉重负担。

1952年10月4日，在他发表那些文章后的第二天，召开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从1923年以来，斯大林没有作为主要报告人向代表们讲话还是首次。由马林科夫代替了这一角色，就像斯大林在列宁晚年第一次做的那样。赫鲁晓夫则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于是全党才意识到接班人的问题已经急待解决了。斯大林坐在离主席台较远的后面，成为不断的致敬和欢呼的对象。发言者依次地引述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但真正的辩论却根本不存在。代表们“全体一致”通过了党章的修改和新的五年计划。只是在闭会时，斯大林才站起来发表了几句关于苏联在世界上地位的话。他认为，苏联作为孤立的社会主义阵地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在它周围都是一些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生力量；而且由于同这些国家的合作和团结，使它能够很轻易地执行自己的任务。他还号召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共产党“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并为所有民族的独立而奋斗。他的讲话充满了乐观主义，甚至是很热情的。但是他所讲的，正好是对他的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的否定。这是他统治三十年来对党和国家的最后一次讲话。

尽管斯大林讲了许多让人宽慰的话，但代表大会仍然感到无法预测的和凶险的事件即将来临。马林科夫和其他发言者谈及了前面的危险，谈到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的加剧，也提到了

斯大林政治传记

要求高度戒备。就像在战前大清洗的前夕一样，到处都在高喊加强戒备。仿佛是预见到了需要与过去再次划清界线一样，代表大会决定今后不再把自己称为“布尔什维克”。由二百四十名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比旧的多一倍。这个中央委员会选出了一个主席团，其人数也比旧的多一二倍。作为党的领导机构，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人数都太多，机构非常庞杂。斯大林这样做有什么原因呢？赫鲁晓夫后来解释，斯大林让代表大会选出这样大的中央委员会，是由于他计划通过血洗的手段将它的规模缩小。他企图通过预备演员的办法，来代替他准备消灭的那些人。赫鲁晓夫进一步说，斯大林在新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恶毒地攻击了米高扬和莫洛托夫，但又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明确的指控——他已经表示过，他认为伏罗希洛夫可能是一个“英国间谍”。据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再次想消灭政治局的一些老委员，目的是消灭他的罪行的见证人，因为这些人能够向以后的人们作证来反对他的。不管事情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反正代表大会弥漫着恐怖气息而令人窒息。11月，在布拉格，克里门蒂斯、斯兰斯基和其他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遭到审讯，他们被以托洛茨基分子、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间谍、铁托分子定罪。这是东欧一系列审讯中的最后一次，也预示了莫斯科新的审讯的到来。基本上每一天都有对党和各界的知名人士提出的让人难以想象的恶毒攻击；几乎每一天都有硬说居于高位的人犯了缺乏警惕的罪行；几乎每一天都阴险地暗示“人民公敌”和间谍混进了国内；也几乎每一天都在大声地反对犹太籍人的“无根的世界主义”。《真理报》严肃地警告读者说，任何苏联公民都负有承担其亲属所犯的罪行的责任——这种警告从雅戈达和叶若夫时期以来就人人皆知了。但关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于这一条将实用于什么人却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不过米高扬的两个儿子不久前被逮捕了；莫洛托夫的妻子也遭到了流放，她是一个老党员，而且是凭借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同年年末，《布尔什维克》的主编费多谢耶夫被撤职，他被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之一苏斯洛夫谴责为沃兹涅辛斯基的同犯。

最后，官方在 1953 年 1 月 3 日宣布，以美国间谍机关特务的罪名，九个医学教授被揭露出来。这九个人都在克里姆林宫工作，担任统治集团成员的家庭医生。他们被控的原因是按照美英间谍机关的命令，谋害了日丹诺夫和什捷尔巴科夫两个党的领导人，并且企图对瓦西列夫斯基、康尼夫、果沃洛夫、什捷缅科等元帅和其他人进行谋害，以削弱国家的防务。这些“作为医生的暗害者”大多是犹太人，被指控是按照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个国际犹太人组织的命令进行活动的。据宣布，这个阴谋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得到清晰的调查，于是关于反犹的喧嚣和提高警惕的号召就达到了至高点。

这次对克里姆林宫医生的控告只能被视为一场正戏前的小片段。他们作为医生，在政治上是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的，他们为自己而努力夺取权力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对他们进行审讯，起诉书中将只能把他们说成是具有重大政治野心的人的猫爪，是那些痴迷于权利和以此为职业的阴谋者的合作者。这样的阴谋者只能出自党统治集团中地位较高的人，因而对于这次阴谋的“真正”策划者的揭露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成为这次医生审讯的高潮。这场审讯的监督者暂时还在忙于迫使医生们招供，让他们准备以自己被迫承担的角色去进行演出。这些医生们面对着一个伪证，这就是某个名字是蒂马舒克的医生给斯大林递交的一封检举信。赫鲁晓夫描述了斯大林是怎样亲自监

斯大林政治传记

督审问并命令把犯人带上镣铐和进行拷打。他告诉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杰夫说：“如果你问不出他们的口供，我们就把你的头砍掉。”后来他把医生们的口供材料让主席团成员依次审看，但他没有给予他们权力过问这个案件和核实那些指控。他感觉到他们的猜测和惊恐，就嘲笑他们说：“你们就像一群瞎了眼的猫。如果我不在，这儿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国家将要毁灭——你们就是做不到识别敌人。”

主席团的成员们感到惊恐和困惑是完全有道理的。虽然这个案件在很多方面让人回想起旧的大清洗审讯，但它也有一种惊人的新奇特点。在过去几次旧的审讯中，被告除了被控犯一些罪以外，总是说他们有谋害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党的领导人的企图。现在这一次审讯所具有的意义就更大了。“阴谋者”企图暗害的人几乎全是斯大林高干名单中的人。在这次审讯中，法官、检查官和报界都将向全国宣称：“这些人都是我们必不可少的领导人，我们是坚决不能离开他们的服务。敌人知道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地消灭他们。”如果某个政治局委员的名字在这个特殊的高干名单中没有被提到，那他实际上就是失宠了，因为如果“人民公敌”都没有消灭他的想法，那末他或者是不配居于高位，或者就是同他们勾结在一起。

医生案件令人震惊的新奇之处，在于被告们没有被控企图暗害现存的某一党的领导人——只有早已不在的日丹诺夫和什捷尔巴科夫被说成是他们的谋害者。指控中有意地强调一点，认为医生们的企图完全是消灭军队的首脑。这种奇怪的情况，即固执地宣称敌人只选择元帅们和将军们作为自己的目标，使党的领导人们难以理解。他们必须思考这种说法的寓意究竟何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在。显而易见，阴谋的策划者就是想把军方作为崇拜的偶像，而诽谤文职的领导人。究竟是谁提出了这种说法呢？由情况推断是军队的情报系统而不是国家安全部。苏联的这两个情报部门彼此竞争，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事了；显然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杰夫对这些命令是不情愿去执行的，所以斯大林才被迫用“砍脑袋”向他施加压力。内务部长贝利亚是阴谋的发起者的可能性不大——几年以后，当斯大林的继承者们以斯大林的帮凶和叛徒的罪名对他加以“清算”时，他们也没有指控医生案件与他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如果说发起阴谋的人来自军方，那末斯大林又为什么给予他们支持呢？是否他着眼于接班人问题而鼓励将军们出来争权夺利呢？如果确实如此，这对党的领导们又预示着什么呢？他们是不是会遭到撤职或消灭呢？是不是斯大林因此才攻击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和安德列耶夫？这会不会是他的最后一次清洗，他同已遭到他的贬斥和耗尽生命的党的最终决裂？他一只脚已经进入坟墓，难道还希望上演或帮助将军们演出很多年以来布尔什维克一直担心的波拿巴政变？究竟斯大林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利益？这个秘密被他带到坟墓里去了；党的领导人们也不会比他们的后代们更能把这个谜揭开，因为斯大林的行动和动机看来是完全脱节的。

除了在争权夺利上进行斗争，斗争还存于在基本政策的问题上。在 1953 年及其以后斯大林继承者之间公开化的分歧，甚至从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就分裂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集团同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集团之间存在的分歧，是早已有的，虽然因为斯大林还活着，对他们自由交换意见设置了障碍，以致这些集团还不能公开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使之表现为一定的形式。斯大林的大部分随从都知道和察觉到，国家这口大锅已经

斯大林政治传记

热得过分危险，它的安全阀门应该打开了。但是斯大林却以其间歇性的余勇，将这个阀门关闭了，而且把它关得严严的，准备使 1936—1938 年的政治迫害再次重现，更使这口锅的压力大增，并加剧了苏联同西方关系的紧张程度。在克里姆林宫的每个角落里，在每个科研机构、办公室、犹太人家庭和知识界中大肆地寻找着美国间谍，这被公认为是精神病似的行为。但是假设这个国家正在准备战争，那就可以把这种疯狂的行为弄清楚了。只有在进行战争准备的情况下，斯大林决定提高将军们和元帅们的地位，使他们出足风头，这才是合乎道理的。同样，他倾心于保密，坚持迅速增加军事开支，以及其他一些措施，也只能说他企图使国家转变成为一座兵营，并做好随时击退某个敌人进攻的准备了。

也唯有如此，斯大林外交的粗暴和僵硬才能得到解释。朝鲜战争在僵持着，斯大林以类似于交战双方对处理战俘的问题未达成协议等不值一提的借口，阻止已经进行了长时间谈判的停战协定签字。斯大林显然是不愿让美国军队从朝鲜脱离，从而得到在冷战的其他地区行动的自由。事实上，他的外交是毫无变化的，而这是由于各种互相冲突的政策所造成僵局的结果。在克里姆林宫中仿佛有一个“主和党”和一个“主战党”在喋喋不休的争吵，而暂时之间两者又僵持不下。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中有势力的分子是真正主战的和斯大林在给予他们赞助。由于上次大战的大屠杀，国家尚处于十分衰弱的情况中，甚至最缺乏现实感或最玩世不恭的政策制定者也不可能静下心来进行军事侵略的策划。分歧不用说集中于对敌人意图的估计上——也就是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西方国家会不会向东欧或苏联发起进攻。这是一个存在了很久的问题，在二十年代

斯大林政治传记

曾针对它进行过辩论，在未来还将在苏中的争论中出现。斯大林在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曾以一个争论的问题将它提出来，他公开声称，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再是无法避免的。

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斯大林尽管作了乐观的宣称，却是在那儿说谎话。表面上他消除了对美国进攻的忧虑，实际上却发动了或默许了根据进攻所造成的威胁的紧迫性和现实性制定的行动方针。因为只有假设华盛顿正在筹划战争，才有理由不停地谴责美国战争贩子，把克里姆林宫医生视作为某个美犹组织服务的特务，使全国动员起来和疯狂地发作，使美国军队在朝鲜不得脱身，以及使苏联及其卫星国保持长期的警戒和军事准备。

对外政策上的这个两难问题自然要对国内政策产生影响。那些主张国家一定要在精神和物质上立足于战争的人，是可能不会赞成将使政治纪律宽松和把国家经济资源作对按需分配有利的任何改革的。另一方面，任何对国内改革进行鼓吹的人，由于他们态度的逻辑结果，一定期望着同大西洋联盟国家实现讲和，要求在外交上更加灵活和主动，并希望实现能使国内气氛正常和安定的缓和的国际形势。对于这些人来说，任何改革都会非常顺利地恢复国家的公民自由，为代议制的政府扫清障碍，并维护革命的传统。他们的目标虽然是很温和的，但又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使国家脱离斯大林主义恐怖的疯狂，并使统治方法实现合理化。在对外政策上，他们的目标一定也是有限制的，因为他们了解，冷战与任何军事冲突是不同的，是不能通过军事谈判代表打着白旗去安排停火而公布停止的。但是，即使在冷战中，西方和苏联也还存在着宽广的余地，可以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进行更为真诚的交涉和接触，以达成富有成果的相互妥协。

然而，只要斯大林还在掌握政权，一切改革和改变的道路都被堵住了，形势日益变得更难以预测和更具有爆炸性。斯大林喜欢自夸自己在战略上的现实主义和精明。他曾不屑一顾地谈到像希特勒那样的“毫无满足的征服者”，他们“志气大但才气不足”，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停止”。他说，他不同于希特勒；他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停止。这种吹嘘是有一些道理的。斯大林在同他以前的盟友的军事冲突中曾多次在边缘上停了下来。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他曾停了下来，在伊朗问题上他曾停了下来，他曾在用军队进攻铁托之前停止了，他曾在柏林封锁还未出现最后灾难前停了下来。我们还不清楚他准备在朝鲜战争所引起的冲突中走到多远。他周围的人现在正感到奇怪：“他是否仍知道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呢？”

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他再也不知道在何处不去触怒和伤害这个国家了。他根本没有明白他已经面临着道义上的危机。他没有意识到，不管是他本人还是别人，都不可能再继续采用他的那种统治方法，他的各种思想同时代的现实情况和国家的需要构成了一种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个国家已经足够大了，没有必要再依赖他的监护了，也不再能忍受这种监护了。他的思想看来还停留于二、三十年代。在他看来，苏联仍然还是一个未实现工业化的和文盲占很大比例的原始社会，而他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这种社会上的。他自己已经不能适应于本世纪中叶的苏联，这时苏联一部分忽视他的想法，一部分又是受到他的鼓舞，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它的社会结构实现了现代化，它的群众得到了教育。这个转变还在进行之中，要使它的结果

斯大林政治传记

真正为国家造福，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斯大林在发现俄国的时候，它的耕种还在使用木犁，而当他离开它时，它已经拥有了许多原子反应堆了。”虽然说来，木犁时代在国家生活的很多方面还是留有残余的。对斯大林统治的这个概括，当然是在称颂他的成就，但是，在斯大林主义中，木犁和原子反应堆也是奇异同在的，就相似于原始的野蛮和马克思主义同在一块；而且当国家已经取得了进步，而斯大林政治的倒退因素却不断地给他的进步制造障碍，并威胁着要使它停止进步。

斯大林变化多端的专制主义从旧式农民的麻木和懒散中吸取了力量，甚至工人阶级也从这类农民中吸收新成员。但是，这类农民与已经长期存在的工业社会和巨大的城市是非常不和谐的。他和他的宠臣们从克里姆林宫对全国经济的控制过度集中，这在“原始积累”的初期可能是有用的，当时必须合理调节国家极其有限的资源，监督每一吨钢、石油或煤都一定要运向最急需的生产点，并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消费。但是对于一个规模巨大的、技术上复杂的和先进的工业制度，这种方法就是完全有害了。同样，斯大林政府用强制的方法迫使大量的农民进入工厂，对他们加以生产技术的训练，并使他们固定于某种职业，这在极端缺乏劳动力和生产技术的情况下，是可以得到某种原谅的。斯大林通过斯达汉诺夫运动和工资差别来鼓励不平等，虽然是残酷的，对他进行建设的决心不能有所怀疑。但是，当工业技术熟练程度日益提高的时候，过分的不平等和强制，就极其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使广大工人群众变得漠不关心和烦闷。一般来说，起初由于防止“十月革命成果”遭到反革命破坏而必须采取恐怖的措施，当新的社会结构已经确立下

斯大林政治传记

来了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日趋减少的时候，它的害处就愈来愈严重了。一再进行的政治清洗和迫害，破坏了官僚机构和群众的一切社会责任感和主动性。对领袖的迷信，给愚昧无知的农民群众塑造了“父亲般的形象”，取代了上帝和沙皇，这就意味着对国家的知识分子的一种侮辱，因为他们在勤奋地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渴望获取现代科学，使自己在文化上走向成熟。

在前面我们说过，斯大林主义是用原始野蛮的方法使俄国走出野蛮状态的。我们现在应该再作补充，这种野蛮的方法也是不能无限地继续运用。在斯大林的晚年，由于他所采用的方法，他的政权日益在失去进步作用。苏联为了使自己不断文明化，就必须抛弃斯大林主义。其中最紧迫的在于摆脱斯大林主义教条对化学、生物学、物理学、哲学、语言学、文学、经济学和艺术的干预——人们由这种干预会联想到宗教法庭的时代，那时在上帝、宇宙和人方面它为整个基督世界决定何种思想是对的和何种思想是错的。在苏联各大学中，在1953—1954年以前，爱因斯坦的著作一直是受到禁止的，弗洛伊德的思想同样如此。这种官僚教条或神学对于科学思想的渗入，本质上是属于前工业化时代的结果。在本世纪中，苏联的行为等同于有意在破坏技术、科学和国家防务。即使对最狭隘的宗派利益，这种破坏行为也是一无是处的，而一切有教养的人都迫切地需要避免它。为了做到这点，首先他们必须驱散仇外思想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迷雾般的影响。在一个意义重大的技术革命时代，这种迷雾使他们的国家孤立于全世界的运动之外，并使莫斯科公国民族精神的排他性倾向得到了增强。斯大林主义的孤立，如果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看来还是很现实和很有道理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那末现在就是十分可笑了，因为它把社会主义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科学只在一个国家取得成功了。当苏联的前途命运已经同世界其余地区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民族自我中心的思想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时代错误。即使从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出发，这种对古俄罗斯母亲不正常的称颂，也不可能同近年来革命的发展保持和谐。现在人类的三分之一已经由共产党来统治了，但是斯大林主义好像还认为它的领域仅仅包括古老的土拉区或唐波夫省。克里姆林宫失去了所有的时间观念。

“医生阴谋”的丑闻，最终把其道德上的败坏暴露出来了。斯大林对待犹太人的隐晦不清的行为，这再也不是第一次了。关于世界犹太人阴谋反苏的说法，本身就有一种“犹太长老议定书”的意味，而且与戈培尔宣传部的编造极其相似。如果这个阴谋被实现了——如果医生案进行审讯的话——它只有一个可能结果，就是全国范围地屠杀犹太人。但是，曾策划这一阴谋的政府仍然宣称信仰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几个国际奠基人的作品仍然被成百上千万地出版着，这些作品的学习也仍然被作为学校的必修课程。斯大林现在是在彻底推翻革命、国家和党赖以生存的思想；是在消除他自己政权的合法证明和意识形态所有权。通过这个行动，斯大林主义甚至在他的作者离开人间以前就在自杀了。党尽管已经变质和显得愚笨可笑，也不能跟着斯大林走向自杀。工人阶级中无数的先进分子和知识分子也不会这样做。这件丑闻对斯大林主义的解体只会起到加速作用，并做好了一次突变的准备。在斯大林死后一个月内，这个案件就收场了；这些医生名誉得到完全恢复，则是这个国家同斯大林主义决裂的第一个表现。

斯大林政治传记

我在 1948 年对斯大林的统治进行总结时说过：“斯大林不能被归入希特勒一类；在所有的暴君中，希特勒的记录是最无价值和最不足称道的。希特勒是一个没有任何成就的反革命领袖，而斯大林却是一场带有悲剧色彩的、自我矛盾的、但又是创新性革命的开拓者和领袖。”如果要对斯大林的整个事业作出评价，上述的说法仍然还是对的。我还说过：“斯大林事业中最好的部分，必然会使斯大林流芳千古，就像克伦威尔和拿破仑事业中最好的部分同样让他们流芳千古一样。”这些表述也是站得住脚的。但还一定要补充一句，在斯大林晚年的时候，他统治中的一些最坏的特征更加扩大和严重了。这种情况只是增加了下述结论的分量：“为了促使斯大林事业中最好的部分保留到未来，为了使它发挥完全的价值，历史还必须严格地重整和净化斯大林的事业，就如历史曾经重整和净化克伦威尔以后的英国革命和拿破仑下台以后的法国一样。”现在我们知道，从斯大林离开人世的那一天起，历史已经开始重整和净化的过程——但是在这儿，“历史”并没有代表任何最高的意志、抽象的规律和时代精神，而是代表人类为了自己的理想和需要而被迫进行的卓有成效的行动。正是由于苏联社会在这个伟大而阴暗的时代中的需要，以及这个社会从十月革命保留至今的理想，促使这个社会中具有先进思想的分子同斯大林主义分裂。在四十年代晚期，似乎还能够抱有乐观情绪的希望：“从长期来看，这些积极而珍贵的因素可能会反过来反对斯大林主义坏的方面。”这种愿望现在也已成为现实，虽然斯大林主义遗产中存有分歧的成分之间的斗争甚至到了六十年代中期都还得不到最终的解决。到了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头一个十年，

斯大林政治传记

苏联社会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十月革命激起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又进一步刺激了前进的社会经济热忱，但经过几十年的集权统治，所有政治组织和思想独立中心遭到毁灭，又使它的道德和政治退化，在两者之间构成了巨大的矛盾。苏联的统治方法和生活方式都不得不做一次全国性的剧烈变化，但却缺乏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来达到它，或者以明确的态度把这种急切的要求提出来，虽然这样的力量在人民群众中是存在的。正因为如此，就不会立即爆发推翻官僚专制主义的革命，也不会从社会底层发起要求循序渐进改革的有组织的运动。改革只能从上层、从统治集团本身、从斯大林的同伙和追随者中而来。这种情况事先就注定了所谓非斯大林化的优柔寡断、矛盾重重和机会主义的性质。

顺便谈及，通过从上而下地纯官僚主义方法来达到俄国生活方式的巨大而又被推迟很长时间的改变的实现，这已经不是首次了。一百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在沙皇尼古拉一世死后发出了废除农奴制的命令，这是革命前俄国整个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次改革。当沮丧的农奴主感到沙皇背信弃义地把他们抛弃后而提出抗议时，亚历山大回答道：“从下而上地废除农奴制要比从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度坏得多。”同样地，在斯大林的晚年，他的继承者也决心，从上而下地废除斯大林主义的不好方面，要大大地好于从下而上地废除它们。但是，正如沙皇半心半意地解放农民而没有解决俄国重大的土地问题一样，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非斯大林化也仍然没有满足苏联的社会主义愿望，而且它长期以来希望得到的自由仍然遭到了挫折。历史还要继续完成对斯大林事业的“净化和重整”过程。

斯大林政治传记

斯大林的死讯是 1953 年 3 月 6 日早晨公布的。按照官方的医疗报告，他六天前患脑溢血，全身处于瘫痪状态，意识和说话能力全部丧失。3 月 4 日晚上，第二次发病影响了他的呼吸器官和心脏。第二天晚上九点半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斯大林的病期持续时间非常短，使他的继承者刚刚有时间考虑怎样面对全国和在党与国家上层职务的再次分配上达成临时协议。从报道来看，在这一事件上全国的反应很矛盾，而这这是由于斯大林复杂而暧昧的性格所导致的。一些人悲痛万分，另一些人感到欣慰，而更多的人非常吃惊，不愿想到未来。他的继承者们则小心翼翼地行事，过去他们只不过是斯大林的影子，但现在仍作为他的影子来统治这个国家已是不可能的了。他们不想再像死者生前那样地对死者进行令人厌恶的奉承，但又担心不这样做会有坏处。甚至那些长久以来希望摆脱对他的个人迷信的人，一旦想到对斯大林的亵渎行为所可能造成的动荡，都不觉为之吃惊。所以，在斯大林的葬礼中，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都特别节制地低声颂扬他的优点。当丧礼进行时，许多群众自发地涌入红场；由于当局没有想到这样大量的人涌入，民兵们对此难以应付，于是群众自相践踏，许多孩子和妇女死于非命，在过去沙皇的加冕典礼和葬礼中是经常发生这种灾难的。

斯大林的棺材被放到红场列宁墓的墓室里，并列于列宁的棺材旁。晚上，在列宁墓的外墙上，在列宁名字的下面写上了斯大林的名字。但是，他的尸体现在已经从那个圣殿中被撤走了，他的名字已被抹掉了。那些被斯大林鬼魂缠身、并为他统治的遗留物感到不知如何是好的后代子孙们，仍然没有办法控制和超越他，只能把他从记忆中暂时地忘掉。